

GDF 76/13

湖南革命史料选辑

出版说明

一、湖南革命史料选辑系一套选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各种原始史料的丛书，供中国现代史专业工作者及其他有关同志参考。

二、本丛书分辑陆续出版。每辑有一至二个中心内容。

三、本丛书选材，以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国内报刊和其他出版物登载的有关湖南史料为主，个人回忆与调查访问纪录，亦将适当选载。

四、本丛书所载资料，正反两方面的均予采用，以便读者对照研究。

五、欢迎史学研究和有关部门积极投稿（包括文物图片）。稿寄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

序 言

本文献集为湖南省档案馆汇编而成，它翔实地叙说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事实。

湖南是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地区之一。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党中央和长江局即先后派出徐特立、任卓民、郭光洲、高文华等同志来湖南，加强湖南省委的工作，经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湖南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度呈现勃勃生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得以形成，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大量涌现，各种抗日报刊、杂志的广泛发行，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员队伍的不断充实和扩大，有力地领导了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的种种抗日救亡活动。所有这一切，无一不体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威力，无一不体现共产党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苦辛劳。现在，通过本文献集的出版，将这些史实如实反映出来，这对党史和湖南抗日群众运动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大有帮助的事。

这些文献资料都是当时省委、县委的领导同志分别给中央和省委写的工作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种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日的事业，是怎样积极从事广泛的抗日救亡工作，是怎样为打开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局面作出努力！尽管其中所叙述的事实、分析的情况、记录的数字和研究的问题都比较简单扼要，然而对于当时

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党的建设诸方面的情况，几乎都涉及到了，既有事实和理论，又有工作的检讨和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有我们党，才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党；只有我们党，才能够领导人民走上革命胜利道路的真理。

湖南省档案馆的同志，为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从许多原始材料中，做了详细的校订、抄写之后，共选编了二十一篇（其中布告一篇），并依时间顺序及先省后县的次序编排。对其中不宜公开的某些内容和人名，均在省略处加以说明；对其中的错别字及衍文，增补的漏字和脱落无法辨认的字，则分别用“< >”、“[]”、“□”标示，并尽量按原件式样付印，以存其真。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编者

目 录

一九三七年

- 中华军委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1)

一九三八年

-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
(一九三八年九月) (3)

一、湖南的社会情况

- (一) 劳动者的状况
- (二) 教育、文化的状况
- (三) 青、红帮的活动
- (四) 地方武装的情况
- (五) 湖南的党派活动
- (六) 反革命的活动
- (七) 新闻界的活动

二、湖南的政治情形

三、我们的策略和我的工作

四、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 (一) 军事工作
- (二) 职工工作
- (三) 我们对各种工会的工作方针

- (四) 我们在工人中怎样进行活动的
- (五) 党在工人中现有工作情况
- (六) 党在职工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
- (七) 关于青年工作
- (八) 农村工作
- (九) 党在妇女群众中的活动
- (十) 宣传工作

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46)

一、政治情况

二、工作的近况

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

(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 (56)

一、三个中心工作执行程度

二、党的组织现状

第一、党的组织的分布

第二、党的生活和教育

第三、一些个别的问题

第四、党的发展的缺点

三、湖南的目前政治和社会

四、领导和工作的一些问题

王涛关于湘南特委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 (81)

一九三九年

徐特立关于湖南二、三两个月统一战线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

告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84)*
一、湖南环境的转变	
二、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于重庆)	(91)*
一、社会与政治情况	
(一) 汉奸、汪派、托派在湖南的活动	
(二) 湖南的土匪问题	
(三) 关于兵役问题	
(四) 国民党各派别力量之变动及其活动	
(五) 国民党政策及其影响	
二、湖南党的组织状况	
(一) 组织机构及数量	
(二) 支部工作	
(三) 干部问题	
(四) 由半公开转到地下党的活动的过程及其发生的现象	
三、对外工作的现况	
(一) 群众工作	
(二) 宣传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总结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108)*
王涛关于湘南政治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	(112)*
一、目前湘南的政治情况	

二、党的工作

三、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

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118)

一、党的发展过程

- (一) 发展党的环境、动力、方式及其所经过的时期
- (二) 发展的成绩和错误
- (三) 发展党的经验教训

二、党的组织状况

- (一) 各级党部的状况
- (二) 干部状况
- (三) 党员状况

三、领导机关及领导方式

- (一) 了解下层及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
- (二) 县委的情况
- (三) 领导方式
- (四) 怎样检查工作
- (五) 领导方式上的错误或倾向

四、支部工作

- (一) 支部组织状况
- (二) 支部生活
- (三) 支部的经常工作
- (四) 上级党对支部的领导
- (五) 环境转变下的支部
- (六) 支部工作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办法

五、党内教育

- (一) 党的一般文化水准
- (二) 干部教育概况
- (三) 党员的教育概况
- (四) 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办法

六、倾向斗争与党纪

- (一) 发生了哪些倾向
- (二) 自我批评的情形
- (三) 党纪是怎样执行的

七、干部问题

- (一) 干部现状
- (二) 今后的干部政策

八、秘密工作

- (一) 如何秘密
- (二) 干部的暴露
- (三) 经验教训

九、各地党破坏、叛变的情形

- (一) 破坏的经过
- (二) 国民党破坏我们的方式及我们的对策
- (三) 教训

十、群众工作

- (一) 群众工作发生、发展的过程
- (二) 目前(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时说的)的群众工作
- (三) 群众斗争与群众要求

十一、统一战线

- (一) 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态度及我之对策
- (二) 中间分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对他们的策略如何?

(三) 统战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办法

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工作报告

《一九三九年》..... (164)

一、政治状况

(一) 在湘北战局前七县政治状况

(二) 湘北战局结束后的政治状况

二、组织状况

三、各县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四、经验与教训

五、支部活动

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给周意的信

《一九三九年四月》..... (172)

一九四〇年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八月》..... (175)

一、湖南政治经济形势

(一) 战局发展中之湖南前途

(二) 薛岳之治湘方针与实施

(三) 民众生活与民众对抗战信心

(四) 湖南之民众运动

(五) 经济鸟瞰

(六) 教育事业

(七) 国民党、三青团之发展，生活及其内部矛盾

(八) 顽固反共分子对我党之进攻

二、组织工作

- (一) 工作进行两个时期
- (二) 党的组织概况
- (三) 组织的隐蔽工作
- (四) 党员的审查与清洗
- (五) 党的教育与学习
- (六) 秘密工作
- (七) 支部情况
- (八) 关于领导方面
- (九) 巩固组织中的左、右倾向与斗争

三、统一战线工作

- (一) 各种抗战力量之一般分析
- (二) 持久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困难
- (三) 从碰壁中所找着便于活动的方向
- (四) 党在统一战[线]活动中我们依据的资本
- (五) 实际的一些联系与一些活动
- (六) 统一战线工作中给予我们的教训

四、群众工作

- (一) 农村方面
- (二) 职工方面
- (三) 青年方面
- (四) 妇女方面

五、宣传工作

- (一) 书报推销
- (二) 报纸方面
- (三) 出版刊物
- (四) 党中央通电、宣言的传播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228)

第一、两个阶段

第二、湖南的政治情况

- (一) 第二阶段的政治情形
- (二) 现阶段的政治情形
- (三) 湖南的经济情况
- (四) 文化教育状况
- (五) 军事

第三、湖南的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止的情形)

- (一) 湖南党的发展过程和有利条件
- (二) 对于发展党的不利条件
- (三) 发展党的实际情状
- (四) 由量的发展到质的巩固
- (五) 有组织的地区和党员数量
- (六) 党员成分
- (七) 党龄
- (八) 女同志
- (九) 干部问题
- (十) 领导机关
- (十一) 县委的领导
- (十二) 区委
- (十三) 支部
- (十四) 党内教育
- (十五) 执行纪律和思想斗争

第四、统一战线

- (一) 开始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
- (二) 湖南的国民党 (一)
- (三) 湖南的政府对本党的态度 (一)
- (四) 友军对本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 (一)
- (五) 阶级间关系的变动 (一)
- (六) 摩擦和对策 (一)
- (七) 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一)

第五、湖南的民运 (一)

- (一) 由发展到沉寂 (一)
- (二) 初期民运的情状 (一)
- (三) 原有的合法团体 (一)
- (四) 抗战以后新增的合法团体 (一)
- (五) 我们对于民运的支持 (一)
- (六) 国民党对于民运的态度和方法 (一)
- (七) 民运的经验与教训 (一)

第六、湖南的民众武装 (一)

- (一) 民间枪枝 (一)
- (二) 人民抗日自卫军 (一)
- (三) 抗日游击队 (一)

第七、敌人、汉奸在湘情况 (一)

- (一) 敌人的进攻 (一)
- (二) 敌伪汉奸的活动 (一)
- (三) 我们对敌人、汉奸的对策 (一)

第八、今后湖南的任务 (一)

密家藩关于湘鄂西公南特委的工作报告 (一)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279)

一、党的组织状况

(一) 各级党委

(二) 干部状况

(三) 党费

二、党的发展过程

三、组织机构、领导方式与工作制度

(一) 组织机构

(二) 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

(三) 巡视工作与报告工作

(四) 计划工作与检查工作

四、支部工作

(一) 支部的建立原则

(二) 支部组织状况

(三) 支部生活

(四) 区委对支部的领导问题

(五) 工作经验教训

五、宣传教育工作

(一) 党内教育

(二) 对外宣传工作

六、倾向、斗争、党纪

(一) 一般发生过这样一些倾向

(二) 倾向发生的来源

(三) 关于反倾向斗争

(四) 自我批评情形

(五) 党纪的执行

七、干部问题

- (一) 培养干部
- (二) 提拔、配备、使用干部
- (三) 干部团结问题
- (四) 关于审查干部

八、秘密工作

- (一) 国内形势逆转前的秘密工作
- (二) 现在秘密工作情况
- (三) 秘密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及其克服

九、各地党的破坏与叛变情形

十、群众工作

附：公南特委补充报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304)

- 一、党员数量 (公安)
- 二、党员成份 (公安)
- 三、洗刷出党坏人及其种类 (公安)
- 四、各地党的巩固程度
- 五、党的发展过程
- 六、支部 (公安)

杨锐、许诺关于岳阳中心县委一般情形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招待所)..... (309)

一、客观环境

- (一) 自然环境
- (二) 政治环境
- (三) 沦陷前后的环境变化
- (四) 敌人状况

二、党的工作

(一) 党的发展 (以岳阳为起点)

(二) 党的现状

(三) 组织领导问题

(四) 教育、宣传问题

(五) 干部问题

三、统战工作

(一) 对统工的态度和作风

(二) 统战工作的进行

四、群众工作

(一) 群众的困苦与要求

(二) 组织群众的困难

(三) 党对于团结群众的工作

五、武装政权工作

六、平江惨案

(一) (惨案发生前的政治情况)

(二) 我们的对策

(三) 惨案的经过和我们的损失

(四) 惨案发生后的政治环境和我们的工作

(五) 这次惨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胡庆熙关于湘潭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 (329)

一、关于一般的停止发展党，进行巩固工作的问题

二、关于审查成份，清除异己分子、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及

敢探奸细的问题

三、关于党内教育的问题

四、关于加强党的保卫与反奸细斗争的问题

- 五、关于秘密工作问题
- 六、没有甚么可以提出
- 七、……
- 八、关于撤退与掩护的问题
- 九、关于现存支部的问题
- 十、关于保甲工作方面

金在关于在湘西两年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 (337)

- 一、第一时期的工作 (乾城——沅陵)
- 二、第二时期 (在凤凰鸦拉营)
- 三、第三时期的工作 (在永绥)
- 四、两年来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教训

一九四一年

聂洪钧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 (345)

- 一、统一战线环境
- 二、湖南的派别团体情形
- 三、我们对抗战中的各种派别
- 四、工作经验教训

湖南妇女工作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 (358)

- 一、客观环境
 - (一) 社会一般概况
 - (二) 社会特殊情况
- 二、妇女一般生活概况

- (一) 政治、经济地位及家庭状况
- (二) 习惯与婚姻
- (三) 文化与教育概况及对抗战的认识
- (四) 各上层妇女在抗战中的政治活动概况
- (五) 妇女生活的痛苦及改善问题

三、湖南省妇〔女〕组织概况

- (一) 在统计之前几个说明
- (二) 其他妇女组织产生及发展过程

四、妇女工作概况

五、统一战线工作

六、党内妇女工作

七、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五年

湘鄂赣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工作情形给中央、毛主席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374)

一、军事

二、政权

三、财政

四、地方党

(227) ……

中华军委湘鄂赣人民 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日本法西斯蒂自“九·一八”向我中华民族开刀以来，无时不以攫夺我国领土与主权为主要标帜。此次芦变发生，席卷北平，囊括津市，轰炸上海，进犯京、杭，屠杀无辜民众，摧毁重要学府，更加暴露其无止境的侵略野心。这使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陷于飞机大炮轰炸恐怖的痛楚，五千士兵为国牺牲，两员高级将领为国殉难，举国上下，曷胜悲痛！

当此战事展开的紧急时期，只要是中国人民，不论任何党派职业，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都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本会矢志“抗日”，枕戈待旦，已非一夕。在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秉承我中央酷爱国内和平统一的意志，须应国人抗敌救国的愿望，凡属是真正抗日武装部队，都应携手共同踏着前线抗敌将士鲜血的血迹奋勇前进，以挽回全国家全民族覆亡的厄运，完成军人捍卫国土应有之天职。是敢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肯认中日矛盾为主要，阶级矛盾为次要，直至停止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取消敌对阶级思想，诚愿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及其直接指挥下之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和平谈判，使湘鄂赣和平得以呈现，增强统一的民族抗敌力量，而重湘

鄂赣边区防卫工作。

近乃有破坏国内和平统一的不肖之徒，当我双方进行谈判时，胆敢欺骗落后民众，散播红军“投诚”与“收编”等荒谬离奇鬼话，阻扰红军集中，破坏红军制度与两党合作，只徒〈图〉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大计。尤其是可耻之方步舟，竟从中挑拨内战，污蔑维护国家和平的国军五十师，不肯停止进攻，致使双方发生误会，延长和平谈判时日，此种居心，实与汉奸无异，贻害国家，诚非浅鲜。本会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计，对于个别破坏国内和平统一、挑拨内战者，决采取严厉的镇压与取缔。自布告日起，嗣后如再有这样情事发生，造谣污蔑，即是故意捣乱抗敌后方秩序，助长日本法西斯蒂在华暴行，损害国力，应以汉奸论罪。切切此布！

主席	傅秋涛	
委员	邓 洪	涂正坤
	刘玉堂	钟期光
	谢 乾	谭启隆
	江渭清	明安楼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

(一九三八年九月)

[湖南的社会、政治情况及我们的策略]

一、湖南的社会情况

(一) 劳动者的状况

国家的军事工业,部分的移到湖南,重工业工人较过去增加。新化县的铋矿仍照旧开采,矿工并不因军事减少,反有增加。我们开始有组织(长江局介绍同志信由我转,所以知道)。

公路、铁路、国防工事和飞机场迅速的发展,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过去没有党的领导,最近不知怎样,纵有,也是薄弱的。

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有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但窑业主很多,资本很小。因军事而窑器不能出口,价格低落,工人失业。我们的党正在进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劳资双方协调,要求地方富人贷款,以货作抵,继续开工。地方富人因怕工人失业酿成事变,有可能希望贷款。

长沙和湘潭有数千码头工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剥削

*本文时间系编者考证。

下，工人的工资往往只能实得百分之五十。在湘潭的株洲码头工人，每日可得工资一元左右，工会包办抽去五毛左右。工人无力反抗，我们还没有工作。长沙码头，是从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组织了。

长沙有人力车三千多张，每一人力车昼夜换班，常是二人以上共一车，因此人力车伙有八、九千，不知目前有无党的组织。车工会负责人是过去的党员，系自首分子。

湖南纺纱厂有工人三千余，有CC、复兴社和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活动力较大，我们采取统一战线的办法进行工作。

湖南的湘东、湘南和湘西，都经过革命斗争，反革命分子技术较高，叛徒部分的可争取，部分的还是他们的工具，使我们的工作发生困难，加上我们过去苏区的党员不善于做秘密工作，因此，在这些地方还不能有较好的群众组织。

(二) 教育、文化的状况

湖南教育在数量上发展很大，比十年前中等学校增加了一倍、到二倍。七、八百学生一校的中学校，在长沙有二十以上，但质量并不好。近年注重文言文，注重封建的精神教育，采取法〔西〕斯蒂的训练和组织。大部分教员为饭碗问题不敢和〔我们〕发生关系。教育厅常用密令及其它不公开的方法对付我们，及限制革命的书报贩卖和学生订购，但大部分学生是接近我们的。

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上层领导是国共两党分权，差不多力量相等，经常的在斗争中过活，互有胜负；但下级干部差不多全体是我们的。我们的党曾经估计下级干部的力量过大，曾提出一改选名单，以为可保证完全通过。结果被中间分子（杨东莼个人）操纵，通过了国民党提出的名单。我是不赞成改组的，因为说干

部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名单可保证通过，我才赞成改组，结果失败了。但因为有下级干部，我们还有力量。该会经常办训练班，已经办了八、九个月，每次都有我们的同志教课。

职业界抗敌后援会，实际上也是一文化团体，因为是银行、邮政、店员等组织的，办有政治训练班，将近全体是我们同志上课，我也有课，领导权完全在我们手中。省党部命令警备司令部解散它，而该会提出抗辩书在《观察日报》上发表，结果没有解散。

上面所说的是进步的现象。再将反动的文化报告于下：

湖南私塾与学校差不多平行的发展，小学校毕业生和初级中学毕业生，有许多再请老学究教经、史、子、集。乡下还有不进学校只入私塾的。

佛教的居士林也与学校平行发展，经费也不减于教育费。长沙城有无数的佛堂，教育界、绅界、政界失职及部分在职的，大批加入居士林。如赵恒惕、彭永彝、罗子云、粟戡时等，均是佛教中要人。而且现在的佛教是学密宗，不是学禅宗、相宗，迷信更深。〔居士林〕最初来自日本，现在又和西藏喇嘛结合。乡下也普遍的组织居士林，家中有五十石谷至百石谷收入的人，大部分入居士林。每次捐款都愿出，要他们出救国捐，能出一元、二元的；在出佛教捐，一次可出五、六十元。

这些迷信团体是维持会的对象。湖南曾经破获一个三期普渡会，其中有汉奸作用。同善社有汉奸嫌疑，被政府解散。

（三）青、红帮的活动

湖南的土著，只是红帮。自东南失陷以来，大批难民来湘的有许多的青帮，但青帮力量较小。红帮中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因

政治找不到出路加入红帮。壮丁逃兵役的，也有些随红帮上山当土匪。政府曾下令禁止青、红帮活动。红帮的武装埋藏在民间的要求政府收编，政府收其弟兄，遣散其首领，因此造成红帮与政府尖锐的对立。湘西土匪劫政府的枪枝、子弹，并破坏公路。政府派兵去剿，并收买一部，还没有成效。最近不知情况如何。

青、红帮常有人找八路军，我只与他们发生抗日的政治关系。我申明八路军不吞并任何人的军队，中央军和晋军被敌人击溃了投入八路军，八路军把他们收编后，仍送回原部队。八路军对任何军队只是站在友军立场帮助，因此不收编任何军队，借以拒绝他们及和他们发生政治上的关系。曾有一部分青帮的武装，我派聂昭良去帮助政治工作。

(四) 地方武装的情况

湖南的民团，因对付我们的游击队，组织比较普遍。在国共合作时，被何键把他们的枪枝都收归政府，以致地方的民团不相信政府，近来购买的枪枝都暗藏起来。这种武装，他们已有表示，是用来对付游击队和溃兵用的。这是第一种，纯豪绅地主的武装。

第二种是保安团，就地筹款，由政府直接指挥。这是地方性的正规军。

第三种是和省府有矛盾的正规军，如宋子文的税警，有三千在湘西，属赵君迈指挥。还有衡阳的行政专员孙则□，有枪三千枝，系从山东带来，经过军委会登记，但与省府有矛盾，他曾向我们的同志吕振羽要干部。

第四种是土匪，湘西已经发生暴动，湘南已有部分的活动。以上这些武装，如果日本进兵湖南时，必然会有大的活动。目前他们多少与我们有些关系，如果我们策略正确和有干部去工

作，而在我们领导下，可以转变为抗日的力量。目前，我们的策略是和他们发生政治上的关系：1、枪枝在日本未进攻以前不可集中，以免有扰乱后方的嫌疑；引起前方军队调到后方剿匪；2、要用抗日的政治训练干部；3、将来还要和政府发生好的关系，取得合法的地位。

(五) 湖南的党派活动

在湖南的国民党，有CC派，名为甲派，有何健派，名为乙派，有历史上长期的斗争。目前，CC把何派从省党部完全驱逐出去，但地方党部无法驱逐何派。何派纯封建的，CC是在封建基础上加上法西斯的方法，因此何派易于利用。何派首领刘岳厚曾约我会谈，因为甲派有与乙派勾结共产党，不敢公开的和我们接近。但他们内部的矛盾也减少了对付我们的力量。

CC派占据教育界，对我们极毒。他们的口号，“反共”是主要的，不过他们力量不够，需采取秘密的手段，常常被我们同志揭穿其阴谋，或在太会上或在报纸上发表，取得一些胜利。

复兴社从前比较弱，因为张治中是复兴社的主要干部之一，在政权帮助下，迅速的用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发展起来，与CC是对立的。就现在情形看，CC更反动，曾与其他亲日派结合的前途，现在已有这种情形。在武汉不守后，甚至有加入反蒋之可能。我们很难与CC接近，虽然CC中我有不少的学生和朋友，但从政治方面接近，比复兴社更难。现在我还没有适当的策略对付CC。

我们的党在湖南发展很不平衡，目前数量较八个月以前增加了七、八倍，大概到年底可发展七、八千，现在连兵四千左右。国民党害怕我们发展，到处阻碍我们。例如在茶、建、攸特委管

辖区域，企图用造谣方法，说我们在该地组织劳工队，不服兵役，有枪枝，压迫富农捐款，向省府诬告，结果查无实据。

在一月前，耒阳县委九人（包括伙伙在内）一概被捕。和省府交涉，未得回信。因张治〔中〕赴汉，我动身时又写一信给张，并指定一个代表请张发护照，到耒阳去调查并解决，目前不知情况如何。这一类的问题，过去用谈判方式解决了一些，但一面解决又一面发生。我们应该有一个原则的决定，以便今后在一定原则下来解决问题。

（六）反革命的活动

一切反革命活动，都利〔用〕国共和中苏的矛盾，都在日本政治间谍影响下活动。我初到湖南时，就有一种谣言说：“满清政府还没有亡中国，而国民党把中国弄亡了。”同时，有人说“满清时用方孔钱，物价便宜”等等，正当着南京失陷时散布出来的。

德孚洋行中的德商，曾到湘东调查商情，其实是调查民情和军事地势。其中有一德人姓名与我的姓名音相近，名徐克立。这一洋行确系国际间谍。

托匪在湖南设立有中国共产党列宁派湖南分部，去年九月成立的，现在在醴陵办有中学校。鲁涤平所办的民国学院，系国民党党部出款聘有托派教员，主要负责人是叶青的学生王宜昌。该院系托匪活动的机关，同时有我们的同志转学到此当学生，还有三、四个教员，如吕振羽、谭丕谟、翦伯赞，均系共产党员。因此，托匪的活动被我们征服下去了。但在醴陵方面，我们还没有相当的办法。

日本在湘政治进攻的对象，在下层利用迷信团体，主要的是佛教；在上层的对象是失意的军人和失意的政客，如彭允彝，过去

是国会议员，现在不易做政治活动，但他在南京失陷时确有组织维持会的企图。他的活动系彭的老婆向他的朋友即我的学生传出的。赵恒惕恐怕也是维持会的对象。赵头脑比较简单，容易利用，加上他比较穷困，而所往来的人都是失意的，他本人又是佛教居士林重要人员之一，他周围所围绕的是有做维持会的会员资格者。赵的老弟赵君迈头脑清晰，与他的老兄确是两样，现在我们与赵君迈有关系，而且〔是〕经过李克农同志考查许可的，我们可以经过〔赵〕君迈做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七) 新闻界的活动

过去有《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中苏》半月刊、《联合》旬刊四种刊物，可以全部由我们利用。现在，《抗战日报》停刊，《联合》旬刊也停刊了。

《衡报》是何键的报，《力报》是复兴社的，《国民日报》是CC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这些报纸不能指导抗战，而张高峰事件发生，他们根据东京电发表言论，几乎做了日本的喉舌。《中央日报》有些言论比较正确。《大公报》是一种极老的报纸，有二十余年的历史，是各方拉拢的一种报，不为过激言论。

二、湖南的政治情形

(一) 下层的政治机构：区、乡、保、甲长大部分换以学生。张治中办了行政干部训练班，有三、四千行政干部毕业，分发到区、乡、保做行政工作。少数有革命性的能得地方的信任，大多数既没有经验，又非本地人，学生的生活习惯又与农民不相投，

除奉行上级命令外，无他工作，对于抗战没有帮助。日兵一来，必然鸟兽各回家乡，政权必然会仍旧落在当地土著手中。

区、乡、保、甲利用征土、征兵、发行公债等等大发国难财。乡长如果需要发财的话，一年可以有一千到三千元收入的。任何贪污案件，只要是某些党派的干部，都不能揭穿。下层行政机构是在封建残余的基础〔上〕加以法西斯蒂专政的方法，其为害地方较之满清时更厉害。因此，在乡间还有些洁身自好、有爱国热情的士绅，可以和他们发生好的关系，对于我们是有利的。目前，我们对于区、乡、保、甲还没有正确的策略。

(二) 县以上的政权机关与党部大部分是一致的，但在某些问题上冲突，每一个冲突都对于我们有利。例如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改选，系省党部包办，省主席不赞成，因此，我们的力量就没有完全被省党部排除。职业界抗敌后援会，省党部下令解散，省政府不同意。又，湘潭县有一书店被县党部封闭，又被县长启封，许其营业。“八·一三”纪念只有机关参加，没有任何群众参加，使省主席到会说话黯然无色，于是省政府一个秘书做一篇文章，大骂省党部，在报纸上发表。我们的报纸拥护这一言论。继之职业界又发表反对省党部要封闭他们的文件，他们的矛盾也给革命力量一些帮助。张治中比省党部确实要进步一点，但他是复兴社高级干部之一，他的行动不会违反复兴社的主张。目前，换了潘公展当秘书长（CC），鄧梯（极反动）当省府委员，在张的用人行动中看不出基本上与党部的差异，所差的是他们的利害问题及对付抗日分〔子〕态度上的不同。不过因为他们有些差异，总是对于我们有利的。

三、我们的策略和我的工作

(一) 在群众中、士绅中、政府中提高我们党的威信。因此，我在长沙工作只抓住大的政治问题，如南京失陷后中国往哪里去？徐州退却后中国的前途如何？张高峰事件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这类大问题，群众迫切的要求解答。能够正确的解答，就大大的提高了党的信用，他们以为共产党是政治的预言家。对于这些大问题，我的估计大体上和党一致，都和事实一致。因此，我的地位大大的提高，而且出我意料之外。

长沙城从外〔省来〕的热心政治者，大部分都和我谈过国家大问题，而且在外省的报纸上发表，更提高了我的地位。因此，不赞成我的湖南人，不敢公开的反对我。

我发表言论和文章，都经过和别人谈话和座谈会，所以到发表时能有内容。目前我说话的谨慎，不轻易发表，因为我的行动、言论，人们不认为是我个人〔的〕，而认为是共产党〔的〕。

(二) 争取一切抗日的力量，同时避免与国民党摩擦和不失自己的立场。例如对青、红帮问题，省府下令禁止青、红帮活动，我发表赞成青、红帮抗日的言论和用抗日的政治教育青、红帮弟兄的言论。我提出的原则是：青、红帮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他的社会基础，一纸命令不能消灭，徒增加摩擦，只有改造是有益于抗战，有益于政府。

同时，青、红帮向我要求给以八路军的名义，使他们组织武装抗日。我以八路军不收编任何人的队伍用来发展自己，只进行友谊的帮助，拒绝用八路军名义，而允许目前在政治上帮助，将来两部分队伍如果接近时，进行友谊的帮助，不发生上下级的关

系。

(三) 工作的对象：上层的对象，争取个别有实力的、有名望的、有能力的愿抗日的分子，经过他，在他们掩护之下进行下层群众工作。例如行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青红帮、个别的资本家，是有实力的人，找一个算一个；学者、政治家、作家、老绅士，利用他们出名字做发起人和提出公道的主张，在他们名义掩护下工作。所谓有能力的人，即是有斗争经验的一切青年干部。一切和我有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他们随时找个别的对象，准备着随时应用，并准备日兵到湘时的活动。

(四) 训练干部的开始：党训练干部采取秘密的方式，部分的党员在公开的群众训练班学习一般的政治，但数量十分不够。想要利用已有的学校，目前不可能。过去曾经利用过临时大学的训练班，目前省党部防范严密，不可能进行。

一月以前，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战时讲学院，已经找好校舍，开始招生。由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当院长，吕振羽当副〔院〕长。目前，省党部还没有来阻止。如果能有学生到校，开学了，就不怕省党部阻止了。不久以前，我曾写信给泽东、洛甫两同志，要求派几个下级干部出〔去〕当学生，将陕公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

(五) 解决国民纠纷的工作：国民党逮捕共产党的事件已有好几次。有些是我直接交涉解决的，如茶莲筱特委事件；有些经过我的交涉，由汉口给电省府解决的。一面解决又一面逮捕。尤其是散在各县的问题，必须经过上下级政府才能解决。有许〔多〕情况不明，解决容易错误，因此，我想多弄一些公开的代表驻扎各县。我曾写两个介绍信给罗梓铭，同〔意〕派他为代表，与平江县交涉及该区行政专员交涉一切问题。效力如何，还未得罗的

回信。……与特务部有交涉，向特务部……，致以……。

……发生了问题，请省府发护照派代表去解决颇有效。因为当地政府见由省发护照，必然是上级许可的，于是办交涉比较容易。过去在茶莲攸发生很大的效力，近来耒阳的问题又采取这种办法，效力如何，我已来此，无从知道。

……总之，国共纠纷问题能用谈判解决最有利。因为国民〔党〕无理由，就需要秘密；我们有理由，就需要公开。如果公开，虽多让步，也是有利的。如果秘密的干，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更困难，国民党秘密的对付我们，只揭穿过一次，其余的都没有相当的办法，终止了我们的回答。

……我们总的方针就是：不破坏统一战线和不失自己的立场。例如，我经常提出的口号是：进步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员不是例外。共产党是一个政党，政治是他的生命。做群众工作是共产党的生命，不能放弃这一工作。中日问题是国际问题，中国不能孤立解决中日问题。国共两党更不能孤立来解决中国问题，孤立双方都是自杀政策。

四、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为了便利中央了解湖南党自抗战以来整个工作的进展轮廓，特在写这一部分工作之前，将这一时期内的工作过程先来作一简略的叙述。这里约可分作下列的几个段落来说：

（一）“七·七”前。在国民党长期的残酷的屠杀镇压下，湖南党的组织除湘鄂赣与湘南外，其他地方早已摧残得极其星散了。直到西安事变，后来由失掉关系的袁策夷同志自动的开始进行一些工作，后来慢慢地建立了几个支部。这时的工作完全在寻找老同志

与联络旧关系上，至“七·七”前，他们便建立了湘江特委。不过，除与湘鄂赣党有联系外，直辖的组织只有铜官、益阳一共五、六个支部，与长沙的一、二个关系而已，大约包括着四、五十个同志，大部分都在铜官。党员成份几乎全部是工人。工作当然很狭小，但仍为“七·七”后湖南党工作的根基。特别是铜官地方，今天党在工人中有相当雄厚的基础，原有的组织是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七·七”后至一九三七年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抗战的发动，党慢慢开始了群众的活动。同时，外地同志与前进分子也零星回到湖南来了一些，特别是我来湘及其不断的公开讲演与各方的活动，党的主张开始在长沙普遍的广播着，而湖南党的群众工作亦逐渐活跃起来了。不过群众方面的活动，还完全限于学生知识分子中。至一九三七年底，除建立了包括着一百多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抗敌工作团外，在党的推动下，还成立了包括着八百余人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但由于对党的发展的注意不够，与长江局联系的薄弱，党的组织仅扩展至六个地区，党员仅扩展到一百多人。党员成份大大的变动了，学生知识分子约占三分之一强。这时，整个组织一般的都表现零乱。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开与湖南工作的需要，约十一月间，长江局便派了任卓民同志来湘。党的组织经任同志着手整顿，才慢慢的克服那些零乱现象。这时期的收获，对湖南党以后工作的开展，作用最大的为文抗会与长沙党的五十多个同志。

(三)省工委成立起及其三个月工作计划结束止（即今年一月至四月）。一月初旬，长江局又加派了郭光洲、高文华来湘。一月十六日，便成立了湖南省工委，袁策夷同志因环境不好去汉，于是省工委便由任卓民、高文华、郭光洲三人组织之。这时党的工

作中心为广泛的宣传党的主张，展开群众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在这一方针下，省工委曾制定他自己的三个月工作计划（即二、三、四月）。由于全党同志工作的积极性，计划进行的结果是：通过《新华》、《群众》、《解放》的推销，我无数的讲演、讲课、参加座谈及各地十几种报纸、刊物的出版或利用，党的主张是广为传播了。不过较为深入的还只是交通便利的湘中诸县与滨湖各地。群众工作则仅在文化人、小学教员、学生中组织了一些宣传剧团、歌咏队、读书座谈会等一类的东西。农村仅利用了或设立一些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流动图书馆等团聚了一些农民，人数是散布得极其零星，几个的，三、五十个的不等，但至多的也不过一百余人而已。进行得稍微好些的，还只是积极的参加了工会改选运动，取得了几个会员较多的（两个工会，包括会员三千余人）工会理、监事当选，与利用了妇慰会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伤兵、难民工作。党的组织是党员增加到八百余人，发展到二十几个县，一般的是完成了计划。但最差的则为军事工作，在部队中仅仅是几个联系而已，上层活动亦不好。这时期的工作详情，请参看三月中郭光洲报告与五月初高文华报告（据凯丰同志说，湖南各报告均交中央），故不详叙。

（四）五月至九月半。由于党的组织的扩大与群众活动的展开，工作是一天天的增加与繁重了。省工委为了胜任的肩荷当前的重责，便积极的充实自己，除长江局派来之聂洪钧同志外，还吸收了文化工作者谭丕谟（民大教授）参加省工委。五月初，省工委即由三人扩增至五人。接着，省工委又制定了一个三个月工作计划（即六、七、八）。这时期的工作中心为军事工作、民训工作与工人运动。由于计划中尺度过高与干部的欠缺，绝大多数的同志虽然都是在积极的努力的工作着，但计划仍是未完成。

六、七、八三个月的总结，请查阅聂洪钧在长江局写的报告。

以下我便开始写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一)军事工作

这一工作，在四月时还仅仅只是几个关系，当时省工委并未好好的进行这一工作。自长江局着重指出并确定它为湖南党的第一位工作后，省工委曾经几次的讨论过并确定以下的工作方向：
①机械化部队与化学兵团；②各种军事学校；③各个正规部队；④地方武装与民众武装；⑤伤兵工作。省工委是特别着重于前二类，同时将军事工作的严重意义传达给各地党，依据各地实际情形分别与各地党详细研究，并确定其具体工作与进行的实际办法。主要的地方党部，都配备了较得力的干部在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省工委除聂专门负责军事外，还配有较强的干事。四个多月来，我们虽然着重与加紧这一工作的进行，但一直至今进展得极其缓慢。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现有的实际情况为：

1. 机械化部队与化学兵团：

××师（即机械化部队）三个团中（一共只三团）有十三个同志，大半都是中尉阶级的驾驶员与教官，差不多都是班长或班长以上。他们的周围有几个进步群众，另有一个营长同志。这里复兴社监视得极是厉害，内中同志除审慎再审慎，小心再小心作些个别联络外，活动非常困难。八月时，我们曾抽调一得力干部进去作文书，计划是要他在里面主持党的工作，企图由外面的领导转进内部作直接的指导，但不久便被怀疑而赶出。十三个同志除大部编入两个支部外，其他是个别的联系着。

化学兵团有一支部，仅三人。内中有一理化技术很高之教官。

2. 军事学校：

(1) ××军所办之军事干部学校，其学生二百四十余人，有十一个同志，内中三个班长同志，分为两个支部。周围有二十几个进步的群众，有些不久便可吸收入党。全校学生有一俱乐部，内分组织组、宣传组、研究组、娱乐组。各组组长均系同志，这里的党员都通过俱乐部活动。二百四十余人中，一半为该军原来之连、班长，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一半为新招之青年学生，而我们同志多系新生中之高中毕业或高中生，活动相当便利。有一队长因不满学校中一些进步办法，特别反对教政治课，后为其他教官反对，军部方面即将该队长调走。

(2) 外国语补习学校，这是军事委员会委下某部设立的，系选拔各军之军官补习外语后送国外深造的。这里有两个同志，一为航空〔学〕校之上尉军官，一为某军副官。学校中很有些较进步的分子，党在湖南大学所组织之明日社（公开的群众团体，系研究抗战文学一类的性质）会议时，常请来旁听，虽与我们同志关系很密切，但为军队纪律限制，不能参加明日社。

(3) ××集团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全校五百余人，一部分学生为该军原有之连、班长，大部分均系新招之学生。党有两个支部，十九个同志，同志中除两个为该军之旧干部外，其余均为招收之高、初中学生。每一同志的周围均有一、二个群众。这里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学生同志活动建立起来的。湖大支部为了便利这训练班中同志对训练班学生的联络，通过湖大学生会成立了一军民俱乐部。

(4) 其他交辎学校、军委步兵学校，有四、五个同志。

3. 各个正规部队：

(1) ××之税警队，内有两个支部，十三人，多系班长或

通讯员，同志周围的群众很少。

(2) ××工兵团之军需主任为一较活动之同志，故他在军官中感情上还好。

(3) ××炮兵团、宪兵团、十五团等班长有三同志，这些同志都为不大活动之光杆。

(4) 另营长同志一，团副同志一。

4. 地方武装与民众武装

(1) 在岳阳、南县、淑浦、澧县等县，有保安队或保卫队之队长同志。这四个同志最多的指挥着百余杆枪，最少的三十多杆枪。在这些武装内，除岳阳建立了五个人的支部外，其他党的组织都未建立起来。

(2) 壮丁队方面，在各地的农民、工人同志大部分都在政府的规定下参加训练了。虽有些同志由于党的活动与他自身的模范作用，争取了一些队长或小队长的位置，但大都在训练完毕后便涣散了，我们亦未设法使之存在。土匪武装虽有几个联系，但是把握不住的。

(二) 职工工作

1. 湖南工人及工会和会员数目之概况

在重要的产业工人方面有：

湖南第一纺织厂三千六百人，常宁水口山铍矿三千余人，新化锡矿山三千余人，长沙白铅炼厂五百余人，长沙黑铅炼厂三百余人，湘南资、汝、宜各机构开采之煤矿三万余人，西南汽车车身制造厂三百余人，衡阳机械修理所航空修理所一千余人，兵工厂（湖南邵阳与巩县三处）一万二千余人，江西安源煤矿（湖南党有工作）三千余人。其他化学厂、防毒面具厂等等，约共六

万工人。

以上这些工人除炼厂与矿区之一部有工会组织，其他多系军事企业或与之有关的，大部均无工会组织（即法律上不准）。在手工业与其他职业工人中，就一般的调查，约共二十几万工人有工会的组织。我们知道较清楚者为长沙市职业工会七十几个，包括工会会员十五、六万；常德职业工会三十八个，工会会员一万五千余；益阳职业工会九个，会员五千余；南县工会八个，会员三千余。这些地方，都是所谓水陆码头，工人集聚较多，工会组织较多的地方。就我们的估计，湖南工人在合法工会组织中者约近三十万人。为了控制工会，而有些是劳资合并组织的。

2. 原有工会之实际内容及其派别

(1) 湖南工人有工会组织的原因：这主要的是由于大革命给予工人的影响极深，工人强烈的要有其自身的组织。其次，国民党一方面怕在严厉的压制下激起反抗，另一方面，国民党各派企图将工人的力量攫取为己有。同时，几年前的竞选国民会议之议员的选举运动，国民党各派更加紧了工会方面的活动，故工会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着。

(2) 工会中的领导分子，随着工人自身力量与国民党破坏、控制工会程度的不同，及国民党各派对工会之争夺，故工会与其领导分子亦可分为几种：

①一种为革命叛徒。这些分子在革命失败后一直作政府方面之特务队者，在长沙方面有铅印工会、人力车工会、泥木工会等。

②为国民党党员。这些系工人，过去曾参加过斗争，在工人中有相当好的影响。如纺纱厂工人代表团之总代表陈天佐，织造工会之理事陈作等。

③为无政府主义派。这派系十多年前劳工会遗留下来的分子，如湖南全省之鞋业工会的领袖李秉乾等。鞋业工会虽无全省系统的组织，但李秉乾确能号召全省之鞋业工人。湖南工会中，鞋业算一较健全些的，它仅在长沙便有一万五千多会员。

④工人自己的领袖。这些人多半都在大革命时参加过或领导过斗争的。在长沙以外，各县这种领导分子多。

⑤自首分子。这些人亦在大革命参加过斗争的，革命失败后，便被国民党强迫自首。这些人在长沙各工会中极多，安源煤矿几乎全都是的。这些人都是唯政府的命令做事。

⑥另一些为老板所掌握，但这是极少〔数〕的工会。

以上的工会领导分子虽有许多不同，但最大〔多〕数都与工人群众有密切关系。

(3) 工会中生活：除每年改选召集一次会议外，一般的都无生活，工人只是缴纳会费。

(4) 工会会员对工会的态度：由于湖南工人多参加过大革命，同时工会领导分子又多与群众有关系，故有些工会亦间常进行一些改善生活的要求。不过，一般的都是向资方政府交涉〔和〕打官司的办法。正因为如此，则有部分工会，它的会员对工会态度并不坏，特别在(3)、(4)类者所领导的工会。其他大都漠不关心，有的不满收会费，敌视者却很少。

(三)我们对各种工会的工作方针

(四)我们在工人中怎样进行活动的

1. 寻找下层中的活动分子。当今年一月时，工人方面的工作只有铜官、益阳、长沙三个地区，最多的还在铜官，长沙只是几个下层活动很小的同志而已。于是，我们只有采取各种直接间

接的办法找工人中的关系，开始时是着重于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下层活动分子的寻找。这些虽未加入过我党，但一般的对我党印象很好，同时又未作过国民党的事，故无什么告密的危险。经过这样一短时期的活动，便与各地各个工会的下层取得了联络。通过他们，党便与广大的其他下层积极分子取得了直接的关系。在各种活动中，我们便逐渐的吸收同志，建立支部。

2. 随着这一活动，便同时进行上层的联络与统一战线的活动。首先着重于那些真正工人群众的领袖或愿为抗日服务与工人谋利益的上层分子，即使是国民党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这时还不是以共产党的面孔出现，而以为救国、为工人的事业来活动。利用着许多实际工作的场合，如纺纱厂之恢复工会与成立救护和救国讲演，长沙织造工人反对资方扣工资，各地的筹备总工会及进行工会改选等等，便与纺纱厂CC工人领袖陈天佐、无政府主义鞋业领袖李秉乾、织造业CC首领陈作和周天璞及其他一批自首分子的工人首领（如长沙糖作业×××、海员孙××），都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与纺纱厂陈天佐曾共同计划，并由陈负责主持，我们负实际的编辑责，出版了《抗战工人》。与各派上层分子协商过与共同进行过解决劳资冲突及改选工会监理事和统一工人运动的事宜等等。除在许多小的工作上获得了相当成就外，较大的都为复兴社工人或特务队之工人反对破坏而拖延着或失败。这在纱厂恢复工会运动遭政府的否决与常德总工会成立的拖延最清楚的表现出来。工会的恢复成立，固为资方、政府所不愿，但这里工人中复兴社或特务队分子却起了极大的破坏工作。他们不仅在工人中广播着有砍头危险，而且还以挑拨离间造成对立，另一方面则进攻政府，反对成立。在这中间，党除向群众揭发其有害抗战、有害工人外，忍耐的策动各方向复兴社、特

务队工人的解释则很少很少。我们更没有在他们派别对立中去进行调解。

3. 关于工会的改选。当三月间公布了工会的改选后，党便抓住它作为工会工作的中心。除上层努力进行联络外，主要的活动是放在下层。为恐引起国民党、资方与政府的注意而限制、打击我们，我们决定不声张，潜伏的隐蔽的积极活动。当五月各地选举进行完毕时，我们进行了工作的工会大部分是取得了胜利，共约二十个工会达到了选举前所预定的目的。许多反对我们者，至今还未知道我党系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等到知道时，已来不及了。这里的有些成功，除工人中党的发展迅速，准备时间相当长，准备的工作相当充分外，主要还是未引起对方注意与上层的活动，故部分的工会上层的坏蛋，能较顺利的赶出去。

4. 关于工人的救亡活动：

(1) 壮丁训练。这是〔按〕政府的命令普遍进行的。但最初时，一般的工人都逃避，即使参加者都极其消极怠工。经过党在工会同志中许多解释和动员后，工人对于壮丁训练的〔态度〕是相当改变了，凡是我们所影响下的工会，有一部分会员都积极的参加着。我们为了改变对工人零星抽调，按地区训练，转到以厂为单位，工人集体训练，曾和资方协商，共同向政府请求，在益阳、常德的某几个厂是这样实现了。这不仅是工人要求，我党要求，而且对资方利益上也是他们的要求。壮丁训练，有几个地方的工人，党是使他们最热忱积极的参加了。如南县有些年龄较大者，亦剃掉胡子，刮光面孔，设法能受到训练。常德工人的壮丁训练队，现在是担任着常德市的警卫，如半夜巡街道、把守要口与盘问行人等。这里的班长、队长，大部分为工人中的党员与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以其模范的行动与努力的学习所争取的。这

些受训的工人，都有一例的制服与戈、矛、大刀或梭镖武装着。南县一队已发给步枪，编为正式的自卫团，队长为工人同志。岳阳亦有一部分码头工人编入自卫团。

(2) 各种政府所召集的抗日集会。工会还只能部分的或小部的召集参加，能大部或全部可以集合只有党基础较强的铜官陶业工会、南县码头工会、益阳织造与靴鞋工会与长沙织造、缝纫工会。这些工会在兵役宣传周、台儿庄胜利祝捷、“七·七”献金、“八·一三”纪念等的大会中，都能大部的改变过去官厅强迫参加的不愿的态度，走上自觉的积极的到会。

(3) “七·七”献金与书写慰问信。这是我们作得最差的工作，只是在各个工会中零星的作了一些，比较好些的只是在长沙方面。主要还是党在政治上没有进行动员，没有抓紧这一工作。

(4) 关于工人参战的动员。除铜官、益阳有二十人左右的动员外，其他各工会都没有，特别是动员到前线后，与党的和工会的关系完全无法维持。上面的人数中，约一半为党员。这些人大部分在生活上无办法，而党与工会又无法解决其问题的人。出发前，〔对〕我们怎样到部队中活动与如何尽其模范的作用，谈得极简单，有的根本什么都未谈，象遣散的一样。工人一般的对敌仇恨极深，也愿到前方打仗，但不愿编散，希望能将他们总起来编制，特别是要求编入八路军或新四军。当益阳几百织造业工人失业时，曾坚决的这样要求，当然不能如愿，最后还是将其分散回乡活动。

(5) 抗敌宣传。部分的工会会员都能多少以聚谈的形式作些，但用宣传队的形式则很少，仅织造业、纺纱厂、铜官陶业与某县一、二工会曾经作过，大半都是在各种纪念节日进行。经常的每周作一次的，仅纱厂化装宣传团而已。用壁报、标语作些宣传

的，亦仅是几个工会而已，也多是利用纪念节书写一些标语。如长沙之织造业、缝纫业、纱厂，益阳的织造业、靴鞋业，南县、常德之总工会与总工会筹备处等。铜官陶业工会作得特别多些。

(6) 募捐〔给〕八路军。这作得很少，而且很零碎，有的是为着交换《新华日报》看。比较作得大些还只有湘潭的皮革工厂。这里由于工人支部的积极发动，曾经继续的募到三百多元。

5. 关于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在我们所能推动的上列二十几个工会中都订有报纸，最大部分都订《新华日报》。有些小的工厂，工人集体订阅《新华日报》。我们所知道还有几处。工人自己设法出版的，还只有南县《工余晚报》，系每晚出版，销售五百多份，完全由同志所主持。纱厂工人出版有《抗战工人》，亦由同志主编，系附在长沙田汉主编之《抗战日报》上出版，销售三千多份，每周一期。现该日报停版，因而《抗战工人》亦未出版了。这两个报都太不通俗，不适合工人阅读，仿佛撑门面，表示工人出版有报纸。其他工会所办之两个小日报，我们的工人同志虽常投稿，但总〔要〕修改后才发表，大部都是发表的。工会所办的学校很少很少，除铜官陶〔业〕工会办有一所高小约二百人，与五所小学约四、五百人及其补习学校外，其他仅几个一、二十人工人夜学。在益阳织造业有两个二百多人的厂，由于这里支部相当大与强，这里的工人每晚都进行一个钟头的读书、阅报、写字，厂里是普遍着读书风，主要的由知识高的朗读《新华日报》。这里工人一般的都识字，而且普遍。

〔六〕6. 关于工人合作社。长沙码头工人有一将近百人的储蓄会，准备转为消费合作社。常德有一饭馆业合作社，由二十几个失业工人组织的，生意极好。两个都为同志所组织起来的，后者还是去年组织的，根基相当稳固。其他便没有什么了。

7. 救济失业与改善工人生活。这是湖南工人中当前一个大的切身问题，特别是由于无纱织造，工人方面的失业特别严重。长沙纺纱厂中织布厂的停工，失业七百多工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在加强工厂生产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下列办法：①将两班制改为三班制，吸收织布厂工友到大厂中来；②每日每人减少工资五分；③加开礼拜天（即星期日不放假）；④发中饭钱六分（即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不出厂吃饭，由厂方发钱购食，其钱数大约等于一般工人每天工资十分之一。提条件时即打算以这数目弥补工人减资的损失）。闻厂方已采纳，但厂内复兴社分子约二百余人又在酝酿反对。益阳的织造业失业工人，系由工会介绍不用资本贩卖东西，解决一部分。这是在向资方、政府、地方要求救济事未解决时。南县码头工人今年五月开代表大会时（共五百多会员，到代表六十余人），提出了取消资主的九元押金要求。经协商，结果由九元减至六元。长沙织造业工人因反对资方每月扣资办法，曾发生了几个厂的联合罢工，共五百多人。罢工暴发时，即由资方以汉奸〔向〕政府控告，旋即逮捕工人领袖三人（均系同志）。经工会各厂几百个工人联名证明不是汉奸与说明事件之真象，才释放出来（五月，织造业改选时，内中一人当选为组织理事）。斗争结果虽胜利，但有一厂却辞退了三十几个工人。湖南的工人与资方都对立得非常尖锐，资方对当选为工会理事之工人都是采取辞退并联名不雇用，这也是最为工人恼火的一点。这个，一方是工人对资方的积忿，另一方也是由于我们支部对新策略不了解。其实上面的争执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对于救济失业与改善生活虽还作了其他的一些〔工作〕，但实在是极不够。

(五) 党在工人中现有工作情况

1. 军事企业中：

(1) 黑铅炼厂有一个四人的支部。其中一人，这次竞选时当选为工会组织理事。党在这里可起相当的作用。

(2) 白铅炼厂有一个十五人的支部，这些同志都是苦力，同时没有工会。故党的活动极狭隘，仅仅与其工人作一般的联系而已，上层活动更是没有。

(3) 湖南兵工厂（改名修理厂）有一个三人的支部，无其他活动。

(4) 汉阳兵工厂有十三个同志，分散几处，曾作过戏剧活动，目前正在进行读书会。这些同志大都是有七、八年工〔龄〕的青年，文化水平都相当高，初中或高小程度。

(5) 巩县^①兵工厂还只有几个群众的联系，化学工厂也只是一同情的教员联系，防毒面具厂有技师同志，在上层中他可起一些作用。

(6) 衡阳航空修理所有一个五人的支部和中央修械所有一个三人的支部。在群众中活动都不广泛。

2. 交通方面：

(1) 船员：在长津轮船仅两同志。常德帆船中有支部，工会中的常务理事为同志。

(2) 汽车：只有西甯公路汽车厂有一支部，三同志。这里还活跃是“七·七”与“八·一三”都领导了工人参加了献金和树立“八·一三”烈士纪念碑，现正筹备成立俱乐部与制设学校，同

^① 原文如此。

时，与各汽车站都有些较密切的关系。能够使工作活跃，主要还是由于代厂长为同志。长沙公路上及修理厂都只群众的联系。

(3) 铁路：只有衡阳、岳阳两处的几个同情群众的关系。虽然在岳阳方面曾经派过两个同志做铁路工作，但无成绩。

3. 矿区：

(1) 安源煤矿现有六个支部，三十几个同志，有党的工作委员会。群众活动，有二十几个民先队员与救国联合会（多自首分子）。由于复兴社严重监视和胡乱的逮捕，故我们的群众活动非常困难。民先和救国会实际上都是秘密的。

(2) 湖南资兴国营煤矿有一个六个同志的支部。支部周围较进步的群众建立有一时事座谈会与一读书会，人数都只有十几人。另有一工人自己管理伙食的委员会，活动亦不广泛。这些群众组织亦是半公开性的。

(3) 新化锡矿与水口山锡矿都派去不久，工作亦未建立起来。

4. 在纺织厂中，党有党总支部。在这里，下面有五个分支部，共有党员五十几个，各个部门都包括有，细纱部与成包部的分支比较大些。由同志组织或复兴社，C.C发起我们参加支持的，有歌咏团约百几十人，化妆讲演团四十余人，救护队十人，工人写作团二十余人。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全厂工人总工会组织。为了恢复工会，工人中曾选出一代表团共三十五人，专门负责做恢复工会的活动，肉中有两个为同志。这一代表团是全厂各部门选出的。

5. 在军服厂中，有同志，仅几个进步分子的联系，无公开救亡团体。

在建设厅的难民工厂中，有党支部（五人），有读书会，座

谈〔会〕，能领导全厂工人公开的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5. 职业工会：

(1) 在长沙有：①织造业工人支部三十几人，工会三千五百余人，有几个同志当选为理事或监事，曾组织有抗敌剧团。这支部的同志多系各个厂的领袖，故与工会会员关系极密切，能动员参加一般的救亡活动。②缝纫工会工人支部三十几人，工会会员约五千多人，有几个理事、监事〔为〕同志，在工会中可起左右作用，同志亦多为工人中活动分子。③漂染工会工人支部四、五人，有两个同志当选为理事，工会会员约五、六百人。④码头工人中有六十几个同志，分为两支部，有工人储蓄会。⑤其他泥木业工人、人力车夫等有一些同志，但活动力都比上面的小。⑥店员中仅有十几个同志，极活跃，都参加在职业抗敌后援会内。五百多人之职抗会，完全由这些同志所领导，所组织。

(2) 在益阳在织造业、漂染业（最近成立的）、靴鞋、缝纫、理发、码头等工会中，都有我们同志当选为监、理事。织造、漂染、码头、靴鞋这四个业的常务理事都是我们的同志。上列六个业的工人都有支部，共同志六十几人。六个业的工会会员一共共三千多人。其他锯木业工会千余〔人〕，运木业工会千余人，虽只有个别同志；但与其监、理事有较好关系。目前已由这八个业发展成立益阳县总工会筹备处。

(3) 常德：在船工（划伕与拨船）、石业、码头、缝纫、筵席业、人力车等工人（会）中，都有党支部，共有三十几个同志。上列工会的监事、理事多系同志，工会的会员包括七、八千人，而船工工会系五千多人。县总工会筹备处早成立，主持筹备处之五人，有三人为同志。因各支部的同志多为活动分子，故他们在工人中都有相当号召力。

(4) 南县有码头、筵席业、屠宰业、锯木业、店员等，都有同志，共五十几个党员。上列的工会监、理事虽都有同志，但作常务理事的只有码头和筵席业。这里有县总工会〈会〉，正、副会长均系同志。县总工会〈会〉过去都为县党部所操纵，对工会活动限制特别严，故这里工会的救亡活动亦特别差。上列的工会包括会员约二千余人。

(5) 铜官陶业工人中，党有一区委，十几个支部，党员四百人。工会的理、监事大多是同志当选。这里一共有六千五百多人，都是加入了工会的。各厂代表与小组亦不少的为同志。

(6) 其他湘潭、汉寿、安化等县，在工人中虽都有些工作，但较上列者更零碎，而且又在手工业工人中，故不叙述。

总计，湖南各地党在工人中的支部约六十余人，最少三人，最多的达五十余人，一般的为十余人，一共党员约一千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在合法工会中，监事或理事与党支部可起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可起决定作用）者有二十二个工会，包括工会会员将近三万人。

在工人支部多，工运相当开展的地方，建立有党内工人工作委员会，如长沙市委下，益阳、南县、常德各县委下都有。另有铜官区委，均系工人支部。安源工作委员会亦均系工人支部。

工人干部已发现和提拔者，相等于县委一级者约十五人，相等于区一级者约四十余人。在约六十个工人干部〔中〕，产业工人干部约占十人。凡在工会中作工作者，几全部都是作该地党内工作，直接指导党在工人中的组织。虽然明知其在公开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上不好，但由于干部的缺乏，只有暂时如此。工人中非党的群众干部〔工作〕我们做〔得〕很差，也没有认真的去注意

这工作。

以上均系党在工人工作中现有的组织情形。

(六) 党在职工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

虽然我们一般的客观的估计了湖南原有之各业工会性质，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实际的动员，及时的注意了工会的改选，相当的建立了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发现与提拔了一些工人干部，并在部分的工人中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在工人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弱点。

第一，在军事企业、重工业和交通工人中工作太差，而这些工作恰是当前工运中最主要的工作。

第二，利用已有的合法地位进行抗敌救亡活动太差。即使已作的一点点，也不善于隐蔽我党的活动，常引起国民党、政府、资方的注意。

第三，如何充实工会本身生活作得极坏。除很少的两个较好些外，一般的都极其差。故会员对工会认识进步很小，有不少的依然冷淡。

第四，上层活动我们还只在部分的工会中开始了联络，但在社会上有些威信、合法地位相当高的工会领袖（只在个别中有来往）缺乏活动，党亦未认真的利用现有之工会领袖进行〔活动〕。

第五，统一的工人运动作得不够，还离我们预期的成功很远。

当然，缺点还多，这里只简略提其要点。湖南工运的困难，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 劳资对立得极其尖锐，往往使得我们在工人同志中说服了，而他们在工人中又碰起转来。

2. 国民党、资方及社会人士对工会活动极注意，畏惧它的活动，特别政府对工人统一组织尽力限制。

3. 自首分子特别多，劳资合组之工会〔受〕老板的操纵。

(七) 关于青年工作

1. 湖南党在群众方面的活动是“七·七”事变以来开始的。最初的活动是在文化界与青年方面，至去年底，便有了八百多人〔的〕湖南文化界后援会与一百多人的抗敌工作团。后者几乎全部为青年学生，前者亦有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抗敌工作团内，有个九个同志的支部与由平津回湘的二十几个民先。自发的或同志分别组织的宣传队、读书会、歌咏队亦有一些。今年一月初，发生着青年群众团体中骨干组织的争论，同时，民先同志与民先队以抗敌工作团名义在青年组织中亦开始他们吸收团员的活动，随着便发生了一些纠纷与困难：①其他小的青年团体对抗敌工作团不满；②在其他小团体的同志认为会议太重复，妨碍其本行工作；③顽固分子便藉其造谣，因而便使得抗敌工作团的立案不能得到批准，虽然抗敌工作团用尽了办法亦未获得成功。省工委成立后（一月中），争论愈加发展。经过省、市委之细心的依据实行的研究，结果是为了展开青年群众的活动，利用各种各样形式去组织的方针下，将这一带着浓厚关门主义的团体取消了（实际上它后来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的限制、破坏与不准立案及大批团员参加民训，分发各地，工作更加困难了），内中的进步可靠的分子吸收入党而解决了这一争执。但对内中的某一些民先同志的解释工作做得不够，并未有使得他们个个心悦诚服。特别是参加民训先出发的一些，未事先商量。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缺点。

2. 自三月间长江局青委派于光远同志来湘巡视后，检讨了

湖南青运，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在总的方面，他同意湖南党对青运的方针。对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认为太差。对青年统一运动方面商讨的结论是：加紧上层联络，广泛的去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团体，特别是着重各校学生自治会与男、女青年会的工作。当时计划着依据长沙市几个大的学校的学生会，几个中心县的学生会，男、女青年会及各地创造几个大的青年组织，以上面的团体作基础来争取青年运动的统一。几个月来，即在这一方针下工作。但至三民主义青年团开始建立与汉口之三青年团遭解散后，由于国民党在长沙对我们群众活动限制压迫愈加严厉和青年工作同志有恢复民先的要求，于是省工委在讨论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上有新的青运的估计和决定。但由于执行上的许多实际困难，有一短时期的犹疑，恰巧长江局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传达到湖南，而其内容在基本上适与省工委商讨者同，于是便坚决的执行。青运新方针的内容想中央早知道，故不再详。

3. 湖南青运概况和组织情形

(1) 抗敌工作团或抗敌宣传队。这完全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小学教员所组织的。在岳阳、衡山、长沙、南县、益阳均有，不过人数很少，三、四十而已，衡山的六十多人，算最多的了。他们能分发各市镇作大的讲演，能号召数百人，甚至成千的人参加，但不是定期的活动。上面的这几个团体都是由我们同志组织起来，内中都有党团组织。

(2) 抗敌性质的剧团。在长沙的有一致剧社、〔一九〕三六剧社、孩子剧团、流动剧团，常德有三八剧社，南县有抗敌剧团，益阳有蔚南剧社，其他衡山、湘潭、岳阳等县亦有这些团体，亦均为我们所发起和组织。在长沙，曾举行过几次联合公演，每次都是二、三千人，颇能号召。这主要的由于长沙之一些有名的

角色不是同志便是我党同情者，国民党所召集之各种纪念大会、演剧的事情，必须和我们同志商量，或者便交于我们办理。在外县也举行一些大的公演。南县之抗敌剧团在北景港的公演，曾经将全镇的老百姓四、五千人号召来，进行两天，发了数千传单。大大小小的公演，上列的那些剧团都曾举行过，但前面有三、四个或为国民党所解散（常德三八剧社），或为国民党压迫而涣散。

（3）歌咏队。在党领导下，各地多半都有些。长沙市委下，今春有一时期便有过二十几队，最多人曾到二千多人，主要的由于几个歌咏家××、××同志的号召。在长沙亦曾举行过联合歌唱。但歌咏队之流动较其他青年团体的流动性更大，现在所存者仅新声、湘滨等几个而已。

（4）读书会。各地党所领导亦有些，在长沙文抗会下，便有过十六个读书会，都系同志主持。文抗会出经费，亦系同志，会员达三百多人。现所余者，亦只几个了。在外县较大者为汝城读书会，有一百三、四十人。

（5）文艺团体。这个很少，只湖大明日社、湘潭南国文艺社。前者有八十余人，后者有百余人，均有党的组织。

（6）各种座谈会。有时事、救亡、军事、社会科学等座谈会，但经常进行座谈的则很少。长沙较固定者：战时教育座谈，三十人左右，同志主持；中苏文化座谈，二十余人，同志主持，我常出席，每周能以聚餐举行的有核东苑之十二人（内六同志），系各青年团体中领导人物，省工委宣传亦为其中之一。

（7）青年的训练团体或学校。函授训练班六百多人，世界语班百余人，中苏社之俄文班七、八十人。在外县有华容之东光中学二百余人，武岗之战时讲学院，自治女校百多人，淑浦之×

×中学二百余人，益阳之蔚南女校与临时中学，茶陵之××中学及其他几个高小与职业学校。前六者均完全为同志主持，学生思想进步，大部都团结在党周围。其他都参加有部分的教职员同志，学生中部分的党都能影响。上面的学生在各地进行救亡工作都是最活跃的。

(8) 在小学教员中，长沙有一小学教〔员〕联合会，益阳有一战时小〔学〕教育促进会，人数都只三十余人，均系青年小学教员，能作些救亡活动。如后者，他们将整个县城之小学生组织在晨呼团内，每早天光时，便领导着小学生高呼救亡口号，高唱救亡歌曲。

(9) 在张治中所办之几期民训班中，吸收三、四十个同志，这些均系青年学生，他们在民众训练中为党作了不少的工作。从青年学生中，党动员三十几个同志到各军事学校中去了。

以上，除长沙市的因敌机不断轰炸，大部分均流动到内地外，其他的均存在。还有些妇女团体亦多系青年女学生知识分子所组织，在以下的妇女工作方面谈。

总计在党所领导下之各种青年组织约四十多个包括人数约二千多人。

(八) 农村工作

流动图书馆。这是湖南党在农村中开始群众活动的主要东西，它并无什么组织形式，只要买两、三块钱极浅近的救亡小册子与抗战词调图书等，由一人负责管理便可开始。凡是党有关系的乡村，就有它的活动，最大者曾经聚集着百多人。图书馆之数自五月时便有三、四十个，最近无统计。

农村中的学校。湖南的农村工作，多半是依靠在小学教

员身上。因为小学教员同志便有一百多人，无论是政治、文化水平及其地位都比较便利。他们最便利做的事，便是平民学校或农民夜学。在各地乡村中，由我们同志所主持之这类学校约百余所，除部分儿童、部分青年农民外，有一小部分为成年农民。每校人数都只三、五十人。大部分所采用的为战时常识读本，间有讲游击战术者（不过国民党不允许，华容南山有一五十多成年农民的夜校，因讲授游击战术便遭封闭）。岳阳八十多所学校中，便有三十多所为同志所主持。

3. 随着这些学校有的办有农村壁报，有的进行中年、老年的男女座谈，亦有歌咏队。虽不能起些什么大的组织作用，但很能唤醒他们起些推动农民走上组织的作用。

4. 农村合作社。这很少，且长沙麓山合作社五十余人，华容九斤麻合作社三十余人。新化之平教会合作社及益阳溆资乡乡农会，虽然在名义上它包括着整乡两万多农民，实际上还是空的。上面这些都是同志组织下成立不久的。

5. 乡、保长。这是乡村中统一战线的组织，一般的说来，凡是乡村中有党支部的地方都与他们有来往（除湘南游击地区）。乡、保长同志在各县有四、五十人，同情，能多少帮助我们者，还多一些。因湖南各县之区虽名为一百家，实际上都【有】二、三百家或更多，每乡虽为十保，实际上都有二、三十保，故关于行政、民运上都颇有些作用。内中有个别的投机分子。

6. 改善农民生活。这作得更少，仅在反贪污上作了一点。较大的有沅江保安境之全境农民清算提务局万余元贪污，由十几个同志的支部（内中有八、九个小学校教员）领导起来的，曾产生四十几个农民代表以告状的方式进行的。在县政府胜利后，又弄到省政府，还未结束。华容东山调拨边境，为反对勒索、敲诈、

绑架的征兵，曾组织了三百多人的自卫队武装反对。由于这一斗争方式的错误，闹到双方大流血。省工委闻知后，即改变其斗争方式，但结果仍是失败。其他小的清算帐目、发积谷救济、公平征兵等等，则有些成功。

7. 壮丁队。这是湖南农村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工作，他是民众武装的团体，等于农民自卫队。张治中所办之民训干部学校，其学生主要的便是担任壮丁队的训练员。关于这工作，省工委对各地党都有过指示，并研究了一些办法。凡是进行过民训的、有同志的乡村，我们都大部的参加了，并鼓励其他农民参加。一方面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与真实本事，另一方面则以上层活动，争取壮丁队中之排长、队长之位置。因党在乡村中组织很狭隘，且政府进行壮丁训练亦极不普遍，故我们获取的这类位置还不过几十个而已。较大的区队长仅有澧县之七区队长同志。这一区队约有二千多壮丁，队员均有整齐的梭镖、大刀与制服，队长同志即系该县县工委之书记。虽然壮丁训练中有些活动，可是并未起大的作用。因训练时间为两月，训练后便涣散了，实际等于解散了。党亦未在结束后依然藉着壮丁队名义团结他们。

(九) 党在妇女群众中的活动

1. 湖南妇女团体之概况

湖南的妇女团体本来很少很少，除长沙与外地的几个县妇女会外，其他仅有一长沙女青年会。女青年会历来还做些社会服务事情，其他妇女会均系供那些势力分子在以前进行选举和平常争权夺利时所利用者，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所组织的，根本就没有群众。抗战爆发后，省政府方面成立了一个妇女慰劳将士委员会，为张省主席之女儿张素娥所主持。因为募捐、慰劳的许多实

际事务及张素娥本人之比较开明，后来成为湖南工作最活跃的一个妇女团体。各女校中有学生自治会、有女童子军，有时亦进行些募捐活动，但都在教育厅有命令下才允许。就党派关系上说，学生团体绝大部分为CC所操持。战争的剧烈展开，今春湖南成为医治休养伤兵最多的地区后，妇女群众的活动才慢慢的在学生知识分子中展开。

2. 我们的活动

(1) 妇慰会。党在湖南群众方面的活动，首先就打入这团体，并依靠它在各方面进行工作。女同志加入妇慰会工作者最多时有三十余人，而且都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者。四、五月时，并由党动员了周南、民宪、含光各女校的学生约两百余人加入妇慰会，并进行工作。利用妇慰会名义，长沙的各伤兵医院、各难民收容所，均分配有各个工作团。在伤兵医院成立俱乐部，为伤兵写信、唱歌、教音乐、读报、教识字。星期日并由各俱乐部之妇女工作者带着将愈之受伤将士逛公园、游山等。在难民收容所成立服务室，为难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亦为他们讲时事，特别着重宣传参加壮丁训练与揭发汉奸、敌探煽惑难民的各种诡计。

在长沙被敌机几次大轰炸前(即六月前)，长沙的大小十几个伤兵医院和大小十几个难民收容所，几乎作到了个个都有我们的活动。这些服务妇女的吃苦耐劳与认真负责，在社会人士中起了极好印象，有不少的人受到深深的感动。最差的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的组织收获很少很少，这主要的是由于活动性太大，几乎都在迎来送往中。长沙经常受敌机轰炸后，伤兵、难民便疏散到各地去了。

妇慰会的壁报团有十余人工作(各个伤兵俱乐部与难民收容所都有他自己每三日一次的壁报)。它在长沙街头的壁报中，也

算是最活跃最能吸引群众的一个壁报，与文抗会的街头壁报差不多，篇幅大，带色图画多，亦每三日一次。

在妇慰会下，曾办过几期救护警察妇女训练班。每期人数不多，仅三、四十人。妇慰会除两、三个主要领导者外，一直到今天，在其下面的人员都完全依靠于我们。

(2) 妇女民众训练的干部学校。这是张治中办的，学生三百余人，全部为高、初中女学生，亦系张素娥主持。教员十余人，大部分系同志或党周围的进步分子。因学生收得较严，我们同志进校者只七、八人。但因教员较好，大部分学生都还不差，现毕业已分配湘南各县进行妇女训练。干部学校亦停办，由于教员同志的幼稚毛病，曾与张素娥闹得不好。

(3) 妇孺教育院与儿童保育院。前者约七、八百人，系由难民中抽出来的，设在湘西之凤凰，系黄湘女士为院长，其妹为教务长（同志）。党曾派一专人在该院工作，因距离长沙二千余里，故该处工作老是不知。但从最近《新华日报》该院举行的游艺、募捐〔和〕八路军的通讯上看，活动亦还相当的好。

湖南儿童保育院，这还成立不久。副院长系张素娥硬荐的，为同志。下设两个分院，一在长沙附近，一在湘西。我来时，正在筹划。这一工作的进行，总院在长沙，有一分院，湘西有一分院，均与党有联系。上面的几个保育院都是再三的向党要工作人员，可惜我们的妇女工作很差，都只能供给一部分。

(4) 女青年会。这里的上层联系本来很好，并藉着它在上层的妇女中起了一些推动作用，可惜的由于它上级机关的决定，不久便离开湘省了。四月间，党曾设法介绍一女同志进去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活动，现在是相当的充实些了。现在女青年会下，有一妇女补习学校，三十余人；一高级训练班，三、四十人，多

系高、初中女学生；一妇女缝纫工厂，三十余人；一图书室；一伤兵工作团，七、八人；一难民工作团，七、八人。除女青年会原有寄宿舍、理发馆我们还只是联系外，其他均由我们同志负责指导。用邻居联谊会的形式，曾经女青年会发起并主持过几次娱乐晚会，由五、六百〔增〕至七、〔八百人〕。在邻居中举行一次普遍募捐，招待由汉转湘西之数百难童，并赠送难童之草帽、毛巾。利用各纪念节组织宣传队进行讲演或挨户宣传，推动了邻住〔厝〕的“七·七”献金。因为这里工作的同志作事认真负责，所以很取得会中总干事的信任。

(5) 妇女会。湘潭、岳阳、新化、益阳、澧县几县的妇女会都有我们的活动。前三县完全是我们推动下成立的，故工作活跃些，特别是新化、湘潭的妇女工作，她们除上列几个妇女会都作的募捐、宣传、写慰问信、出壁报外，还举行过五、六百人的“三·八”妇女纪念会。新化妇女会曾募捐数百元，并推派代表到长沙举行伤兵慰问、难民慰问，召集长沙的所有伤兵医院之数百个将士代表举行献旗大会，不仅邀请了新闻界、社会名人参加，并请了党政机关要人训话。新化的妇女宣传工作亦作得特别广泛深入些。清明节与暑假时，她们都动员有数十人分队下乡宣传，特别在新化数千人之锡矿山，曾经作过一个星期的宣传，募捐数千元。其他妇女会都作得零星。妇女会工作最大的弱点，便是吸收进来的妇女群众太少，除新化、湘潭有百数十人外，其他的都只有三、四十人。

(6) 各女校。长沙之周南、民宪、含光、自治、长师、长卿附小等女校均有党支部。最大者为周南，同志十余人。各校大部分同志都参加学生自治会，而在自治会能起主导作用者，仅民宪、自治、附小三个女校。在外县还有五、六个女校（包括高

小)，除新化的外，都作得很差。

(7) 其他妇女团体。有抗敌工作团、歌咏队、剧团、座谈会、读书会等。较固定者有湘滨歌咏队、战时妇女座谈会，□□剧团等。战时妇女座谈会曾经发展到有百二十余人，它是为我们十几个基本女干部所组织的。每周公开座谈一次，并请有党部、政府要人太太参加。座谈时亦请党部指导，但最后仍为党部所勒令停止。湘滨歌咏队虽有四、五十人，但孩子多，最近才成立。建设厅难民工厂的读书会，虽然全厂人数都只八十多人，但读书会的却颇能起作用，除能认真的看些书，研究时事外，还领导全厂工友作各种救亡活动，如献金、写慰问信、参加各种纪念大会及组织宣传队等。关于这类的未立案的小团体虽有一些，但救亡的活动作得更小更少。亦有一部分妇女群众参加到其他活动中活动。

各种群众大会的参加，以上慰劳会、妇女会等等都能部分的或大部的动员。“三·八”妇女纪念节，在长沙曾举行过两千多人的大会，还是因为雨天。预计时至少可到四千，因当时女校均开学，难民亦多，同时准备方面亦开始得早。不过，这次会后的确提起了国民党对妇女团体方面更多注意与限制。另外，长沙还有两个刊物：一为《妇女三日刊》，二为《妇女半月刊》，均系同志主持，每期发行千余份，内容非常空泛，篇幅亦极小。纺纱厂内有十几个同志，几十个较好女工，在厂内都能参加救护队与化装讲演团的工作。铜官在工人中有二十几个女同志，只能作家庭的一般宣传。

3. 组织概况

在群众方面除十几个女校有党的组织可能起推动作用外，真正的有妇女群众的团体很少，约计一共有十几个团体，八、九百人。而这些团体一部分又为低级的，会员既不固定，组织性又差，

所以至今还未形成几个有下层基础的得力团体。

全湖南的女党员约计两百余，占全省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在两百余女党员中，其成份比例为：学生知识分子百分之六十；工人百分之二十；农妇百分之五；家庭妇女百分之十五。各级党委除长沙市委下有妇委组织外，其他都还没有。长沙妇委系由几个区委中的妇委与市委中妇委共同组织的，以市妇委为书记。长沙女党员七十余人（铜官在内）。

党的女干部，区一级者约十余人，县市一级者亦有十人左右。但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者，不仅在女同志方面没有，即湖南党的领导机关中至今也还未作到。兹将党内的主要女干部列下：

4. 我们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主要弱点和缺点

第一，活动的范围还只是束缚在最少数学生知识分子中，活动的形式只是一些老办法，即在城民中虽采用邻居联谊和献旗的较好的方式，〔但〕亦未广泛的运用。在女工与农妇的已有联系中，总老是联系而已。

第二，妇女团体的流动性很大（主要的为战局关系），但我们未充分利用它去扩大工作，展开与各地的联系。

第三，未有提出湖南全党同志都注意妇女工作，只是依靠女同志。

第四，一部分妇女干部的不团结，相互轻视，这使妇女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第五，有些同志在学校或团体中已取得了相当地位，除部分的起了一些作用外，一般的说来，我们还未灵活的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作用，有时又走到去强迫这些人〔做〕所不〔愿〕干的事。

附：孟庆树同志要我写的详细的東西，我不写了，实在那边的妇女工作很差，虽然我有些不知道，但较好些只有这点。

姓名	籍贯	出身	担任何项工作(党内外)
邹克之	长沙	北平某大学肄业生	长沙市委组织部, 长师附小六年级级任教员。
苏 镜	新 化	北平师大肄业生	新化党工作委员会(县一级的)负责人, 女子高小教员。
彭文华	岳 阳	北平师大毕业生, 中学教员	岳阳中心县委书记, 岳阳中学教员。
陈德明	湘 乡	同 上	长沙市妇委, 中学教员。
贾 雍 (即高杰)	益 阳	家庭妇女	长沙北区妇委, 女青年会干事。
张竹如 (即张琪)	新 化	北大肄业生	新化工委之一, 高小教员。
曹国智	长 沙	北平师大毕业生	长沙自治职业学校校长。
黄时雨	长 沙	大夏毕业生	《妇女日报》主编, 儿童保育院副院长。
李含	长 沙	大学生	南区妇委, 附小级任教员。
李颖生	长 沙	湖大毕业生	自治教务长, 妇慰会宣传主任。
唐荣前	长 沙	高中毕业生	西区妇委, 附小教员。
林菊仙	浙江人	清华毕业	战时讲学院女生指导员, 长沙民先负责人之一。
陈 俊	湘乡?	高小生, 做工七年	长沙纺纱厂总支部妇委, 最近来延安。
罗 翥	宁 乡	高小生, 作工九年	长沙纺纱厂支分部书记, 最近来延安。
黄绍甜	常 德	清华毕业生	湖南妇孺教育院教务长。

(十) 宣传工作

1. 党报推销的情形: 党有组织的三十几个县都有《新华民

报》、《解放》、《群众》的订阅者，销售得较多些的只粤汉路与洞庭湖一些交通便利的县城、市镇。有分销处的只长沙、宝庆、南县等几处而已。因为到的时间太慢（到长沙迟两天或四、五天，到各县比长沙则迟一星期左右），致阅读者不多。长沙分销处销售三百几十份，南县、宝庆分销处六、七十份，其他县份多者亦不过三、四十份。所以，至今湖南所销之《新华日报》就我们可估计者，亦不过千余份，《群众》、《解放》还要少。当然，还有些估计不到的，但决不会多，因不仅慢，且亦不廉。

2. 《观察日报》：这是长沙出版的，完全在党的领导下，省工委直接管理，内容还相当充实，但不够通俗，版幅为《新华日报》的一大半，现销一千七百份。因经费困难，馆中工作人员除工人外，都为无给职，仍然时有停刊之虞。

3. 在各地党领导下的有：《中苏》半月刊、《联合》旬刊、《战鼓》、《明日社刊》、《妇女三日刊》、《〔妇女〕半月刊》、《农友报》、《抗战》、《晚报》等等十几种刊物。销售数目多千余份，少二、三百份。无论内容、文字、发行都不如《观察日报》。一般的说来，都只适合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口味。即使标榜为工人、农友等名义，也亦一样。在政治上他们都是以《新华日报》、《解放》为基础，只运用得不灵活和过火。亦间有些临时刊物或油印刊物。

关于党的各方面

党员数量、成份、干部及其散布地区，兹列表如下。这一目，是根据八月底的工作总结，有几个地区则为我离湘时，即九月半的。成份比例与干部数目则系依据讨论各地工作和我巡视各地工作时的记忆，不十分可靠。

县 别	党员数	成 份 比 例				党委级别	干 部	
		军	工	农	学生知识者		区一级	县一级
长 沙	380 ⁺	1%	60%	9%	30%	正式市委	20	7
长沙(铜官)	840 ⁺	○	55%	34%	5%	中心县委	25	9
岳 阳	120	1%	20%	34%	35%	中心县委	15	5
衡 阳	76	○	36%	40%	24%	工作委员会	6	3
湘 潭	65	○	○	65%	35%	工作委员会	6	3
湘 乡	68	○	○	80%	20%	工作委员会	6	3
浏 阳	11	○	○	100%	○	支 部		
平 江	25	○	○	100%	○	特 支		
醴 陵	18	○	○	50%	50%	工作委员会	1	
安 源	37	○	100%	○	○	工作委员会	3	
攸 县	4	○	○	○	100%	支 部		
衡 山	120 ⁺	○	10%	30%	60%	工作委员会	6	5
新 化	25	○	○	10%	90%	工作委员会	3	1
邵 阳	1	○						
溆 浦	110	1%	○	74%	25%	县 委	6	3
宁 乡	28	○	○	50%	50%	工作委员会	3	1
益 阳	250	○	30%	65%	5%	中心县委	9	5
沅 江	20	○	○	40%	60%	工作委员会	3	
汉 寿	149	○	10%	80%	10%	县 委	6	3
常 德	57	○	60%	15%	25%	中心县委	3	3

续表

县 别	党员数	成 份 比 例				党委级别	干 部	
		军	工	农	学生知识者		区一级	县一级
沅陵	4				4①	特支		
澧县	85	○	○	80%	20%	县委	6	3
临澧	2				2②			
大庸	5				4③	特支		
石门	2				2③			
南县	250	○	20%	65%	15%	中心县委	9	5
华容	150	○	○	90%	10%	工作委员会	6	1
安乡	5	商④				特支		
藕池	9	商④				特支		1
安化	34	○	○	40%	60%	工作委员会	3	1
凤凰	5				5⑦	特支		1
洪江	15				15⑧	特支	1	
武冈	5				5⑧	特支		3
湘南十二县	445	○	10%	80%	10%	正式特委		13
各部军队	102	100%					12	5
有党组织者 三十七县	3501	约 160 ⁺ 0.5%	约 1000 ⁺ 30%	约 1600 ⁺ 42%	约700 ⁺ 27.5%		158	79

①、②、④、⑦、⑧、⑨原数如此，当皆为100%。

③原数如此，当为80%。

⑤、⑥原文如此。

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政治情况

何键在湘主政的时候，湖南主要的派别是甲（C C）派和乙（何键派）派。但张治中到湖南后，逐渐变成了三派。这原因是，一方面张带了些人去，另一方面何键派中许多份子投向张治中派去了，于是复兴社在湖南亦成一主要角色。现在何键派是消弱下去了，但一批前进的救亡的力量又突现于湖南——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下和周围的份子形成的这支力量。

复兴社的力量主要在省政府。岳阳至常德、汉寿、益阳一带，湘南则衡阳一带，都是复兴社占主要力量。C C是省党部、文化界、教育界和各县党部。何键派主要分子是军官，地方上的绅士。在下层群众中，C C占优势。甲乙两派间的磨擦很厉害。我们刚到湖南时，前后两天，就有所谓“联乡自卫”和“抗敌自卫”的两个团体的名目出现，其对象、性质完全是一样，后经调解才合并起来。又如去年底纱厂的罢工，亦是甲乙两派互争当选国选（大）代表和工会领导权所酿成。这些事，现在工人中有好多都知道了。他们互不让步地勾心斗角，致有些可能与应当组织的群众团体都不能成立。如长沙市各业工会都有，但始终至今都还没

*原文标题：湖南的近况

有一个各业工会的联合组织。据群众说，都是因他们（甲乙派）互相的争领导权，各自想独霸领导权，致不肯合作。

最近表面上好些，但实际上还是互相排除，这在文抗会的改选及工会中的竞选中，都是可看出来的。

对于抗敌的群众运动，他们有一共同点，就是争取领导权，设下一个空架子，自己不做，而又控制着不准群众动；这在衡阳、常德的复兴社的态度和长沙文抗中的C C的态度看来实无异。但在张治中的态度看则不同，他的言论与行动中看来都是想排除地方上的守旧势力的阻碍，想组织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如他发表的两个有名的施政纲要和举办学生民训班与登记知识分子，准备加以训练后去作县指导员、区乡保甲长和督察指导员等数职务。张治中这个雄心与坚决的态度是收到些效果，如许多地方的民训正在开始进行，最近严办贪污的斗争之开展。但亦受到不少的阻碍，以致因阻碍力大，有许多地方就根本不生效力，如湘西、如各县的敷衍的态度。过去C C曾散播谣言，说要发生第二次的“马日事变”，这一谣言在群众中是产生了些反响的。有些人确被其吓住。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挑拨离间的文章（如《国民日报》陈国新的），企图在政治上打击我们党。最近各县的反映中，各县的当局大叫其严防共产党活动。在常德，我们有同志曾亲眼看见过国民党上级党部的指令上这样说：“抗战或和战，还待三·二九会议之最后决定，应严密防止共产党活动”等语，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工作的近况

长沙市：

原来（二月前）在长沙市的同志总共不过四十人，现在并近

郊的农民党员总共一起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左右。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占六十多点，工人占四十多，其余是店员和农民（这是据我所知道的大概）。

第一，群众工作。有文抗会，其中有六个支部，有几个做上层活动的党员都还不错。在文抗会领导之下的小的细包(胞)，如读书会、时事研究、戏剧、歌咏等等，共有三十几个单位。这些小的组织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活动。这亦是文抗会的基本群众。所以，文抗会的上层，虽有C·C的几个巨头进来，但下层则全在我党之手，就外县的关系亦多在我党之手。他们的工作是长沙第一个活跃的群众组织，请名人演讲，文字宣传，街头戏剧宣传，筹款救济难民与作文抗基金的公演大会，战时政治训练班等等，名堂不少。过去当局常说文抗会全是C·P的，但经这次改选后，把他们的人都拉进来后，他们则不说这些话了，对我们的活动虽在某些问题上受限制，然在另方面则又更有利我们大胆的干的便利。

第二，中苏协会。这里面真正全是我们党的领导，虽然会内上层份子有很多是国民党的大头子，但他大多不理睬其内部的情形。这个会现出有刊物叫《中苏》，另外，有俄文补习学校，有三百多人，都很好，有许多是外县的小学教员跑来学习的，其热忱真可佩。其次，在其领导下的还有些“时事研究会”之类的小组织。

第三，妇女工作。有妇女抗敌慰劳会，另外还有妇女工作团。这是长沙活跃的群众团体之一，但它的群众基础是两个女子学校和难民中的妇女及女青年会，现办有《湖南妇女》半月刊一张。有些在做伤兵工作、看护工作，在其领导下的有些研究会之类的小组织。另外，还有个妇女训练班。在“三八”举行纪念会，到

会的有两千多人，当晚举行火炬游行，虽然在街上遭遇强烈的暴风和冰泡的袭击，然情绪与秩序都还很好。

第四，伤兵与难民中的工作。在长沙的医院是一四四和一四二，其中伤兵有四千左右。其次，即是收容所，这是临时性质的，在伤兵医院中，有伤兵俱乐部的组织，教他们唱歌、演戏，在青年会还公演过，游山、习字，替他们写信，个别谈话，也曾同他们上课，讲游击战术。不过，其中的党员发展很慢，原因是流动性太大。难民中的工作，现各收容所里面组织有难民指导委员会，在这其中我们可占优势。指导委员会的人有些是同志，有些是同情者。在难民中组织，有座谈研究会、壁报委员会，常出壁报。至于正式军队中的工作做得很差，在宪兵团中。

第五，学生中的工作。这可说是整个工作中最弱的地方。我所晓得的，湖南大学中有一支部，民国大学中有一支部，周南女校有一支部，育英小学有同志。但在这几个学校中都没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在学生抗敌会中，我们始终就没打进去工作，特别在中学里面没有一个中学有党的组织，这是个大问题。最近，以三个同志组织了一个青年工作委员会，是专从事注意和研究青年工作的，属于长沙市委。除进行推选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外，其他都还未展开什么工作，所以青年工作是很弱的。

第六，农民中的工作。在东、南、西、北四郊都有党的支部，党员在四十左右。其中，以南郊的较好些（党员多些）。现进行党的发展外，还没有什么群众组织的出现（但我对这部份工作并不太清楚，因好些时未提出讨论了）。

其次，是店员中的工作。现有党员二十左右，这里面大多是会党中的。过去有一职业界救国团，团员有八十左右，因未能立案，至无形中停顿。至于会党，在湖南一方面是人数量多，另一方面

政府镇压得很厉害。近二月来，省政府三令五申的取缔会党活动，要求其自首，曾因别事枪毙几个。我们的同志中有一会党中的大爷。我们过去曾想组织洪门协会，修改其口号，如“抗日救国”、“铲除汉奸”、“义气千秋”等等，并在会党的各山头中建立我党的支部。自后，我在工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认为这样有一危险，前途即是培集会党力量，形成他一个集团，在另一环境下对我们党的威胁很大，因此改在职业为单位之下组织支部。最近情况不太清楚。会党中什么坏现象现还未出现。

第七，工人中的工作。党员四十多个，计第一纱厂一支部，党员五个；黑铅炼厂一支部，党员七个；白铅炼厂一支部，党员十一个；修械所一支部，党员三个；泥木业一支部，党员三人；织造业一支部，党员十一人；理发业一支部，党员三人；码头现有党员二人，正在建立支部中。在长沙的产业工厂，除电灯厂、铜元局外，都已建立了党的支部（黑铅、白铅、纱厂、修械厂都是官办的）。除以上这些外，还有些工场有关系。如铜元局（管办），有二十几个群众，正进行建立支部中。还有几个毛巾工场，已有读书会的组织。在码头上，有几十个群众是在我们同志周围的。人力车、缝衣工人，有些个别的关系；茶居业、靴鞋业、漂染业有个别关系。这是组织的近况。其次，是工人群众的组织状况。在长沙，计有手工业工人工会七十余个，总之有一行就有一工会。这是长沙的特殊现象。这些工会是带浓厚的行会性质的，他们做的是收会费、调查学徒的出师、进师，没有加入工会的不许做工。他们亦做了一点好事，就是替工人与资方订集体合同。长沙的工人总计是十几万人，其中以码头、鞋业、人力车、织造业、缝业、泥木业为人数最多。

工会中是极不统一的，甲乙两派在其中的互相争斗最厉害，

他们各自把持一部分势力不合作，致全市没有总的各业联合会的组织。现有一长沙工人抗敌后援总会，这是一个空架子，官办的，并未经任何大会，亦未经选举，而是由各业工会理事会派一常务理事设立的。他们根本不做事，如〈而〉又不要工人做。前些时，织造业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抗敌工作团，他们都不允许，说有了抗敌后援会，不应另有组织。工会中最有权利的是鞋业工会的常务理事，名叫李秉乾，他过去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后被何键收买。过去竞选国选〈大〉代表时，何键不准他竞选，于是他又投向到赖连那边，成为C C派了。这个人能抓住二、三十个工会，在群众中亦相当有信仰的。现在，我们亦正在设法争取他（已有同志常同他接近）。在长沙工会中，另一特殊现象就是自首的共产党员在工会中占有相当数量与地位。其中有些是已做特务工作，有些是表示什么都不管的，有些是真正被迫自首，这部份现表示还要找关系。现在我们是抓住其中两个较好的份子，在我们周围做掩护与桥梁去进行上层的活动。

上层活动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个同志专门去活动，而且已做了些工作，本月份出席过铅印业、堆栈业的改选大会和出席剪刀业的成立大会，因此得和各业工会的上层分子聚集于一起，见面认识。现在他周围的亦有几个人，这是上层活动的基础。

长沙的工人运动，当前是在注意合法的工会运动。这里主要的是一方面注意恢复工会的组织，另一方面是改选工会的运动。恢复工会运动方面，现在第一纱厂正进行，前月工人签名的已一千多人，被厂方的总务科长见到扣留了。现在工人又已签名二千多，准备〔请〕省党部恢复工会。据省党部说，要在“三·二九”会上最后决定（按：第一纱厂的工会是去年底罢工后被迫停止的，当时并开除二十四个工会积极分子。后来群众募集九百多块

钱办了一“友联商店”，维持这二十四人的生活。这其中是 CC 为主，“友联商店”中的总、副两经理即是两个国民党员。这二十四人中真不乏好的脚色，有的是勇敢的，有的是能说话的，有魄力的。但现在已与我们有了关系，我们正抓住其中几个纯洁的好的分子。在他们周围有一千——二千群众)。改选运动方面，现在我们感到缺乏真正的群众中有信仰的党员。这里当然由于我们党刚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缘故。但在织造业方面和黑铅炼厂的工会，我们是有把握当选的。人力车方面亦有把握，石印业方面亦有办法，其余则困难。其次，工人中现进行了些识字的、读报的日常教育工作，还有几个小厂建立了读书会的组织、流动图书室之类。

在长武铁路和湘桂、湘滇公路有一个同志在做上层活动，但还没有什么成绩，只不过有两个上层技术人员的关系而已。其次，组织了一个（失业的）工人巡回工作团，有二十几个团员，其中有三个党员和几个同情的群众。这是利用朱学范他们总工会的名义弄的，经费亦系他们供给，而我们找到他们的关系，又系经一个工人（铁路工人，是陆京士的妹夫）的社会关系去弄的。现正在练习排演戏剧、歌咏，准备出发到醴陵和安源两煤矿区去作工人工作。其他各地的工人工作，还是属于当地的党指导，因地方党和工人工作都还薄弱得很。

在工人工作中，我们感觉到虽有些收获，但还是不够的，特别在抗敌运动的活动方面还不够。同时，实际开始工作的时间只是从二月底至现在一月左右的实际工作。前些日子，因工人过年回家和干部的回家，致有无形中停止的现象，因此，请多给些指示。

第八，文化工作的另一方面。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有一个《观察

日报》，篇幅中等，不大亦不小。现每期印一千份，外县定户四百，本市三百多，但送人的太多。这张报纸是《大众报》合并在那里的，因经济实在无法子维持。第二个是《联合旬刊》，十天一期，销路还可以。第三是中苏文化协会办了个《中苏》半月刊。这三种东西是完全在我党领导下，亦系同志所主持。但其中有两个困难：一是钱，二是文章稿子缺乏。我们的意思，要《新华日报》中多余的稿子给《观察日报》的副刊去充实，在长沙的《民国日报》、《商报》、《市民日报》、《抗战日报》，都可投社论去。《抗战日报》，田汉他们办的，销路还好，他们利用些难民去做报贩，可说长沙报贩最多的一个报纸。还有田汉他们办的戏剧协会。在长沙文化界最活跃的人是傅东叶，他团结文化界的一些左倾的人物，举行定期的座谈会，但其中大多是我们同志，不知他有什么背景否，还不清楚，但言论上还正确。

各县的工作，现有党的支部以上的县有十九个，有关系的有十三个县，共计有三十二县。

在湘南的衡阳、衡山、湘潭、湘阴有党的支部。其中以湘潭的较好，他有两个支部，有好些群众组织“三八”节举行过纪念大会，到六百人左右。其次衡山，其党员虽少，但他有一个学校为中心，最近举行一次军民联欢大会，到三千多人。湘东醴陵有一支部，有学生工作团、教职员工作团、抗敌后援会，但工作则不见活跃。岳阳，这是工作比较好的县，有三个支部，其中两个乡村支部，一个县城里的，计有二十多党员，本月底可增至五十人左右，同时准〔备〕成立岳阳工作委员会。在城里的有岳阳小学教师联合办事处、妇女工作团、伤兵俱乐部，这三个群众组织我们党占优势，可起决定作用。最近，准备开一书店及成立妇女抗敌慰劳岳阳分会。在第六区有支部，党员十三人，大多是小学教师。

在我们党领导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小学”有三十多个。有一短期乡师班，现有学生三十多人，出去后即做小学教师，亦在我们党领导之下。那区的“民训”队长亦系同志，同时他们与区长的关系弄得还不错，因此想办保甲长训练班，集合些保长甲长加〔以〕训练。他们中有一工作方法值得学习的，就是他们民训中的教员除每乡派两个外，还剩下两个即做巡回教员，这样他可以这乡跑到那乡，一方面做公开工作，另一方面还可做内部的联络。在这里还有一小小图书室，有百多块钱的书，各乡小学教师都在此借书看。这里的工作最大缺点是还未深入农民中去。

第三区亦有一支部，有党员五人，小学教师十多人在我们周围，亦有一图书室的组织。

在常德、汉寿、益阳、溆浦、沅陵、新化、安化、湘乡、宁乡、南县、铜官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起码是支部。铜官是区委，益阳是工作委员会。铜官和益阳全是工人，其他各县大多是知识分子。群众工作做得较好的是新化、溆浦。新化在“三八”节举行纪念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溆浦则因县一级的如县长、科长之类过去大革命时是同情者，所以较好些。在湘西的工作，最大的困难即是交通不便，如到溆浦这类地方的信件，起码半个月才接得到，这在指导工作的时间性上大成问题。因此，急需在那里（湘西）设立中心负责人，能单独解决问题才成。省政府已设立省府行署于沅陵。

总计湖南的党员是在五百左右，这是本月前半月的统计，要是四月初做总结，八百党员是不会相差很远的。外县的组织状况大概如上。其次，各县中的土匪是相当严重的，其中湘西、湘南、平江、浏阳一带都有，不过多少不同。这里有两〔个〕问题，①这些土匪的产生，是由于一些不满政府压制民众的知识青年（湘

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

(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

一、三个中心工作执行程度

还在四月间，长局^①根据湖南情况就指出了五月底老高到汉，长局^②依然决定且更着重指出要湖南党坚决去执行军事工作、民训工作、工人运动等三个中心工作。三个月来执行程度如何，这里就尽先谈这个吧。

第一，军事工作。这在当时还只有不甚主要的个别线索。为了这个工作，省工委曾几次讨论过，决定了各级党委直到支部都设立军事干事，推动全党去进行这个第一位的工作。工作的进行是：（1）机械化兵团和学校；（2）一般的正式军队工作；（3）地方部队及建立民众武装。这些又以机械化部队及军官为主要工作。执行的方法是：（1）加强已有线索在里面的发展；（2）动员党员及前进青年大量参加到军队去；（3）利用社会关系及发动演剧、歌咏、慰劳等〔活动〕，去建立军队中的关系和组织；（4）每个工农青年党员不参加军队，就得参加民训武装或人民自卫团等等地方武装部队。

这样去进行，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工作的结果，

①、②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1. 在主要的机械化部队算建立起了党的支部组织。上层指挥官也有个别的。在其他小的机械兵团和学校大多都有个别线索。化学兵团已可成立支部。

2. X路军及X集团军的干部学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尤以在X路军的干部学校有数十人。其他军师仅有个别关系。

3. 在警、宪部队，警察及盐务稽查队各有两个支部；在宪兵里还只有两个个别关系。在正在编制的省防军里有一个团副。

4. 在伤兵里有十五个支部，成份大部分是伤兵，有一部分连、排长、个别助理员及医官、看护。

5. 此外在陆大（已迁桂林）有三个同情者；另有一个在职的旅参谋长，我们相见过两次，他要求长沙危急时指导他打游击战争。

近四个月工作，共约发展三百三十多人，除流动的，尚存百数人在湖南。这百数人中，约百分之七十是少尉以上的中、下军官。而这些中、下军官之中，又大多数是非直接带兵的，他们多半是技术人员、教官、官佐及学生之类，百分之三十是士兵。

除此，在地方武装中，尚有岳阳保安队支部，澧县一个百多人的枪兵队及淑浦一个数十人的团队都是在我们领导之下，及其他还有个别做人民自卫团队长的，都没有算在上述统计之内。

这些如果说经过近四个月工作，所获成绩自然是显得太微弱了。不能获得应有成绩的原因，还不在这个工作之困难，实在是：（1）工作领导上没有真正能够把握这个主要工作，一切工作没有联系这个中心工作去推动与进行；（2）没有发动真正成为全党党员的工作；（3）一些上层党员与上层社会关系没有组织到这个中心工作上去，徐老经常有很多军官去拜会他，但他不与约关系，连姓名也不知道，是以虽然一次、几次谈话，每次话

谈完了也就什么都完了，不能起些微组织上的作用。这个头等主要的工作，始终还是陷在个别同志的东奔西跑。这些微成绩的得到，主要是原有线索的发展；其次，是将伤兵中的同志调到一些主要的或者无组织的部队中去；再其次，才是从地方党中调到军队去以及选用个别社会关系发展到部队里。在湖南，湘剧在国民党统治下在我们领导下的剧团，曾经有一个时期与军队关系颇好，经常被请去演剧，但没有能发生组织上的作用。就如各地的伤兵服务工作，都有我们同志参加，妇女会进行了八个月伤兵工作，也没有能够发展组织。伤兵所有组织也还是个别同志去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这些微的收获，也算不小的成绩。如果军事工作发动成为全党的运动，每个主要干部都能懂得与在实际上以之为主要工作去〔执〕行，自然成绩都或比此要大得多。在湖南军事工作，依靠现有组织和线索基础；同时，在党的干部和党员中，已经过几个月的教育和斗争，同时，又处到了武汉、湖南危急的新的情况，而开始了转变对这工作的更进一步的認識，所以，在最近将来是可能有一新的开展。

第二，民训工作。首先对于张治中办的行政干部训练班，省工委每次都通知了各县动员党员去投考，但是能够获取的只是个别，最后一次训练督导员和县长，同志无一考取者。不过每次训练，我们都能在内部取得一些发展。一、二期干训班，每期都得发展十多人，在第二期，督导员、辅导员之类总共发展了五人，后来分发各县都起了较大的作用。最差的是最近的一期，仅利用社会关系找到一个督导员。在乡村民训工作中，只要那里有我党组织，同志大多都参加了，但藉以取得较大作用的仍极少。主持者多数是利用以强悍群众，其控制受训者，凡比正式军队还要百倍的严（对于国民党怎

样进行民训工作只好于谈到湖南政治问题时详谈)，如果是我们同志或进步群众主持，只要稍为积极与略认真做些民训工作，便就有被撤职以至于拘留的危险。

在民训的进行和张治中的所谓行政改革中，由于反动的障碍，我们虽未能取得应有的作用，但在争取乡、保长中仍然收到个别和部分的成效。在我们有组织的二十多县之内，每县至少一个乃至五个党员当乡、保长。这些同志大多数都能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及党的策略路线，积极的工作。仅有个别不能起党员的作用，为保持自己位置，胆小而不敢动。也有个别甚至是出以革命投机的买卖，即为怕革命而加入革命。

第三，工人运动。这已有一个专门报告，此地不多谈，所要谈者只是对那个报告尚须提出的几个原则问题。

1. 四月间，长局^①就指出湖南平运要着重军事工业部门、矿山以及铁路交通工人工作之发展，但到现在这方面还是显得很微弱。军事工业一般的尚只有个别线索，还有好些如长沙兵工厂、修械厂等尚连线索还未找到。由外省迁湘的许多军事工业，经长局^②转过去的关系的连（联）系，都还未建立好，更谈不到加强指导与发展。铁路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线索，公路也仅只三渡水车身修理厂有两个上层的联系。矿厂除安源发展了三十多人的组织，其余资兴有一个支部，此外如有数万人的新化锡矿山及数千人的水口山铜矿厂都还没有党的组织。在主要企业（中），工作薄弱乃至没有组织，这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缺点。

2. 在长沙的织造工会、缝纫工会及益阳的五个工会和常德、南县的某些工会理事会，确都有我们同志参加成为其主要负

^①②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③④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责者，如果说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已有决定作用，那是夸大其词的。不说为着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要求，就是较积极的抗日活动，我们也还不能作一般的决定作用。工会依然是很沉寂的，在理事会中的我们同志，并还没有被工人群众视为他们利益的积极坚决的领导者或领袖。这些同志仅是比工会官僚好些，这也就是他们被推为理事的条件，但他们还没有成为工人群众的真正领导者，他们的工作常常是做着工人群众的尾巴。

3. 在湖南，大多数职业工人都有组织，然而工会生活却大致都是没有的，我们得到参加理事〔会〕的工会也还是未能实际建立和充实工会生活，工人与工会的联系依然很淡。因是工人常常相信青帮、红帮，而忽视阶级工会的组织。

总之，在湖南能够运用旧工会，在里面活动并取得参加工会理事会的领导，这是它好的地方；但不能利用一切合法公开的可能，发动和领导工人的斗争，这又不能不是它的缺点。不仅不善利用，甚至放弃好多公开合法的机会，就如省府召集“八·一三”大会，工会里的同志事先既不积极去动员，待到临时邀约了千多群众去参加，及到会场却是大会已经散会；虽然未参加上全市群众大会，而自身千多人也当开一个会和进行游行等，但他们却见大会已经散会，便即自动解散了，而给工人一些不好影响。

长沙有几十种职业工会，我们得到参加理事会的只两个工会，有党组织的也只有少部分职业中，大部分还没有党员。长沙工会最反动的要算印刷业工会，但在印刷工人中，我们始终还未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工会中能起和已起了些领导作用的，还是铜官的陶业工会。

此外，职业界（银行业、电汽业、邮务交通业、书业合组）抗敌后援会颇为活动，并取得了相当社会地位，这是个在我们领

导之下的团体。成份主要是职员，工人参加的很少。

第四，就是其他各种群众工作。

1. 妇女工作：在长沙有一个妇女会，由妇女服务团和妇慰会共同组织起来的，委员中我们同志占相当数量，但因为能力弱，复市委对他们的领导不够，致不能起应有的作用。直到现在，妇女会仅有上层，而无群众基础。这个工作，长沙市妇委有一个报告，此不赘。

湖南各县妇女工作，在我们领导或影响下的有：新化妇女会、岳阳妇女抗敌工作团、衡山妇女抗敌工作团、铜官妇女会等等。在其他各县，有我们领导或影响〔的〕妇女组织尚没有，大致在较大的县都有C.C或复兴社组织的所谓妇女团体，自然更是没有群众的。一般的在湖南现在还谈不到广大的妇女运动。

2. 青年工作：这个工作在过去省工委是忽略了，从来没有有计划的去指导和进行过青年工作。省工委成立以来，只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公布后讨论过一次青年问题，意见原则上大致都是正确的。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青年工作方法，采用各种方式组织青年，特别是恢复民先队都提出了，决定了。但因为对这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刻，是以在实际上仍然没有〔按〕计划去进行。

因此，虽则在湖南仍有一些微弱的青年活动，多是自发的或是下层个别积极的党员自动去进行的。总计起来有：

①湖南大学“明日社”，系由我们同志发起组织起来，现在已发展到八十多人，百分之九十是我党的同情者，内而成份最大多数是学生，也有军官外国语训练班二十多名及二十集团军的干训班一部分教员参加。组织生活尚活泼，定期大会及每周小组会多能按期开会，讨论研究时事、政治、理论、会务及青年本身问

题等；此外还有按照兴趣成立歌咏、游泳、足球、网球等等。游泳、足球等还举行了几次同二十集团军干训班及青年会的比赛。最近“八·一三”，党的领导通过“明社”的发起和联络，举行了一个五千多人的军（二十集团军干训班及军官外国语学校等等）民（除湖大及高农外，尚动员了近两千的工农及船夫参加）纪念大会。大会讲话的人很多，且都能提出统一战线与为民主而奋斗的口号，所以在会后的第二天，长沙即散布流言，说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②战时研究团，由一个同志×××^⑨发起，据说曾发展到百二十多人，但以这位同志的风头性、领袖欲与工作的官僚主义，群众多厌恶，是以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组织，也无大的工作表现。

③此外，在长沙尚有各种附属的青年组织，如：文抗会战时训练班六十多人，职抗会的战时训练班和救护班各三十多人，群众读书会，各团体座谈会（现多停顿状态）以及世界语班等等，多系我们领导或受我们影响的。

④全省性质的有一个函授班，乃我们同志主持，学生六百多人，影响和联系都算好，可为发展全省青年工作的基础。此外还有一个流动剧社十六人，我们同志有七个，现出发湘西，可以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工作宣传队。该流动剧社，是经过总政治部立案批准〔的〕。

⑤在各县仅有：湘潭南国文艺社，原为C·C发起组织起来，我们同志参加在里面，成立有一个支部。南国文艺社大致都能接受我们的主张与领导。交通大学民先队，从唐山迁湖南一直存在，其队长是C·C，我们同志在队中，曾担任过队长，现因C·C姓名系编者略去。

在，并未停止过活动，不过很弱。衡阳孩子剧团，虽只有个别同志，但该剧一般的是接受我们影响的。其他自然还有好些小的青年团体，更有不少是完全宣传我们主张的，但有的只有个别联系，有的没有联系。南岳数千学生的集训，我们有二十几个同志参加，但活动甚微弱。

（不补，在安源矿工中有一个二十多人的民先队；在汝城有一个在我们影响下的百多学生的读书会。）①

陈泽云从训练班毕业，带着长局②对青年工作意见回去，省工委比较详细的讨论过一次，决定了陈泽云负青年工作责任。在青委成立后的青年工作，陈泽云已有一报告，因此关于成立民先队部等问题都省略。

文化人工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当初是由北平回来的一些前进的文化人发动组织起来，开始比较很活跃，但在今春上海省党部的合并组织以后，一切活动就都受着党部的牵制或压制，排挤，到现在许多干事被排斥了。伤兵服务团被解散了，难民工作团也禁止了活动，一九三六剧团和一致剧团都无形停止了工作，原来定期的座谈会和讲演会也不召集了……，只有我们同志参加的个别部门尚在继续坚持工作着，而整个文抗会是在奄奄一息了。这里一面固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守旧，但同时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左倾关门与右倾投降，即首先以轻视党部参加人的态度，一切活动完全不理睬他们，不去尽可能求得与他们协商进行，引起他们的疑虑和狭隘醋性，同时，党部的人提出打击或排斥革命分子以及停止一切必要工作，不坚持与之力争，任其猖狂，好些同志好象意气般的自动离开文抗会，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希望的。

①此段原文系另纸所补。

②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在长沙另有一个高级的文化人座谈会，由杨东莼发起，他们称为干部座谈会，共十二人，我们同志占六人。在这个干部座谈会之下建立有十二个座谈会（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即每一干部座谈会的人领导一个座谈会。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能够作一些文化宣传工作，但没有群众的基础。此外，在长沙有一个青年记者会，我们只有个别同志参加，不能起什么作用。

在各县，由我们同志发起在塘田成立战时讲学院，本月就开学；岳阳有一个教育界抗敌工作团；衡山有一个小学教员抗敌工作团；南县有一个抗敌宣传团；长沙乡村有一个小学教师联合会……，这些都是受我们影响和领导的。

4. 农民工作：这是一个基本的群众工作。这个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开展。

在湖南，党进行农村工作现在主要是限在：①建立民众学校或夜校，这在大多数有我们组织的县都有这类学校。在岳阳共有九十多所，由我们同志直接主持的有三十多所，其余也都有我们同志参加。②流动图书馆，除湘南特委管辖的各县还没有建立外，其余各县只要有党组织就多这类农民图书馆的组织，部分地方还有农民壁报。③农民合作社，这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建立还不普遍，只有长沙的乡村及新化原有的一个平教会办的合作社，在长沙的合作社主要是借贷。④此外，个别的自动组织的如国术团等等也有一些。真正形成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现在还没有。

在几个月来的参加民训工作，是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一个月前，张治中的所谓为改革基层而颁布的“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我们利用这个法令即发动各县去进行。现在已经一

一个多月，因为土劣的障碍和党部人员的压制，也还没有具体成绩表现。不过时间还短，最近将来至少在部分地区的乡、镇是可以组织起来〔的〕。

二、党的组织现状

四月间，长局^①的指示是要求湖南党的组织发展十倍。从六月起，现在是应该发展到八千，但实只发展得三千多党员，四倍不到，自然相差是很远。这并不是客观的不可能发展十倍，实是主观上有很多的缺点，这在下面再讲。现先讲三千多党员的分布情形。

第一、党的组织分布

1. 长沙——党员六百四十五，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一，农民百分之三十四，学生百分之二十五，店员百分之五，自由职业者、教员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五。

2. 铜官——党员五百多，陶业工人占百分之八十，余为农民和小学教员。

3. 岳阳——党员一百二十，但最大多数是学生知识分子，工农占少数。

4. 衡山——党员一百多，主要基础在南岳，也是知识〔分子〕占最多数。

5. 衡阳——党员三十五，军人、工人、农民、学生都有，农民占多数。

^①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6. 益阳——党员三百五十，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百分之十二，学生、教员及其他占百分之十六，这是一个约计。

7. 南县——党员二百五十，农民占最大多数。

8. 华容——党员一百五十，农民占最大多数。

9. 常德——党员五十七（七月统计），学生多数。

10. 澧县——党员八十五，农民占多数，有二十几个小学教员。

11. 汉寿——党员一百一十，农民占最大多数。有县府公务员三名。

12. 湘潭——党员六十五，农民多数。

13. 湘乡——党员六十八，农民多数。

14. 溆浦——党员一百一十（七月报告），农民占最大多数。

15. 安化——党员三十四，多数小学教员及乡、保长。

16. 郴县——党员一百二十，农民占最大多数，只有个别学生。

17. 汝城——党员七十五，学生知识分子占最大多数。

18. 耒阳——党员三十五，最大多数农民。

19. 桂东——党员四十六，最大多数农民。

20. 安仁——党员四十五，完全是农民。

21. 醴陵——六十八。

22. 浏阳——一十一。

23. 攸县——四。

24. 安源——三十七，完全工人。

25. 安乡——五。

26. 宁乡——一十四（七月情形）。

27. 沅江——二十。
28. 洪江——一十五。
29. 沅陵——四（七月情形）。
30. 石门——二。
31. 大庸——五。
32. 临澧——二。
33. 藕池——九。
34. 新化——五（七月情形）。
35. 邵阳——一。
36. 凤凰——一。
37. 军队——一百零二。

此外，在湘南之临武、宜章、乐昌、常宁、永兴、资兴等县共散布有一百二十多人（这些党员多是在这些县的边境，即过去游击区域）。

上述各县，成立县工作委员会的有：岳阳、衡山、益阳、南县、华容、常德、澧县、汉寿、湘潭、湘乡、湘潭等十二县；湘南以郴县为中心共十二县，原系东南分委下成立的一个特委；现尚模糊；长沙市（包括城市和附郊）是正式市委；长沙县（长沙乡村与铜官合并）正在准备成立正式县委；安源已成立安源矿工工作委员会。

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省正委已几次计划成立八个中心县委。即：

1. 长沙——管湘阴、浏阳。
2. 湘乡——管湘潭、邵阳、新化、安化。
3. 衡阳——衡山、攸县、醴陵、祁阳、耒阳。
4. 常德——澧县、桃源、汉寿、临澧、石门、大庸。

南县——华容、安乡、藕池。

益阳——沅江、宁乡、安化一部。

岳阳——临湘、平江、湘阴北。

郴县——汝城、桂东、桂阳、安仁、临武、宜章、常宁、永兴、资兴、乐昌。

溆浦则向周围各县发展和联系，准备将来成立中心县委。此外尚有武冈、沅陵、洪江、芷江等中心县，因本身党的组织尚弱甚至没有，周围的县也没有党的组织，现拟以大的注意去开辟，并求于最短期内走向中心县委的前途。

上述建立中心县的计划，但以经费和干部困难，除常德外，其他尚皆没有实现。

第二、党的生活和教育

1. 支部、小组会议能够经常召开与很好的讨论问题，只在长沙、衡山、澧县、岳阳、南县、湘乡、溆浦等县一般的能够作到（也还有部分不能作到）外，其余各县都是很差的，甚至不知道怎样叫作开会。

2. 在两个月前，省工委经常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后来因环境及其他原因，近两个月停办，直到现在才又开始。不过，对于长沙市的干部训练是一天都未停止过，省工委的人都参加教课。在长沙、益阳、南县、澧县、溆浦等县，大多都能举行经常党员训练班。

3. 各县负责人近的每月到省两次至三次，最远的至少也要到一次。每次到省，省工委必与之详细讨论工作及各种政治问题。六月，省工委派了人到各县普遍巡视过一次。

4. 对党员教育，我们作过的除党的建设、马列主义基础理

论及一般工作方法、方式外，特别进行过专门教育的有反托派斗争，反对张国焘主义、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等等。除少数边远地域外，都算比较深入传达和讨论了。此外，政治问题、党的决定，如“保卫武汉与我们意见”等等，除支部、小组讨论，亦都在各种的以及在流动训练班中特别进行了深入的教育。

5. 全省（除湘赣、湘鄂赣外）虽然只有三千多党员，但都是在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复因干部基础的薄弱，一切基本的教育所以还谈不到是深入到了每个党员。事实上直到现〔在〕，各种坏的倾向和行动，就在长沙也都是很严重的存在：组织观念的模糊，私人感情和个人利益超过党的组织和党的利益；阶级意识薄弱，没有阶级立场及不愿接近劳苦群众；政治上的动摇不坚定，如单纯的害怕“马变”（国民党以“马变”恐吓革命分子）而不敢动（常德党甚至因此整个组织决定停止活动足有两个多月）；自由主义与自由行动，更是普遍的事。

第三、一些个别的问题

1. 自首分子个别混进党内，在大多数县份都有。澧县及汉寿各被清出四十多人，南县和常德也各清出十多个，多半是自首过的分子和其他异己分子，这还只是表面的一些，隐藏着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并没有完全清除出去。……①

2. 有意无意的反对省工委、破坏省工委在党员和群众中信仰的流言常可听到。但他们都不是有什么根据的，只是看到表面的革命斗争不能如小资产阶级所希望的热烈，便到处随便批评。甚至攻击省工委“太不行”，甚至如兵役动员的恶劣现象等等归

①此处编者删去约百六十余字，主要为隐藏叛徒举例。

到省工委没有很好的去领导与动员，也有谓九江的失利，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克服困难与艰苦工作去动员群众与加强军队的无知笑话……。这种以极左革命词句在党员中散布流言，因有或由于个别幼稚分子之过左要求，也难免不有个别托派分子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具体发觉出来。……^①

3. 上述现象都只是个别，流言的影响也很小，党在基本上是团结的。不过，省工委的威信在党员中还没有提到最高度是事实。

湖南党几乎完全是和平发展起来的，新党员没有经过任何大的斗争锻炼，加以混进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是以在广大的发展党的组织中，百倍加强党的教育、严密党的组织、清除异己分子，以巩固党的组织，是同时提到了湖南党的面前，并且一刻也不能忽视的严重任务。

第四、党的发展的缺点

三个月，党的组织发展四倍，建立了全省几个主要区域党的基础，已形成了党在湖南的政治上的力量，这自然是不可忽视的成绩，所以个别流言的攻讦是胡说。然则是不是可以说，三个月还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呢，客观的情况是可能的。其没有获得更大发展，达到完成十倍的原因：

1. 关门主义的错误。湖南大学半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已经是七月了，去检查他们支部的时候，原来他们发展的条件是：^①要读过半部以上马列主义的书籍，^②要没有一点小资产阶级劣根性；^③大概还要会讲话等等。实际上，根据这些条件，湖大支

^①此处编者删去百七十余字。主要是对一些流言散布者的评述。

部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做共产党员。仅有这些条件，不再有其他条件，也不见得能做共产党员。此外，在新化，在宁乡等县也是与湖大支部同样的原因，半年没有发展一个人。一般的还是由于政治上的右倾动摇，害怕群众不敢活动，而将门紧紧关起，这在各县或多或少都有。湖大支部经过斗争改造以后，很短时间即获得很大的发展，并开辟了新的工作，团结了很多群众。新化、宁乡等县八月份尚无组织发展统计报告，尚不明。

2. 干部的训练和分配，没有大度的进行，因而有好些县和许多有群众的团体、机关部门，我们许多都没有派遣同志去工作。

3. 党的组织发展是和平发展起来的，是全靠个别接触吸收，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发动广大群众运动，在广大群众的斗争运动中去吸收党员，发展组织。

由于上述原因，使湖南党的组织还远落于客观政治之后。湖南民训员有两百多，因思想行动左倾被撤职，甚至被禁闭，但无一是我们党员。有许多青年团体因为纯洁，积极革命，即以其有C·P·背景而遭压迫解散。但这些团体实际与我们还没有关系，就在文抗会及中苏文化协会一期、几期办的训练班，我们也没有在里面获得应有的发展。总之，是有极广大的群众须要革命，须要斗争，须要抗日，热烈要求我们的领导。但是我党在他们中间的组织工作还是很微弱，甚至于没有。反之，又由于不能从开展群众运动中去发展，而使得部分不成熟的甚至个别异己分子也混了进来，妨碍到党的巩固。

三、湖南的目前政治和社会

这个问题前经几次长局^①指示，原则上没有什么变动的。总

^①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的方面的问题，这里不谈，这里只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第一，张治中到湘不久，即颁布了一个施政方针，这已是很早的事。不管张治中主观上是如何打算，或者为了打击旧的何派势力，以图提高与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者其他，而那个施政方针总不失为是比较进步的东西，至少与何键统治时代是要进步些。他是不是要求他的方针的实现呢，他训练了好几千的民训员，不能说他不是这个企图；最重要的还在他在国民参政会后所颁布的“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的法令，这个又要比他的施政方针更具体更进步了（虽则基本上是不够的）。九江失守，湖南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即派了杨东莼到汉调查动员委员会组织法。接着覃政到湘，他即留覃担任湖南动员委〔员〕会责任，像坚决要放胆发动一下的样子。并有人向他建议，可否吸收一些共产党人参加，他的答复是不必用共产党名义参加，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在当时虽仍然是官僚的，但是很紧张的在进行着、准备着。但是自从蒋到湘，在南岳开过一次会，随着又跟了到汉，回湘后便不声不响，一切像都沉寂下去了。张治中的突然消沉，绝不是由于他的施政方针及“改善基层”的法令等的行不通之故，也不是由于与省党部的冲突，这恐怕是与整个国民党政策有连系的。

第二，湖南国民党部的内部派〔别〕及其与省政府的冲突。

1. 湖南国民党内部冲突老早是很厉害的。七月间省党部改组，派了李毓尧去，冲突是更益厉害。李毓尧到后，第一件事便是调换在省党部的科长、科员及各县的书记长为自己私派人，引起很大的反对，好多县份拒绝新书记长到任或通电反对。陈立夫在湘省党部的科员以上演讲会上，即有人公开当场向陈提出反对李毓尧，谓李“引用私派，排斥异己”等等。据一般考查，最近所发生这一现象，一面是复兴社、CC和何派的冲突之继续加

深，李毓尧即为复兴社；一面便是各县原任书记长为饭碗的斗争，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涛。

在湖南，现在国民党内一般的还是复兴社得势，省党部的一些原来CC的分子如陈大庸、周邦式等，据说都投到了复兴社。原来据说李毓尧也是一个CC转到复兴社的，以其在CC内较有地位便于拉拢CC才被派到湖南。C派（即何派）的下层也有很多投到复兴社的，不过上层的一些人觉得就是投到复兴社门下并不能出头，所以仍图自己的再起，自然他们是看势头的。

2. 省党部同省政府的冲突。曾经好几次省党部召集群众大会的地点，省政府临时给以改变，于是党部的陈大庸等屡对人挑拨式的讲：“政府怎好做民众运动，民众运动应该是党部的事。”七月间，省政府颁布的“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法令的一星期后，省党部即颁布一个“建立家族组织”的办法以与对抗。其他就在行政上，这种事实都不胜枚举。李毓尧到湘，曾企图调整党部与政府的关系，开过几次联席会，但并未能解决。后来，蒋到湘也或会提到这个问题。陈立夫到湘，根据他的演讲或主要就是为此事。调整的情形如何，后来不知道了。但基本的矛盾，可以断定是不易解决的。一致对付C·P·吧。今天张治中并不能真正感觉到C·P·对他的威胁，而却只是深感党部牵制了他的权力。他带去的私人，一个也不能运用到行政机构上去，是他最不满而又是最难堪的。

第三，湖南国民党的压迫民众运动。湖南国民党从来没有进行过民众运动，只是经常在想法如何防范与压迫。

1. 所谓“建立家族组织”，实际为的对抗张治中“改善基层组织”及限制民众运动的办法。

2. 原来国民党也组织过湖南学抗会等团体，主要是因为群

众的要求及国民党为着便于统治，便就随意在学生中指定一些他们所认为要得的人负责。但因为民族危机的深入与革命形势的发展，不革命的学生也要革命了，学抗会也竟组织起战地工作团与后方工作团起来。省党部于是决定战地工作团不许成立，于是战地工作团的人就都参加了后方工作团，共三百多人。出发之前，党部委员大骂共产党的训话，就把团员骂去了大半。所剩不到百人的工作团，出发不到半月，以他们行动越轨，终调回来了。从此，党部也就怀疑起学抗会来了，于是勒令学抗会迁省党部办公，写一字条都必须经过党部的审阅才行，因而学抗会的负责人就都消极走了，学抗会也无形解散。

空洞的或者能够听摆布的团体名义，他们是可以弄一些的，但只要一有些实际活动，便必立遭压制，如湘潭妇女会等都是。

3. 湖南文抗会已被压得奄奄一息了，上面已说过。

职抗会是在我们领导下的一个比较活跃的团体，近突然以“活动越轨”空洞的一句话停止他们的活动。职抗会因为又是比较有基础与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团体，命令到后，坚持活动，延不执行停止；同时，将他们所做的工作（募捐、慰劳、演剧、救务……）在报纸上公布，请求援助。终于国民党还未敢强迫停止，据说还有谈判条件的可能。

此外，尚有许多团体，如衡山各界抗敌工作团，有群众基础，也有势力者参加，国民党极力反对与破坏，但莫之奈何。在国民党的民运压制政策下，被压迫解散或无形停止活动的固不少，但同时新起的群众组织仍是向前发展，不论在长沙或在各县，群众小规模的组织经常都在发展与增加，不过活动形式稍有变更。

第四，国民党对付我们党。这总的方面同其他各省自然没有两样，这里要说到的只就在湖南的一些事实；

1. 我们在长沙做伤兵工作的王可增，他们是把他作为共产党员捕去，徐老曾函张治中保，迄未释放。

2. 耒阳县委全体被捕，他们是以他们不该散发湘委宣言捕去的，也还未放出。

3. 安源CC组织马克思主义协会，被复兴社破坏，而CC却供是我们同志易青元组织的。〔见〕易青元来的报告。

4. 军委会战时青年干部团在澧县发起要共产党员登记。上述个别混入我党，自亦为他们有计划〔派来〕的。

5. 复兴社到处组织专门对付我们的所谓剿动队，尤以□□在常德组织的为普遍，内面分子多系流氓及革命叛徒分子。

6. 学生的所谓集训，主要是在那里宣传反对我党，从反对我党来发展他们的所谓三民主义青年团。反对我党，流言恐吓革命群众，是他们经常的工作。

（补：①土匪很活动，溆浦土匪自称抗日反共军。

②青、红帮，土匪假藉八路军名，强迫农民参加他们的所谓游击队，并且每个参加的人要出五元钱。

③青、红帮到处拉人加入。

这些据说又多与国民党有关。）①

第五，我党在湖南的影响，是随着民族危机与国民党一部分的开倒车而日益增长起来。的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未公布以前，虽然在湘的顽固派一样是压迫破坏群众运动，群众总当他们是国民党内一部分落后的、顽固的一派，而对整个国民党、对蒋的希望与幻想是很高的。但自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及章程发布以后，在普遍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乃至很多的政府的和教育

①此段原文系另纸所补。

界的行政人员都表示非常的失望。接着而来的压迫，更是使群众的忿怒的不可遏止，再加上我党坚持的立场与光明的态度，是使群众更加认识了我们，接近我们。这里且举几个事实吧：

1. 在六月底七月初，我们在湖南还不到千人，三千多党员全是在七月的下半月和八月份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

2. 不少曾经确是妄想在全国党的领导下做一番事业的人，他们有作事的热忱和决心，他们又多是在国民党、政府或地方上有些地位的人，现在他们都非常之悲观失望了。有很多是更接近我们，甚至要求加入我们的党。在政府行政人员中有，在教育界更多，直到乡村的一部分想做事的乡、保长，也有不少消沉了，辞职回家，如新化教育局长及其他很多这样的人。

3. 近来，国民党大概一则为“防范”思想，一则为了安插沦陷区流亡到湘的CC与复兴社分子，现要进行全省小学教员登记，据说要大批调换小学教员。但是现在最大多数教员都拒不登记，而国民党用视察名义派去准备接替教员的那些流亡分子，在各县形成一种窘态。

4. 南岳学生集训，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据说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只是集训不到一月，即有四百多学生被开除了。集训生每个人都记得集训第一天宣布纪律时的这样两句话：“你们来集训，你们的命运和生命就握在我的手上了，你们要小心一些！”集训生甲队不许与乙队接近，本队学生也不许三人一起同行或讲话。学生现多采消极抵抗，甚至有这样填表的：“你认为那个是中国唯一领袖？”填：“不知道”；“你打算你将来的前途〔途〕怎样？”填：“回家吃老米”或“愿到抗日前线去打仗打死”。

5. 交通员工训练所，有三百多都是同浦铁路的员工（据说

是因为八路军在山西办得很好而眼红才办的），训练了近半年，结果不能分配他们的工作固是原因，主要还是政治上的不满，一致要求“赶快发给我们路费，我们好到郑州待机参加八路军去”。国民党枉费半年苦心，毫无所得，于是教官杨华官也不得不对人害〈唉〉声叹气说：“不知八路军用的什么方法，我们实在无法。”

6. 我党在湖南各阶层中，在工农和大部分学生中自不必说，就是各县地方地主、绅士也可以分出这样三种人：①最反动而坚决反对我们的，这只是一部分，而还不是最大部分；②害怕我们而愿与我们妥协，或是不问此事的，这是最大部分；③前进、开明、赞助并积极帮助我们的也有不少的一部分。政府委派的督导员、辅导员之类等等，好多找我们同志商量，如果长沙失守，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督导员据说不准离工作地要坚决打游击的），并请帮助。县长比较接近我们的有桂东县长，岳阳县长，南县县长等等。最上层如刘岳厚等对吕振羽讲，要吕与共产党保持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准备于长沙危急时即要发动游击战争，但发动游击战争必须要求共产党的帮助与参加。

最主要的自然还在湖南广大群众革命情绪的增长。

湖南同全国一样，是在或正在转入民族革命的狂潮。国民党的倒退，只能给予某一些措〈挫〉折，而不能根本损害它，而且群众从措〈挫〉折中只有更加获得经验，更加觉悟，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

四、领导和工作的一些问题

第一，在总的目前形势下，根据湖南目前情况和党的力量，

省工委一般的提出了（但还不是很明确、坚决的决定了）目前几个主要工作。即：

1. 军队工作：①不断输送大批同志到军队去或投考各军的干部学校，特别是投考机械化学校；②组织一切有上层社会关系的同志转移其工作，主要向着军队的上层军官；③加强军队现有组织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发展。

2. 民众武装与准备游击战争，一切民众运动须与〔之〕密切联系起来。动员党员和群众参加人民自卫团里去以及加强现有的一切地方武装的我党的活动。群众游击战争布置，主要是发展党和发展民先，县、区、支均设军事干事，必要时期以党为骨干，民先为基础，发动游击战争。

3. 工人运动：用一切力量发展军事工作及交通工人工作，建立已在我们领导的工会生活，加紧工人军事训练（自然是利用合法的）。

4. 以民先为基干的广泛开展青年运动，把已有在我们领导或影响下青年团体，通过党把他们联系起来，统一行动，最主要用一切形式去组织青年与发展已有的青年组织。

这四个主要工作，自然中心的中心还是军事工作，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全党各级和各部分组织议程的第一位必须是军事工作。

第二，为着执行上述主要工作还必须要：

1. 军事工作的重要及其意义要作普遍的教育，党员军事化的口号要深入每个党员。进行对各级军事工作人〔员〕单独特别的训练。

2. 利用张治中的“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的法令，加强各县特别是同乡、镇、保长的统一战线，由上而下或者

由下而上的建立各种下层群众组织。

3. 可能参加到上层政权机关及军队中去做事的，要尽一切可能进去，使利于下层工作之进行。同每一个前进的上层分子建立密切的联系。

4. 整理在我们领导下的报纸、刊物（如《观察日报》及《中苏旬刊》、《邵阳真报》等），争取与加强同其他各报纸、刊物的联系，使〔其〕能在我们领导下发生舆论的影响。我们意见，最好省工委还能建立一个自己的机关报（周刊或旬刊）。

5. 最主要还在党的组织的发展。现在虽有三千多党员，然以偌大的湖南，还是不能起应有的作用，且还有二十多县无我党的组织。扩大党的组织力量，是执行一切工作和任务顺利完成的枢纽〔线〕。现在计划打算是：（1）大批训练干部派到军队及各地去开辟和发展工作；（2）长沙所有党员准备来一个分配：①主要部分到军队去；②一部派到需要的地方工作去；③一部回本乡工作；④长沙只留少数。

在武汉危急、湖南吃紧、国民党倒退〔时〕，我党组织是进到一个开展的形势，只要有人和有正确领导，组织是会获很大发展的。现在问题是一面要加强党的组织力量的扩大；另一方面要同时整顿和严密党的组织，首先就须立刻把隐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叛变分子清除出去，以求党的巩固发展。

第三，在领导上，湘委有自己的长处，即每个负责同志都是忠诚的积极的，不怕艰难，所以也就能获得一般的工作成绩。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1. 工作的事务主义与手工业方式；2. 虽有工作计划，但没有检查工作，甚至还没有检查工作的习惯，偶然检查一回也是不深刻的，所以还是未得解决问题；3. 最重要还在政治领导的薄弱，从来很少讨论政治问题，讨论也很少有

明确的决定和根据决定去计划、去执行，只是那个《保卫湖南宣言》，先经过我起草后提到省工委，因徐老有不同意见，讨论才算比较郑重，每个人都很负责。对下级政治指导非常之缺乏，每每有临时发生的政治问题，省工委不能及时讨〔论〕，即讨论因不明确也就不能很迅速与一致的传达，致使下层同志中常常发生一种惶惑或狐疑。在领导方式上：1. 有分工负责而无集体领〔导〕，致使各个人负责的工作，彼此不知道，现已在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2. 不善于抓住中心一环的推动；3. 巡视工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八月初，湘委曾致电长局^①与中央，要求调富春同志到湖南，我想不论如何即富春同志不能去，也须派一个比较能掌握政治局势的同志去，特别是在如果武汉危急、长局^②迁移离湘更远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湖南是正式成立省委的时候，无论如何要派一个负责同志去主持。

洪 钧

九月六日于长〔江〕局

这几天来都在病中，这个报告写得非常零乱，且有一些材料临时遗忘了，容待口头再补讲吧。

（补：在沅江发动了一广大农民与堤捐局长清算捐款的斗争。）^③

①、②此系对当时长江局的简称。

③此段原文系另纸所补。

王涛关于湘南特委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①)

湘南现在的工作区域，包括有郴县、耒阳、安仁、常宁、两
衡、宜章、乐昌、桂东、汝城、资兴、临武等县的一部或全部。
湘南在一九二八年曾举行过农民暴动，一九三一年恢复游击
战争，一九二八年曾犯过严重的盲动主义。一九三四年主力红军
经过后，敌更用大力摧残，当时特委书记牺牲，一部分委员叛
变，游击队遭到很大的损失。以后组织新的特委机关，但当时又
犯了逃跑的错误，所以最后只桂东、汝城边界保留了一个小的游
击队和根据地，湘、粤边宜、乐保留非常小的根据地，耒阳、安
仁也保留了一点子。当时地方党的工作可说被取消了，而只是在
这些地方有些群众能帮助我们并保持秘密而已。一般的群众因为
游击队的失败，一部分叛徒和敌人的残酷进攻受到很残酷的压迫
和摧残，直到现在失败情绪还相当的厉害。同时过去因为进攻，
所以现在统治阶级的保、甲组织也比较严密，统治阶级和豪绅地
主的压迫也还比较厉害。但是群众过去受了很深的共产党的影响，
最近八路军的胜利，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以及我们回到湘南工作
和最近国民党的征兵中发生的拉兵、烤炸（敲诈）、派公债的
〔不〕公平等，所以群众一般的表现很好，要求组织，但又希望

*原文标题：“报告”。

①此文年月系编者考证。

取得合法的地位。统治阶级方面在湘南来说，也表示他们是不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我们一般的正确的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公开的与我们对立和破坏的事件还很少看见，主要的是采取消极的方法秘密地监视我们的行动。

这次我到湘南，开始是去找游士雄和湘南特委。但是等我到湘南，游士雄已率队到江西，特委没有找到（实际已没有），因此不得不自己去找李、刘两部，去与当地的政府机关接洽。最后将李、刘两部找到，并累次与当地政府接洽好，才将部队集中，开赴前线，共扩大到三百余人（原约三、四十人），部队的纪律和政治影响都很好。特委在五月十一号以前自〈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可说就是部队集中和扩大，所以在这一时期很多地方党的工作是被忽视了的，直到部队开拔以〔后〕，特委的精神才集中到党的工作上来，近来是有相当的进步。

湘南特委现属两个中心县委，两个中心区，但是没有一个组织健全了的。原因都是没有干部，现在能工作的干部共约二十五人，支部约二十六个，党员数目都是很少的，还没有统计，主要的成分是农民。最近特委开了两次训练班，群众组织最近才开始，一切最近都在整理中。

在这一时期工作中的收获，党的影响扩大了，取得了公开、半公开的地位，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建立，并有了一部分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与各方面建立了相当的关系。

主要的弱点是，一般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不够，党的组织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各级党的组织还不健全，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还做得很差，主要的是关门主义，最近极端合法的倾向也在开始发生。

今后工作：目前湘南工作最中心的一环是干部提拔和培养干

部。特委经常开办训练班，准备训练材料，提高一般干部的学习精神。在这里首先要大量的吸收新党员，特别着重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和工人中的工作。

应将工作中心移到城市，更灵活的从各方面去运用统一战线（有些同志以为统一战线就只是上层谈判），特别抓紧抗日这一点。

加强党员的教育，建立支部生活，去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建立预、决算制度；建立计划工作、检查工作制〔度〕，反对游击主义。

建立宣传工作，扩大《新华日报》、《群众》的推销，代卖书报，可以经过一部分进步分子办报。

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

湖南特委 王 涛

徐特立关于湖南二、三两个月 统一战线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湖南环境的转变

(一) 经济、政治中心的破坏。自长沙火灾后，长沙只恢复了一些小商业；工业只有小手工业；学校完全没有；报纸有三种日报，其中两种是小型报；政府机关只有省行署和长沙县署。因此，长沙失去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作用，而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就束缚在狭小的范围中。

(二) 在湖南，日本的间谍素很活跃。二、三〔两〕个月中，我收到日本的刊物有《红旗报》、《大公报》、《救国日报》、《和平报》、《东方》共五种，此外，还有人在酒馆席上拾到日本散发的传单。刊物的内容主要的是挑拨离间，散布和平空气，诱我们投降。其形式是假托中国救国的面孔，其中充满着“伪政府”、“敌人”、“汉奸”、“我们的八路军”等字眼，尤其是《红旗》，完全是假托共产党的刊物。

(三) 湖南对于汪精卫叛徒散布许多不正确的言论，说什么是一种苦肉计，说什么也是政治主张等等。同时，省党部曾召集

*原文标题：《湖南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二、三个月的工作》

长沙各报纸禁止登载反汪言论，一、二月间逐渐洗刷反汪标语。

(四) 政府发出的防共密令中，有防止中共参加各级参政会的密令，有假造中共中央委员叶德辉发动伤兵捣乱后方的密令。四月初，在长沙近郊间有持枪士兵逮捕共产党员，其拘票有“奉李、白司令密令；据广西博白县政府检查邮件，有湖南东乡一字墙王某寄香港某街某号信，其中有入党党员表，系汉奸共党”等语。持枪士兵不知从何机关派来；李、白司令是指广西的李、白；湖南东乡不知系何县、区。〔这〕离奇的密令，其中含有破坏中共和李、白的作用。在湖南的报纸上，党政要人言论中常引白崇禧的名言：“一个党、一个主义……”谁都知道，这非白的言论，这种引证含有重大的政治阴谋。

我在长沙常有〔人〕问我写了什么小册子被国民党得了。又，省府曾有密令给长沙县，由县转乡，防止共产党徐特立活动等等。

茶陵、攸县、安仁均有屠杀共产党员案，即捕即杀，没有审讯，没有罪状。特立三次缄告省政府，三次去会行署办公厅主任，不见。特立请求首先制止继续杀人，已成事实以不妨害团结抗战条件下用法律解决，经过两个月未得任何回答。攸县又继续杀人，长沙近郊又继续捕人。抗议无效，特立准备诉之于舆论，一切信件，都是仁至义尽，尽可以公开发表的，俟相当时期发表。湖南在大火时，省党部曾下委任状给左某任长沙城商会会长，出来维持长沙城，准备日寇来长沙维持市面，此事已成半公开。长沙县抗日自卫团，在火灾时改为保安团，以避免日寇来长沙得以存在。

二月间，九战区政工会有对共产党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为“感化、溶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之”。薛主任在开会时致词有

“国军党军化”之语。

以上这些事件，与日本的加紧政治进攻有亲密的联系。目前的民族阵线中，因新的力量增加，威胁了民族败类，〔阵线也〕将有新的部分的分化，前进的还是继续前进，最落后的将有部分随着环境困难与汪去合流，甚至企图在中国造成西班牙局面。因此，统一战线工作在现阶段的湖南，需有新的转变。

二、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一）目前下层的统一战线较上层易做，尤其是区、乡、保、甲的工作较县以上易做。例如兵役问题、征土问题、粮食问题，上级命令急于星火，甚至县府派兵坐催，军队或对乡长加以打骂。谁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谁就能利用乡、保、甲长，经过乡、保、甲〔长〕展开动员群众取得合法地位，又得群众拥护。我们已经在某些地方做得〔有〕效果。

（二）积极的工作较消极的易做。我们对友党建议最好的方法是：多提出积极的办法，替他们解决问题。例如兵役问题，首先是发动群众自动的去当兵。中签者自动的组织互相帮助，解决自己的家属问题。自己取得说话的和组织的资格，就有权批评抽签的舞弊，就有权组织优待军人家属委员会。一切的弊端不利于群众，不利于抗战，只利于土豪劣绅者，只有从积极解决抗战问题下才能解决。

（三）要正确的分析环境，具体的、有步骤的计划工作和进行工作。过去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单纯的，从主观要求出发的，不适合环境，必然遭到失败。例如湖南参政会，特立已由省党部提出，而我们省委没有调查情形、正确估计而发一电报，提

出口人的名单，有此〈些〉人并〔为〕地方人所知，因此惊吓了国民党。加上又派代表王自中同志向党政当局交涉，结果适得其反。大概是省党部已呈中央解决，在湖南参政会问题〔上〕有通令给各省，限制省、县会议不许我党加入，特立被提出后又被取消。

薛主席二月一日就职。二日，各团体招待主席。这时，特立是民众运动统一委员会的常委，没有得到通知，不敢冒昧参加。因此，不久以前，特立曾会见省党部负责人，〔其〕满口的张君承诺，没有得到相当的结果。因此主席就职，拟在就职后去道贺，免在大庭广众中受人冷视，降低自己的地位。我们同志有主张用快邮代电发一通电贺主席，我未接受，因我不知薛的态度，发电未必有益。有行署办公厅主任系留法学生，经过留法同学会餐一次，以后会餐，他也不再参加。特立经过许多间接关系得到他一般恭维，但一触到实际问题，他就称病不见。这不是他的特别作风，而是国民党对我党的态度有新的转变，倘仍用旧的一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是不适当的。目前国民党有新的决定，最高负责人不会放弃他们党的主张。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只能解决个别问题，想得法律上的一般的保障，是难做到的。最近，《观察日报》的禁止出版，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武力解散，即是执行国民党最高的决定。我们对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估计太低，必然遭到失败。我们衡阳负责人三次催国民党县党部发起反汪运动，虽然最后举行了，而引起国民党害怕我们。衡阳县万书记长，常对我们同志颂扬我，因此要我去见他。因他外出，我只留一名片在县党部，但始终他没有来回看我。因为万书记长在新决定下态度改变了；公开的去会他是得不到结果〔的〕。

目前对参政会暂取放任态度，因为参政会的目的不过是一种

联络工具。如果我们能够参加，可以利用合法的工作帮助抗战动员。目前不独排斥了中共，复兴社也只占少数，其作用不大，可以预料。其中有些进步的士绅，我们可以影响他，但他们本身力量也非常微弱。因此，我们不必把参政会过于重视。

（四）我们过去工作太突出、太直接。例如，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系覃理鸣，〔院〕董有赵恒惕等；院中的事务主任系当地的绅士。学生的父兄也很赞成该院的办法，学生在短期间达到二百，社会环境算十分的好。因为副院长吕振羽全副精神用在校内，没有很好的与院长、院董取得联系，还与覃理鸣有多少矛盾未能克服，就使顽固分子得以进行挑拨离间工作，孤立副院长。最后，武力解散该学院，得不到院长和院董的援助，而且断绝了覃、赵等的今后关系，替顽固分子增加力量。

长江，还有育英两级小学校，学生百余，校长和教员大部分是同志。校外工作过多，校内方法过新颖，因此，虽抓了学生，反引起了学生父兄不满，使学生与家庭发生矛盾。统一战线反因息亲会、□□会等大会过于突出，脱离了旧的社会关系。学生本是很好的桥梁，经过这一桥梁联络父兄，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事半功倍。我们用得过当，反遭了损失。

衡阳我们办有干部训练班，学生由各县委派。在长沙，有些学生回家，被父兄监视。因为去时没有报告父兄，回时没有准备怎样告诉父兄，一言两语即被发现是在我们的训练班受课。女中另一部分没有父兄的，还没有问题。

抗大学生有不少的过于积极，企图把抗大所学的全部拿来使用，结果大多数不能活动。一切同情我们的人常在于我们经过他们做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他们保存他们一切旧的社会关系。若党外的干部弄到和我们一样，那便将统一战线的

中间桥梁割断了。例如黄炎培的人，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人，有和〔我〕接近的，我每次都劝他们保存旧的社会关系。例如曾到延安的堵述初在平教会工作十年，他要求到延安学习，我未许可。我要他以参观名义由平教会介绍到延安，这样就可以保存十年的关系，结果在延安居两月仍回平教会工作。又，抗大学生向尚，人人都知道他是抗大学生。因为黄炎培常有信给他，他将黄信给同事看，因此他能在统一委员会工作。几月我不和他通信，从来谈话有一定时间和地点，并时刻纠正他左的倾向，以免他和我一样红。

有些有社会地位的人向我要干部，我不轻易介绍同志去，而介绍非党干部为众所周知者。因为有些投机分子想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也必需和他发生关系，介绍一非党干部作桥梁。因为我们曾介绍一些同志给赵君迈办盐务，用一进步分子，另用一落后的牵制之，没有实权，而且我们同志没有应付官僚的技术，常被人排挤出来，还把过去与赵的关系弄坏了。我对赵过去是采取不沾不脱的关系，自我去年去延安（九月）后，与赵靠得很紧，结果更弄坏了。

我发现和我靠近的人有四种不同的程度，我们必需和他们接近、靠拢，但还要提高警惕性，举例如下：

1. 有部分的叛徒请我吃饭，要我住在他家里去（因我初回长沙，住旅馆）。因为他过去破坏了我们的党，有些还杀了我们的人，今日共产党有前途了，他害怕而接近我们。此外，还有我们的党过去杀他们的父兄，他们不独表示不怨我们，而且接近我们。如叶德辉的儿子，不记父仇而来看我，并要求我帮他解决问题，同样是害怕我们而接近我们的。这一类人我总是诚恳的帮助他们，同时我也没有忽略他们的来意。

2. 还有一类是做特务工作的。但到我处做特务工作的人，其中一部分是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的，政治水平较高，倘引为同调，就糟糕了。到我处经常有这种人，其中之一曾有我们同志介绍他入党，幸没有通过。我是公开的，不能拒绝这一类人。我的办法是：在我的房间不留任何文件，有时我吃饭去，请他坐在我房中，以示坦白。曾有一青年女子混入通讯处工作，既已来了，就不能无故弄起出去，我用帮助她读书的办法争取她。结果被我们相当地转变了，她离开我处时，还发生一些好影响。这一类人，有的公开告诉我，向我要材料，我也供给他一般的材料，但始终我是警戒的。我对任何人不说不能公开的话和非抗战的话，及不保存文件在房中。

3. 有些投机分子也与我接近，我应付这种人只是不失联系而已，因为他也不要求进一步靠近，我们有些同志过高估计宝庆区司令岳森及过高估计赵君迈，过高估计衡阳县委书记长万和我的关系，现在已经明了，虽然没有损失，但也是小缺点。

4. 有一部分人虽然〔反对〕共产党，却需要救国，为着要求抗日的工作的改善，也与我们发生好的关系。这一类人，只能在工作上帮助他。

5. 对我们同情的人，无论他是否国民党员，要从各方面帮他。最主要的是：要他们不脱离旧的社会关系，纠正他们左的倾向，教他们某些妥协的办法，少和他们通信，少在群众面前称许他们。如果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们，留作转党的干部，勿轻易介绍入党，以保全他的桥梁作用。

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 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于重庆)

一、社会与政治情况

(一) 汉奸、汪派、托派在湖南的活动

当汪精卫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极力的在群众中散布“汪精卫是决不会做卖国的事情的”，“汪这次的行动是中央的苦肉计”等；另一方面极力的压制人民，不许谈论汪精卫叛变做汉奸的事情，不准举行讨汪大会。在衡阳、邵阳等地，个别的汪派分子，起初曾在群众大会上公开的帮助汪精卫辩护。当“德苏协定”签订的时候，他们在群众中极力的散布“苏联帮助法西斯侵略”、“苏联同德国瓜分波兰后就会同日本来瓜分中国”等等。当苏日签订“满蒙边境停止武装冲突的协定”的时候，更散布极毒恶的谎言说：“进攻湘北的战争是苏联与八路军共同帮助日本进行的”，“毛泽东与苏联同日本合作了”，“共同联合日本来打老蒋”等等。由于汉奸们有计划的在群众中进行造谣、污蔑的活动，所以在个别地方曾发生过某些影响。当最后这件事传到翻

*原文标题：“湖南党的工作概况”。

山后（毛泽东同志家乡），许多群众中曾发生过争论，而且不少群众去问我们当地党的负责人。汉奸们除了利用国内国际每一重要事件进行其破坏抗战、破坏我党和苏联在群众中的信仰外，并经常的在难民中进行其活动，说：“日本人在沦陷区不杀人了”，“日本人比中国政府还要更好些”，“日本人会发米、布等给老百姓”；在一般临近战场的群众中则散布：“日本人来了不要紧，不杀老百姓”，“日本人来了不要走，有便宜的盐吃，有便宜的布买”等。

（二）湖南的土匪问题

这问题过去曾经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土匪在偏僻的地区到处进行抢劫、绑架、扰乱的活动，以致使交通受到阻碍，人民生活不安，最近这时期土匪问题的严重性是比较减轻了些。这主要的是：一方面由于湘西陈渠珍的势力受到打击而瓦解之后，使湘西土匪失去一个主要的依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最近在湘西成立了一个“湘黔鄂边区”之后，那里成了宪兵的统治区域，宪兵在湘西不仅进行了以残酷的办法去剿匪，而且直接干涉到行政的工作。他们以整营整团的宪兵为单位，去每一县、区、乡进行“剿匪”的工作，到处则是整批的人被枪杀，引起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不安和恐慌。在溆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宪兵将全村的壮男召集在一起排成队，机关枪向排成着队的人架起，逼迫这些农民要指出谁是土匪，否则用机关枪全体扫射相恐吓，这种事情在湘西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宪兵直接办理各地的保甲长训练班。在这种政治之下，湘西的大股匪虽然很少了，然零细的散匪则无法消灭；而同时湘南的土匪问题，今天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剿匪的政策只单依武力而没有配合政治工作去进行；

第二，剿匪没有与肃清汉奸活动相配合（因有〔的〕土匪里是有汉奸活动的）；第三，没有进行改善群众生活与改善兵役相配合。

（三）关于兵役问题

最近为兵役而成千壮丁登山当土匪的事情虽然减少，而且很少听见了，但兵役中另一问题却仍是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兵役机构对壮丁的待遇的问题及兵役中的舞弊问题。湖南群众中有这样一句话：“兵役差事是发财差事”，“兵役机关是财政机关”。他们想出各种办法去发财，在乡村中他们采取了不当兵就得出钱的办法，就是说，你不去当兵，就得出钱给我们替你去买人顶替。可是他在甲村或甲家得了几十块钱，而在乙村或乙家却又进行着同样的敲诈，假若轮到没有钱的，不管你是否应征的壮丁，却无条件的要去当兵的了。于是他衣袋里既已装满了钱，而另一方面又拉满了应去的壮丁数目。在城市里（如湘潭）却进行着挨家商店公开进行募捐买壮丁的运动，他们会对你说：“当兵这样苦的事，象你们当先生的人怎么受得了，不如出几个钱”。但他们募捐所得，并非用去买壮丁，而是放进袋子里。在兵役机关里，他们却又另有他们的一套赚钱的办法：第一，是“吃缺”，就是几十个人报一百人，而不足之数，却采取捉逃兵的办法，在各地捉些人来凑满数目；第二，是在“防止开小差”的名义下进行搜刮，将每个壮丁身上从家里父母或亲戚送的带来的几文钱都由“长官”们拿去了，他们会说：“待你们不会开小差的时候再还给你”；第三，就是如果你给钱给“长官”，他可放你公开的“开小差”。

(四) 国民党各派别力量之变动及其活动

国民党在湖南原有三个派系，即是：CC、复兴社、何键派是也。

1. 何键派自何键下台和张治中在湖南做省主席一年之后，大部分的基础虽已瓦解，但仍保存某些力量，如在军队中的刘建绪、李觉和在党政中的刘岳厚及醴陵、茶陵、攸县等，湘东南乡村中的某些地主封建势力。因此，当去年长沙大火前后，何派曾企图进行恢复他们势力重新统治湖南的活动。根据这一企望，他们曾进行下列的活动：第一，在何键派势力区域收集地方土匪和地方武装，企〔图〕组织武装力量在敌人进攻时发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并且选定武冈一带为其根据地。因为这一缘故，当我们建立塘田学院时，何派健将刘岳厚是积极赞助者和发起者之一，刘并将其欲以武冈为游击根据地的愿望告诉我们的同志。第二，当第一个计划失败后，随着即企图在湘东以醴陵、茶陵、攸县等地为基础，建立并巩固其湘东的基础。根据这一愿望，他们在茶陵县出版了一个大型的报纸——《开明日报》，并创立学校；同时，刘建绪的总指挥部后方留守处亦移到湘东去了。他们这些活动仍然象他们在武冈活动的目的——即是希望以湘东为他们在敌人进占长沙后的游击根据地来发展他们的势力。然而这一计划，在省政府迁到耒阳后，随即九战区数个师在茶陵一带常驻，并准备将来在那一带作坚持的武装斗争，因此，何派在湘东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又受到打击。因为何派在湖南的失势与不断的受到压制与打击，为了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他们曾采取了表示愿与我们接近的态度。在塘田学院的创立，他们赞〔助〕刘岳厚，在经济上曾给予某些帮助；在《开明日报》以总编辑给

予我们的同志。同时，李锐的部队在湖南亦采取比较进步的姿态在群众中活动，赞助和扶植群众团体的组织（在长沙，我们有几个小的群众团体是在他们驻长时帮助组织并在师政治部立案的），并且收集一些青年办青年训练班等。

2. 当何键派采取比较进步的姿态在湖南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取赞助的态度的。然今天看来，何派在湖南已更进一步的失去其势力。当何键的内政部长撤职之后，刘岳厚的省党部委员亦随即（被）撤了职。因此，何派在湘的作用就更加小了。

3. 复兴社（即黄埔系）是随张治中来湖南而发展强大起来的。在短短的十年的过程中，发展到超过CC的力量，他占有整个“民训”系统和大部分的乡镇长和县政府，而且在工人中亦散布了某些种子。但随着张治中的去职与CC乘机靠紧薛岳，并对复兴社采取排挤与攻击的结果，使复兴社在湖南的势力大大的减弱了。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的一年过程中，不仅张治中过去的设施改变了，而且张治中时期所训练的一些行政干部差不多全部调换了。“民训”系统取消了，而且民训干部亦大部分拒绝录用。在张治中时期的“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的乡镇长和县长大部分调换了。湖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的机构改变了，自卫团的干部大部分调换了。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复兴社采取了某些抵抗的办法，在湘乡、安化的“行政干部学校”的乡镇长组织了“行政干部学校同学会”（我们在其中有推动作用），并有过反对无理由的撤换乡镇长的斗争，但因大势已去，终归失败了。

4. CC正与复兴社成反比例。当复兴社得势之时，CC则处于不利地位，但现在CC却正处于有压制的优势。CC本质上是一个顽固的反动集团，现在正配上了存有“成见”的顽固的薛岳与国民党最近时期的政策，因此更有利于CC的活动，使CC能更跋

扈的实行其反动的政策。其反动政策的特色，就在于“自己不干而极力的压制别人干”，“极少干真正有益于抗战的事情，而专门干反对我党和反对人民的进步事情”。湖南最近时期摩擦愈更严重的现象、与CC在湖南的活跃是有密切关联的。

4. 三青团在湖南比较重要的中心县分大都都有其组织和活动，但团员的数量并不多，而其主要成份大部系青年学生。其开始发展的基础大多是收集战区逃来的失学、失业、生〔活〕无依靠的青年学生，开始发展的时候是比较迅速的，但最近的发展则比较迟缓了。他们对我党的态度与CC对我党的态度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防止与打击我党的活动及进步的群众团体活动，是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之一，有时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攻击我党。三青团与CC所不同的地方是，对抗战的态度较坚定，对抗战工作比较积极。

其次，关于薛岳我想说几句话。这个人不仅对我党存有“成见”，而且脑筋狭小、固执与横蛮，特别是极喜“表功”。每当别人谈论起张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绩时，他是很不高兴的。如果你说一声薛主席的施政成绩好，则很易得他的恩惠。他自己时常说，他的军队是岳家军，百战百胜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现在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而编辑和主笔不能有任何自主的权利（以上这些都是根据事实中的表现与接近薛夫人的妇女会同志的报告）。

（五）国民党政策及其影响

1. 对群众运动：“凡非本党（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不准

登记，不让其存在”。在这种政策之下，不仅我们党所领导的团体不能存在，而纯粹的群众自发的救亡团体亦不能存在。其目的是在于：求得使国民党能完全控制群众运动，不让群众起来。在这种政策之下，我们所领导的比较突出的群众团体完全解体了：衡山的青年工作队解散了，湘潭的南国文艺社停止了，湘乡的工作团停止活动了，邵阳的妇女会改组了，省文抗会变成僵化了。总之，一切突出过的团体百分之九十九都解散了，而新的生长则没有。

2. 对文化事业：“凡非本党领导的报纸、杂志、书籍不得登记，不让其发行”。在这种政策下，《观察日报》停止出版了，《真报》停刊了，沅陵的生活、新知，邵阳的民众等书店封闭了，除衡阳的三家书店未封外，其他地方一切进步的书店都被封闭了。由于各地书店及报纸、刊物被封闭，使各地党及群众不仅很难看到党的书籍、报纸和刊物，即比较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出版的刊物、杂志都很难看到。但国民党特别是三青团在这时期却出版不少的刊物或报纸，同时各中心县都开设了青年书店或文化服务社。

3. 对教育事业：“严格的监察与考查学生及教职员的思想行为”，“有不正当的思想行为者，不得收留在校”，“异党操纵者不让其存在”。在这种政策下，塘田学院武装强迫解散了，战时中学强迫解散了。在学校里的学生怎样考查法呢？在湘西的国立安徽中学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个学生因为看了一本鲁迅的作品，被学校当局指为“共党”而关起在“学校里的禁闭室”，而且象法庭审犯人般的去审问这位学生。同时马上就有学校当局向学生训话：“国家有饭给你们吃，有衣给你们穿，有书给你们读，你们还不满足吗？你们还欲何求？”原来他们不是为抗战救

国而教育青年，而是为“控制青年的活动”、“考察青年思想”而教育。为了力行这个政策，省教育厅不断的三令五申的密令、督促和指示各校当局。当我离开湖南前一天，曾获得这样一个密令，其中心内容是：严格考察学生和教职员的思想行为和异党活动，规定如有不正当思想行为者，劝告、警告、处罚、开除，并将其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及其像片寄省教育厅转告各校不得录取和聘请被开除的学生及教职员等。

关于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我党的政策，我想湖南与其他地区相差不大会很大的，而这些，南方局比我所知的会更明白。因此，在此不写它。

二、湖南党的组织状况

(一) 组织机构及数量

由于战争进入湖南地区，由于党的数量不断的发展，组织单位不断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怎样使各地党在整个湖南进入战场的时候，能领导群众进行抗敌自卫的斗争；第二是，在战争的状态下，单位众多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怎样加强省委与各地党的联系，并能迅速的解决问题。为了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省委根据地势、组织基础、便利指导几个原则，决定组织几个中心县委，派小宋同志为书记，组织了衡中心县委，包含衡阳、衡山、祁阳、零陵，派袁得胜同志为书记，组织了湘宁中心县委，包含湘乡、湘潭、宁乡、长沙西乡、兰田、锡矿山，派帅大姐为书记，组织了常益中心县委，包含常德、益阳、汉寿、沅江、临醴、桃源，以谢竹峰同志为书记，组织部属工作委员会，包含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绥

宁、东安和洞口。此外，有湘南特委，包含郴州、耒阳、常宁、桂阳、宜章、乐昌、资兴、汝城和桂东；湘西工作委员会，包含沅陵、溆浦、辰溪、泸溪、乾城、凤凰、芷江、晃县和大庸。

在省委领导下的共计有二十几个正式县委，二十三个县工作委员会，九个以县为单位的支部，总计为四十个县份有党的组织。今年五月间，省委组织部统计有五千零几名党员，农民成分占第一位，工人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军人第四，商人第五（支部和区委都有统计；现计〈记〉不清）。

（二）支部工作

这问题在湖南过去曾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今天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当省委各个同志在各地巡视回来，曾共同的感戴到大多数支部陷于这样的状态，即是：

1. 大多数的支部没有区委去出席，不能自主的开会。
2. 大多数支部没有日常工作，少数有日常工作的亦未能顾及到当时当地发生的事情及群众的要求。
3. 支部会议大多只是听取区委出席人的报告或指示，未能自动提出当地的具体需要的问题在支部讨论，而出席人亦大多是未注意这些事情的。

这是在今年四、五月的事情。根据这些反映，省委二次全体会议上曾着重地指出健全支部生活、转变支部工作方式的问题，而且提出了“支部工作本位化”的口号，即是：学校支部的工作重心在于本校团结和组织本校的学生、教员，推动学校当局进步和解决本校群众日常发生的一切问题，而不是忽视本校的工作建立而专做校外的活动；农村的支部工作重心是在于反映本地群众及行政机构的需要，提出〈交〉支部讨论，并决定解决的办

法，而不是光听上级的报告或指示；在工厂支部亦是同样的。为了这一转变能有成效，曾提出了每县集中注意去创立一个模范支部，以此为转变整个支部工作方式的步骤。这一决定到现在已经数月了，而据最近的反映，各地的支部工作仍然没有多大进步，个别地方还更加坏了（其原因在后面一个问题上可以看见）。

为了更具体点起见，在此提出几个好的和坏的支部作例子。比较好的支部：①学校支部：新化的青农学校，在支部的领导下，能将全校各班的同学组织起来，他们各班有自治会，有文艺座谈、时事座谈等，同时能领导全校同学去进行校外活动，举行固定的民众讲座，民众识字班和壁报等。②农村支部：如益阳白露区的和湘乡的韶山区的两个支部。前者在保甲长的选举运动中，能自动讨论并提出候选人，结果是按支部计划实现了，在建立学校（小学）与巩固学校的斗争中同样胜利了。在后者的一个支部中，在此时湘北战争中接受行政当局要动员群众去破坏公路的消息时，能自动提交支部讨论，并积极动员群众破坏公路，在反对汉奸活动、揭发汉奸造谣的工作上亦起了一些作用。③工人支部：衡阳航空修理厂支部及祁阳纱厂支部。前者支部会议能经常自动的召集，并能讨论厂内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当该厂政治指导员在全厂群众大会上公开替汪精卫卖国行为辩护时，工人即当场反驳他，并在会后支部自动讨论并领导全厂工人签名写呈文到老蒋处去控告该指导员。当老蒋接到该呈文，见是全厂工人签名（百多名）时，即电该厂当局要查办签名运动的领导者时，支部能团结工人，使我们出头签名的同志始终未曾暴露。后者的支部能领导群众组成该厂工人俱乐部，并充实俱乐部生活，支持俱乐部，到现在该俱乐部已能成为团聚工人群众的群众组织（详细情形请参看工人工作报告）。

前面是比较健全的支部例子，现在再举几个坏的支部的例子：在邵阳的连（廉）桥区有两个这样的支部，三个月没有开过会，每个支部里十多个党员连小组都没有编。其中有几个党员自填了入党表后，未曾开过党的会议。在长〔沙〕西乡有个区委（名古塘区？记不的确），三个月内没有开过正式的会议，当你问他怎样讨论工作？“有时路上撞见亦谈谈”，这是区委书记答复的。这个区委领导下的支部自然是不会健全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好的支部和坏的支部都是占整个支部中的少数之少数。最普遍的现象是不能自主的开会和讨论当地的群众需要。然这类支部无疑的是属于坏的支部之例，不过坏得比最坏的稍许好点而已。

湖南支部工作中另一问题必须说一说的是，支部对同志的教育问题。普通的比较好点的支部的教育方法是：区委出席人每次作点政治报告或讨论一、二次党的建设，然而支部的自我批评，同志之间的自我批评及思想意识的锻炼，同志间不正当行为和错误的斗争等等，这些工作是做得异常少而又少的。正因为这缘故，不仅使许多普通党员中的阶级意识异常模糊，而且有些党员甚至个别干部发生腐化与堕落的现象。讨小老婆的有之，要拿刀杀人的有之（湘潭），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有之。至于自由主义和现〔时〕社会中带到党里来的落后意识、农民意识及小资产阶级的坏根性，更在党员中普遍的甚至是浓厚的存在。由于这些缘故，使大多数支部的生活是不紧张，无朝气。其次，支部中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在生长着，这就是缴党费的问题。在半年前，湖南党的组织中收党费这一问题是非常忽视的，那时候党员中的党费难收到百分之十，但自省组织部严格指示和督促后，现在大部分党员都能缴党费。

(三) 干部问题

干部正象劳动的工具一样，没有他即不能生产。除湖南保存了几个老干部之外，整个湖南的干部是在随着党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培植和提拔的。为了适应工作之需要，省委过去曾用了不少的经费和时间在办训练班培植干部这一工作上，现在湖南县一级的干部中（除延安返湘的几个干部外），大多是省委各次训练班毕业的。最近，因为战争进入湖南地区，交通的不便，并且路费花得太多，因此自各中心县委成立后，省委即决定，训练干部的工作重心由省委转到各中心县委去，并且将办训练班的经费分划给各中心县委。在这一决定的执行中，起初的几个月是收到了些比较好的效果的，不仅切实训练了一批干部（区、县），而且创造了些好的经验。即是：时间是短期的，一星期左右；教材是以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联系理论原则；方法是以讨论式而不是讲〔授〕式。其次是不同的工作授以不同的内容，如工运、农运、统一战线，集合三、五个这样做专门工作的讨论专门的内容，并且能有计划的利用在一个工作计划完成的总结会议中，作训练干部的工作（如区委、县委或各部门，不过时间延长到三、四天）。这是关于训练干部方面。

其次是关于提拔干部。由于党的组织是在新的短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方面既缺乏老干部，另一方面却不断的要提拔新的干部以满足工作的需要。因为这缘故，所以在湖南提拔干部起初通常是以〈1〉政治面目清楚；〈2〉工作积极；〈3〉政治上有发展前途和比较有些工作能力这样三个起码条件为标准。至于〔以〕经过长期工作中和革命斗争中的考验及工作经验等条件〔为标准〕则几乎不可能。因此，在提拔干部中往往有这样的

事，即是：起初提拔这个干部时觉得各方面都还好，但工作经过一个时期后就暴露了这个干部的弱点出来，发觉了过去对这干部考察的不〔正〕确。但是问题还不只如此，问题是当我们已明白这干部不能胜任这工作或不能教育到我们要求的程度要撤换工作的时候，不知要费多少曲折和精力，以致到影响工作的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考察干部的时间太短和考察不周密，以致个别奸细能混进党的领导机关里面来（如衡阳）。

（四）由半公开转到地下党的活动的过程及其发生的现象

由于湖南党是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发展和长大的，因此使党的指导机关——省委，对秘密工作的注意松懈，和对过去白色恐怖下的教训的警惕不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批刚跑进党里面来的新党员，不仅没有过过秘密活动的生活，而且从现〔时〕社会中带进了不少的冲动、急性、好出风头等等坏的根性和作风到党内来。因此，便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由工作作风的突出到党的组织的突出，使湖南党成了半公开的状态。这是今年六月以前的情形。

根据各地的材料，省委在那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是：在有党的组织的主要县分，差不多每县都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指党的指导机关的突出）。省委虽然经常讨论到秘密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省委本身一方面对秘密工作的警惕性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没有把秘密工作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在干部中和支部中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教育及向忽视秘密工作的错误作坚持的斗争。因此使省委累次对秘密工作的决议未能发生真正的效力，变成了空谈。这一严重的错误，一直延长到今年五月间省委第二次全会后，经恩来同志严格的指出和批评，经过南方

局及中央不断的电示，同时湖南的摩擦正在尖锐地发展着，而全国的局势亦一天天的恶化，在这情形之下，省委才从新的比较详细和深刻的检讨之后认为：省委过去在组织问题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并认为要使湖南党由半公开的状态转〔入〕地下党的活动，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并做艰苦的长时间的教育及斗争。因此，省委决定从那时起，集中力量在一定期限内解决这一严重错误。同时决定：1. 在组织问题上将各地指导干部突出的有色彩的一概调换，并撤消所有突出的机关地址。2. 在政治上反对麻木现象及提高党的政治警觉性，并防止惊惶失措的现象的发生。3. 在工作作风上反对出风头、急性病，实行埋头苦干的作风，使党的工作在巩固的基础上前进。4. 在民运工作上根据当时的情形，进步的大的团体不能存在，而且亦不能继续的产生。因此，决定由进步的团体的活动转到：①生产岗位上去，即到工厂去、学校去、农村行政机构去；②到一般的旧形式的和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中去；5. 在这一组织工作的转变过程中，将秘密工作在干部与支部中进行必要的教育，在开展反对忽视秘密工作的斗争中必须联系到党的纪律的执行，以制裁破坏秘密工作的个别分子。在这一决定传达下去之后，是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的，个别地方并且发扬了这一决定，采取了些更切合实际需要的办法。如湘宁中心县委在执行这一决定时，制定了一种通俗化的简短的东西，这东西名叫：“五不、四要、三努力”。将这东西在干部和各支部中去进行教育工作，并在今后根据这一东西作为检查每个同志的行为的准则。现在将这“五不、四要、三努力”录在下面：

五不：不应说的不说；
不应问的不问；

不要在会外谈论组织；

不要发生横的关系；

不要经常聚集在一起。

四要：要开会；

要缴费；

要听党指挥；

要团结群众。

三努力：努力学习理论；

努力学习经验；

努力在群众中学习。

在半公开的转到秘密的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湖南有三十二个县一级的干部被调动了工作；其中有十七人是由甲县调到乙县；有十五人是撤销了党的领导工作，而转到群众中职业中去工作了；此外有七人是在这时期新提拔起来的。这一干部的调换，经过了三个多月在大体上完成了。由半公开转到秘密的问题，大体上已经做到了第一步。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却发生了另一严重的现象，这就是：1. 在政治上，由□式的“盲动”、“乱动”而走到“畏缩”、“不动”，而且个别地方少数分子则发生“惊惶”。最近这时期中，湖南大多数支部是静止的，不仅很少有群众运动，而且由于政治上畏缩，好些支部的会议、生活都非常不健全。2. 在组织上，由于大批干部被调换及由党的领导工作转到群众工作去，由于现在干部大批离开了党的领导工作而新的干部的培养做得太少，因此便发生了“干部恐慌”和“上下脱接”的严重现象，不仅县一级的干部不够分配，而且据我自己在湘宁各县巡视所见及老高在常益各县巡视所见，大部分区委是“残缺不全”的。许多区委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苦心撑持”，有些区

委虽有二人或三人，但都是勉强凑起来的，真正健全的区委则占少数。上下脱节的另一现象就是，不能迅速的反映下面情形及迅速传达问题，最近两个多月省委对下面情形的反映是非常不够的（这是因为：①省委由邵迁长，由长迁邵，耽误了时间，使省委各同志不能到各地去巡视；②因为交通不便，同时又没有建立起党的交通系统）。总括上面的情形，我觉得湖南党今天组织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上下关系密切问题、支部工作健全问题。

三、对外工作的现况

（一）群众工作

自整个政局转向逆流之后，湖南的进步团体已摧残殆尽。现在我们党能起某些作用的团体仅仅有书报供应所、中苏协会、省妇女工作委员会、湘南某地的妇女工作团。

自省委决定由进步群众团体活动的重心转到“生产的岗位上去”之后，在这方面还得到某些收获：在兰田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现在有两百多学生；在益阳、长沙各新创办了一个小学，其中并设有初中补习班（长沙的因此次湘北之战已解散）。这一时期中，有三十多个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干部转到学校的教员岗位上去了。此外，尚有一部分青年党员进到学校去了。其次是有几人打入到“工业合作社”系统中去作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关于工人工作的情形请看我写的另一报告）。

（二）宣传工作

过去主要的大多是用在《观察日报》上，各处虽有几个地方

的小型报纸有些联系，但省宣传部没有直接联系。自《观察日报》封闭后，省委决定尽一切可能使《真报》（由日报改为半月刊）成为省委带指导性的刊物。但不久，《真报》亦被迫停刊了。现剩下的只有《中苏》半月刊了。两个月前，根据南方局与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省委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现在正进行各地有文化工作同志及文化机关的地方文化工作组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的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写写文章及与各地文化人和书店联络联络。

其次，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工人工作已有另一报告；青年工作上次出席青年会的同志已有报告，而且我所知的很少；妇女工作亦无东西可写，因此这些我都不写了。

（此部分文字因扫描质量极差，内容几乎完全无法辨识，疑似为另一段报告或批注，故在此处省略。）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关于组织工作的总结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自从扩大会以后，各地组织工作都有了一个显著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

1. 各级组织部本身工作的开始建立。过去，各地、县、区委的分工都是马马虎虎的，组织部工作没有明确独立起来。

2. 提拔了一批新的干部到各地领导机关内来，很多地方创办了干部训练班，党内普遍地提高了学习的精神，而且特别注意到干部地方化。

3. 各地组织的重新整顿与划分，很多地方正式民主地成立了县委(如衡山、南华安等)。自首分子重新严密注意与总的清算。

4. 支部大都能经常开会，有些地方支部生活开始活跃起来(如南华安、□□、宁乡等地)。

5. 党的发展中，注意到工农成份的保持(如衡阳、南华安、汉寿等)。各地都在开辟新的地区工作，一般都注意到“发展中求巩固”、“巩固中求发展”这一口号。

6. 开始注意到秘密工作与经常征收党费。

这些进步都仅是开始，不够的地方仍是很多的，有些缺点还严重地存在着：

1. 组织的发展仍表现极缓慢，远落后于政治，赶不上战争形势的紧迫〔需要〕，尤其有些地方群众工作极热闹，而组织发展差不多完全停滞（如沅陵、邵阳、新化等），关门与拉夫的倾向仍存在着（拉夫最厉害的是湘南和湘潭）。

2. 支部生活大部分讲起来仍是极枯燥的，千篇一律，一般的空洞，光杆支部多。

3. 各地仍缺乏能力强的、能独当一面的干部，尤其是普遍缺乏好的支部书记。

4. 个别的地区，发现干部的不团结、闹意气（如沅陵、蓝田）以及自由主义的倾向、逃跑现象（湘南）。

其他各部份的具体问题，总结分述如下：

一、党的发展与巩固

好的方面：

①保持了工农成份（衡阳、南华安等）；

②注意了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③注意到知识份子的桥梁作用（如湘南）；

④负责教育，初步训练，或补行入党教育；

⑤经过一定手续，在群众中去发展的，先有工作而后入党。

坏的方面：

①关门与拉夫的存在（新化、蓝田、湘潭）；

②如湘南、耒阳等仍喜在老基础（过去游击区）上打圈子；

③因为私人利益，甚至为逃避〔抓〕壮丁而要求加入党的还是不少。

二、干部问题

好的方面：

①地方化的问题强调了；

②. 提拔了一批新干部；

③. 开办训练班（湘南、南华安、湘乡、湘潭……）；

④. 学习与虚心程度的提高，积极团结的进步。

弱的方面：

①. 缺少强有力的独当一面的干部；

②. 干部了解地方情况都极不够；

③. 新干部缺乏，会做统一战线的尤其是军事干部、工农干部也缺乏；

④. 闹意气与逃跑的现象；

⑤. 畸形现象——新化全〔是〕女干部，缺少工农干部，湘南缺少知识份子新干部。

三、支部生活

好的方面：

①. 各地大都能经常开会；

②. 有些个别地方表现得极活跃，如长沙、常德、□□、浦市、□□、祁阳、宁乡、南华安等地之动员群众破坏公路、铁路，阴历拜年，管理粮食，玩龙灯，协助军队生产，筑沿湖工事……以及新化、湖大等学校支部；

③. 注意到支部生活怎样充实的问题。

坏的方面：

①. 支部多不健全，无具体工作，枯燥；

②. 多无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

四、自首份子和老同志问题

1. 严密注意到自首份子，开始做总清查；

2. 但是，隔离的技术太差，也没有经过一定过程，因此大大影响那些自首份子的情绪，使当地工作陷于停顿（如衡阳）；

3. 很多不健全的老同志倚老卖老，发生很多笑话（如湘潭），并且很多意识极坏、完全机会主义者（如湘潭、常德、汉寿、衡阳）。

五、纪律与党费

1. 普遍地忽视纪律问题，不了解纪律问题；
2. 领导机关执行纪律时，完全失掉了教育意义，变为一种单纯的处罚；
3. 党费征收开始注意，但尚无具体结果，过去是完全忽视的。

六、各地对秘密工作注意仍不够。

七、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

1. 许多地方从组织上严格执行上级指示，这个精神是贯彻的，但是贯彻过程中，许多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贯彻到底。

2. 各地扩大会议的召集，许多地方未能及时召集，有的地方甚至忽视，甚至下级联系开始密切，但仍不够。

3.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果敢能力不够，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4. 整个关门主义的工作作风各地仍存在着（如对共青团之忽视）。

5.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6.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7.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8.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9.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10. 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许多地方县委独立作战。

王涛关于湘南 政治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

一、目前湘南的政治情况

湘南的政治情形，自三月起我们的同盟者就更积极地向我们进攻。在郴县停止几个群众团体的活动，破坏一个剧团的组织。在宜章，公开捕捉救亡工作同志。近来更摧残一切较进步的壁报，检查书籍，公开向我们找摩擦。以前我们想着的春节动员宣传将是郴县救亡运动的开展的初步，结果恰恰相反。同时这一摧残，据我的观察，并且不仅是湘南的，不过因为在海南我们力量（尤其是上层统战工作）较弱，因此他们的进攻也较严重。但是在其它地方，如桂阳，因学校和文化人的增加，群众运动则在开展着。除此而外，则利用剿匪和过去游击区有些脱离党的份子当土匪向我们进攻，屠杀、逮捕我们的干部，威吓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想利用土匪来增加力量等。

湘南的土匪主要来源是失业工人，无法生活的农民，避役壮丁等。其次是派别的斗争。因此，湘南小股土匪到处抢掠的多，

*原文标题：“湘南报告”。

大股的则很少。但是因为基本问题不能解决，同时剿匪部队纪律很坏，本身就是派别斗争（王帜昌，乙派的），所以愈剿愈糟。

关于征兵的问题，一样的闹得非常严重，尤其在耒阳、永兴、宜章等县完全是乱拉，没有任何宣传，拉不到壮丁则拉老人、妇女，要去换得〔用〕钱，买卖的事很普遍，以致一般人都在岭上睡，春耕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南昌失陷后，一般人曾发生一次恐慌，认为没有办法阻住日寇。抗战的准备工作则一点也找不出来，没有一个有民众的救亡团体，没有宣传，党部方面更是从各方来摧残各种救亡运动。

二、党的工作

从特委扩大会后到今天来检查湘南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的。在特委扩大会上，特别提出转变工作方式，建立支部工作，加强抗战动员的工作。但是在今天的检查，这几个工作通是我们最弱的。并且发现着我们扩大会议的决议的传达完全不深入，甚至连参加扩大会的同志他们回去就将它忘记去，所以又是老的一套，传达时脱离当地的实际环境。

1. 仍然抓不住中心，死守着老的基础，忽视新的基础。如耒阳还依靠着老游击区的同志为中心，忽视新的几十个知识分子党员，经过他们去开展工作。宜章派去的同志不去抓着一些新的学生关系，而去死守一些老的恢复党籍的分子。

2. 支部工作没有具体的实际工作，只讨论一般的、空的、上面的指示、决议，发展党员等等，甚至与抗战动员完全脱节。如汝城的模范支部经常开会，能出壁报，每晚与群众开座谈会谈时事，但是他们从没有讨论过自卫团的问题、剿匪问题、优待出

征军人家属等问题。一般的支部都是：他们很少甚至完全不讨论他们自己和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的问题；结果支部工作不能活跃起来。领导支部工作的同志犯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代替支部书记的工作；一种是只推动支部书记开会，自己参加而已，不能够深入的去了解支部的环境、支部干事会的能力和支部党员中的活动分子，对支部党员的教育则经常是零星的重复的，而不是有计划的有次序，并联系到日常的工作和抗战动员工作。所以老党员与老党员所了解的问题大概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进步，以致党员觉得开会没有兴趣，没有工作可做，讨论的工作又做不通。

3. 工作方式没有转变是湘南党最严重的问题。“命令主义”，游击区的工作方式，“走马看花”，“形式主义”，工作没有中心，工作不深入，不能了解下层和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每个同志和干部的工作能力。所以，巡视出去走一走，问他，各处都到了，但工作一处也没有弄好。汝城则老是十足的形式主义者，甚至连县委直接领导的小学和剧团（现已停）都要写一个指示信和用复写纸做个工作计划，结果一切都是空的，有些党员加入党两三个月还没有开过会，党员的任务也不知道。

4. 组织的发展。因为湘南党没有广大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一般的介绍都是经过个人的关系，所以党员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够。同时还因为过去的挫失，所以使组织在今天表现着一些涣散。这一时期因为整顿，所以在新的方面表现特别的慢。现在的统计约一千四百人。不过，在组织上比过去是巩固了很多，新的知识分子的成份也增加了。

5. 党的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这是被一般同志与干部所忽视的。这里最主要的反映着过去游击区的工作方式和太平享乐，随便谈笑、接头，以为现在和平了，什么都没有问题，出风头，

随便到公开地方去，党员不到会、不工作等，都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批评，以致很多都相互知道，和一部分是党员又不是党员的样子。

6. 党内的教育、支部的教育在前面说了。干部的教育，特委虽然经常开训练班（经特委训练班的有六十四人），但今天能做区以上干部的都很少。最基本的原因是：一部分老干部进步慢；一部分是各地送来时没有详细的审查，以致有些根本不能做干部的，或者政治、文化水平太低，受训练不弄〔懂〕什么等。但是总起来说，每次训练班都有他的进歩，新的干部增加进步较以前快，但还只是少数。各地流动训练班也在开始办，成绩很少。原因是教授不得法，多而不精，又不实际，结果不记得，又没有兴趣。这里最主要的在党里还没有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

7.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健全和培养干部。党的领导机关，各县、区到今天还没有健全起来。主要原因一部是留恋着老的干部，不相信新的干部，对知识分子注意不够，没有深刻的了解同志和干部的能力观念等，以致不能正确的提拔干部；有时是提不出，有时提出来的又要不得。这里表现得最厉害的是过份独断的作风，忽视集体领导，而存在着严重的命令工作方式。

8. 党内自由主义倾向的严重性。湘南党的工作扩大会以后还没有大的转变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自由主义倾向：（1）对决议不坚决执行，派出去的人不能根据决定去完成；（2）轻视上级领导机关；（3）责任心、积极性差；（4）忽视党的纪律。由于上面的原因，湘南的工作在这半时期的进歩是很少的。但是有他进歩的地方，（1）党的组织较以前实际、具体和巩固了；（2）各地党都有一个新的整理、调查，支部较以前能开会，做一些工作；（3）

（1）党的组织较以前实际、具体和巩固了。各地党都有一个新的整理、调查，支部较以前能开会，做一些工作；（3）

(2) 党员的数目虽然发展较慢，但较前好和确实。

(3) 特委开了两次训练班，每一次都有很大的进步，并且最近发现几个好的本地的新干部，最近进到各县去开训练班。

(4) 新的地区和新的知识分子党员增加了。

(5) 矿山的工作也开展一个新的。

三、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

1. 春节宣传是由国民党、青年团、民运指导处和我们四团体发起的，联合郴县各机关〔合〕法团〔体〕，曾发动了郴县各团体的青年参加，经过一月余的筹备，达到话剧公演。虽然只做了一点话剧公演（其他都被限制，不能做），但是我们的影响是扩大了，我们公开的站在台上，尤其是群众认识了我们对于救亡工作的责任心，表现了共产党的面目。

2. 桂阳自卫干部训练班是由李典午先生主持的，是桂阳东镇乡的，有六十多个学生，由我们派人负责政治教育。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已得到完全的成功，这些人都可到自卫团去工作。最近，由李典午先生主持又办两个学校，一个高小，一个初中补习学校，这都是进步的学校，可惜我们没有人派去当教员。现在陈宇上负责中学，要我们找一教务主任，现在还未到，假若到了，对这学校将来可以成为推动湘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复兴〔社〕与我们合办的）。除此，其它学校亦有上层关系。

3. 桂阳的妇女工作近来也有很大的进步，县妇女干部训练班的毕业，“三八”节的火炬游行，儿童健康比赛，并且这些工作得到了党部的赞助和各界的同情。

4. 郴县书店经过上层的联络，又增加一些新股东，他们都

〔是〕上层有名望的分子。

5. 群众的组织因为同盟者的压制，只能从其他方面发展，最近主要的是夜学、保学等。

6. 在该城，我们争取了两个高小的校长。在耒阳，因为我们解决了一个保的派别斗争，我们被选为了保长、保队长、小学校长三个职务。

7. 在桂东方面，我们取得一个自卫队，并且在剿匪中造成了一个模范的队伍。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但是因为我们干部的不适宜统战工作，所以表现只在某些很少的有利的地方，而不能普遍从各方面发展。在安仁、宜章，因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忽视，同时又不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友党用剿匪的办法摧残我们的组织，屠杀和逮捕我们的干部。近来，因为友党故意向我们找摩擦，所以使我们统战工作更困难。这里，我们主观力量弱还是一个主要原因。

特委第二次执委会决定开除余稼生、彭寿其（县委书记，逃跑了）党籍。

湖南湘西党的发展过程，即湘西党的发展过程，即湘西党的发展过程。

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的报告

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①

湘西党的发展过程，即湘西党的发展过程，即湘西党的发展过程。

一、党的发展过程

（一）、发展党的环境、动力、方式及其所经过的时期

湘西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一九二七年以后，所有各县的组织都被破坏，而且防匪很严，所以现有党的组织都是抗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因为湘西土地很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大富豪（即地主兼绅士）可以收入两万至万担租谷，贫农最低限度要将其收入的一半交给地主，多的则到百分之七十的。高利贷非常盛行，年利最少最〔为〕百分之三十，也有百利之百至百分之二百的。投机生意也很盛行，收获时以低价收买农民的谷子和其它农产品，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又以高价卖给农民，而且地主（或富农）、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人密切联成一起，大多数是“以身而三任焉”。在这样残酷的剥削下，雇农和佃农的生活就达到了贫穷的最高峰，中农也不能生活下去，失地、失业的现象日见严重，而阶级斗争也尖锐化了。从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政治形态，也是封建割据的局面，大地主同时就是绅士或区

^①本文时间系编者考证。

长、乡长之流。他们都是各霸一方，拥有武装，做土皇帝，县政府的命令，非经过他们同意就行不通。于是，县长就与他们打成一片来压迫和剥削农民、手工业者。苛捐杂税之多，真是不胜枚举，即乡公所每月之办公费，往往有超过一千元者。田赋每一两银子换到二十余元，有时卖小菜也要抽税，贪污几成为公开的事情。关于航空捐、救国捐、冬防捐等一类“指富捐”款，豪绅又拿来“摊派”给中小之家，这使中农也无病呻吟。因此，更使文化不能发展，尤其沿湘、川、黔边境各县，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迷信和宗教（佛教、基督教）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在这样情况之下，青年知识分子是极端的苦闷和不满，加上抗战的炮声震动了他们，使他们都在跃跃欲动。“七·七”以后，我回到溆浦发动救亡工作，首先邀集一部份比较进步的青年，参加政府所领导的“抗敌宣传队”，下乡宣传。同时，结合将近三百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呼声社”，在社内还有一个核心小组，以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领导发行《呼声报》。在“帮助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揭破黑暗，反对贪污，开展文化，破除迷信”（呼声报的宗旨）的口号下，不仅得到农民及青年知识分子的援助，而且也得到许多社会公正人士的同情和援助。于是在《呼声报》号召之下，反对区、乡长贪污剥削以及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溆浦就广泛的展开起来。而革命的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些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则迫切要求党的领导。从江西苏区被捕押解回籍的翟根甲与贺耀（贺希曾）同志，即在这样环境下着手进行党的组织。因为翟同志与上面没有联系，不敢大量发展组织，只吸收几个表现最好的，如刘耀舟、舒效□、向玉池、梁春阳四人而团结其余进步的青年。这一时期的特点（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九三八年二月）：①群众自发运动高涨，党的领导不够；②没有同上面取

得联系，对统一战线的运用方式及某些原则不懂，③辰溪、沅陵、乾城、凤凰各县进步青年所领导的群众自发斗争和救亡运动也发动了，但没有党去领导。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溆浦得到徐特立回长沙的消息，曾有叛徒×××^①（×××^②）同翟根甲商量，派刘纪明到长沙去取联系。当刘纪明去后不久，翟根甲又同我商量，觉得刘去长沙不妥，因为他不知道溆浦工作情形，同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怕接头不上。于是又着我去长沙，通过王凌波同志的关系与省委接头。经省委批准溆浦党的合法以后，才给我们在溆浦发展组织的任务。不过刘纪明到长沙时，也同省委取得联系，他比我先回家。当我未回到溆浦前，翟根甲、×××^③、刘纪明、谌鸿章、谌焯、×××^④向玉池等人即召开了一次小组会。因为在会议上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没有结果而散。迨我回溆后，另外召集会议，即将×××、×××^⑤清洗出去。刘纪明不久也自动消沉而脱离组织。从此溆浦党才在秘密的形式下建立起来，个别的发展了组织。这时发展党的主要对象有三方面：①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通过他们的桥梁作用可以深入农村，不过限制太严，仍旧带有很大的关门倾向。②、乘国民党没有进入农村以前（那时国民党也喊出下乡工作的口号），集中力量开展农村组织，建立党的基础。③、争取地方武装，准备游击战争。等到组织有些开展以后，即分别建立支部，并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县工作，而各方面也都有些进步。至六月，省委派人来县视察工作，改县工委为县委会，纠正了许多错误和缺点，并交给我们向湘西各县发展党的任务。此后，溆浦的党逐渐走上正轨，而农村也建立了基础。八月中旬

①、②、③、④、⑤ 姓名系编者略去。

(一九三八年)，溆浦县委即派我到辰溪去开展组织。这时(一九三八年春)凤凰、乾城还有白云华同志在那里进行工作，他是先建立县委，然后开展组织，而沅陵、泸溪、芷江等县也有外来的个别同志在进行工作。这一时期(自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九月)的特点：①、在溆浦，农村工作开展很快，但对青年关门；其余各县或建立组织或有个别同志在进行工作。②、工作缺乏计划性，有忙于事务主义的倾向。③、干部担任工作太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没有分开。④、没有正确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以致常犯左的(同党政对立)或右的(只同上层混来混去，没有通过他们很好的去发动下层群众工作)倾向。⑤、由做群众的尾巴而转变到领导群众。⑥、工作还未曾做好，把干部弄得太红。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我到长沙向省委报告工作及湘西环境，省委即决定派三个同志赴湘西领导和开展工作，并组织“湘西工作委员会”。因为湘西地域很大，山脉绵延，交通不便，几十年来都是封建割据的局面，土匪(这是失地、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反抗地主官僚的表现与方式，但为一般投机取巧者利用，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同哥老会密切地联系着，各霸一方，互通声气，国民党中央及省府历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而政府的命令也常常只能在城内通行。为防匪计，地方武装就非常多。其实这些武装大部份又或明或暗(暗)同土匪、哥老会打成一片。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假使敌人进攻湖南，湘西是很好的游击根据地，即使敌人不来，由于农民生活的极端痛苦，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对统治者的不满，又有红军过境的影响，而国民党的统治力很弱，很可能在这里创立革命根据地。不过湘西的土匪和哥老会是阻碍农民革命意识发展的障碍，他们转移了农民斗争的正

确目标。为着进行哥老会和土匪部队的下层工作，为着开展地方武装的工作，特别在“西工委”内设立军事部，专门负责进行土匪、哥老会和地方部队的工作，而这些部门里党的组织也与军事部直接联系，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在长沙大火前后，许多机关、学校、工厂都搬来湘西，影响和刺激了湘西的人民，而救亡团体在各县都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在这高潮之下，各地党都有些发展。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时，湘西组织情况：溆浦、辰溪、凤凰都成立了县委；沅陵、泸溪、乾城都成立了县工委；在洪江、荒〔晃〕县、保靖也创立了支部。这时（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二月）假使领导得好的话，各县都可以深入农村，建立基础，但〔由〕于西工委本身的不健全（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一月，正式讨论工作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开过），书记尹泽南的包而不办，他把组织部、宣传部的职务都一个人兼任，而各地党的组织则找不到领导机关，只好自己决定一切问题，没有经验的新干部当然错误很多，致使党的组织非常散漫而呈现着混乱状态，奸细（：×××^①）、投机分子也乘机混进党内。这一时期的特点：①、领导机关不健全，作下级党的尾巴；②、各地组织很散漫、混乱，纵的联系则非常不够，横的联系又扯的很宽。组织生活不健全；③、各项工作制〔度〕，如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检查工作、教育干部等都没有建立；④、各地群众组织发展和救亡运动高涨，但没有好的领导，成绩不多。

自从尹泽南撤职以后，省委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派人到湘西视察工作，乃改组“西工委”。根据湘西的环境，青年的桥梁作用非常大，而且一般的说，他们的革命情绪也很高。中等及中等以

^①姓名系编者略去。

上的在校学生已达一万二千余（很多是流亡学生）。同时，湘西的劳动妇女非常多，沿湘川公路各县（沅陵、泸溪、乾城、永绥、保靖、凤凰），是妇女占生产中的主要地位，但她们受压迫的程度则比别区的妇女还要更厉害。知识妇女，特别是女学生的革命情绪很高。因此，决定在“西工委”增设青年及妇女两部，原来的军事部则由书记兼任，合组织宣传两部，则成五人的组织。这时，根据六中全会的决议来整理组织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在“西工委”本身建立集体领导制，并作初步的分工和规定一定时期的工作计划和学习计划。而且“西工委”的负责同志分住各重要县份，帮助县委及县工委检查和整理党的组织，转变作风（如纠正事务主义及过左过右的倾向），教育干部和建立党的基础。因此很快的就清除了一些奸细、叛徒及阶级异己分子。……^① 妇女工作这时有了新的开展，妇女团体也创立不少，如沅陵县妇女会，溆浦、辰溪、泸溪三县各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保靖县妇女会及湖大（湖南大学）的女同学会，各地的女党员也有了些发展。青年工作在常中（常德师范）、桃源女中（省立桃源女子师范）和湖南大学、民国大学得到相当的成绩。这一时期的特点（自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月底）：①、党的领导机关大大的推进了一步，走上健全的道路，由作尾巴而变为起领导作用。②、这时的主要工作一般的是整理和巩固组织，加强教育，发展党员是次要的。③、党员移动的数目很大，如溆浦市转去二十余人，乾城离开二十余人，沅陵离开三十余人。④、妇女工作和青年工作这时有了开展。⑤、湘西的环境起了大的变动，即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深入湘西，打破了陈渠珍的统治，而一般政治形势也开始逆转。⑥、群

^①此处编者删去约一百二十余字，主要为例举奸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

众工作有了大的转变，即由我们领导转向与国民党共同领导，由狭隘的非法组织而走向广泛的公开的合法组织。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省委又派人来视察工作，且部分地改组“西工委”，并将洪江、芷江、荒〔晃〕县等地划去，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曾派大军（如一〇三师、第九师、七十七师、第十一军、福山部队等将近二十万人，还有宪兵及税警一共七团，交通警备队及别动队各一支队）驻湘西剿匪，逼迫陈渠珍以新六军的名义收编土匪开上前线，汤恩伯则着刘寿奇在辰溪、黔阳等地编去匪部四团，同时严密封锁湘西各县，大施屠杀。对哥老会则加以破坏和收买，地方武装或解散或改编，完全置于国民党复兴社统治之下。因此我们的军事工作则遭受严重打击，如辰溪自卫团被解散，团长陈策同志被捕；溆浦保安警察队第二、三两中队被围剿解散，各地的土匪部队则收编开去；我们有些同志则随新六军同去。由于环境的急剧变化，乃将军事部取消。同时，妇女部由于原任妇女部长黄时雨同志因调动工作离开湘西，一时又无适当干部可资提拔，而国民党这时已压迫各妇女团体停止活动，故将妇女部也暂时取消，妇女工作则由分住各县的西工委分途负责（军事工作也是一样）。但在乾城、凤凰、永绥、保靖、泸溪等县的工作中则已接触苗民，我们认为这一少数民族的工作也很重要。他们的文化最落后，自己没有文字，在政治上受汉族统治。苗民的土地在清朝时曾被政府全部没收（即现在的所谓“屯田”），百分之九十七、八的苗民没有土地，极端贫穷，生活非常恶劣，仅有极少数的富豪（百分之一至二）统着他们，并利用他们民族仇恨的心理同汉族对立。故“苗匪”之乱，在湘、川、黔边境各县不时发生（如一九三五年，“苗匪”首领龙云飞率众攻陷乾城），而苗民的人数在湘境已达一十五万左右，川、黔更多；该

地又为三不管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最弱，便于我们创立根据地，于是在“西工委”特设苗民部，专门负责进行苗民工作，并兼顾有苗民各县的地方组织。故此时“西工委”则分为书记（李声玄同志）、组织部（丁务淳）、宣传部（陈楚）、青年部（白云华）、苗民部（梁春阳）等五部门的工作，统一战线则由各人负责。这时“西工委”在领导方式、工作计划和检讨，自我批评和学习各方面经省委的指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更趋健全。且鉴于前一时期分住各县领导确有成绩，但还不够深入，因为县委都是没有经验的干部，非带着他们工作，不能很快的养成他们独立能力，乃推进一办法，而将分住各县的“西工委”直接参加该地县委，担任书记。一方面帮助县级干部去领导下级党的组织，深入地去检查工作，巩固党，训练区、支的干部；同时，在工作中实地教育和培养县级干部。从一九三九年六月开始，在组织上即着手进行很大的转变，如规定秘密工作条例，严密党的组织；分开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停止红的干部在党机关中负责；缩小组织单位，使小组不超过三人，支部不超过二十人……。群众工作则完全转变到公开合法的形式，把过去我们所领导的狭隘团体自动解散，而参加到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特别是把群众工作的重心放在乡村教育和保甲工作。由于湘西环境日趋恶劣，而党也随之逐渐成为地下党的组织。至七月底，“西工委”书记李声玄未经组织通过，亦无工作交待而离开湘西，当时曾引起个别同志非常不满。但因“西工委”尚能团结一致，并未影响工作。当即决定在名义上由组织部长丁务淳暂时兼代理书记，同时加强集体领导，一切原则问题都由会议决定。八、九月间，乃将一部分红的干部调动工作。因此解散了乾城、泸溪两县的县工委，而改成四个独立支部；在凤凰解散了满元瀛领导过的

组织，而重新建立了县委；在保靖、麻阳各建立了特别支部；大概的调查清楚了苗民的情况，并已派干部深入苗区教书，秘密的在苗民中发展组织，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且吸收两个苗民同志；在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也建立了组织。直到十一月底，省委乃将丁务淳、陈楚、梁春阳三同志吊〔调〕开湘西。这一时期（一九三九年六——十一月）的特点：①、党在各方面都有了进步，工作检查已深入到下层，自我批评和工作中学习有了相当的进步。②、党的组织同群众工作在策略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过党虽然进入到地下工作的状态，但秘密工作的技术仍旧非常不够。③、在这一时期的上段，“西工委”的负责同志分住各县兼任书记；④、湘西环境急转直下的变坏。

（二）、发展的成绩和错误

在溆浦、辰溪、凤凰三县□□创立了党的基础，使党的组织深入或进入到农村；在沅陵的几个工厂里建立了支部；在湘西的两个重要学校（省立常德中学和省立桃源女子中学）里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支部；在乾城、泸溪、永绥、保靖、麻阳各县都建立了支部；教育和培养了一部份干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获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由于：①、乘着革命高潮的时候创立了群众团体，从群众团体中进行工作，发展组织。但因为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不够，或者是方式不好（过左和过右），不是弄得太红，就是没有成绩表现，以致有许多地方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希望。②、省委给我们的指示，曾经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所以每当省委来视察工作一次，在各方面都把党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同省委的联系不够，以致在工作中的错误也犯得太多（因为是不知而犯）。③、

具体地分析了湘西的环境，认识湘西青年的特点和桥梁作用，把青年工作作为初期的中心工作，通过他们过渡到农村、工厂。但因有些地方没有抓紧这一中心工作，向青年关门，而有些地方则过渡得慢或完全在青年中兜圈子，而没有建立很好的基础。④、宣传工作的配合行动，如《抗战日报》、《呼声报》和各地的壁报、小报等，以及“生活”、“新知”、“新路”、“新力”、“战时”、“垦荒”、“乐群”等书店在宣传、教育和鼓励上都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⑤、及时的改变策略方针，纠正错误，争取进步。⑥、领导机关与下层组织联系密切，及时地进行教育和从工作中教育干部。正因为教育得不够和初期的教育方式不好，特别是在农村支部教育得不够和整理各地的经验教训去教育同志的工作做得不够，致使许多支部不健全不坚强。⑦、干部地方化和很快地清除奸细、整理组织有很重大的作用。因有湘西完全是新的干部，年龄很轻，工作经验不够，而每天都处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凭着热情与努力，在党的发展与巩固上虽然得到一些成绩，然而错误和缺点终究太多：①、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没有很好的分开，把许多事情都推在比较有能力的干部身上，以致把他们弄得太红。②、在初期工作时，许多地方对青年关门，以致大批革命的青年找不到出路，而被国民党捷足先登。③、对于有能力而本质很好、家庭贫穷的青年，由于他们暂时还不认识马列主义，我们就不去争取、说服和教育他们，放弃了提高他们到党的水平的任务。特别是大部份进行农村和工厂工作的同志，对工农关门，把青年知识分子入党的条件拿到农村、工厂去应用。④、在革命高潮的时候（长沙大火前后），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失掉开展工作的机会。⑤、一般的说，湘西党曾经关门，

但也有一些不合标准的分子……①这是因为考察不详，我们新同志没有经验，只看到别人口头上说得很左，或因上下联系不密切，下级同志不知道重新入党的条件。⑥、工作计划欠周到，欠具体，有时甚至作了错误的决定。⑦、因为环境的困难，分散得太远，忙于本身职务的同志特别是农村支部和个别联系的同志，组织生活不健全，支部教育太差。⑧、有许多地方没有生根，没有建立基础。

(三)、发展党的经验教训

1、新党员入党后，必须立即给以党的教育，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使他们对党的基本问题了解清楚，对组织发生好的印象，免得工作中多犯错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犯错误都是由于不知道。

2、从群众工作中发展组织，比较个人关系的容易得多，特别利用农村夜校、工人夜校、民众识字班等进行发展工厂、农村的组织，非常便利。

3、必须抓紧革命高潮的机会发动群众，开展党的组织。当组织有发展以后，必须要及时地加以整理和教育，不然会使组织非常散漫，甚至弄成一团糟。

4、发展组织时，必须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抓住中心的对象，而且要随环境的变动很快的变更中心对象。

5、发展组织时，特别要注意奸细、投机分子装成左的面目混进党内来，争取地位，打听消息。

6、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必须根据某一时期的情况，抓住

①此处编者删去七十余字，主要为不合标准分子的举例。

中心工作，拿大部份的力量去解决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同时要注意在重要地区建立党的基础。

7、必须彻底了解周围的环境和正确的估计自己的力量，决定一定时期的策略，路线和工作计划。当环境转变时，要很快地转变自己的策略、路线，以适应当时的环境，并创造新的环境。

8、由于农民的散漫性，不易过组织生活，不易执行纪律，难于进行教育，而且机密性太弱，报复主义太强，容易出乱子，所以农民中的组织不宜大量发展，应特别注重质量。

9、新党员或候补党员，最好是由介绍人个别联系一个时期再编入组织。

10、党员转移关系时，应将本人的优点、缺点、履历、党龄、党内职务和转移后的职业，作一简单介绍，特别是要约定口号及接头的地点与方式。

二、党的组织状况

（一）、各级党部的状况

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情况说，“湘西工作委员会”是湘西党的领导机关，它管辖沅陵、泸溪、辰溪、溆浦、麻阳、凤凰、乾城、永绥、保靖九县党的组织。其中溆浦、辰溪、凤凰三县有县委，而只有溆浦县委领导两个区委和三个特别支部；辰溪、凤凰都由县委直接领导支部，没有区委；其余各县的支部则暂由“西工委”直接领导，迨有适当干部时，再成立县委或区委。总计支部的数目共三十五个，其分布状况：沅陵，四个工厂支部，一个妇女支部；泸溪，一个学校支部，一个工厂支部；辰溪，三个学校支部，两个农村支部，一个乡镇支部（在浦市），一个城

市支部（包括店员、手工业者）；溆浦，三个学校支部（一个小教支部、两个学生支部），一个城市支部，两个乡镇支部，六个农村支部；麻阳，一个青年支部；凤凰，一个妇女支部，两个小学教师支部，一个农村支部；乾城，两个青年支部（一男一女）；永绥，一个青年支部；保靖，一个青年支部。其余有些个别联系的同志。

（二）、干部状况

湘西各级党的干部，只有开始创立溆浦组织的翟根甲同志是从江西苏区被俘押解回籍的，其余都是本地新的干部及外面来的几个新干部。参加“西工委”的先后有：

尹泽南（时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任书记）：家庭是中农，一九二七年中学读书时入党，曾参加湘鄂赣边区游击队，红军长征以后，该游击队被破坏，他的情况不明。抗战后在长沙办事处恢复关系，并入“抗大”学习（第四期），毕业后回湖南，即任“西工委”书记。

李声玄（长沙人）：家里做〔生〕意，本人毕业大厦大学，一九三七年入党，曾任《观察日报》编辑，长沙市委〔委员〕。一九三九年六月初，任“西工委”书记，至七月底离开湘西。

黄时雨：长沙人，大厦大学学生，李声玄的妻子。一九二七年曾加入过青年团，家庭已替他自首，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当时任蒋夫人所领导之“新运总妇女工作委员会湖南分会”的总干事，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月任“西工委”妇女部长。

丁务淳：安徽人，家庭是地主大官僚，清华大学毕业，一九三七年入党，曾任长沙市委、澧县县委、沅陵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二月至十一月底任“西工委”组织部长。

县级干部统计表

姓名	成份	党龄	教育程度	受训	履 历	党 内 职 务
湛鸿章	知识分子	1938	高工毕业	受过短期训练	任溆浦贫民工 厂工务主任	任溆浦县委书记和组织 部长、被捕过，公开过
曾福春	贫苦青年	1938	小学毕业	同	任过乡村小学 教员	溆浦县委组织部长、书 记
傅景三	知识分子	1938	高级工校 毕〔业〕	同	任过技佐、工 程员	辰溪县委书记，泸溪县 工委书记
江亚青 (女)	同	1938	湖大毕业	同	任机械厂会计 主任	辰溪县妇女部长、湖大 支书
陶菊生 (女)	同	1930春	桃中学生	同	参加过“民 先”	桃中支书，辰溪县委组 织部长
杨绍元	同	1938	常中毕业	同	小学教员	凤凰县委书记
郑 敏	同	1938	常中学生	同	学生	任过常中支书，泸溪县 工委 ①
黄增颐	同	1938	常中毕业	同	小学教员	任过乾城县工委书记
肖韶珊 (女)	同	1938	高师毕业		保育院的教员	凤凰县委妇女部长
唐知伯	同	1939春	高中毕业		办过民训	任过凤凰县委书记、宣 传部长
田成上	同	1938	高师学生		办过民训	任过常中支书，凤凰县 委组织部长
李道之	同	1938	高师毕业		做过行署宣传 股长办过报纸	曾任过湘西青年、乾城 县工委

①原文如此

陈楚：大庸人，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死后，即无家庭。常德师范学生，抗战后进“抗大”四期读书，即加入党，毕业后回湖南，住办事处，任招生委员。一九三八年十月参加“西工委”，担任群众工作，一九三九年二月任宣传部长，一直到十一月底才调动工作。

梁春阳：溆浦人，富农出身，毕业于湖南楚怡工业学校，一九三七年入党，曾任溆浦县工委和县委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十月任“西工委”军事部长，一九三九年二月至六月任“西工委”书记，六月至十一月任苗民部长。

区委共五人，都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其中有一个邮差，两个手工业者，两个知识分子，有四个人受过短期训练。支部的干部约八十人，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十五（十二人），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五（约三十六人），农民占百分之二十九（约二十一人），手工业者、店员约占百分之十四（十一个），其中大部份受过短期训练，都是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新党〔员〕，工作经验非常不够。

（三）、党员状况

“西工委”领导的组织共有党员约二百八十余人，其分布状况，大概溆浦有一百一十余人；沅陵约三十人；泸溪二十余人；乾城十二人；保靖十一人；凤凰约三十人；永绥三人；麻阳五人；辰溪约六十人。如果党员数目按人口总数（大抵将近一百八十万）的比例仅占六千分之一；而单以溆浦说（三十万人口），则占二千五百分之一；辰溪占三千分之一；保靖则不到万分之一；沅陵本地党员一个也没有。以成份说，党员中工人约占百分之八；店员、手工业者约占百分之十；农民约占百分之四十二；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

十。工人同知识分〔子〕党员大部份受过党内教育，组织生活也比较健全，每周开学习讨论会。农民和店员、手工业者则少有受过训练，组织生活也较散漫，没有一定的学习计划。其原因是：①、他们本身工作太忙，没有好多集体学习的时间。②、生活不是在一起，各人开会的时间经常起冲突。③、文化水准太低，不易进行教育。④、他们轻视理论，害怕学习的困难，不愿努力学习。⑤、散住太远，不便经常集会。⑥、很少适当担任这种教育的人和适当的教育方式。故各党部都把容易教育的同志先着手进行，而把这些难进行教育的同志推放到后面，甚至迁延下去。女党员一共五十几个，约占全部党员人数百分之十九，除吴佩扬同志以外，其余都是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入党的，其中有两个女工，一个家庭妇女，余为知识分子。过半数的女党员都受过较好的党内教育，而且有些比较有前途的妇女干部。

三、领导机关及领导方式

(一)、了解下层及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

“西工委”所领导的组织、党员虽不多，但分布区域很大，而且只有溆浦、辰溪、凤凰三县有县委，其余各县的支部都靠“西工委”直接领导。因此，一方面“西工委”下面有书记、组织、宣传、青年、苗民五部门的分工，另一方面则将负责同志分住各地，担任领导该地一切部门的工作，并把湘西九县划成四个区域：在沅陵、泸溪经常分住一人；溆浦、辰溪经常分住一人或二人；凤凰、麻阳间或分住一人；乾城、永绥、保靖则在一定期限内派一人巡视一次，在各县留住一、二周，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问题和短期的训练干部。在一定期间内(一月至两月不等)“西工委”

则集会一次，由分住各区及巡视工作的同志各报告该地一切工作情况，再由组织部总结各地组织情况及组织工作，宣传部总结各地宣传教育工作，青年部则总结各地青年工作，书记则总结国际、国内、本省、本地的环境变动。其余群众工作、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则大家负责。检讨工作以后，再由各部提出下一期的工作计划，经会议通过后，于是又分住各地去帮助该地党来具体执行。

（二）、县委的情况

县级党主要的是分书记、组织、宣传三部，但在凤凰则另有妇女部，辰溪则另有青年部。因为干部缺乏，常有兼任工作的现象，以致各部工作不太健全。县委的领导与分工，也是由每个同志分别领导几个支部或一个区委，出席支干会或区委会，倾听他们的工作报告，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了解情况，规定工作计划和方针；同时还负责教育干部，但有时则特别抓紧某一区委或支部，加以突击的教育和整理后，帮助他们规定下一时期的工作计划，让他们独立去做，再过一个时期去检查一次（“西工委”对各县也常采用此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上下联系不致脱节。县委大都每半月开会一次，讨论工作进行程度和困难问题；一月或两月则总结工作一次，遇有特殊事情，则召开临时会议。在环境没有变坏以前，曾召开过活动分子会议，以交换彼此的经验教训和讨论问题。但以后为着严密组织及开会不便，也就停止了这一办法。活动分子会议在交换工作方式、检讨优缺点、接受经验教训及讨论问题上曾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新干部秘密技术不够，容易暴露组织关系。

(三)、领导方式

除了“西工委”开始创立的一个混乱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一月）外，一般的说，在党的组织初创时，则上下联系比较密切，上级给下级的帮助也较多。待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干部稍有独立性以后，则实地帮助他一个时期，再停止一个时期（即只给一般的指示），让他自己去独立进行工作，然后去检查他的工作，纠正他的错误。规定某一地区的工作计划时，则先征求当地同志的意见，再加以补充或修正，但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以前，不可随便删掉或抹煞地方党的办法。对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应当要求当地同志先发表意见，不要一开始自己就作结论。领导机关随时随地都要做下级组织的模范，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当经过审慎的考虑以后再作答复，决不可在下级同志面前失信，否则就不容易团结干部。在偏僻区域工作的同志，则规定定期接头，如规定一个月接头十次，则工作同志这一月向领导机关汇报，下一月则由领导机关派人去巡视。在环境没有变换以前，领导机关与下级党的联系比较很密切，领导也还深入，开会的时间较短。自环境变坏以后，则有大的变化，接头、开会的时间都延长了，领导也不便直接到下层去，只好隔几个月找支部同志（有县委领导的支部）去详细谈一谈该支部内的情形，领导地区也不便变动，差不多固定的分途同那些同志接头，各个地方的领导和各个支部的领导都用不同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西工委”则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整个区域内的中心工作（如一九三九年二——五月的中心工作是整理党的组织。因为前一时期各地组织有了发展，但由于联系不够，非常混乱），其余的经常工作，则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联（连）带的去推动。完成了这一

中心任务以后，再规定下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各县则根据“西工委”的中心工作任务，又具体地规定他自己的中心工作，集中大部〔份〕力量去解决中心问题。当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到相当程度时，若发生别一任务更重要的话，则须规定别一任务为下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而把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推到下一时期作为经常工作而围绕别的中心任务去联〔连〕带推动。如淑浦开始发展组织时的中心工作是青年工作，但由《呼声报》的宣传和鼓动，农民的革命情绪突然高涨，因此，很快的把工作重心移到农村去建立党的基础就成为迫切的任务，而青年工作则围绕农民工作联〔连〕带去进行。即这时青年工作，主要的是农村小学教师。关于抓紧中心工作，我们有过很大的错误。如沅陵没有本地党员，曾经几次把“生根”做沅陵的中心工作，可是只有一般的注意和动员，没有特别抓紧沅陵女子师范和辰群中学的工作，没有集中力量在这两个据点（因为这两个学校是沅陵本地的学生占绝大多数，特别是女师的学生，毕业后是要任乡村小学教员的，而且我们去进行工作又有门径），结果到现在还不能生根。又如，乾城一开始就很注意青年工作，但老是抓住这一点浮在表面，而不能很快地过渡到农村去，结果把几个脱离学校、能力较强的本地干部弄得太红，吊〔调〕开以后，就更不容易建立农村基础了。在各部门工作配合上做得相当不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经常混在一起而由一个人去担任，妇女工作也往往只由少数女同志和个别男同志去进行，其余同志则置之不理。宣传与组织则比较有些配合，如组织部进行整理党巩固党的时候，宣传部则加紧党内教育，各书店则及时的贩送适用的书籍；当我们准备成立什么群众团体时，则首先在报纸上宣传和鼓动，党领导某种群众斗争时，则报纸和壁报就加以援助。在分析当地具体环境时，特

别要注意各集团、各个人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演变，而我们的策略方针也要随之变动。对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尤其重要，领导机关若忽视了这一点，就会遭受严重的打击，辰溪军事工作的失败是血的教训。

(四)、怎样检查工作

“西工委”在每次会议中，根据各同志的报告以后，把各地的工作都做一次检讨。为检查“西工委”各同志的报告是否正确起见，有时相互调换领导地区，相互检〔查〕工作。分住各地的同志及当地县委，常出席支干会（有时出席同志不发表意见，只听取意见）和听取支部同志的工作报告，然后再同个别同志去谈话，并间接地向群众打听他对我们同志的印象。在一定时期内，则对于上一次的的工作计划和决议案作一次总的检查，看它能实行了多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计划有哪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地方，决议案是否错误。往各县（如泸溪、乾城、永绥、保靖）巡视工作的同志，则根据支部的报告再出席他们的会议，然后找个别非支干会的同志来谈话，以检查他们对上一次的计划和决议执行多少；或者先找个别同志谈话，根据所得的材料，再同支部的报告对照，看是否相符合，然后出席会议时纠正他们的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因此我们常发现有些决定并不正确。如国立第八中学在校长邵华的反动压制下，我们全体同志不愿埋头苦干，而结队离开学校以后，“西工委”曾决定“不在八中发展组织”。但以后我们检查各地青年工作时，重新分析八中的情形，才取消上一次“在八中不发展组织”的决议。因为八中将近六千学生，它分成十部而散在湘西各县（乾城、所里、鸦溪、洪江、麻阳、永绥、保靖以及四川的秀山），由于环境的便利，湘西大批青年过

去不能升学的，现在都涌进八中读书，假使我们“在八中不发展组织”的话，那么湘西的青年工作就会缩小得不可言了。计划太空洞而不合实际的地方也有几次，这大部分是没有注意到执行计划的人。从此就得到了一些经验：①、新发展起来的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决议执行得非常不够（特别是那些个别联系的同志和偏僻地区工作的党员），每经过一级要打一些折扣，甚至到最下层几乎等于零的也有。而县、区、支各级党部的工作报告，也常常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甚至有大部分不相符合的。因此，我们检查工作，就不仅专听县委、区委的报告，而必须亲自到支部去考查；不仅亲自到支部考查就算了事，还须要同小组里的个别同志特别是单独联系的同志进行谈话及间接的采纳群众〔众〕的意见。②、在经验不够的干部去检查工作时，不能某一地区经常专门由那一个人负责，必须相互交换的去检查，而且检查工作不是天天跑到下面去问，而是过了一定的时间（一两个月都不要紧）再去详细检查一次。③、决定工作计划时，必须要首先详细的了解和分析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注意工作对象或群众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和政府的方针，再规定适宜这一环境的工作计划。同时，必须正确的估计自己的组织力量，看执行计划的人是否能完成这一计划，否则要求过高，就会变成空文。④、当检查〔查〕工作发现了错〔误〕时，必须当即向该组织提出，要他自己检讨错误的原因，帮助他如何改正错误。这是从工作中教育干部很好的方式之一。⑤、检查工作，要细心的从小的问题着手而推进到大的问题，不然粗枝大叶，走马观花的看一次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五）、领导方式上的错误或倾向

“西工委”的领导，曾经犯过官僚主义的错误。如初创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一月)；负责同志只住在沅陵不动，各地的组织则仅由书记写信联系，使下级党找不到领导机关，领导机关没有事做，而且“西工委”也是根据这些来往信件的材料向省委报告工作。其原因是：①、由于书记包办，没有发扬民主和建立集体领导制；②、不了解下级党的情况，没有深入到下层去检查工作；③、本身组织生活不健全，没有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后开始整理组织时，曾犯过事务主义的倾向。其原因是：①、由于当时的组织非常散漫，党内情况很混乱，没有抓紧最重要的问题和地方先解决，其余的逐步去推进，而只想很快的把组织整理好，结果东也抓紧，西也不放，弄得忙不过气来；②、干部很少、很弱，没有经验，不能独立解决问题，于是不得不把许多事情集中在领导同志身上；③、不敢大胆地相信干部，没有具体的把工作分给他们去做，这样要过问，那样也不放心，以致什么事情都堆在自己身上（这一错误，梁春阳同志特别犯得厉害）。

（二）在整理组织时，曾犯过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其原因是：

四、支部工作

（一）、支部组织状况

在湘西二百八十多个党员中，除了翟根甲和莫佩扬两同志以外，其余都是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新党员，因为散布地区太宽和工作的情况不同，其中约有三十个同志是个别联系的。支部人数的配置，最多的是十八人，最少的是三人，平均数目大概是九人。支部书记领导全支的工作，他负责召集支干会，同上级联系，拟出一定时期的工作计划，经支干会通过，再交全支同志分途去执行。

他总结支干会（学习会除外）所讨论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支干会则领导小组，决定全支的一切问题，审查和通过新党员，检讨全支的工作，并进行学习讨论会和教育同志、领导群众工作。支部大会因为环境困难，从来没有召集过。支书的成份，工人约占七分之一，农民约占四分之一，手工业者、店员约占七分之一，知识分子约占七分之三。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支书，大部分都比较能够独立工作，农民和手工业者则较差。支部中的活动分子有刘毓璜、金汉虚、彭司续，都是知识分子，工作很积极，有群众拥护；李孝梅、顾加善、田楚明、王启清、丁时进、何鹏都是学生，工作努力，得群众信仰；杨子汉、赵贻谷、谢万林都是工人领袖，表现很好；向茂华、龙步云、杨指标都是小的群众领袖，工作也表现得很好。

（二）、支部生活

支部大会虽然从来没有开过，小组长联席会也开得很少，但关于支部的重要问题及工作计划，都须首先个别的去征求每个同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支干会则在每一星期，或十天，或半个月召开一次。小组会则每周召开一次。有些支干及小组则除工作讨论会外，每周还开一次学习讨论会。一般的说，工厂、学校及知识分子中都能够按时开会，只有农村支部和店员、手工业者的支部，不能经常按时开会，特别是那些偏僻地区很困难。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每次都是一个或两个，最多也不超过三个，在上次会议上规定下一次所讨论的问题，使大家预先准备。讨论问题的内容，主要的约分三方面：①、有关每个同志或群众的切身问题（包括当时社会上临时发生的问题）；②、时事及学习上所规定的问题；③、工作检讨和计划。并且根据各支部情形轮流讨论

一方面的問題。在工厂及知识分子中，发言比较踊跃普遍，民主性和灵活性也比较高些，农村支部差不多经常由几个会讲话的同志包办，当上级派人出席会议时，他们都不敢多说话。支部会议时，大多数的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讨论最热烈，但也有些支部对检讨工作和学习发言最热烈的。

(三)、支部的经常工作

在环境没有变坏以前，最大多数的同志都参加到群众团体中工作，或利用特殊方式(如同群众一起参加民众夜校、识字班等)与群众联系，以进行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发展组织。现在，原先那些群众团体都被解散或停止工作了，支部同志只能利用一些公开合法的形式和私人的关系同群众取得联系，每个同志都各自团结一部〔份〕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西工委”曾规定把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检查党员成绩的主要条件)，经常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注意他们的切身利益，向他们提供意见，教育和领导他们，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及政治觉悟，以俾达到我们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支部同时还经常的考查和教育党员，有很多支部每周或两周开学习讨论会一次，以提高同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注意他们的组织生活和切身问题。

(四)、上级党对支部的领导

首先了解支书和支干的履历、能力、优点、缺点以及支部同志的组织生活、工作情况与群众的关系，并估计到全支部主观的力量，再根据支部同志的报告、群众的意见以及其它的材料来帮助支部详细的、具体的分析支部周围的环境，然后规定支部一定时期的工作任务。而且经常出席他们的会议，检查他们的工作。

作，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及缺点。但有时由于对支部的本身力量和客观环境估计不确而发生要求过高或计划不切实的倾向，有时因忙于工作和职务，不多想办法去克服困难，以致偏僻地区的组织或农村支部及个别联系的同志而发生脱节的现象。

(五)、环境转变下的支部

环境变坏以后，支部需要完全转变到地下工作的方式。因此，把支部的人数相当缩小了，把农民同农村手工业者划分开了，店员同城市手工业者也分开了。分开以后，禁止发生组织关系。新党员入党时暂不参加支部，由介绍人单独联系一个时期，把开会的日期延长，加强秘密工作的作风。这时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党内教育和争取党同群众的联系，把党员隐蔽在群众中。现在比较好的支部有七个，坏的有五个，一般的有二十三个。其好的原因及表现：①、支部能够隐蔽在群众中，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我们的同志能起模范作用，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我们的政治方针能成为群众的指标，党能在群众中起领导或推动作用；②、上下的联系很密切，领导机关对支部的情形了解清楚，帮助或指示都比较切实，特别是从工作中进行教育，从错误和成功中学习经验教训，使同志比较养成了独立工作的能力；③、领导机关对支部的监督较严，教育较强，因此支部的组织生活较健全，纪律性、民主性、灵活性都较高；④、支部同志入党时就过较好的组织生活和学习生活，没有脱过节，因此，同志间的工作精神和学习兴趣很高，开会时争论很热烈；⑤、支部同志经常生活在一起，有许多学习、工作、斗争的共同条件，使他们容易过集体的纪律生活。坏的原因与表现，大致上与此相反。当支部转

变时，曾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①、在群众团体中作惯工作的同志，忽然脱离了群众团体，连群众也脱离了；②、开会接头的
时间延长以后，上下党的联系比较松懈，而党员的组织生活也一时呈现散漫状态，不过党的组织是比较隐蔽得好些了。

（六）、支部工作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办法

1、支部必须要按生产单位组织，因为他有共同的生活条件，进行一切工作时都较便利；

2、支部必须要隐蔽在群众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每个党员都要进行群众工作；

3、支部同志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必须要在本身的职务上起模〔范〕作用，生活上起模范作用，帮助群众，对群众只提意见，不下命令；

4、支部领导群〔众〕斗争时，不要把同志的名字列在最前面，因为容易遭受国民党的打击；

5、每个支部必须要彻底了解周围的环境，特别是群众的情绪，随时都要注意环境的变动而变更自己的策略；

6、新建立的支部，领导机关必须一开始就多用点力量把它弄好，使它走上工作和学习的轨道，然后再放松一点不要紧，否则开始形成散漫，整理就非常吃力；

7、农村支部在初期开会时，不能按规律的提出问题和发表意见，只能提出当地他们所熟悉的问题，引起他们发言，拿当地的一些实际问题去教育他，使他逐渐走上规律的道路。

五、党内教育

(一)、党的一般文化水准

因为党内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多，所以党内文化水平也比较高，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而能自己看书报者约占百分之四十；除此以外而能看浅显书报，但须人帮助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文盲和稍微识字而不能看书报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二)、干部教育概况

“西工委”分住各县的同志，每一期都要训练一、两个支部。因此，工厂和学校的支部干事及活动分子都受过几次短期（一月或两、三星期）训练，其余的支干也都大部受过短期训练，只有农村支部的干事比较少有受过训练。县级干部大都参加过短期训练班受训，而淑浦县委则特别由省委派人去训练过。除了短期训练班以外，各级干部以大多数都经常进行自我学习，每周或两周开学习讨论会一次，先由“西工委”按月规定学习内容和题目，并自先详细讨论，再交县——区——支去挨次讨论，这使大部分干部对于一般理论原则有了初步的认识，能够了解一些基本问题。在县级干部中，曾对某些个别问题作过较深入的讨论，同时把这些讨论过的问题应用到工作中去（如讨论了“组织的领导”以后，即用到怎样去领导支部），在工作中去检查和证实，这在提高干部独立性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干部教育中的缺点也很多：①、大多数的训练班里只讲到一般的原则问题，没有很好地联系到实际工作上去；②、因为本身的理论水准不高（指“西工委”说），所以对许多问题只得到一般概念的了解，而没有得

到深入的、明确的解决；③、在很多次训练班里，只贪多而不精，结果成绩很少；④、没有很好的执行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

（三）、党员的教育概况

“西工委”曾规定新党员入党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逐步了解和熟悉党章、《支部工作纲要》、《论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以及《论政党》五本书的基本内容，并经常看党报。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则要他自己熟看；能勉强看书的同志，则由文化水准较高的帮助他看，解释给他听；不识字的同志，则由识字的同志逐条的讲给他听，要他记着去做。并规定看了以后，要在小组会和支部会上逐步讨论，逐步运用到工作中去，在工作中来检查。学习时，以每一小组为单位，支部干事担任小组的教员，县委或区委则担任支部的教员。“西工委”则担任县委或支部的教员。当县委讲给支部听了和支部讨论了以后，他再拿去讲给小组的同志听，然后县委到小组去检查成绩。教学的方式是每星期规定题目，同志们预先准备。开会时，或首先由教员讲解，然后再来讨论；或先进行讨论，再由教员总结。因此，除农村支部以外（大多数的农村支部都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教育），其余的同志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比较提高很多，特别是工厂支部进行得快，有很多过去不关心时事的同志，现在都养成了看报和讨论时事的兴趣。但是缺点还相当多：①、教育没有普遍化，特别是农村支部最不够；②、学习与应用配合得不好，从工作中检查学习的成绩进行得不够；③、有许多同志喜欢贪多，结果反而学得很少，并且了解得不清楚；④、没有很好地去研究教育方法，接受学习经验。

(四)、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办法

1、讲授及讨论的问题，先经领导机关详细的讨论以后，得出结论，再挨次（由县——区——支——组）交下去讲授或讨论，这在教员的准备上相当便利，而且内容比较丰富又容易深入；

2、由县委先教给区或支，支再去教小组的同志，这可以免除讲解或讨论时的许多错误，而且可以替支部解决许多学习中的困难问题；

3、当县委教育了区委（或支部）以后，必须从支部同志（或小组同志）中去检查他们（区或支）的成绩，看他们接受和了解的程度，纠正他有错误的地方；

4、讲授和讨论的材料，必须要与他们日常工作联系起来，使他们学一点，做一点，再从工作中去检查他们学习和执行的程度；

5、每次所讲授和讨论的问题，不能要求过多，应当少而精，要使他们彻底了解和灵活的去应用；

6、进行农村和工厂支部的教育时，最好是先设法成立识字班、夜校……一类的组织，要我们同志参加，使党的教育和文化教育配合起来，而且农民、工人、店员、手工业者一类的同志，对于讲授的问题，一两次是不能接受很多的，要三翻〔番〕五次的多解释，多举他们所见过的具体例子；

7、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必须注意他们好高骛远的心理，首先要他们看最基本的书，了解最基本的问题，然后再逐步深入的去研究；

8、学习时，可以采取竞赛的办法和创立模范学习组，经常把模范学习组的成绩拿去教育和鼓励别的同志；

9、党应当有计划的推销党报和有进步理论的书籍，以解决同志们在学习上的困难问题；

10、领导机关应当有计划地推进党内教育，把学习作为党员的任务之一，并有计划地定期总结各支部的学习经验，提作同志参考。

六、倾向斗争与党纪

(一) 发生了哪些倾向

在湘西组织中，走“左”、“右”两极端的倾向开始时犯得特别多，如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些专门同上层分子（党政机关及乡绅之流）混在一起，而不通过他们的关系去发动下层工作，有些则基本同他们通来往，甚至拒绝他们的帮助。如国立八中的同志，开始学校还不注意思想问题时，他们就在“晨呼队”的口号“中国国民党万岁”下面加上一条“中国共产党万岁”，由此引起了校长邵华发觉有共产党活动而加以压制时，他们则全部结队逃跑，放弃自己的岗位；如沅陵纺织工人训练班，开办时因为主任很同情我们，我们的同志则成立图书馆，专门收集进步的书籍，组织时事座谈会、读书会等，做得非常热烈和起劲得很，等到上级机关发觉把主任撤职而禁止活动以后，他们连沅陵出版的《抗战日报》都不敢看了，连汪精卫也不敢反对了。这些倾向的来源：①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犯寒热病的表现；②联系不密切，领导机关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形，没有预先防止这些倾向；③工作同志很幼稚，没有经验，不能详细地分析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任务，但经领导机关知道了这些事情

并把它详细分析了以后，也就逐渐地纠正过来了……^①在初期工作中，由于没有了解青年在革命中担负的任务，由于只看到青年坏的一面，因此有些地方曾发生过轻视青年和对青年关门的现象，但自接到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以后，立即就纠正了这一错误。然而，有些地方又反过来又发生了乱拉青年的倾向，但很快的也就克服过来了。

（二）自我批评的情形

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西工委”本身曾发扬得相当高。一方面每次会议的末尾都专门进行自我批评，对每个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做严格的检讨和批评；另一方面则征求和接受下级党的意见，要求下级同志有话都说，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出，就是错了也不要紧。有一次，我们接到下面很多同志对于“西工委”白云华同志的批评。在会议上经过整天的斗争，他才承认错误。各地党内自我批评的精神也还不坏，大都能够公开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听上级党的劝告。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着帮助同志克服弱点，加强党性的锻炼。因此我们进行批评的方式，是每个同志都说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过程，再指出别人的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要他自己说明产生的根源，然后讨论怎样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及发扬优点。

（三）党纪是怎样执行的

我们把党的纪律是当作以补说服解释之不足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错误，总是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当说服教育无效

^①此处编者删去约二百余字，主要为贪污腐化方面的举例。

时，就进行会议上的批评和斗争，以致执行纪律的制裁。工作中的错误及不知而犯的错误，少有用纪律制裁过。明知故犯和累次犯错误的，我们才执行纪律的制裁。但是，对于奸细、叛徒、异己分子，则毫不留情的清洗出党。

七、干部问题

(一)干部现状

现任县委及因红而暂时停止工作的县级干部共十二人，区委和能做区委的干部约十余人，支部的干部则将近八十人。在干部中有一个大的缺点，即县级干部红的太多，并且全是知识青年。现在非常缺乏能够独立解决问题，不被国民党注意而又宜于埋头苦干的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干部大都能够团结一致，有问题在会议上公开的提出，诚意的相互批评、监督和帮助，但也有当面不说，背后议论或有话不讲的现象。这主要的是由于教育不够，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没有克服，不过我们也很注意他。关于提拔干部，我们曾经犯过很多错误。如辰溪要××^①当县委书记，他是外省人，不懂本地情况，是新党员，没有领导经验，自己又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能很快的克服，以致使辰溪的组织有一个时期相当不健全，溆浦也让×××^②以不合党规的手续担任了县委书记。经过了这两次教训，我们才规定提拔干部的条件：①提拔县、区级干部必须先经过“西工委”的通过；②首先要干部在政治上、意识上表现很坚强，然后再看干部的能力和是否适宜工作；③最好是干部能熟悉当地情况者；④预先征求当地组织对这个干部

①，②姓名为编者略去。

的意见怎样。因此，提拔干部就不象从前那样马虎了。配备和使用干部也没有很好的计划，有时迫于公开群众工作需要人用，常把负秘密工作责任的同志去担任，或者是把可以培养成为秘密工作的干部而分配到公开群众工作中去。总之，就是没有很周密地去计划这些事情，这不能不是缺乏秘密工作干部和干部红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才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审查干部首先是根据他自己的报告，考察他家庭的环境、个人的历史、思想发展的过程、社会关系及其特点，再从下层党员或群众中去探悉他的报告是否正确；同时看他在工作中表现怎样，是否与他所报告的相符合；并且要每个同志把他所知道的在政治上有问题的同志或非同志的情形向党报告。因此，我们曾经查出了一些不合格的干部，而撤去他们的职务。但是审查工作，我们始终都还做得不够和不深入，特别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各个衔接关头。

（二）今后的干部政策

我们曾根据党中央的干部政策，规定过大概如下的方针：①各级党的机关，必须预先培养着能够代替他自己职务的干部，以防万一的事变；②要根据干部的特点，培养他去做能够发扬他自己长处的工作，不要随便更换他的工作；③教育干部时所采取的材料，首先要注意他有应用的机会，帮助他怎样运用到工作中去，在工作中去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发扬他的优点和成绩，特别是要整理各地的经验教训去教育干部，使干部把工作中的学习和书本上的学习联系起来；④把秘密工作干部和公开工作的干部严格的分开起来，不要随便调动秘密工作的干部去进行公开的群众工作，在秘密机关中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不必去参加公开的群众活动；⑤必须培养出本地有能力有社会关系的干部，能了解本

地情况的人，并根据他们自己所知道的确实材料，帮助他分析、了解周围的环境和决定工作方针，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还须要告诉他们怎样领导与布置工作；⑥必须教育干部养成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上级不要依赖苛求，就是使自己怎样能够适合干部的条件，对下级则要帮助爱护，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⑦必须有计划地审查干部，彻底地了解干部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思想转变过程、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及其特点；然后提拔他担任适当的工作，不要随便打击和撤销他职务。

八、秘密工作

(一) 如何秘密

关于一般工作中的秘密技术，我们非常不够，特别是小的地方不注意。各级党部机关的隐蔽情形：“西工委”的负责同志，因为经常走动或调换地区，不便找到固定职业（但在十月初，曾决定准备分住固定区域，找一定的职业，延长集会的期间，因须征求省委同意，尚未实现），只好找较好的社会关系，各带适当的证明文件，佃房子或寄住，走动时则带确实护照、证章或证明文件；县委除淑浦的组织部长脱离职业，寄住在亲戚家里以外，其余都有一定的社会职业；区委或支部也都全有职业掩护。“西工委”开会的地点，则分区轮流召集，以某一时期某地特务工作较松为宜；或者藉躲警报的名义（因为湘西许多城市吃了早饭以后，政府即迫令市民出城躲避），日里到山上去开会；或者藉请客的名义到自己住的地方开会；或者利用本地同志的关系，找乡村小学或庙宇开会。但是这些办法，不能经常在一个地方举行，因为很可能引起别人的注目，久隔一个时期间或召集一次倒不要

紧。最好是本地划船的同志，或者要我们当地的同志设法自备船只，划到河里去开会，但须不要经过关卡。县、区、支开会的情形大致相同，不过他们人少、时间短、比较便当得多。最近，把开会的时间又延长了。关于小的问题，彼此交换一下意见，没有争执（执）就随时解决了，在会议上只决定重要的原则问题。秘密文件，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就决定一概不用。会议上的决定，也是每个人记在脑筋中。书面报告也取消了，除非万不得已的东西，暂时以特殊的方式记载一下，其余的秘密文件、书籍，我们看了以后就烧掉了。不过这样过了一个时期，就找不到原先的根据。

（二）干部的暴露

湘西正式向国民党公开的同志，只有翟根甲和湛鸿章两个，而被国民党所估认和注意的干部及党员则约二十余个。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起，我们曾陆续将有些特别红的同志相互调换过工作，要他们改换姓名，隐藏在职业中埋头苦干；对于比较不太红，但被国民党注意或怀疑的同志，要他们脱离党内一切工作，同组织分开起来，单独进行一些比较灰色的群众工作，且与接头联系的同志疏远些，非必要时，不许随便接头；并且根据省委的指示，规定了一般秘密工作的条例。今后还准备把这些被人注意的同志也逐渐调开，隐蔽起来；同时要求省委尽可能调动一些到别区去。假使有什么突然事变，就要这些同志立即离开原地，暂时隐蔽到偏僻地方去，或苗区，或到土匪部队里工作。干部暴露的原因：①在初期工作中，党对非党的群众领袖没有加以保护，以致很多同志还未入党以前就非常红，等到入党以后，就无法隐蔽了；②对环境的认识不够，在革命高潮时没有估计到会有低潮的到来，而

一般热情的青年就只注意到努力工作，表现积极性这一方面，没有注意到掩蔽自己的身份；③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没有很好的分开，经常混同在一起；④能干一点的干部，参加的群众团体和担负的职务太多，以致这里也是他们几个人，那里也是他们几个人，因此“救亡专家”的头衔〈衔〉就送上门来了；⑤新干部没有经验，秘密工作的技术不够。

(三) 经验教训

1、同志们的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领导机关的同志最好是找职业的掩护，万一不能或不便找职业时，佃房子住也要有一定适当的名义，找适当的铺保或证明人，自己带适当的证明文件。

2、在路上走动或巡视工作时，必须要带与自己身份相适合的证明文件及行旅（李），并约定与自己证明文件相适合的来去地点。行动的时候，不要带秘密文件在身上。

3、对新同志加以秘密工作技术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一般秘密工作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4、集合四、五个人在一起开会时，除了找得适当的地点以外，同时还要利用适当的娱乐，以防万一有人碰来。

5、党的组织应当隐蔽在群众中。

6、应当派忠实沉着的同志到国民〔党〕内部去做情报工作。

7、暴露干部的原因，也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

九、各地党破坏、叛变的情形

(一) 破坏的经过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溆浦劣绅武耐文的卫兵被人暗杀了，国

国民党即乘机陷害，将我们县委湛鸿章、翟根甲及党员湛炽逮捕入狱，并加以“组织青、红帮，抗日打游击”的罪名。当时党即动员社会力量担保，特别是教育局长龚励初出面说话（因为他在溆浦很有地位，同县长好，被捕三同志都是他的属员），当即保释了湛炽和湛鸿章两同志，翟根甲，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肯释放。于是党即公开翟根甲的面目，告知省委，要办事处从上面去交涉。至长沙大火时，溆浦党又公开了湛鸿章同志。那时，又乘社会激动的机会，动员社会力量公开向党政当局交涉，并得最有威望的绅士陈霞龄的援助；同时，暗杀武耐文卫兵之凶犯已捕获，国民党无口可藉，在社会舆论的压迫下，乃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县长解职时释放翟根甲同志。当县委同志被捕时，二区区委即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准备攻城，党虽然立即制止了他们的行动，但政府已从外面调兵来围剿，结果区委书记裴宥德战死，其余四十多个同志则逃散隐蔽而失掉了联系。

一九三九年二月，溆浦县委组织干事刘跃舟又被国民党误以“收编匪部，组织民先队”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今未放。

一九三九年五月，辰溪县自卫团长陈策（华暄）同志被宪兵逮捕，并解散自卫团。当时曾动员辰溪大部份力量（即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在表面也具名担保）及湘西一些官绅出面保释，但结果无效，至今未放。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沅陵军政部制革厂张国良同志又被宪兵逮捕，现在情况未明……^②。

（二）国民党破坏我们的方式及我们的对策

国民党破坏我们的方式，在湘西已经发现的大概分为明暗两

^②此处编者删去约四百六十余字，主要为叛变、腐化等方面举例。

类。明的方面：①藉故逮捕我们的同志。②暗杀我们的同志。③威胁和利诱。暗的方面：①派人打进我们的组织，争取地位做内线工作。②秘密侦查我们的行动和联系，暂时不惊动我们；准备必要时一网打尽。③秘密诱惑我们的党员自守〈首〉，回头来做特务工作。我们的对策是：①站稳自己的立场和行动，使国民党无口可藉，揭破国民党的阴谋，以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援助，以正当的理由动员社会力量来援救被捕同志。②把红的同志调开隐藏起来；提高同志的警惕性，每个人注意自己的行动，不给国民党以暗袭的机会。③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准和阶级意识；清洗党内动摇妥协的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挂名的党员；提高新党员的入党条件。④严格审查党员及干部，清洗来历不明和行动诡密的奸细、异己分子。⑤把组织单位划小，不许在会议以外谈论党内问题，不许随便接头，不许同红的同志通来往，不许在信件内谈论政治问题（即党所规定的秘密工作条例）。⑥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的分开，并进行一般秘密工作技术的教育。

（三）教训

- 1、国民党随时都想而且随时都进行消灭我们的组织。
- 2、国民党向我们的进攻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各种方式相互配合的。我们的同志大都只注意国民党明的进攻，而不大警惕他暗地的来破坏。
- 3、反对国民党公开的逮捕，最好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群众的力量，以各种合法方式（指目前大后方而言）去进行斗争。
- 4、应当把反奸细斗争做为全党的经常工作去进行。
- 5、对叛变自守〈首〉投机份子的处置（开除党籍或停止党

籍的），应当不让他自己知道，在党外少打击他，以争取他少起一点破坏作用。

十、群众工作

（一）群众工作发生、发展的过程

湘西的群众工作，大概分为三个时期：从“七·七”抗战到长沙大火前是开始创立时期；从长沙大火后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央军深入湘西，“剿匪”工作初步完成前是发展时期；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是消沉时期。

初创时的群众工作，大都是一些进步青年自发的组织小规模时事座谈会、讨论会等，进行谈论国内外局势和某些进步理论。国民党对于这些组织，一般的是采取放任态度，有时甚至还加以赞助。我们虽然有个别同志参加在内面起些作用，但还谈不上有计划的领导。不过在溆浦群众工作一开始就发展很快：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在县政府领导下组织了二十余人的“抗敌宣传队”，挨保到农村去宣传，发动民众参加抗战，走遍了溆浦六分之五的地区，很得到党政各机关及民众的赞许，到一九三七年底任务完毕后取消。这一团体虽然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但因有一部分进步青年参加，收效很大。同时，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间，有部〔分〕积极的青年则着手组织“呼声社”，不到三个月，参加的社员将近三百青年，并发行《呼声报》，很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

《呼声报》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编辑部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同志。不过当时只注意报纸，而没有好好的将社员组织起来，这是很大的错误与损失。国民党对“呼声社”和《呼声报》是非常痛恨的，他开始《溆浦民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同我们对抗，结果使他

遭到严重的失败（这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好），因此他恼羞成怒，限制我们的登记。但我们是由中间份子的绅士周甘泉担任社长，出面登记，并设法取得县政府的援助，但没有取得中央宣传部的登记证。到环境变坏时，周甘泉则害怕而辞社长职，国民党终于勒令停刊和解散“呼声社”。一九三七年底，溆浦还有一个“抗敌音乐会”，由太厦大学的学生丁汝康领导组织的，有会员五、六十人。因为丁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同国民党有些来往，所以我们很左的表示看他不起，没有同他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大大的错误。为预防“呼声社”被解散计，我们还通过党政当局（备案）成立了“溆浦学术研究会”，参加的会员达百余人，且有一部分是国民党的下层党员。由于我们的同志在内面把持了领导权（将几个股长的位置都占了），而在讨论会、研究会中间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太高，不合一般群众的水平，每次开会又几乎都是我们的同志和几个有名的绅士包办发言，因此，群众对它不感兴趣。

自从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许多机关、学校、难民都迁来湘西，这影响了湘西的人民和激动了他们的救亡情绪，而一般爱国人士都纷纷谈论怎样对付敌人的进攻湘西。于是在我们同志的推动下，把过去那些狭隘的（如座谈会等）小组织，乘这一高潮的机会都扩大起来了。在乾城就成立了两百多人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凤凰也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战时青年服务团”；辰溪也组织了约近一百人的“战时青年服务团”；泸溪则有各机关团体联合的扩大座谈会、话剧社、救亡小图书室以及常德中学的“破浪队”（约八九十人）；浦市的“市民座谈会”约八十余人，“江苏失学青年工读服务团”的“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约三十人；湖南大学的“女同学会”约百余人；沅陵则有“联合座谈会”，“业余歌咏队”，“一致剧社”（外面搬来的）；溆浦则有“溆

浦学术研究会”、“话剧社”、“抗浦晚报社”敌音乐会”、“激)从“呼声报”转变来的)；妇女团体，则激浦、辰溪、泸溪三县各有“县妇女工作委员会”，保靖、沅陵则各有“县妇女会”以及从长沙搬来沅陵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此外，还有湖南省立桃源女中和常德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在我们领导下，对救亡工作也非常努力。所有参加这些团体的群众，大概将近三千人。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帮助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经常的工作大概是：定期召开时事座〔谈〕会，演剧，讲演，出版壁报、画报，募捐及义卖献金，慰劳伤兵，送壮丁上前线，办识字班、训练班等。一般的说来，这时群众工作的发展故〔固〕然有客观的要求，但各地党的组织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上述的群众团体几乎全是我们同志领导的。但在开始发展时，“西工委”对各地党的领导不强，联系不密，以致各地同志在群众团体中表现得很“左”，把每个群众团体差不多都弄红了。不过国民党这时一方面忙于伸张自己(指复兴)的势力进行剿匪，另一方面则看到群情高涨而想利用，故对群众救亡工作一般的是采〔取〕放任态度，但也有个别地方加以限制或援助的。

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央军在湘西各县布置就绪，陈渠珍倒台，剿匪工作初步完成以后，国民党即有计划的进行压制群众工作或群众运动。其所采用的方式是：没有在党政机关备案和非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一律要解散或停止工作。因此，我们一方面争取社会上公正绅士出面领导，向党政备案；另一方面则争取同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合并，并自动的解散那些由进步青年所组织的狭隘的小团体，而参加到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在壁报及报纸上则避免那些左的词句，让国民党检查；在书店里则将我们党内一些书籍(如党章、论政党、支部工作纲要

……)不公开的摆出来,同时还卖一部份国民党内不以攻击共产党为原则的书籍,因此曾将救亡活动延长了一个时期。

(二)目前(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时说的)的群众工作

自从欧战发生以后,国民党则逐渐停止他所领导的群众团体进行工作,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压迫这些团体内的工作人员做他的工具。同时他还进行所谓“扫清残余”的工作,即限制小报、壁报出刊,扣留报章、杂志,封闭书店。至一九三九年底,我们所领导的报纸、壁报、书店都全被封闭了。公开的群众团体虽然在名义上还有辰溪、乾城、凤凰三县的“战时青年服务团”,泸溪、辰溪、溆浦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和沅陵、保靖的“县妇女会”以及湖大的“女同学会”,溆浦的“学术研究会”,但是工作都被限制,不能开展,而且国民党则多方的散布妥协投降的论调,于是群众也很消沉。而我们此后群众工作的方针也有很大的转变:①把主要的群众工作放在工人夜校、民众识字班、保甲工作上,以及利用社会上各种群众斗争(如小学教师要求加薪,中、富农反对苛捐……)去进行活动并领导斗争。②每个同志都利用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去进行较小的灰色的(或秘密的)群众组织(如结拜兄弟、“放会”和各种学术团体等),以团结一部份群众,准备将来有机会时再把它扩大。③不放松国民党想利用群众的机会,去进行群众救亡工作。我们对各种群众的策略各自不同,如对中小学教员,则同情他们目前的生活困难,鼓励和援助他们进行加薪、减课运动,在斗争过程中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的困难与现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腐化官僚政客压迫剥削发国难财的关系,以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对兵役制,我们则首先说明日寇侵略中国的原因和中国抗战的必

要与前途，以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再揭破兵役制内面的种种黑幕，坚决反对腐化分子借征兵发财和捆绑壮丁上前线的现象，并鼓励和领导适龄壮丁争取抽签时的平等与民主。鼓励和援助出征军人家属争取政府优待条例的实现。对哥老会的策略则各地不大相同，有利用他上层的关系而进行下层政治工作的；有专门进行他下层工作而孤立他的上层领袖，以瓦解他的组织；有时也同他建立统一战线而互不侵犯。这些都要看我们主观的力量和客观环境为转移，不过目前我们的基本方针不是打击他而是争取他抗战。今天争取群众的最好方法，是鼓励和帮助群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合法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替他们贡献意见，指示方针，抓紧反动分子使群众不满的地方，来教育群众，并帮助他们为进行斗争而组织起来，以达到斗争的胜利和争取群众的目的。如《呼声报》开始揭破社会黑暗，反对贪污，并鼓励人民进行合法的反贪污斗争。在各方面援助他们，结果许多群众斗争得到胜利。因此，不仅《呼声报》的地位和影响提高与扩大了，而且《呼声报》差不多成为被压迫群众的顾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很远的跑到报馆来商量，“呼声社”的社员也因之增加。

（三）群众斗争与群众要求

我们所经过群众斗争，有工人的要求改善生活和补发路费的斗争；有农民反贪污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有人民反征兵不平和黑暗的斗争；有小学教员进行加薪减课的斗争；有学生反对校方拿汉奸言论施教的斗争。其所采用的方式是：首先暗地里收集确实的证据结合进行斗争的群众，再依合法的手续向当局请愿；同时将这些证据向社会上公布，以争取公正人士的同情和援助；加强报纸上的宣传作用，造成舆论对腐化反动分子的攻击；而且要

多方面向群众进行鼓动工作，争取同情者参加斗争，扩大自己的力量。斗争的结果，大都得到大部份或全部的胜利，失败的比较少。因此，我们得到一些经验：①目前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进行群众斗争，最好在筹备时保守秘密，等到把力量团结好，证据充足以后，再以合法公开方式向当局去请愿或诉讼。②在斗争过程中要扩大宣传与鼓动，以争取社会上公正人士的同情和援助，争取后备力量来参加斗争，而且随时要注意团结自己的力量，鼓励和提高斗争情绪，以免一部分人发生疲倦、消沉的现象。③在斗争过程中要严防敌人的收买政策和分化阴谋，以巩固自己的阵容。④进行合法斗争时，我们的同志最好是不要把名字列在呈文的最前面，以防遭受国民党及对方事后的打击。⑤进行斗争最好不要从单方面着手，应当有人发动，同时还准备人来响应。⑥应当注意在斗争中教育与组织群众。⑦应随时注意客观环境的变动和主观的情绪，使斗争适可而止。群众主要的要求是，怎样达到自己利益的愿望和解决自己困难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帮助他们争取切身的利益和解决困难问题，但也防止个人利益超出团体利益之上的行动。在群众团体和群众斗争中，他们对民主的要求比较高，我们则尽量发扬民主，避免包办，养成群众的民主生活。可是，我们有很多下层同志对于发扬民主做得非常不够。

十一、统一战线

(一) 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态度及我之对策

在抗战初期，顽固分子对我们虽然表示痛恨，还不敢采取什么积〔极〕行动，那时我们由于策略上的错误，不仅是不好好的去争取他们抗战，而且时常都威胁、刺激或打击他们，以致象淑

浦曾有一个时期，使他们惶恐不安，而借故来陷害我们。当我们纠正这一错误以后，才开始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复兴社的势力正伸入湘西，而同CC明争暗斗。因为复兴社没有基础，有时想利用群众发展自己的力量，我们曾同他建立过统一战线，一道发动救亡工作，但对他们两者之间的斗争，一般的是采〔取〕放任态度，有时也给以某种程度的调解，这要看对工作有利与否为转移。环境转变以后，顽固分子即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对策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在群众面前揭破顽固分子阴谋，使一般的顽固派在群众压力之下暂时不敢积极的反动，孤立和打击那些不可救药的最顽固的分子，抓紧他们在社会上坏的行为而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不仅在群众面前失掉威信，而且要在一般的顽固分子面前，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失掉威信，使他们丧失社会地位而变为孤家寡人。

（二）中间分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对他们的策略如何？

中间分子大都是些机关上的职员，工程界的职员，自由职业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退伍军官，大部分的青年学生，一部份的中农、富农以及社会上的公正人士和一部份国民党的下层党员。我们则根据他们各自的生活与地位以及他们各自与国民党的矛盾，同他们建立各种不同的统一战线，经常分配同志去进行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为达到某一目的与他建立斗争的统一战线，在斗争过程中教育他，影响他，以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不过我们计划的进行争取中间分子的工作还相当的不够。

（三）统战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办法

1、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防止“左”的（如看不起生活习

惯上不好的分子，不区分顽固分子的顽固程度，有事同别人去商量，无事则不通来往……）和“右”的（如随波逐流，跟着别人腐化，做别人的尾巴，只同上层混来混去而不通过他们去进行下层工作……）倾向。

2、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不能把他限制在某些狭隘的圈子里，但也要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对象，拿大部分力量去抓紧主要的对象，但也不放弃次要的对象。

3、进行统一战线时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情况，分清各阶层各集团各个人间的矛盾，要抓紧他们任何一点小的矛盾而进行工作。

4、应当经常的有计划的分配同志去进行各集团各个人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

5、进行统战工作时，特别要注意争取那些有群众拥护和有社会地位的中间分子。

附：关于中心县的工作报告，因为我到那里的时间不久，一方面忙于建立机关，一方面宣传部长涂国林〔良〕在我离开前一个星期才来，所以对于整个工〔作〕情形还没有讨论过，并且前一届负责同志离开时又没有工作检讨与总结，我们还须重新分途到下面去了解情况，因此那里过去的工作情形，我不大清楚，只粗枝大叶的知道一点。

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工作报告

(一九三九年) ①

1、政治状况

湖北、常、益、桃、汉、沅、澧、临七县，位于洞庭湖滨，是敌人时刻想利用汽艇捣乱之地，也是大革命时代斗争最剧烈的战区。因此，那儿的政治状况是随着战局变化的。现在分作湘北战局前和战局后写下。

(一)在湘北战局前七县政治状况

在这几县的县政府和县党部，常因领导民众抗战团体发生冲突。县政府都是复兴〔社〕的，对民众团体比较开放；县党部内有老CC、新CC，除他们自己有冲突外，对付开明的县长和限制群众团体的活动是一直〈致〉的。例如，汉寿县长在“七·七”为着帮助宣传基站出特刊，组织宣传队，批准了经费六十元，县党部就怀疑县长不是复兴社的。沅江县长与政训处为着组织战时服务团与党部大起冲突，甚至县党部向省党部告政训处长是共党。

当那个时候，三青团还只有常德、益阳、澧县有组织。在常德，三青团与党部是有冲突的。益阳的三青团和党部是一致的，

①此文年代系编者考证。

因为益阳是三青团的总队部处。还有一个反动组织“十人团”（是何键统治下遗留下的，又叫架子团），首领曹明阵，有枪数千，党羽散布在南县，沅江，宁乡都有。旧的反动势力很大，过去十年就是专对付我们的。在抗战开始，想收罗一些枪枝，准备敌人来了组织滨湖县份伪政权；与县党部有关系，因此他在益阳可以左右一切；与当地驻军四十三师及县政府常起冲突，并劫抢了四十三师枪一次。在澧县，小派别虽很多，主要的还是CC势力大。在这时，一般说来，县政府比县党部是进步的，主张帮助抗战工作团体的。我们在这时候，帮助县政府及各公开的团体做了以下几点工作：

（1）在常德总工会筹备处与三青团合办了一次工人训练班（主要的是训练工人，敌人来了不逃跑，组织游击队）。

（2）帮助四十三师及县政府发动民众起来，除掉了汉奸曹明阵。

（3）汉寿宣传基站与县政府合作，出了“七·七”专刊，组织了一星期宣传队。

（4）沅江服务团在反汪大会上，打击了省党部特派员余焕生在县党部报告中“汪不是真正的投降”袒护汉奸的言词。

（二）湘北战局结束后的政治状况

三青团各县都有了组织，在民众团体内及学校活动得很厉害。他们的工作是，抓住民众团体的领导，如象益阳对总工会特别抓得紧，要工人加入三青团。常德的三青团也同党部没有什么冲突了。对于比较进步的县长、民运指导处及驻军中的政治工作的人员特别打击，如控告沅江县长对训练保、甲长不负责，提议撤换五十师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这时候，他们共同起来阻碍群

众团体的发展，在各县增加特务机关，凡是比较积极点做抗战工作的，就认为有我们的领导，特别监视。他们现在所有特务人员，若是对于某个可怀疑的人及团体积极一点工作的人，他就同他谈些进步的话：八路军是真正抗战的，他很敬佩，他也想去。我们的同志没有政治警觉性的，就中了他的计，如像沅江这次被捕了五个同志就是这样。并听说沅江县党部现在印了七、八百份自首书，准备大批捉拿我们的党员。这在其他县份，也在准备。目前，滨湖几县的政治环境也在一天一天恶劣化。

二、组织状况

从扩大会后，在组织上就着重巩固与严密组织。在常益中心县委特别要严密组织。因为，过去益、沅、澧三县发展组织时，差不多部分的是由八路军名义号召加入的，有些旧同志也没有经过长期的考察而恢复的。在这一时期，是着重整理及改造领导机关。

中心县委下面，有两个正式县委：常德、益阳；两个县工委：汉寿、沅江。澧县工委，因有自首分子在内，同时负责责任的同志过去失掉了几张入党表，他们公开、秘密工作混在一团，失掉了的入党表被当地警察拾得送到县党部，党部就把填表的人捕去了。在这样危险情形下，中心县委就决定把澧县工委解散，保存个别同志的关系，经过长期考察后，重新建立组织。

临澧只有从抗大回来的两个同志在那儿创造工作，因他们的工作较“左”，一直到现在才把他们“左”的现象转过来。可是他们从“左”的方式中暴露了面目，组织上一直到现在还没建立基础。

桃源地区的同志流动性大，到现在才在本地生根，建立起一

个特支。

党员数目：在整理后到现在实数共计六百二十九人——益阳二百九十人；常德七十八人；汉〔寿〕一百零五人；沅江一百五十人；桃源十一人；临澧五人。澧县未算。

党员成分：百分之六十五是农民；百分之十五是工人；百分之二十是小商人及知识分子。

干部数目：县一级十五人；区一级三十五人。县一级干部大半是老同志，每县委差不多平均都占两个老同志；区一级的干部大半是新提拔的。县委干部成份，工农占多数，如益阳县委有两个农民，常德县委有两个工人。一般说来，在县一级的新干部理论方面较好，工作经验和领导方式表现有些不切实。如小白、余克伦、小李在常德、益阳时，常常只顾自己做冗长的政治报〔告〕或传达上级的指示，报告完了也不领导同志们讨论，就写一个工作计划交给区委同志，区委同志常不知道怎样实现计划，弄得检查工作时还是一纸计划。老干部呢，理论水平较差，不大努力学习，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常把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忽视。

支部生活虽在扩大会后在各县来了个转变，可是各地还表现得不健全得很，经常支部会只有大部分、汉寿少部分、益阳三分之一能够开会外，其余都很难开会，甚至沅江还有把支部会当成党员大会的形式。支部讨论的问题倒比以前进步一些，能够配合当地发生事件及响应政府的抗战工作，如挖公路、抢收、战局紧张时怎样疏散人口及储藏谷米等等。这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支部活动另有一页在后）。

秘密工作，接到上级的指示时，提到各县，各区及支部专门讨论，并具体的提出秘密工作的“四不五要”的条件，供给支部同志作材料讨论，并由支部检查同志执行的程度。但还是有许多

同志一时不能转变，每个同志嘴巴里都会喊了，可是做起事来就忘掉了。现在，已在用每个检查的方法〔检查〕每个同志，用一种纪律上制裁、把暴露了的同志分开、绝禁横的关系慢慢来转变。

三、各县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益阳总工会，常德总工会筹备处，汉寿总工会，汉寿妇女会。

益阳总工会的成立，完全是我们的推动。所有下面四十几个〔个行〕业分工会，都是我们同志活动建立的，到总工会成立时，我们工会工作的新同志陈大刚被选为总务理事，老工会同志王琪被选为组织股副理事。常德总工会我们也有四个同志任筹备主任。汉寿总工会我们也有两个同志在里面当理事。

益阳总工会有会员二万余，里面组织的运输队、担架队在益阳惨炸后，担架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常德总工会筹备处在“五·一”劳动节召集了群众大会，组织了一礼拜的宣传队，在群众中起了相当影响，不过，这些工作方式在常德工会筹备处是过“左”了一点，以致影响到现在还不能成立总工会。汉寿总工会发动了群众积极破坏公路，并帮助军队在一星期内建筑了公（工）事。这些工作都是县政府及驻军、三青团所称赞的，同时也是他们所注目的。从此，三青团特别抓紧工会工作，要担负工会工作的负责人加入三青团。因此，益阳总工会理事×××^①由组织决定他加入了三青团，加入之后，因×^②是新同志，在政治上还不坚定，常常有许多问题不能从政治上批评三青团，受了他们的威胁就跟着他跑。我们的老同志××^③不能指示出×的加入〔三青〕团。

①、②、③姓名系编者略去。

后，要拿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推动他们进步，批评他们的缺点才是对的，而不能这样做，只是生气，要退出工会。中心县委见这种现象严重，我们的群众基础将来会被他们拆倒台，马上帮助益阳县委讨论目前对三青团应付〔办〕法及总工会今后的工作：第一，对付三青团是站在抗战原则上进行工会统一；第二，我们今后着重在各分工会建立我们的基础，使每个分工会有支部起核心作用，对×××^①还是拉着他，严厉批评×××^②同志不能坚定同志及教育同志的缺点及〔要〕退出工会的错误，给他的任务要他即刻到工会去执行。不过他的工作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执行任务也很慢。今后，益阳要经常的注意工会工作，并帮助工会同志解决一切困难问题。

汉寿妇女会由我们的同志领导与当地驻军合办了战时妇女训练班，学生六十人，并办了五个民众夜校，完全是妇女。领导民众夜校的妇女去慰劳四十三〔师〕后方医院，为他们洗了两天衣服，很得到他们的信仰。

有我们关系的学校：常德静心中学，益阳蔚南女中、农村师范、作育学校。这些学校，在宣〔传〕反汪、反对妥协〔方面〕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农师投了文章在益阳《民报》发表，并募了草鞋几千双慰劳四十三师兵士帮助秋收。蔚南在益阳惨炸后，在益阳《民报》上发表了告同胞书，并驳复了敌机散发的无耻传单。两校在“双十节”及庆祝湘北胜利开了群众大会，出了壁报，组织了宣传队。作育学校在“双十节”用恳亲会方式，召集学生家长及当地的军民由小学生排演活报剧，形容日寇的残酷及反对妥协投降，要军民联合起来，保卫家乡，参加人个个喊好。静心也出了壁报，组织了宣传队。这都加强了民众抗战的信心。

①、②姓名系编者略去。

四、经验与教训

- 1、提高政治警觉性。这次沅江同志的被捕可作铁的教训。
- 2、群众团体的工作要注意到我们基础的建立，尤其是工会。这次益阳的工会事件，可以作今后的教训。
- 3、严密党的组织，要着重检查同志的社会关系及思想问题。过去，沅江区委×××^①叛变，就是因为他加入组织想到八路军做官，没有做着官，就叛变了。同时，新党员要加紧阶级教育及对组织上的认识。
- 4、提拔干部要注意他的对党忠实及政治坚定性，从各方面详细考察。如益阳提拔的×××^②，沅江提拔的×××^③。可作铁的教训。
- 5、在工作上必须帮助军队及政府捉拿反动势力的汉奸，这次益阳就是好例。因为发〔动〕群众除掉了反动首领曹明阵，到政局变动的时候就没有那样来压迫的厉害。
- 6、学校关系必须多多建立，因为有同志在里面领导，可以帮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这次学校做的宣传工作对民众影响很大。

五、支部活动

益阳农师支部利用讲前面〈线〉抗战消〔息〕及抗战故事，接近农民群众。如秋收时，军队帮助收获，当时许多农民都怕军队。

①、②、③姓名系编者略去。

不愿请他们，经过支部同志解释这是一种军民合作的形式，告诉他们同在一田工作时，就说军民联合起来抗战的意义，以后他们同军队的关系弄得很好。秋天时疫厉害，军队中许多人病了，农民就募钱买些菜送给他们。因此，这支部就团结了一部分群众。

白乐区农民支部和汉寿西乡农民支部抓住今年暑天时疫问题讨论，发动群众请政府派人下乡打防疫针。经过打针后，在乡下减少了一些疾病，以后那里的男女群众都对我们的同志讲的话相信。

常德后乡民众书店支部利用教旧书的方式，组织了一个读书班。

这算是几个有群众的模范支部，其余支部都不善于在群众中活动。如兰溪区支部见到群众政治问题及募捐问题，弄得一般群众都不愿见他们了^①。许多支部都犯脱离群众现象的错误。

^①原文如此。

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给周意的信*

(一九三九年四月) ①

周意同志：

四〔月〕十一日来信收悉，兹有以下的覆示：

一、战况——目前敌人采用两个主力作战，一在西北，一在华中。自南昌失守后，敌人策应岳、平线正面的进攻，积极沿湘赣公路向长沙及株洲推进，企图占领粤汉全线，继续进取桂林，联结华南与华中的各个战区，进行割离华中各地，威胁我抗战的大后方，截断我西南国际路线，使我江、浙及广东、福建等广大的东南地区从大后方割离开来。然后利用民族败类之汉奸、托派脱离我政府的领导，而实现“以华制华”的毒计，更使我东南战场上坚持抗战的国军同中央分割开来。为了停止敌之进攻，使抗战迅速转入相持阶段，粉碎敌人这一企图，赣西北的同志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努力下面的工作。

二、你们是处在湘赣与粤汉两条铁路之间，依据于目前华中的战争情况，在不久的将来，有成为直接战区的非常可能。然而现在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将万分紧迫的参加动员工作松懈起来。尤其一部分民族败类秉承日寇的意旨，进行挑拨离间，企

*原文无标题亦无作者。

①时间系编者考证。

图破坏我国内部团结。加之，由于过去十年的残酷内战，很多顽固分子尚存着深刻的成见。因此，在战争更加吃紧和逼近时，环境内会更紊乱。这时，一方面某些人有可能假借抗日名义树立部队，扰乱地方秩序，只顾个人升官发财。另一方面趁着环境的紊乱，可能发生在一些地方给我×组织和干部更大危害。因此，可见在现时即应加强党内的教育，一切违反抗战利益的任何部队均不得参加，并领导群众一致拒绝。同时告诉每个干部和同志随时提高自己的政治警觉，避免一切不必有的损失和牺牲。这是对长期抗战最为重要的问题。

三、在目前形势下，你们必须把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参战动员为中心。这必须：

第一，教育每个干部和同志，首先自己化除成见，以极诚恳的态度，帮助政府各种动员工作。用具体的工作表现，去取得当局的信仰，细心而耐烦的去与同盟者共商。不怕碰钉子，不怕麻烦，与同盟者共同工作。今天，不管他同情共产主义与否（如叛徒等），只要是抗日的，都要去与他联络及推动他。

第二，推动中间和同情分子去建立上层统战工作，同时更要注意争取学生知识分子成为开展统一战线桥梁。你处正因不注意发展知识分子及学生，恰恰是妨碍了统战的开展。

第三，要克服以为没有公开机关或公开的人就不能进行统战工作〔的〕倾向。只有细心研究各地环境，寻找各种有利机会，从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方法下，把统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第四，要使统一战线的开展，必须有广大的民众运动。你们要依据现有的基础，积极建立各种合法民众组织，并使这些组织热烈参加一切抗战工作，特别是涌进到军队中去，使部队继续补充起来。

第五，巩固并扩大×的组织，是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你处党的组织，现在应着重于原有组织整理教育，在尚没有组织的地区，应积极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粤汉、湘赣沿线），以便加强统战工作的领导。

第六，准备游击战争的干部，调查和单个训练，派遣到各部队中去，加强游击工作的领导作用。

四、来信几个问题的答复：

（一）□委委员照所补充的批准，但应仍任原有工作，以免下层工作的停顿。

（二）刘、胡二同志即由你们直接介绍去前方。刘的老婆是否能在前方担任部分工作？否则恐有困难。如刘不愿将她留你处时，可介绍回去。

（三）攸县事件和茶陵摩擦问题，除我们再向徐特立同志商量，要他再去省政府交涉外，你们应依我们原有指示坚决执行。

（四）颜富华同志请即介绍来我处（平江嘉义）。

（五）五月份的经费待我们去领，请派一妥（当）人到醴陵×××来等，以便〔联〕络拨交你们。

（六）办事处尚未到吉安，将来有到吉驻扎〔的〕可能。

（七）你们必须与赣西北建立密切的交通联络，可由你们派人与他们直接商讨交通工作的进行。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八月)

一、湖南政治经济形势

(一) 战局发展中之湖南前途

整个战局已日益进入更艰难的阶段，而去年湘北战争后，一直在敌人威胁下，时紧时松。最近，宜、沙失守，袭击洞庭沿岸的积极，敌人要进占长、潭的谣传又起，显然的已可能为了重庆的目标而作侧翼攻击。这消极方面说，可阻止湘北的出击与夺取洞庭湖米粮；积极方面更可准备着遂行它打通粤汉、割断西南与东南之一贯企图。但就湖南对战争准备上说，只要敌人真要进占长、潭的话，击溃敌人的进攻，那是完全无把握。因而，洞庭沿岸的全部被丧失，白水咽喉为其所控制，整个湖南领域之为其分裂正严重的威胁着我们。

(二) 薛岳之治湘方针与实施

依据湖南在战争中所处地位及其所受之威胁，无疑的湖南的

*原文标题：“湖南工作报告”。

当政者应该如何改进政治、加紧战争的动员与实际准备，然而薛岳不此为图，却狂叫其“安”、“便”、“足”治湘之三大方案。它的具体解释为：除匪肃奸以求安，发展交通以求便，生产屯储以求衣食足。除肃奸的实际内容完全对付我们之外，概略的来叙述所谓三大方案之实施：

1. 首先是排除异己。〔薛〕一上台便是调换县长，并逐渐撤销张治中时干训班出来之乡、保长，而代以他自己系统下之爪牙。这在各县曾经引起不少的纷扰与核〔劾〕诉，但薛却曾以贪污不法等罪名抢夺排除之。

2. 藉抢运粮食以低价重购谷米。抢运是必要，然而以最低价购一般农民之惟一产品，这不能不是罪恶。为了自己的赚钱，强制的不准农民私卖，不准他人的贩运，这不能不引起农民的愤怒与反抗。当今看战局一度紧急，谷米强购快完，才解除这一号召。为了□□农民不满，便趁此奖励自由装运后方。

3. 统制食盐。在这一政令下，便有所谓严查户口，计口售盐的办〔法〕，所有盐行均由政府装运与分配。由于政府机构之腐败，贪污狂隐之事便随此而普遍的发生，几乎每一农村角落都闹过。最主要的是省、县级之政府人员私自买卖，便大发财，而民间则是口无数次的计，而食盐都是几个月的不见售，弄得完全淡食。有时以二元、三元一斤的高价，可买到政府私自卖出之盐，能辗转装运至转〔卖〕者则是大量利用粉掺砂石。为着食盐，骂政府者有之，控告县长、保长有之，包围或捣毁政府机关的有之，几百几千人抢劫盐船者有之，几乎没有不骂政府的老百姓。

4. 强拉壮丁充当兵役。湖南役政中一样是贫苦工农吃亏，只要你家有男子，他可不依法的给你一征三征^①。一般富裕有来

^①原文如此。

路的，都以隐瞒人口、做公务员、进学校（读书或当教职员）等各种方法来避免兵役，政府从“计口售盐”才发现富裕家隐瞒壮丁数之惊人。当各级政府无法解决此困难而又必须应上峰命令时，便是督促各保按户口（也有按田者）集资买壮丁。现在壮丁的一般买价为六十元至一百二十元，急需时或富家统买壮丁代替子侄之兵役，亦有二百至三百元的，这是普遍的现象。除此便是武装强拉。再拉不到时，便是假着召集会议为名，鸣锣集众，然后围而捆之。长沙尚有此现象，其他可想而知。由于役政之严重，愈增了入征后之逃跑，湘中各县之许多船夫、轿夫不少是卖出入伍后，然后有跑至二、三〔次〕者。

5. 其它水上交通，无论军运、粮运、盐运及机关人员一切私人东西之转运，无不是掠掳民船，给食不给资，亦有根本不给者，弄得各水上游船只不敢下行，商运叫苦连天。机关、军队贩运仇货更是公开的秘密，潭、衡商人常以此来回答别人对他贩运仇货的责难。据闻，九战区司令有三十几辆专作生意的汽车，盐运处亦有十余辆。

6. 为了打击进步言论与阻止政府黑暗之传播，报纸不少曾为此受过指责或停刊处分者。近来，为进一步的钳制舆论，更采取对报纸的整理与统制。

假如湖南要说还有可取的政绩的话，那便是湘北、长潭一带公路、土路之毁得彻底。最近来开始进行之国民兵团似尚认真。除此，便是薛部常吹之湘北战争了。

（三）民众生活与民众对抗战信心

湖南物价虽比重庆为廉，然而比起去年同时期的物价，则高涨到两倍以上了。目前，米是十八、九元一石，肉是四、五角一

斤，煤是二、四元一石，其它外来物品则是涨得更高，特别是所有物价都在一天天增涨中。对一般人民物价并不特别重，但也不轻，如保甲长办公捐、壮丁安家捐、各种慰劳捐、保长甲长受训捐、甲长制服费等。而劳动力与某些土货则提不高价，至于出征家属人口多的更是叫苦。正因为生活的日益艰难，使得汉奸的活动起得某些作用，尤其是当汉奸对下层人民中宣传汉口物价低廉时，能引起他们的幻想，有的甚至走上对战争厌恶，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绝大多数的人民对抗战的胜利是坚信的，这由百数万男女老幼日夜积极参加毁路的工作中可看做〔到〕湖北战争时不少人民积极准备参加游击中可以看到，凡是欢送出征壮丁或军队重上前线时一般人民特别踊跃与输将可看到。但是，政治上不改进，人民生活不改善，不从政治上加强人民的信心，在敌人进攻湖南时，将产生严重的局面。

（四）湖南之民众运动

首先必须来谈谈国民党在湖南民运方针，然后便利于看湖南民运之过去与现在。他的民运方针是什么？1. 要绝对保证国民党的控制，团体的基本干部必须加入党或团，否则便解散或不准成立。2. 积极的建立各业公〈工〉会，便是由原有之基础乃〈召〉集大会，由党部出席会议，选举理事□事，所以每次群众大会除学生外，只见各种公〈工〉会旗帜招展，而公〈工〉会下之群众极少，几个人而已。现在，正在组织的妇指委分会，是以县长太太、书记长以及各机关科长、干事夫人为骨干组成的，市民妇女亦有参加者，由〔于〕国民党妇女干部尚有些要为民族服务的学生份子，所以在某些地区尚有一些作用。

(五) 经济鸟瞰

1. 农村方面：由〔于〕战争影响与今春大旱，有些地区根本就未下种，有的亦因天旱受损，即使最近气候能丰收，亦要少于去年。由于物价高，农村副业都极发展，如猪、鱼、鸡、鸭的喂养均比前增加。沙金的发现，在资水流域与湘北的某些县份，如安化、益阳、汉寿、常德等县，自去年来，各地都有成群的农民淘金，有多至数千人者，每天收入量少者为一元左右。

2. 工业方面：只有辰溪、烟溪之兵工厂系□县迁来者，一般枪炮均能造，工人数为万余名。矿产则有新化锡矿山之锑与常宁水口山，〔工人〕千余人。湘南各县之一些煤矿均因销路缺乏，产量剧减，共约万余工人。手工业方面都是相当发展，特别是纺织业。总之，比抗战前是太大的衰落了。

3. 商业方面：各地城市人口之增加，所以一般的都比以前繁荣些了。特别是衡阳与湘潭，因它交通上的便利，其繁荣是数倍于抗战之前，货物大都自金华或上海来，一般用件是应有尽有，但日货却不少。

4. 交通方面：铁路有粤汉路（系涪口至曲江）、湘桂路（系由衡阳至桂林），两路在湖南境内者一共也不过六、七百里。公路则较多、较长，但不容易买到票，湘西方面之汽车更难乘到。洞庭湖与湘江都还能行驶轮船，一般的说来，湖面的交通还算是比较便利的。

(六) 教育事业

湖南教育就西南各省说，要算是比较发达的。抗战后，由于逃避兵役而办学校者，由于逃避兵役的学生颇多，而趁此赚钱

而办学者；亦有年老教育家为着效力国家而办学者；同志〈时〉外地还迁来了不少的学校，故湖南教育事业抗战后反比前增加。

学校与学生数目，据教〔育〕厅最近的统计材料：中等学校为二百八十余所，内中私立中学最多，计一百一十余所，县立中学九十余所，国立、省立、联立等中学八十几所，学生数目四万到五万。大学校有湖大、江苏银专、北平民国学院等三校，学生数目亦只有四、五百人。小学则无从计算，但就湘乡一县计，就有小学（湘乡为教育最发达之县，高小在内）一千五百多所，小学教员二千九百人。其它湘中各县小学教育亦为相当发达者，尚以此来估计湘中十几县之小学教员，其总数实为惊人。中学大部都散布于中部、西部与西南部，最多的为安化、新化、邵阳、武冈、溆浦、辰溪等县。

学校（指中学）的背景大体可分下列几种：

1. 控制于党棍（或其爪牙）之手者，如省中、临中、安徽八中、国立十中及其他公立学校之一部〔分〕，数目相当大。特别是大多为主要的学校，有左右湖南教育事业之力量。

2. 虽系国民党员，但忠实于教育事业者，如桃中、常中、衡师、楚怡、上梅、蔚南等，数目较少。虽多为次要的学校，但在社会〔上〕信仰颇高，〔在〕湖南教育事业上起极大作用。

3. 专为赚钱或专为支持地方派别中某一系者，此类多私立中学，为数最多。但学校最腐败，最为社会上所不满，无地位，作用极小。

4. 非党员而又忠于教育事业者，如蔚南、上梅、崇德等中学与某些高小所增加之初中部，为数少。在中等学校中的地位平常，但多数与我党有关系。

5. 教会的中等学校为数最少，约十余所，学生人数两三千

名。

国民党反动的教育政策是什么呢？

1. 学校中所有的教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学生自治会的委员及班代表等必须加入三青团，否则免职或不准参加自治会。

2. 禁止阅读左倾书籍，以所谓唯生论哲学来教育学生思想。

3. 控制教育厅的津贴，强迫执行其政策，发给津贴之迟与早或多与少，均确定于他对学校政策执行之考绩。

4. 依据三青团建立特务组织。

(七) 国民党、三青团之发展，生活及其内部矛盾

他的发展方向：

所有政治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特别乡、保长必须入党，所有学校（教会学校除外）的教职员，特别〔是〕国立、省立者，各校学生与市民知识青年，武装部队集团入党。

发展现况：

三青团的组织，除很少的偏僻县份尚未建立，最大多数都先后成立了他的分团部。凡是中心的县份其〔团员〕数量都不少，约自一千至两千，特别是衡阳、长沙、邵阳、兰田，其人数更多，约略估计一下，至少有四、五万。这中间以学生与小学教员为最多，兰田的各中学，一般的已有三分之一入团，如建国中学（五百多学生）、文艺中学（千余学生）则几乎是二分之一都入团了；其次为市民、青年（内中流氓、痞子不少）；工人被征收入团者最少（我们所知者益〔阳〕四、五十人，长沙有些）。国民党党员则无从估计，我们只知道大多数乡、保长已入党。中学校教员，虽然曾三番两次的催促入党，但至今还是只有部分的加入，

即国立、省立的学校中亦有未入党者。至于地方部队入党，去年七月，我们曾见长沙保安队三千余人集体宣誓加入。其他地方武装中，当亦有如此者。

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者之动机，就我们所知者，最多的系为维持饭碗或找饭碗不得不加入者；次多的系为□□□无赖或其他企图自动加入者；第三，为朋友强拉无所谓而加入者；第四，民族意识强，要为民族工作自愿加入者，这在学生中还有些。就客观的事实来观察，一部分人对国民党之强征党员表示不满，但真正反抗硬不入者，则是极少极少。

抵抗强征是些什么人呢？一为政见不同，向来反对国民党，同情我党者；一为对政治实无兴趣，且知识技能到处需要，不受饭碗威胁者；一为对我党势力估计极高，天下迟早是共党的，共党来后一定要杀国民党；一为自尊心极高，认强征是有损他人格，对他是侮辱。

他们的组织，三青团比党部好。三青团还有些会议商讨工作，党部则多为书记长个人指挥。三青团有内部教育之定期刊物，内容除组织上一些文章外，大多转载蒋介石与陈诚讲话，虽系组织教育的秘密刊物，但内容颇平凡。由于大量的扩大党、团，无论党、团组织上更为松懈，花天酒地者有之，招摇闯祸者有之，强敲恶索者有之，霸占夺取位置者有之，气焰万丈，纠纷四起，弄得党部、团部不得不再三公开的发出禁止轨外行动的命令，三青团更有监禁与开除处分的事情。

国民党之内部矛盾，首先必须叙述其历史的发展。何键时代，国民党中为两大派，一派为CC，即甲派，它是与乙派斗争中扩展起来的，组织布散于各县，而且深入到农村，力量是相当雄厚的，他们的主要基础为湖南整个教育界，有大部分的县党部

完全掌握在甲派手中，省党部亦占优势。一派为何键派，即乙派，他们的基础为湖南整个的国防系统与长沙及各县之商会，有部分的县党部。自CC于一九二九年侵入湖南后，他们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斗争极激烈。一九三一年震动全中国之“宁案”惨剧，便是甲派与乙派之党争。自后甲派势力不断增长，不过就整个力量总还是乙优于甲。抗战后不久，对比力量便发生基本变动，即甲优于乙。何键离湘，张治中主湘初期，甲派力量有一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各派中的主导力量。

张治中主湘后，随着复兴社的力量便逐渐生长起来。张主办之民训干部班毕业后，复兴社之力量接着便猛烈的发展。乙派首领亦决定将部分之干部加入复兴社，当时复兴社为削弱甲派，亦主要吸收乙部以联乙。直至张离湘，复兴社势力自未超过甲派，但基础绝大多数为下层政治机构中之乡、保长或公务人员，其次便是部队中乙派加〔入〕复兴社者，就复兴社整个力量的比例说并不大。

薛岳主湘后直至现在，国民党之派别为：

1. 薛记的力量最大，其基础在政治机构中为县长，一部自其军队中调充。除省级的外，有一部份县为薛记插入，省党部以薛记为主，甲派削弱。

2. 三青团，这是一个新的力量，其力量多在学校与新闻界中，在政治上还不能起大的作用，在群众运动中作用则大过其他派系。

3. 甲派，其基础已为薛记与三青团所削弱，但在各县党部中与各学校中仍占极大优势，他在教育事业与全省的新闻事业中仍起着决定作用。民运次之。

4. 乙派，它的基础较前更为削弱，仅在湘东各县与公路局

有某种程度之决定作用，省级与其他各县力量可说已是全部崩溃下来。

冲突在哪里？在湖南，我们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策上的不同而争辩、而冲突，主要仍是〔为〕权利、地盘而争夺。当薛岳初入湘时，甲派曾趁机在政治机构中作积〔极〕活动（在乡、保中，甲派、张记的斗争很多），并包围薛岳，各县在政府机关中争取了一些位置，这是甲派的全盛时代。当时，薛岳为准备人员对付张记复兴社（因多在政府与部队中），对甲不得不有些应付与让步。但张记力量大部解决后，转而对南（甲，）甲曾依靠其基础坚决抵抗，而薛亦以果断手段对付。今年三月，长沙县长刘蔚蒸、湘潭县长王纶藉贪污而遭枪决，这在湖南是尽人皆知的薛记与甲〔派〕之争。省党部中之甲派，自书记长及委员大部调重庆，薛岳所力争之军、政、党、国四位一体之目的，现在可以说是大功告成。

甲派与三青团在政权问题与发展组织上亦在各方面发生过尖锐的斗争。在职权上，甲派所坚持的与对外宣传的是父与子的关系，而三青团则坚持为一个父亲的双生子，并又据公开宣称，后者为解决昏庸腐化之前者而组织的。在发展组织中，由秘密进至公开的争夺，亦有加入三青团复加入甲派者。有一时期，一些进步分子曾利用过他们而求得了两方都未加入，即甲强征则答已入三青团，三青团强征则答已入党。在民众运动的领导〔上〕，亦发生许多争执。总之，他们曾经闹过不少笑话，由于薛岳要压抑甲派，所以三青团能占到一些胜利。

在薛与甲斗争剧烈时，乙派首领刘岳厚出任民政厅长之声颇多，显然的，乙派曾为薛努力过一时期，至今他们关系还是不好。

在湖南，甲派的根基非常深，所以历届斗争中他都是被进攻者。薛不离湘时，将来主要的仍为薛记与甲派的对立，其他各条则依附于薛记之下。由于甲派对〈给〉各方印象极坏，他继续削弱的可能很大。

至于对我党之态度，前列几种，前三者最坏，完全一致的来进攻我党，而摩擦文章、通讯、言论，甲派渲染得更广泛。我们从各方面所得污蔑我党之言论，党部系统更多于行政系统。后二者由于力量太小与各方面压力大，对我党及进步分子还敢直接的来往。

(八) 顽固反共分子对我党之进攻

首先，在政治上污蔑我党，那些论调最初只是一般的传播，现在则是在群众大会的演坛中亦可听到了，象省党部仇硕夫、临中校长熊梦飞等亦于演坛中、文章上公开进攻。

其次，便是在机关团体中清查排除我党，如果发现我们的人或可疑分子，便设法或强迫你自首，这在新化、衡山都有过。即使是大革命的老党员，而今天亦无关系者，为了在政治上打击我们，也来一个发宣言与登报脱党。最近，益阳有个×××^①者就是这样做的。自首不成，便强迫你入党，他可以以位置以实权甚至叫你帮他办党来饵诱你。但当入党后，当初当真的给你工作，慢慢的责成你于工作时进行反共，你推脱或滑头，他便为你制造大纲，只要你在群众大会照读就是，你不肯，他便以党的命令来强迫你。常德×××^②原为我区委之书记，国民党见其甚活动能干（或许已被怀疑），对〈劝〉×^③加入国民党，当地党为了

①、②、③姓名系编者略去。

隐蔽组织与开展工作，允许其加入，旋即委为区书记，以后就千方百计的要强奸，我们的同志无法抵抗，便弃职逃跑了，最后还遭他们的通缉。在清查中，我们有些同志是以来历不明而遭辞退。

第三、就是破坏我党、迫害我同志，仍是采用内奸、跟梢、绑架、直接逮捕、暗杀等等办法。至最近，已被捕去同志三十三人，内已有八名被杀，其他尚在监狱。今年六月，邵阳一同志被三青团暗杀，名单、年月另附。

以上为湖南一般的情况，但各地尚有其不同之特点。

在湘西，为湘鄂川黔边区行政公署所统治，政治完全操于宪兵手，县长均已调换为宪兵所介绍之人，军政上更能配合。各地股匪在宪兵的歼灭政策下，已分散为小股了。民运的统治相同。生活条件上湘南（西）〔为〕最困苦之区，文化最落后，民性亦最强悍，对旅客居民亦为检查最严之区，党的基础弱。

在湘北，这里为接近战境的地域，人心不安，政治上亦较松懈，但粮食丰富，人民生活较好。

在湘中，为湖南政府之基本区域，政治紧，人民政治、文化水准较其他地区为最高，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为湖南之精华地。党在此地基础较大，由于红军未经此地，亦非游击区，故关系上较其它地区来得缓和。

在湘南，由于过去为游击区，斗争深入，因而阶级仇深。抗战以来，亦为湖南阶级对立得最厉害之区。政治上较湘西松，人民生活文化水准亦较湘西为好，交通有粤汉铁路，还便利。党的基础大，但散布广，得力的阵地少。

二、组织工作

(一) 工作进行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是去年二月扩大会后到八、九月底，八个月。这时的形势尚不严重，党的任务是深入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与严格执行恩来同志关于提高警觉性，加紧秘密工作之指示。当地党的工作处在开展时期，党的严重处为组织的暴露。

后一时期为去年十月接着中央巩固党的决定时起，至今年六月省委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止，〔共〕九个月。这时的形势急剧的逆转，党的任务是巩固党，首先是组织的隐蔽与党员干部之审查。这时党的严重〔问题〕是在撤退、迁移、隐蔽中发生混乱，党的最大困难是干部恐慌与党的教育之难于进行。

一年半来，党的全部工作便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曲折的变动与曲折的发动着。为了便利于了解湖南工作进行的过程，特先作此简略的说明。

(二) 党的组织概况

党员的最多数量去年曾达五千人。经过洗刷后，今年六月总结时为二千三百人。关于组织的一般情况可参看下列表：

1. 党员统计表（见附表）；
2. 党员散布区域图①；
3. 已撤退离湘或调动之干部一览②；
4. 现在依靠工作干部之一览③。

①因原图模糊不清，校编时编者略去；

②、③原文未见此两项附表。

(三) 组织的隐蔽工作

1. 类似公开机关之撤销：在湖南，不仅省委，即中心县委、区委都有公开半公开机关。这一类的地方大概可分三种：一为各地负责人自己住处或同志家中；一为党所筹设或同志主持之商店、工矿、学校；一为政府所属机关或地方救亡团体，共约三、四十处。去年六月起至十二月止才全部撤销，内中有几个为与组织隔离，或为改头换面或撤离湖南。

2. 红干部的互调与离开湖南：去年六月至今年六月，县级以上之干部几乎全数调动，不过是互相间对调或地区调动而已，共约五、六十人。因太红由省委决定离湘找职业者或由上级调动者三、四十人。决定调时容易，但在执行时便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职业、住处、家庭、路费等。

3. 干部地方化与干部职业化：由于前一时间各地方干部都弄得很红，一时地方化颇不容易，好在只要不是外省人注意的还少，就是外省人，只要有职业，还可以住下，不过来往各县就困难了。真正难于解决的问题倒是各地大批年轻力壮红干部相互对调后隐蔽问题，为了能久住，就必须有一定职业，为了避免作壮丁抽或作逃避兵役的壮丁抓，就必须有不是在役人员的证明。因之，有职有家庭是干部互相调动后迫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各地党一时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十几个小商店、小工厂，省委除王、聂、高均作为店面的贩卖商（长、潭街做这样生意的不少），另外有两个工厂。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是屡战屡败，务必要在商场中插足。取得商业掩护者，不只是由于其他职业难找（党团条件为最大难问题），特别是由于商场中便利于我们隐蔽，便利于我们工作。最困难的是资本金太少，上列各店都是百元至三百元

左右，干部中亦大部不懂做生意，但犹可克服。

（四）党员的审查与清洗

湖南党员数最高数曾经是五千人，今年六月总结时有二千三百人，那二千七百人怎样出党的呢？内中一千一百人未经审查便失去了，大体可分这几类：

第一类，是破坏后找不到关系。计郴州去年十一月东区、南区破坏，区书被捕遭害，县委书记曾两次冒险去找，均因逃走而未找着，丧失同志一百二十余人。耒阳、安仁、桂北为一九三八年底或三九年初，共约丧失同志二百余人。沅陵县去年县工委、区委被捕四人，组织无从恢复，丧失同志百余人。总共约五百人，几乎全都为农民，大都系内战时游击区群众。

第二类，为形势恶化下不愿与党组织见面，自动脱离的。这里最多的为汝城、溆浦、沅江、益阳、长沙等地，共约四百余人，其成份多为地主、富农与知识分子。

第三类，为去年八、九月干部大调动时无人去找而失掉关系的、联系的。这里如锡矿山一百二十余人，兰田五、六十余人，烟溪兵工厂十余人，共约二百人，其成份最多数为工人。

其他一千六百人是怎样审查的呢？

首先，在地区上便确定〔以〕发展最早最迅速而党员、干部最复杂的地区着手。于是，便决定以湘宁为中心，湘南、衡阳两地亦同时进行。为此，便决定老聂往湘宁，老高往湘南，王涛留衡阳。这时下面的巩固清查固重要，但省委本身机关的未稳定，各地交通关系的未健全，领导机关的混乱亦极其严重。所以，同时省委还负有另一重大任务，即建立省委安全的居处，稳定首脑机关，同时解决交通问题。

其次，清查整理时注意的几点：如该地党之创造者，领导机关，各届人选之研究，党员发展情形，工作进行情形，特别关于干部的研究。……①

党员清洗出去有这样几类：

1. 为奸细控制下的一些组〔织〕，不敢轻易接收而被抛弃的，如衡阳约二百人，长沙码头七十人，及其他约三百人。

2. 自首〔分子〕手中发展而又为其领导者，或其领导机关有奸细嫌疑者，以宣布解散，重新登记以解决之。计湘潭五区五、六十人，长沙近郊三、四十人，衡阳铁路支部数人，及其他共百余人。

3. 认为暴露而又复杂者，以停止党的生活隔离之，这样最多的便是铜官七百余人。

4. 认为老实不能为党工作之挂名党员，劝其退居同情地位者，各地均约三、四百人，内中部份的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

湖南党在审查党员、干部问题上，还只能说刚刚开始，有许多地方根本连开始都没有，今天所进行的审查还是上面的，至多是区委。最深入、最可靠之党员审查，惟有依靠支部进行这一工作，然而这还有待于湖南省委之极大努力，尤其是干部方面，更须要重新深入的审查。

（五）党的教育与学习

1. 在一般的党员中系以支部会议来进行教育。教材是《支部工作纲要》、《论新阶级》、《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与其从

①此处编者删去约六百余字，主要系例举一些混入党内异己分子的情况。

《论政党》中摘下来的片断，《共产党人》出版的适合于下级同志的文章，都用复写纸抄送下去。真正深入些的、普遍些的还是前者，但就全党来说，党员参加过讨论会者还不到二分之一。《论新阶段》收到相当效果，除推动工作外，其他所起的作用是很少的。这一工作做得好些的大都是知识分子多些的地方，如湘西、湘乡、长沙等地。

2. 关于干部的训练：自去年十月以来，大都没有办过训练班。一九三九年二月到十月，省委举办过训练县、区干部之训练班六期，人数都是五、六人至十余人者，受训者一共约五十人，湘南特委三、四期，人数约六十人；衡阳两期，人数约六十人；其他各县都是五、六人一期者，大都只办有二、三期。以上为到上级党受训者。至于教员往学生处教课者，后一期大都这样做：教员都是各级执委，往下面巡视工作时，解决工作后选二、三个干部进行一天或两天训练，其课程为出发前在家准备者，教材除《论政党》外，都为党内文件。虽然省委训练者仅六、七十人，特委与中心县训练的亦只有二百余人，但都着重区一级，故现在县级干部大都受过训。区级干部则因新提拔者多，故大都未受训练。

3. 在职干部之自我学习：自接到中央关于干部学习指示后，省委便严格决定了学习的课程，以《论政党》、《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联共党史》为学习课本，依据各自程度来选读。今年“五·五”学习节，又作过学习决定，但是六月检查，我们还没一个地方做得差强人意。省委自身的学习亦如此，虽然决定了二十天一次学习会议，但是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将各人的所看书的意见交换整理过一次。关于学习中困难是：①教材欠缺，就是原有的几本亦分散各地；②找不到学习顾问或指导人；

③秘密条件的限制；④影响学习最大的便是工作的混乱。

今后湖南在职干部之学习，惟有在彻底的改变工作方式后，以各自的读书为主。

（六）秘密工作

我们在秘密工作上最严重的、最普遍的是党的书籍，报纸乱堆，由县委到省委，每个人家里都如此；其次，内部机关来往的人没有严格的限制；第三，好随便通讯；第四，横的关系与不必要的来往。……①

省委曾为此作过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严重的揭示其意义，依据目前形势配合着内战时代之血的教训，加紧进行秘密工作的教育。各中心县委以及某些县级的干部，都曾于解决工作时研究过改善的具体办法，有的还依据省委秘密工作条件，针对着当地现象重新作过决定。同时，对那些破坏或忽视秘密工作者作过严厉斗争，直至纪律上的处分。×××②为遗失秘密文件，曾受到省委最后严重警告并撤销其秘密工作的处分。□□中心县宣传××③不经组织决定而自由通讯，致使许多不必要的同志知道他的所在地。中心县委曾为此展开一次深刻的关于秘密工作的讨论与严格规定。经过半年多来的斗争，书报、文件在领导者的住处是完全不放或深藏的少放了。机关来往人数，通讯与外部关系等，在省委、中心县、特委等领导机关中，一般的都是取得组织决定然后再做，但区级之内部工作人员仍然恶劣。

关于公开与秘密的联系：

1. 内外划分上、省委、中心县、特委大都严格划开，外面

①此处编者删去约一百四十余字，主要说明党内文件两次遗失情况。

②、③姓名系编者略去。

工作的同志不到内部机关来（决定掩护机关之职业同志在外），内部工作的同志亦不到群众团体与政府机关中去，都是经过同志家或其他第三者处联系。

2. 上层活动或上层机关中同志停止会议生活，由该级领导机关分别联系，时间是半年或一月一次。但由于干部的减少，实际上联系，两月或三月一次了，因为事前未有好的告知或计划好工作，这点已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

3. 群众工作的人改正那些畏首畏尾、缩手缩脚的告密举动，力求态度的大方与普通。

4. 停止群众工作上的集中领导（即系党国式的）与统一的活动，这里便利于他人发现党的活动与党的同志，力求由同志分途进行、分途组织、分途联系，以不同的方式去影响群众，这在教员、学生、上层同志中已开始。总之，我们在这样的方针下，改变公开与秘密联系的方式。

秘密工作的教育：

自恩来同志指示后是相当深入的，湘宁、益阳的支部大都讨论过。如益阳白鹿区第一支部在传达了中央巩固党的指示后，讨论秘密工作时便这样决定：除会议外，同志不能三个五个的集合，不准找同志玩耍，不准在村内与同志一道走路，不准穿〈串〉同志的家；同群众谈，同群众玩，同群众走，同群众生〔活〕；集合群众，穿〈串〉群众的家。湘宁的党曾决定过“三不、五要、四努力”，在支部曾广泛的讨论过，并以〔此〕作为检查工作的标准。“三不、五要、四努力”者，即：不与同志发生横的关系，不在会外谈党内事情，不问同志所负的党内工作；要到支部会，要执行决议，要有群众，要缴纳党费，要^①，努力工作，

^①原文脱字。

努力学习文字，努力研究政治理论，努力学习军事。内中或许有一、二错误，但基本精神如此。

（七）支部情况

只知发展时期的支部生活是最差的，大多数的支部是开不成会或根本不开会。有时上级去人召集会议，有的则是找不到人或找而不到，有的则是乌鸦的一大堆，听了报告后乌七八糟的闹一顿就是，至于群众工作，他可有可无。真正主动的找几个朋友有计划的进行民运，这是凤毛麟角的支部。缴纳党费则大多支部中根本没有这一项。为着这现象的严重，省委去年曾严格的规定支部工作三条：即十天开会一次，每同志团结两个群众，按月缴纳党费（免缴者，需经过支部会议）。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与督促，现在情况如此：

1. 会议生活：省委就各地概括统计，三分之二有会议生活，但大部分仍须上级出席才能开成。教员、学生支部一般的比工农支部活跃得多，工农支部中有小学教员者亦比没有的好，能自动开会的大都是这些支部。县、区周围的支部其生活亦是比较健全的。在会议上每次能发言的也只有教员、学生支部，工农支部发言者虽有不断的增加，但哑口无言者依然很多，约占百分之四十。

2. 支部编制前一时期中，支部人数很多，地域亦广，故工作范围异常庞大。特别在湘潭五区、长沙铜官、益阳白鹿、溆浦龙潭、衡阳东、耒阳东等地，这些地方有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后来都改为依据保为单位，其他亦依据情况缩小。中央巩固党指示后，又来次缩编，同一地区、同一学校建立两支部，一般支部现在的人数为六、七人或系四、五人，大的也有十余

人，不过编为三、四组了。建立平行支部的地方，大都是暴露了的地方，或发现有可疑同志的地方，其次便是人数太多，妨碍秘密而编开。怎样编？怎样工作呢？暴露了的同志则编为一支，其他较隐蔽的则编为一支，这些支部的会议，一般的都是很少的，半月或二十天一次。有可疑份子则将可疑份子编开，编为很小，由可靠的同志充当组长或支书。人数多的可据地区划分，一保内有建立两支部者，他们的工作或按公开些与秘密些分，或按上层与下层分，或按班次按甲分。为避免同志知道有平行支部，不限制范围，但在一般工作中党给予主要方向，领导支部为这一校或这一保参加区委之同志（这样的地方大都有区委委员）。领导者如能依据情况给予任务，是可以避免碰头的。

3. 支部的群众工作：前一时期由公开活动转入完全不动，为了避免暴露，有的完全走上脱离群众，任群众散伙，致使群众在烦闷下消沉下去。今年春才开始慢慢地改正，由支部会议决定同志的群众活动，以个〈各〉自的地位作为最切实的联系，过去的那种号召式的运动基本上已改变过来，由一般观察是沉寂了，但事实却是无疑的深入与实际了。每个同志都要团结两个群众的口号，正在初步的走上现实，支部是在注意与开展群众工作了。一般说来，从支部到教员直到工农支部中，都多少团聚有群众，特别是有的已进入思想的影响，这在初即合作社同志在社员群众的影响中。益阳淘金工人同志完全依靠于支部同志自己活动，正在筹建淘金工会。某些农村支部已注意到甲长的争取，而且已经争取到一些位置。可以看到，不管如何在开始注意与转变，然而铁的事实群众工作仍然为我们支部工作最薄弱的一环。

4. 党费的缴纳：这点至今仍未为许多同志所重视，不少支部负责人认为，党不需要这些钱工作，有也好无也好，只要有工

作表现就好了。因而自动缴纳党费的可以说十个之中还没有两个，就是缴纳者，也是上级催促之下不得不缴的。湖南党自抗战三年来，收入党费才不过一千元罢了。这些党费的缴纳者，就成份来说，大多为教员、学生、合作社同志；就地区来说，以衡阳、湘西、湘乡、益阳常为普遍些，最差的为湘潭。汉寿县委与湘南方面。

（八）关于领导方面

1. 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慎重的、适当的配备干部。中心县委与特委人选，省委是特别注意的，其人选务须在会议上通过，使他掌握在可靠的干部中，调动或撤销亦须经过省委通过。其次是缩小。原来县以上的都有七人，一般的青委、妇委、职工等部门都设立，这样，往往使领导机关庞大而不适于环境，同志上、干部上实在是勉强位置。中央指示后，现在均已改为常委三人。因为领导干部之暴露，使得各级领导机关不得不迁移，如常益中心县委由益阳迁汉寿，湘潭中心县委由湘潭迁湘乡，衡阳中心县委由衡阳迁衡山，长沙县委从东迁市区，湘南特委自资兴县迁桂阳。省委自身自去年七月则是从邵阳迁长沙，九月湘北战争进入市郊，又分居邵阳、湘乡、衡阳、长沙各地，而以邵阳为中心。当时准备长、衡失陷后，即由各省委分途掌握各地工作，十一月全部迁衡。由于去年十一月与今年一月两次的遗失文件，二月又自衡迁往湘潭。在迁移中，集体的领导都弄得非常差，尤其是省委本身，记得有一时期两、三个月未开过会，形成各自为政，最多亦不过是交换一下意见而已。现在，各地的与省委的集体〔领导〕是逐渐改善了，省委对各地工作指示与问题的解决，都是经过集体的研究与决定，已恢复到扩大会议后的集体领

导一样了，不同的只是会议时间缩小，人数减少罢了。

2. 交通网与通讯网：以前省委与各地党的关系，不是省委自身下去，便是各地负责人来省委，一切工作问题均在这时解决，根本没有交通关系，而通讯处所用的几乎完全是暴露了的地方，各地来往干部当徐老未离邵时，完全与他们混在一起。省委迁长后七月执委会议时，曾一致的强调交通与通讯网之建立，并责成小郭专责筹划。小郭离湘后，即由老王专责进行。虽然我们不惜抽调得力干部（湘宁中心县委书记张春林调往交通总站）配备于这一岗位与不惜大量财力（二千元左右）使用于这一工作，然而终因种种原因，直至今天也还即是铺下了一点基础，即省委交〔通〕站建立了商业机关，找妥了几个有掩护的交通员，由省委自身兼任交通，现已转到由组织干事兼任交通了。这一不好之办法，最近或可改变了。通讯网则在今年三月后大体已获得解决，省委下之工作单位都有一个或两个可靠的通讯处。总之，这一工作的恶劣，省委是尝够了痛苦的教训，党的整个工作是遭到不少的损失与威胁。

3. 领导机关之结构与领导方式：从省委直至支部，都是由三人组成的领导机关，书、组、宣由三人分负其责，其他部门亦由此三人兼任，主要的是研究后提供常委。省委的分工是如此：书高，组王，宣聂；职工高兼，保卫王兼，军事聂兼。这是没有完全按照这里决定的，分工上稍有变动。地区的分工为：湘西、宝庆，高；湘南、衡阳南、常益、湘宁，聂。王涛从重庆回去后便改为这样。但由于组织混乱和秘密条件之限制、干部缺乏等，各部工作至今未有建立起来，各地工作之巡视研究与各地来人问题之解决等，亦完全未按照分工的进行。省委本身机关今年三月虽已开始固定，但忙于职业问题，所以内部工作至今仍未走上轨

道正常化。

对上级指示，对湖南整个局势与各地情况，省委有准备的深入的研究很少，尤其集体的研究更少。总之，大家都以为细读了懂得了，马虎讨论一下就成，对上级的指示一般的都偏重，依据它去检讨自身工作的弱点与具体执行办法。十月至二月，对上级指示，对各地工作都是互相交换意见，传读文件，分别的读读而已。

对各地领导，大都在省委会议后由省委自身分途出外传达，或督促检查，但一般说都是出去时周密，为〈回〉来时只是马虎谈谈而已。上下联系，省委与桂林方面混乱时弄得很坏，连固定的交通都没有，直至今年二月后才解决，经常是二十天交通往桂林一次。在桂林，省委建有两个机关：一为交通来往住处，一为负责人来往住处。对下面的联系，除湘西外都是三个月省委去巡视一次，各地亦系两、三个月来省委一次，平均一个半月上下负责人有一次见面。长、潭两地因距离近，密切些。这一办〔法〕仍不妥，就是弄成上下负责人老是忙于这些关系。每一单位最好是半年省委下去巡视一次，半年内下面亦来省委一次，使上下负责人能三个月见面一次，平常都依靠于交通。现在在朝着这一方向走。

省委的日常生活混乱时是各方面忙，实际上弄得各方面都未弄好，真是吃力不讨好的生活。现在稍微好一点，生活上是开始安定起来了，党内党外之材料正计划搜集，各地工作都在开始作深入的研究，商业上或普遍应付上每天总要花些时间，因湘潭大小有时总要利用长沙接头，也需一些时间。省常委会议为十天一次，学习会议为二十天一次，每天至少都阅读二小时书（除有时要挨户检查停止外）。但学习会议自“五·五”学习节至六月底

点，实际上只举行过一次，自我学习的精神，自省委至各级都是异常之差。

省委、中心县委、特委之职业：高、王、聂都是贩卖商，什么茶油、洋油、白糖、榨菜都做，实际上就是图贱买卖，这在长、潭、衡很普遍，并不犯法。常益的常委是开机房，贩篾席，喂猪。长沙常委是开袜厂，卖小菜，教私塾。湘宁是纺纱贩运（后改为何项不知）。衡阳是豆腐、袜厂。湘南是贩运炭柴，〔开〕饭铺（现不知）。□庆的是袜厂，小摊，缝纫，茶。湘西是缝纫厂（建立妥否，尚不知），教书等。这是上层些的机关，下层的多半就原有职业。因为商人受约束少，故多插足于商业，亦便隐蔽。

（九）巩固组织中的左、右倾向与斗争

当着省委深入〔学习〕中央、南〔方〕局指示切实执行时，首先遇到的是看不到整个局势的发展和湖南特点，认为他那里环境好，组织的暴露与干部的红还不要紧；或者满足于他们的工作，认为组织健全，同志坚定；或者认为警觉性的提高为庸人自扰；或者认为在国民党区域内，只有立即布置游击战争，依靠武装来掩护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听着要提高警觉性、隐蔽组织，便害怕，便动摇；当着组织遭受袭击或破坏时，便张惶失措，有的甚至动摇逃跑。……^①故前一时期反倾向的重心为反麻木不仁，而后一时期的反倾向的重心为反张惶失措。当着后一时期开始时，客观局势愈益恶化，同时在党的弱点处处暴露下，有些认识不够或另有企图的同志便藉此作攻击党的活动。……^②

^①此处编者删去二百三十余字，系举例说明某些干部动摇逃跑情况。

^②此处编者删去九百六十余字，系举例说明党内某些不正当情况。

附：党员统计表

中心县名	行政县别	领导机关名称	党员成分								党员总数	性别		备 考	
			工	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教员	学生	军		其他	男		女
常德中心县委	益阳	县委	20	30	30			2	5		3	90		5	本统计数系今 年六月根据中心 书记的报告。成 分比例，除活动 的些，都没有，内 中农民分开是我 估计的。
	汉寿	县委	5	20	30	6		2		3	4	70			
	常德	工作委员会	15	20	15	2		4	3			59		3	
	沅江	特支						3	2			5		1	
	桃源	特支							4		3	7		4	
湘宁中心县委	湘乡	县委	4	63	75	10	5	33	4		6	200	7	本统计系根据 六月湘宁总结会 议，除农民系我 估计分开的外，其 均系报告中的详 数。	
	湘潭	县委	4	50	70	10	5	4	4		18	245	7		
	长宁	工作委员会	2	40	28			5			5	80			3
衡阳中心县委	衡阳	县委	5	30	25	5		2			4	71		3	这还是今年二 月底衡阳中心县 会议时报告统计， 有各地总数，成份 系依据过去记忆 估计的。
	衡山	县委		30	10	5	2				5	52			
	祁阳	工作委员会	25	10	10							45		5	
	零陵	特支									7	7			
宜将中心县委	邵阳	县委	25			15	8	15				200		4	今年二月底统 计，新化、兰田六 月遭破坏，当有些 变动。
	安化	工作委员会					3					14		5	
	新化	工作委员会					22					?			
	武冈 (新宁)	特支					7	24		1	36			1	

续表

中心县名	行政县别	领导机关名称	党员成分								党员总数	性别		备 考	
			工	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教员	学生	军		其他	男		女
湘南特委	耒阳	中心县委	20									129	15	这是今年六月特委书记的书面报告，只有总数和干部，成分比例系依据我二月巡视时估计的。	
	郴永桂	县委	5		15			2	52		1	95	6		
	宜乐	工作委员会										40			
	资兴	工作委员会	5	20	13	5	2				1	2	48		7
	汝城	县委		60	82	25	5	5	3			10	190		5
	矿区	工作委员会	25										25		
湘西工作委员会	沅陵	工作委员会	14						2		8	24	7	这还是去年十二月的统计，除教员、学生、工人可靠外，其他都是工委书记估计数目。	
	辰溪	工作委员会						3	3		9	15	3		
	泸溪	工作委员会						4	32		11	47	19		
	溆浦	县委		30	12	5	5	18	5		3	76	5		
	凤凰	工作委员会		5	30	6		18			5	64	9		
	保靖	工作委员会						10			5	15			
长沙	长沙	县委												这是今年六月长沙县委会议由各常委详细报告，此统计最为实在。	
			63	102	80	20	7	19	16	15	33	342	33		
												① 2278	② 149		

①、②原数如此。

三、统一战线工作

(一) 各种抗战力量之一般分析

这是一般极其复杂及极其重要的问题，党的统战策略方针，便是依据〔当〕时这些力量之对比与相互关系的具体认识而确定的。然而，湖南党对此并未作过深入的研究与整理，自然这在具体活动中，工作遭受损失。兹就我所观察到或感觉到者来作以下的一般看法：

1. 顽固份子。这在湖南统治力量中占着压倒的优势，但他有几个不同的来源，与不同的顽固特点，如：

①中央部队：薛记党、团、县与省政府，他的首脑份子的大部分都是对我党成见极深，为最积极的反共份子，但今天还不真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是以薛岳、李树森、廖维藩、李敬阳等为首，这是湖南顽固势力中统治力量。

②CC县党部之书记长与某些中等学校之校长：这些人的大部分都是对我党仇视极深，为最积极之反共分子，对抗战动摇的。他的首领李毓尧、陈大榕、谢祖尧被薛岳从省党部排斥后，现以仇硕夫、陈士芬、刘员峨及省立临中校长熊梦飞、国立〔安徽〕中学校长邵华为首。

③何键时代之团防系：各地首领职务抗战后虽大部分解除，但不少的还保持着老关系，在各地方武装还有不可忽视的基础。他们为大地主，首领中的最大部分是反共最力（湘南、湘北之暗杀、逮捕均系此辈所主持），对我党仇恨最深的份子。他们与汉口之大小汉奸有直接、间接的来往，是主张妥协投降的，以湘江八县最有威力的周家八爹为首（此人为何键对团防势力最大者）。

据闻，湖南参议会会议长赵恒惕亦与汉奸有来往。

④商业资本家中的少数份子：这些人在何键剿共时代为基本的支持者，抗战后即成为运销仇货的主要份子，他们大都从上海直运，有的实际上已变成日本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些人专在各方散布抗战不能持久或不能久抗之流言，特别利用国民政府普遍征收所得税、所得税这点来造成商场中对政府愤慨与组织对政府税收人员之暗杀等。这些人的赚钱是惊人的，长沙德昌洋货行在一九三八年之纯利便是一百万元，它的分号散布于湘潭、衡阳、邵阳、常德各地。

2. 中间份子。他在湖南具有极大力量，但无组织，而是极其分散的，大多在乡、镇中，由于其本身利害之不同，亦有其不同之中间性：

①各地乡、保长中之大多数。他们大都为中小地主或富农、中农（保长中有很小数目为贫苦知识份子或活动之老贫农），主张团结抗战，但其中大部分对我党骇怕戒惧。

②大学、中学教员与各级党、政、军之公务人员。他们多为中小地主出身或上层小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团结抗战，对我党不骇怕或骇怕心少。

③杂牌军队或地方武装中之大多数。抗战来，下层政治机构改组后，各县团防武装均分置于乡长之中，故大多随着乡长态度之转移，一般的对我党怀疑。杂牌部队原在湖南者，大都调赴东南战场。今天仍驻湘省仅商震部之数千人，他们对中央削弱、排除异己之阴谋诡计极愤慨，今天对我党态度尚好。上两者均主张团结抗战。

④中等商人与中等厂主。这些人大都为中产阶级，都主张团结抗战，在政治上不满国民党之苛捐重税、贪污腐化、政治专

横，对我党尚好，不同意摩擦反共。

3. 进步份子。这在湖南今天力量尚微弱，还不够在湖南政治〔中〕起〔作〕用，只能在些小的乡、镇尽些改进政治的推动作用。他的基础便是我党工作与广大工农份子、部份的中、小教员、学生和保长；他有无限的潜在力，但须我党在长期工作中去发掘，去蓄积。

（二）持久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困难

由于湖南过去阶级斗争残酷与对我党诬蔑宣传之深入，一般有权有势的上层份子对我党怀着成见。薛岳主湘后，愈加助长他们成见的生长，不仅是徐老、凌波及各地红的同志纵面活动难，即稍一露出与我们有关，他们便更加警惕。所以，通过徐老、凌波或红的同志在当权有势者方面的活动收获很少。而另一困难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统战策略不了解，特别某些老的干部的不愿了解，认为这是多余，徒劳无功，客观上便对当权有势者活动消极。克服这里的困难，我们认为首先要从内在的困难做好，因而深入讨论统战策略，在湖南组织中与湘北工人同志中，曾经用过不少的力。

（三）从碰壁中所找着便于活动的方向

经验告诉我们，湖南统战活动的主要方向不是省级而是县级，特别是在内战中在野；而在抗战后逐渐取得权势之地方势力派。这派人与反共团防关系不深，复与国民党各系关系浅，一般的还不拒绝我们，愿与我们来往。至于失势之乙派，亦有一些愿与我来往，但为数少，诚意差。国民党中虽都不为顽固反共派，但敢与我们接近者却极少极少。去年上半年，我们曾经把主要方向放在省级，尽一切力量活动，企图在这方打开一些局面，结果

所得寥寥。去年七月后，我们便将主要活动移于县级，特别是地方势力派，虽无大的成果，却是实在的展开了一些联系。

（四）党在统〔一战〕线活动中我们依据的资本

这里主要的为两层资本：一部为中下层机构中的同志；一部为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小学教员同志。前者在长沙有三个乡长（内中×××^①为自首份子）、十一个保长与几个分保公务人员；在湘宁有七个保长、十六个甲长与七个县级之公务人员（原有之长潭良峰同志，现不知调何处）。以上为今年六月在长沙、湘宁总结会议上之统计。在其他各地均有此类同志，如汝城去年七月时，还有十九个保长同志；常益亦有六、七个分保长同志。在局势恶化之下，只知丧失了不少，但详情尚不知。后者在湘宁有高、初小学教员四十四个同志；长沙十九个同志（内两中学教员，统计时间同上），宝属中心县有四十七个中、小学教员（内中学教员十八人），此次破坏丧失教员仅七人，今年二月统计。湘西于去年十二月来省委总结工作时，教员五十三人（内中学教员二人），其他均不详。去年小郭离湘前，曾经大体统计过，湖南教员为二百七十人左右（内中学教员为三十三人），其他则为文化界，主要是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现仅两人而已。以上便是我们在统战方面活动的资本。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工作，但是除下层统战外，党的所有的中上层活动都是完全依于他们的。

（五）实际的一些联系与一些活动

大体上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1. 地方势力派，在长沙□湘、益阳鲇埠、汉寿商头铺、兰

^①姓名系编者略去。

田三甲、溆浦龙潭、邵阳广桥、耒阳城郊等等地区，因有些分保长同志或中层的同志，使得我们便利于将地方上一些有势力的份子影响或团结着，虽然今天他们还不能影响整个县的政治，但在当地或附近的乡、镇与区确能起某些作用。去年湘北战争进入长沙近郊后，能坚持不逃，团结着一些地方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帮助军队者，为我党的乡、保长同志及当地的农民同志。今年四、五月，为着食盐，在娄底、在鲜埠为几保农民所拥戴与百余代表共赴县府请愿。地方势力份子亦系当地统战工作者所影响的，宁乡唐市、黄材在几十个保内，曾广泛进行几个月的训练。

2. 县、区教员界：在新化县城、桂阳东镇、凤凰县城、汝城县城、湘乡谷水、□□城市，湘潭韶山、益阳城郊、溆浦城区等等都有些联系。他们在我党影响下，设法改进自己的教育，聘请我们的同志或设法帮助改进地方政治。益阳蔚南女中今年三月传播过关于延安宪政问题的材料，因尚被注意，有的起了些掩护作用。在上层教育界中，民国大学的联系还好，由于这里的教员同志（前三人，现二人）都负担重要功课，为校中所依靠之支柱同志，学生对同志的信任亦高，因而与代校长刘俨关系更好，同事中大部尚融洽，对学校行政能起相当作用。至于八中校长邵华秘书××与教〔育〕厅××科长同志，虽周围有些较进步的朋友，都只能尽另一种作用。国立十一中之三个教员同志，虽然都有其重要职务，由于校中有教育部派去之特工人员，监视极严，所以在上层中只一般来往。

3. 正派士绅：由于这些人多表示清高，不愿为地方任职，一般都对我党表示好。特别有些六、七十的老士绅，他好读《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他好在士绅评议上、民族中的祭祖会上、人多的广场中谈论毛主席及毛之著作。这类人与党接近，各

地都有些。但由于他之无实权，故不为党所重视，认为有也可，无也可，故党并未在各方面展开活动。

4. 与军队中联系：在薛岳部队中，我们尚没有，只有杂牌军中有些工作。李觉部下有×××个连、排、班长，今年五月，□□派有县委负责之干部〔负责〕该部游击训练班工作。湘北战争时，这些同志表现最英勇善战，连长都是这战后才升的。这里工作并未暴露党的负责人××，李觉实际上知道并与之直接来往，表示对他信任。五月派去之人亦系经××周折介绍去者，他的部队移前线，关系交袁国平。驻湖南者只有商震部有些关系了。这里的团、营同志均离湘，所余者只有×队内两个连、班长了。商之参谋长×××与省委之关系，曾要求入党，省委讨论认为留居同情地位，便于工作。此人为一军事教育人材，善谋划，但不能指挥部队作战，过去在北方作战为一屡战屡败军官。商颇信任他，曾代商执行职务。商部人多为此人学生，故颇受部下尊敬，但无威信。他与北方部队的关系多。

5. 国民党、三青团之联系极少，仅专员徐庆誉、曹伯闻与乙派首领刘岳厚及各地县、区之某些人有点直接间〔接〕联系而已。

（六）统一战线工作中给予我们的教训

1. 交友对象最中心的是中间力量，首先是乡、保长与各级公务人员。依据中间力量之工作来渐及顽固左翼，否则它不信任你，而且怀疑你有作用。

2. 交友桥梁最便利而且最得力的为乡、保长同志与中、小教员同志。

3. 交友面目，一般的要以派系利益、自身利益、亲戚朋友关怀或民族志士的面孔出现。即使交情颇深，亦只能以坚持抗战

建国、忠于民族国家面目对人，只有从思想上考察对方是一个可靠的同情者时，才可表示自己系在对方影响之下同情党。在这一点，在湖南要特别慎重，否则极容易影响到我们的位置与活动。只有经过我党面目的，只有经过我党省委慎重决定才可以。

4. 交友时间，最好是在对方困难的□活动位置急须帮助时。要诚恳，但不要老实。再懂得各种手段，但要审查使用。要讲信用，但勿轻易允诺。恶意要警惕，但善意同样要小心，因为不少人的恶意都从善意中去审慎，去使用执行。

5. 经过朋友交朋友。对好朋友必须注意下列几点：①隐蔽朋友，均不以为朋友有地位便可随便，不仅自己要隐蔽，自己和他来往要注意，而且要设法使朋友亦懂得隐蔽，懂得在他的具体环境中的交友之道。②要爱惜朋友，要万分慎重的使用朋友，当使用朋友时，不要看到工作需要之一面，同志必须想到好朋友来得之不容易。③支持朋友，帮助朋友，当该朋友遇到困难时，在可能内应支持他，使之克服困难；即使朋友失败退却时，应设法帮助他，作丧失小的退却。

湖南党今后在统战中紧握的是，切实地隐蔽与巩固现有基础，展开中间圈的活动，发展各种隐蔽曲折的工作方式，推动各地朋友，扩大联系，使这些道路逐渐走上小的集团的形成，来慢慢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力量，来争取顽固份子中的左翼，削弱孤立顽固力量。

四、群众工作

(一) 农村方面

湖南党的基础最大数量在农村，只要我们能正确的运用群众

工作的策略，广泛的展开党在湖南的群众工作是有把握的。

湖南农民情况怎样呢？在经济上，一般的是贫农、中农多，相互间的来往比较密切。整个的说来，虽然是极大多数不识字，但湘中各县却是识字者多，因而对政治亦较为有兴趣，除极少的参加青、红帮外，便只有庙会、灯会一类的东西了。前者为半公开的，已为政府严禁，后者则只是一年一次的集合而已。今天，在农村中组织农民的唯有政府的下层政治机构——保、甲，因而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座谈、教写字、记帐与通俗抗战小书的传阅。注意上层〔的〕争取，特别在并保合甲时，组织曾积极动员，力争其位置。

所谓并保合甲，系为了减少行政单位，便于施政，有二合为一，亦有三合为一者。去年七月间，益阳白鹿乡有过黄溪桥与刘家湾两保并一的竞选，我们的力量是两保都有庞大的支部（前者三十余同志，后有十人，但全部为农民），区委所在地，县书亦住黄溪桥。正因为我们阵容的强大，没有人敢于参加竞选，只有某些士绅们拟议要以阳某担任（系一正派之长者），而党则经过区委、支部事前的讨论，决定了拥戴我们同志出来充当。选举的情况是同志十二人，同情我们者亦十余人，士绅方面的不到十人，总共三十余有表决权；旁观者士绅□人、同志二十余人，县书亦在内；其他为乡政府监视人员而已。当提名单时，士绅方面的首先提出阳某，继而旁观士绅对阳某之为人大加称赞，并称举得其人，紧接着便是护阳声，同情我们者亦参加护阳。当时参加的同志与旁观同志都相对瞠目，不知所对。此时阳某起而推却，我们才趁机提出同志名字，以年轻力壮之理由。有的同志起来响应，但会场空气沉寂。紧接着便是“稳重老练为好”的一片声，将我们压得无法说话。最后由监选人说了“大家赞成，一致通过”

完事。散会后，同志议论纷纷，互相埋怨，后来区委会议亦未检讨、作结论，复决定采取不合作主义。于是，阳某知难而退，结果由党改推一同情者继任。

另一个保长的竞选亦是在益阳，是滨资乡下的三保并一。参加竞选者，每保一人，即都想将保长争取到自己区域的人充当。他们的政治面目，一为反动之豪绅，一为平庸之富者，一为我党同情之小学校长。我们的力量只是在枫□垅这一保有支部，士绅站在我们方面，其他都只个别同志，上层联系少。保长的产生，是由于大家竞选才真正执行甲长投票决定，而乡长怕闹乱子，特向县政府要求派员监视。投票权共为二十六票，计：枫十票，四票为同志；六票为同情者，内部团结力好，完全一致；豪绅方面亦约十票，富者六、七票。选举前两天，各方大肆活动，但选举日时，县府监票员却主张各保推一人，由县府圈定。我们党方面秘密主持者为县军委，颇灵活，亦为当地人。由于原系投票决定，事前均未预作此活动，因而都表示反对。特别是在此时，豪绅积极夺取我票下佯装让步，并对竞〔选〕表示消极，因而更加鼓起了他们对圈定的反抗。最后仍为投票。开票结果，校长十六票，其他七票、五票。因为党当时对并保合甲争取位置非常注意，前者曾找县书作口头报告，后者曾找县军委口头报告，其中曲折还多，不过大体如此。关于选举事，省委曾责成常益中心县委总结其教训，以教育同志。

关于教写字、记帐、座谈与传阅通俗抗战小书等，这都是小学教员同志进行的，所以都围绕在学校周围。比较作得广泛一点是前一时期，这时，凡是有同志的学校（农村），大都或多或少的进行一些，一般都是缺乏计划性与寒热症。

其他便是参加毁路，反对食盐舞弊。在各地是进行了一些群

众活动，前者以常益为好，后者湘宁为好，至于农村由各民族的总管、房长等位置的争取，氏族所设立之小学校校董会董事之争取，也曾进行过。这以兰田三甲梁氏大族所获得成就大，即争取了一些以同情者为房长、总管与以同志为校董等，亦有族校之校董全部在同志手中。在农村工作中，我们最严重的地方是，从抗战出发而以农民切身生活来切实进行农民群众活动，不会利用与配合已有之上层关系，一般的多少存在着宗派观点，特别是忽视中间阶层的活动。

我认为，今后农村工作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策略下，应该是力争保、甲长位置，展开保、甲长的活动，百倍的提高对小学教员地位的认识，并加紧其工作。握紧农民活动份子，重视农民切身要求，并为此积极地参加保、甲会议，通过保、甲形式将农民组织到我们手里，从注意中间阶层利益与各种活动将它争取到党的周围。在农民思想下，要着重抗战与民主教育；后者对农民意义极大。

按：①“甲”为农村中最基层组织，“甲”上之事农民均可过问。因此，甲长与农民关系最直（接）而又最密切者，“甲”实为农民群众活动最中心的东西。

②“保”在农村中已是一上层机关，农民对保长也是以朝廷一小官看待，保长与农民是隔离的，故“保”并不适宜于农民群众方面活动。但保长却是当权有势者，而且是本地人（乡长则不一定为本地人），为最有力最便利进行农村上层工作的份子。即使现在民主大大缩小，由民主产生者少，但政府为便于施政，不能不多少顾及到民情的向背而考虑下保长人选，所以保级的活动比乡级要容易得多。

③农民活动份子，大都即是甲长这一类的人，常有当甲长的希望，他们大多为贫农、中农，在宣传与组织农民中的作用极大。

④小学教员，不只是便利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与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他最便利于进行甲长的工作。目前政府重视农村知识份子时，往往为保长的候选者。

（二）职工方面

湖南除铁路、公路、轮船等一部分交通工人、兵工厂工人外，其他便是矿工与广大之手工业工人。不管其如何零散及重要企业工人数量之如何不大，但在抗战中都有重大意义，然而它在我们工作中实为最薄弱的一环。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遭受极大削弱，现尚存下列基础：

矿工：常宁水口山支部九人；湘潭锰矿支部四人；益阳淘金工人中两支部十余人；湘南资兴、瑶岗仙、东江等处煤矿现二十余人。其他铁路仅有柳州支部五人；湘桂路支部自解散重新登记后仅有联系。手工业工人：铜官窑工三十余人；邵阳合作社与缝纫、织布等十余人；祁阳合作社与军服厂等处工人四十余名（现况不明）；沅陵军服厂与织造业十余人；其他较集中些的手工同志，仅益阳、常德、汉寿、长沙约四、五十人了。芷江汽车车身制造厂三个，新化锡矿山一百二十余人，兰田十几个挑夫与织布工人，烟溪兵工厂支部十二人，均已半年与组织无关系，最近才确定由袁德胜去恢复。以上为我们职工基础的大概情况，今年各业一共还不到三百同志。

党在工人中的活动，主要是经过公开的方法去进行合法的组织，如邵阳、祁阳在同志积极的筹备下，创立有缝纫合作社二、织布社一、织袜社一。参加进出活动的有各地之制鞋、火柴、织布、织袜、麻鞋等社，除火柴有几百人外，其他都是二、三十人，甚至几人者。由于合作社中有相当民主的作风，所以在选举理事时，同志都积极参加的。由同志筹创之社，其理事与主席均系同志或进步的。即参加进出的，亦因同志负责，大多不是主席或理事。文化学习、生产学习大都在我党同志推动下积极进行，去年上半

年进行得还很好，每周都是三次或两次的上课，局势恶劣后，就时断时续了。义卖与募捐亦都积极参加，较各团体优者，曾受政府当局赞许。指导员训练班与女工手工训练班，都曾派同志进去受训，已分发各地工作。

各职业工会：铜官窑业工会的三千多会员中，去春同志曾扩展到八百多人。此次为了巩固组织，已将七百多同志的组织生活停止了，此后将劝其退居同情地位。党在这里曾进行过一些教育，工会自身有陶业、高小与其他四个初小，故文化教育便于进行。去年，对献金及反汪运动，经党动员进行，都是极热烈的。现在的工会活动是无形停顿了，党的组织只有缩得短小精干，深深隐藏着，这时是着重内部组织的整理。今年春，国民党曾诱出工会委员三人。迫其自首，结果三人均投降，现在在下层活动。

益阳县的总工会，完全由益阳党长期活动于去年春成立的，执委名单亦由县委确定。成立大会时，大部分是通过的，特别〔是〕组织方面的事，完全由县委职工部负责的同志主持。在总工会下，各镇陆续筹建各业工会，总工会所辖各业各地之工会，最后达一百二十几个，有织制〈造〉业、织袜业、漂染业、鞋业等。工会之主持者（即常委、理事）均为同志，其他陶金业、车夫、码头都有同志。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与工人因公受伤的医药等要求上，有同志在织造业与漂染业中被开除（漂染主席、理事××同志便如此）。织造业工人曾由织造工会理事××同志等组合二百余人至桃源织布厂工作，不数月，为要加工资与厂方对立，直至捣毁锅灶与捆绑经理等等，简直是登峰造极的左倾盲动。结果是该厂中所有益阳工人二百余名均被开除。益阳总工会主席××^①（原系同志）去年加入三青团后，便渐渐离开阶级。今

①姓名系编者略去。

春〔在〕三青团指导下积极进攻我党，并为三青团用钱引诱我同志，今天已完全成为最狠恶的特工人员，县总工会的同志都被迫离开，各业已受到极大影响，益阳党目前正在进行下层的稳定。其他长沙、汉寿、常德的一些工会，虽未受到打击，但工会活动等于停止，好的亦只是半生半死。

矿工方面：我们只是在同志中作了一点识字工作，在工人中口头的传播了一些抗战消〔息〕而已，除有些盟兄弟的组织以外，主要的就是青、红帮了。在矿工中是没有合法团体的，而国民党亦无工会组织。

在职工方面：我们最严重的就是党的组织比任何方面都要暴露，基层的群众组织中，党的工作最差。正因为如此，职工工作遭受极大损失。今后，应该以各业工会与合作社的基层组织为中心来进行工人群众活动，并从这些团体中深深的埋下党的精悍的基础。同时，必须重视兵工厂支部之恢复与矿山支部之巩固，并依此在工人中艰苦的逐渐的进行文化与思想教育。

（三）青年方面

湖南青运的主要对象：由于青年工农集体生活的组织没有，创立此种集团又不易，特别是湖南另有一群广大的青年学生，他固有不少的于毕业后升学，但最大多数还是政治下层机构的扶持者与小学教员，而国民党正加紧对他的争取与收买。因之，湖南党便以学生青年作党青运的主要对象。

国民党、三青团对学生之态度与活动：对学生知识份子重视的，并采取积极政策争取之。为了罗致青年，他们设有青年招致所，有失学、失业青年的登记处，虽然设立很少，但他可以介绍你到军队服务或转学校，只要他考查你的来历，认为无问题便

逸样作。有时他便吸收入团，由团部直接送省立、国立中学。国立十一中校长杨□康为此曾对三青团大为不满，认为破坏了学校行政系统。凡学生青年聚积处，都开设有青年书店，长沙、湘潭、衡阳、耒阳、兰田等地区，规模都相当大。其他什么青年理发室，照相、咖啡馆、浴室等亦在积极筹办，有的地方已经创立起来了。关于体育上的什么球类比赛、游泳比赛、划船、赛跑、爬山都号召，都主持。戏剧、歌咏有时亦举办。上列关于青年生活诸事，虽然还不普遍，还刚开始，但积极努力的正在进行则为显然之事。由于湖南学生青年的相当多及三青团的基础极大，这类工作毫无疑问的将有一广泛地开展。至于三青团组织的活动，则自去年冬各县党部及各学校党部负责王渝受训返湘后，寒假时即从各中等学校每校抽调二名学生到兰田由熊梦飞负责训练。今春开学时，即以受训学生为当然委员在各校建立三青团组织。今年五月节前，曾作猛烈的扩大或创立。凡是主要些的中等学校，大体都已公开或秘密的建立了三青团的组织，在兰田、衡阳、邵阳等地之学校，学生入团之比例为大。学生中必须入团者是：自治委员会全体，童子军各中队、分队正副队长，各班代表等等。入团学生一般分为两种：一为公开者，一为秘密者。公开者多主持或积极参加公开活动，秘密者多为侦察我党与监视进步份子，对我党同志则是威胁利诱其自首，必要时则逮捕或暗杀之。兰田我党学运工作之刁牧夫为其数次暗杀未果，最后遭逮捕。邵阳青年同志谢固安系三青团由家中诱出，黑夜在野外枪杀者。

我党有联系或有组织之学校，去年下期与各校之关系为多，今年已削弱不少，除小学方面者外，中学、大学方面现有之同志为一百六十余人（内教员二十五），散布于三十七个学校中。

1. 国立者：湖大学生三人；民国学院八人（教授二，职员二，学生三）；国立十一中三人（均系教员）；国立八中四人（教员一，学生三）；中央军校五人。

2. 省立者：临时中学十四人（中学部七，师范部七）；常德三中十四人，为一支部；桃源女中十八人，为一支部；衡阳师范十二人，为一支部（教员一）；衡阳六中一人。

3. 联立县立者：黔阳师范一人（教员）；武岗师范二（教员）；邵阳爱莲女师一；湘潭女中一；桂阳师范六人，支部；柳州联立中学十四人，支部；郴州师范六人；益阳龙师五人。

4. 私立者：上梅六人（教员五，学生一，七月退去教员四）；民范三人（内教员一）；青峰三人（教一）；邵阳育群二人；民宪女校二人；周南三人（教一）；复初一人（教）；长邵二；妙高峰一；文艺中学七；明德一；崇德二（教员）；长沙女职一（教）；新生五（教）；成嘉一（教）；广德二；蔚南三（教员二）；育才一；桃女中教员一。

去年下期学生为二百余人，教员三十三。今年上期已减少，估计到下期还要减，因有一批这期毕业，有一批红，务必要调动。

我们的方针和活动：前一时期主要的用各种形式团结学生，并在此团体中进行教育，对外则是广泛的抗战宣传。前者多为各种问题之座谈与研究，在党有组织的学校，都有或大或小的团体，但都狭隘。至于抗战宣传则较普遍，如戏剧团、歌咏队、宣传队、慰劳、募捐、办民众学校等。在有的学校，如蔚南则是以二分之一时间专作救亡工作，长途旅行宣传，直到派部份的学生组成工作队赴各队服务等。这些救亡专家的办法，引起学生家庭的不满与社会的反对，省委曾为此指责过常益的党。这种事是去

年上期多，下期就没有，环境也不允许了。去年下期起则是转入校内活动，主要的是建立学生自治会及争取自治会中的位置与合法条件下进行校内校外的活动。在这时期，组织强大些的学校都反对自治会的包办，事情蛮做，同志并未因合法活动而隐蔽，依然暴露。自中央青委乔木巡视后，今年初才彻底的改变作风，自治会让出大部位置，留一、二得力同志在内。学术股的位置多握在我们组织手中，特别加紧自己的学习，依靠自己某学科的特长，来结合对同一学科感兴趣的同志。它既可避免三青团监视，复可团结同志，于日常生活中进行思想上的影响。由于同志中优材生多，更便于进行，这里已经有了些收获。过去，一开始便劝同学读新书报的简捷偷懒的急性办法，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大体是改过了。教员中则是认真其本位的职务，将书教好，使学生成绩优良。无论是中学的或小学的，去年下期来，各地党、各校教员同志对这点基本都是作到了，博得了社会的好评与学生的敬爱。新化上梅初中六、七百学生，相当混乱，几个教员同志被介绍进去后，便整理得进入轨道，特别是在学生成绩的进度上，因而学校当局对这些教员极其信任、融洽，并共同研究计划着于下期创办高中。由于同志艰苦负责与学识一般的都胜任于他职务（即比别人高）和其教学的成绩，不少的引起了学校当局加级加班的筹划，而且已经有些学校本来是初小者，现加办了高小，本为高小者，则加办初中补习班。他们对学生的思想是起着极大的作用，学校增班固有社会上需要的原因，但教员同志为学校当局所信任依靠上，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无疑的是极重要的因素。但这只是那些忠实于教育事业之学校当局才如此，其他教员同事嫉妒其实力，学校当局不满其思想，学生对我同志的敬爱而引起其他同事吃醋等等，想方设法排除辞退者亦有之。不是由于我们同志在

这种场合中善于应付，而是由于我们在前者的学校多，故为学校所解除还很少。但是，学术的特长，对职务认真负责，在生活上能吃苦耐劳是极其重要，即使思想有些不稳，也有人不得不聘请。如桃源女中向湖大校长皮宗五聘请教员时，女同志向光涟便为皮这样介绍着：学科好的人有，课程保证教好，但思想不负责。

对学校态度：凡是忠于教育事业者，我们都是尊重爱护之，不管其是否国民党员与思想如何。一般的这些人都有些正义感，老头子正义感更强，他们是讨厌、不满意学校的特务工作的。象省立常德中学（即三中）、桃源女中（即四中）、衡州师范等及其他某些私立的中等学校都是这类人。今年春，桃中训育主任为了藉学校遂行其办党企图，与位私提款^①，对校长（老头）向绍先采取了许多阴谋诡计，如在外散布流言，说校长袒护共产党学生闹恋爱，在校内则造成同事间摩擦与对校长的不满。同时，鉴于自己的地位不够与避免他人之怀疑，怂恿教务主任活动，企图经过他之代理校长时期而过渡到自己的手里。由于他之奸诈，竟未为校长与他人识破，谣言渐渐传播，内部之摩擦加深，逼迫着校长不安于位，因而对于他经营多年的学校痛心，表示引退，并决定赴重庆。当时的支部便讨论对这问题的态度，决定支持向校长，打击阴谋家。但学生出面更可引起阴谋家之藉口，更使校长不安而加速他之出走，于是决定校内力求镇定，校外加紧活动之。校外作战法：首先通过校长之亲戚朋友稳定校长，使之安心，至少延缓他的离湘。同时，从学生家长关系中直接间接展开舆论的回答，并将谣言制造者与播散过程调查清楚，在社会上揭露，再将社会反谣传之舆论，经过校长外甥透露给校长。这时，支部中便

^①原文如此。

选定几个校长最喜欢而又隐蔽的同志分别的见校长，从毕业后之自身出路，谈到离湘后之前途暗淡，有谈到痛苦流涕者，校长因而大受感动。特别是这时整个舆论完全转变，校长便要决心清查此事之起源，支部便再由同志在同学中将外间之舆论作一般之传播，教员中亦起变化，大家都可耻训育主任之为人。结果，训育主任在众恶之的制裁下，不得不藉故辞职远走。自始至终学生无何举动，党部企图从此找藉口而无所获，事后有人怀疑教员曾活动。

至于采取塘田讲学院那样办法，帮助开展青年运动是失败的，至今讲学院之学生还到处为各校所注意，为三青团所监视。

今后青运的策略，以国立、省立的中学为中心，巩固现有的阵地，创造新的隐蔽的支部。提高自己的学科程度，从学术的研讨中，从同学的各种爱好中，加强党与他们的联系。扩大学生的思想范围，从上列各种活动来逐渐进行进步思想的影响。应该是深入的耐心的实际工作，而不是表面的浮露的牛皮。必须派一批坚决的同志加入三青团。对教员位置应巩固现有组织，创立新的基础，它在影响青年的思想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四）妇女方面

1. 国民党妇运政策：湘北战争时，他们主要的只是为着粉饰湖南门面，捧一捧自己的身份，因而在工作上形式多、敷衍多。湘北战争后，由于前方之需要鼓励与慰劳，由于逆转局势之开始，他便采取了积极的姿态，企图在各县建立妇指委的基础。今春，除派妇女干部来重庆受训后，即在耒阳开办妇训班，学员三、四十人，今年六月结业后分派各地工作，目前正在筹办第二期。这些学员均系来自各县，由三青团、党部保送之党、团员。

湖中各部之妇分会已逐渐建立起来，大都由县长、党部书记夫人主持，科长、干事等太太参加，参加的亦有上层妇女。真正进行些工作的还很少很少，认为只要能敷衍上级就够了，除长沙、衡阳、邵阳有时还募捐、慰劳外，几乎都是鸦雀无声而变为空头机关。在国民党积极的妇运政策坚持下，无疑这一局面将逐渐结束而展开活动。

2. 湖南妇运的主持人为薛岳〔夫人〕方少艾，是个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自信心很强，对妇运非常积极，她很想收揽一批干部，对干部的态度殷勤、好予私惠。她自信能感化女青年中不正确的思想而使之加入三青团，所以她明知为我们一些女同志干部，她敢于收罗，并设法为之再三邀请，丈夫、兄弟她可设法为之找职业，丈夫有病她可立即下条子为他进入医院养病。但以后便慢慢的劝你加入三青团，慢慢的便叫你或叫别人迫你说些反共论调。由于我们在指委会工作的同志大都年轻幼稚，总是象麻醉着了一样的了解她，以为她都不是坏意而是善意。随着蒋夫人的文学奖金后，薛夫人在湖南亦紧接着来一套，七月曾公布过她的选择标准为思想四十七，其文字结构、书法等为五十三。总之，薛夫人在能力上是一个老于世故，相当有办法的人；在思想上是一个与薛岳一样，是一个顽固的反共份子。

薛夫人下面的干部一般的可分为三个方面：

①党、政、军的以方学芬夫人张□为主要者，实际上也就是这一个，张为薛夫人之主要助手。除薛夫人指挥进行之妇女工作，如写文章、参加会议等，象总务那一类事情，大多由张经手，她对于买卖货物、理钱等很繁、很吝啬。

②民众的为周天璞，这是大革命前就从事于女权活动的湖南妇女前辈，她曾同情劳情运动，也作过一些平民妇女的活动。但

由于她的文化水平（大约是职业学校毕业的）低，地位低，特别是内战中对女权运动的压抑，一直以来并不得志，思想上已被镇压，消沉颓丧，后来作妇科医生，直到现在。女权运动的思想，抗战后又多少燃了些，薛夫人之所以拉周者，系双方需要，周要藉此谋高地位，已谋得妇女界之一位，薛则利用周在长沙妇女界中之影响，拉周、用周系今年的事。

③为学生知识份子，大都为抗战后参加救亡份子，这批人大都为同志。省妇指委会中，工作者原为七人，由于红，现陆续退去，余二人而已。目前，妇指委会多系从三青团中挑选者。

湖南妇指会的工作并不广泛，但还作了些事，如湘北战争后的募捐，派代表赴前线慰劳，募寒衣、献金，驻会地出壁报与出版《湖南妇女》等。壁报、刊物的内容一般的还好，但由于妇运差与政府整个的倒退政策，销路很小。妇指委会的两同志参加编辑。

3. 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估计到抗战来所生长之妇女干部大都染红（几乎全部），都陆续退去了，她们原有的工作岗位，一般的中、上层工作阵地几乎丧失殆尽。依据环境情况，去年年底党确定的妇女工作方向是加紧学校、工厂（合作社在内）的工作，一切以打根基为前提，同时依据同志的各种社会关系来逐渐展开各阶层活动，以创造新的隐藏的中、上层资本。

4. 党当前所依据进行妇女工作之基础：在中等学校中学生四十余人，除桃源女中十八个学生同志外，其他散布各私立中学；教员同志十四人内中，中学教员占四人，其他均为小学教员；女工十四人，大都在合作社与工厂；农村中的妇女和手工业妇女五十余人，总共仅一百二十余人。上列同志中，比较活跃些的还是教员，她们的作用大些。如国立十一中学季××，她就是

数百个女生部的主任。长沙女职张××，她是教务主任，与学生、当局关系很好，学生均敬爱她，她的生活、思想都能给予学生的影响。其他小学教员范围虽狭小，但束缚少，因而思想、言论没有中学教员那样的限制严格。学生同志对学校的活动只是部分人参加的，学校自治会中的学术股和童子军队长位置，只要能争取，大都不放松。桃中、民范、新生大都在同志手中。女工中，有两个女合作社的主席、理事为同志，亦有充当合作社各县领导机关中的女指导员，这都是便利于社员进行文化教育与生活改善的位置。所〔有〕这些地方，都有认字课，生产的提高与社务的改进的民主讨论，不少的社员确能接受这些影响，而团结于同志的周围。沅陵女青会的妇女，工厂管理员亦系同志，虽有二、三十个工友，但民主少，只能进行些教育课。其他只是为隐蔽党作些宣传，也有连一般的宣传和认字都不做，实际上等于挂名党员亦不少，特别在农妇同志中为多。

5. 湖南妇女结合的场合与对妇运的意义：一为各县妇女分会，现况虽如上说，但最近之将来，一定将一度起来打开妇女界之沉寂局势。一为学校，中等学校与职业女校至少有四、五十个，包括五、六千学生，至于女教员，亦可推测到为一巨大数目。这些人都是集体生活者，由于她们是知识份子或有专门技能，或毕业后即为社会服务，她们对妇女界影响非常之大，在展开妇女运动中，她们是处在重要地位。一为工厂与合作社，除零碎的外，已有二、三十人的有数十处，将来数十人的工厂、合作社可能增加。由于她们的阶级意识与结合于生产地位中，在妇女运动上显然是一个坚固的战斗的基础。

6. 今后妇运的方向：依据抗战来妇运的教训，妇女会的不能坚持，容易瓦解，政治形势的不能逆转和我们工作方式的恶

劣，固为重要因素，但由于结合于一些涣散之市民妇女，中上层妇女身上，亦不能不是一重要原因。依据这一教训和上面对于各类妇女团体的看法和我们主观基础，因之，我以为今后妇运仍应该是加紧学校与工厂的活动，尤其是学校，这是主要的，其次便是积极参加妇女会与争取某些中、上层妇女。

五、宣传工作

为广播党六中全会及以后屡次的主张与提高民众对抗战的积极性，省委曾经几次的动员全党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着宣传鼓动。前一时期，主要的为依据救亡团体党的书报推销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其地域自城市而乡村，因之，当时的宣传范围极之广泛。后一时期，则系依据学校、报馆和乡保之一些关系，隐蔽的进行传播，而支部同志亦多是个别活动，因之这时的宣传范围是大大缩小了。以下便为这时期的活动：

（一）书报推销

这是一直来为省委重视工作之一，曾经竭力的进行过。在交通便利些的县城都曾开设过书店或代售处，也有担过书到乡间学校私卖过的。农村方面亦有联络同情者，亦有订购书报组设图书处者。因而党的书报有一时期相当普遍和深入，它在启发人民的救亡认识上，就湖南各地说，确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省委此次总结工作，除生活、新知与分销处与代售处不计算外，在党筹划下所开设之书店，自五百元左右至三千元之资本者为十四家，《论新阶段》在湖南翻印与报纸转载的共八千份。现各书店大都被迫关门或遭封闭，余下几家只得设法换牌迁移，对新书只得少卖或

不卖，改变为文具店、书纸店。另一方面，推动同志、同情者利用各种曲折办法直接订购或购买前进书报，这在学校方面做得好些。至今常德三中、桃源女中还订有《新华》、《救亡》四十余份，郴县联中亦有八、九份。自去秋来，在湖南不仅是我党书报禁售，即使进步些的，在湘西、湘南亦遭禁，但如能利用权势关系，则仅偶尔扣留而已。

依靠前面所叙之各救亡团体，进行一般的宣传或进步之座谈、研讨、讲演等。有些学校和工会曾举行过农村和工人比较大规模的宣传，或利用献金、募捐、义卖、慰劳等活动中进行一般的传播，凡有党基础都是或大或小的进行。但自去年七月以来，限制加多，逐渐讲到不准宣传，现在只有取得允许存在的几个团体在国民党指定的范围内作些〔宣传〕它的内容也就隐蔽些、审慎些了。

（二）报纸方面

前些时期《观察日报》发行数曾达二千多份。为省委领导的《抗战日报》亦发行千余份，湘西党参加编辑。在汉寿县则有《醒报》，则有《商报》、《工余报》，邵阳则有《真理日报》，这些均为地方党主编之报纸，发行数即最多之《真理日报》亦仅六百余份。在被迫相继停刊后，党才注意到合法报纸的工作。在湖南有全省性的报纸有下列几种：

1. 《中央》即原《中央日报》之湖南版，言论稍平稳，地址邵阳，多销售于□□各地^①，但发行数不多，仅二、三千份。

2. 《力报》，为国民党员康德主办，言论较进步，发行数曾

^①原文如此。

到六千多，销售宝庆、湘中，颇受学生欢迎，五月封闭。

3. 《大刚》，衡阳出版，为当地三青团负责人毛健吾负责主持，言论最坏，常登摩擦文章。销行于湘中各地，销数颇广，实数不知。

4. 《正中》，为国民党员谭常愷（原为乙派，现为三青团）专为自己捧场之报纸，言论坏。销行于衡阳、长、潭各地，发行数最少。

5. 《开明》，为乙派领袖刘岳厚主办，原在茶陵出版，现迁衡阳。销行湘东各县，言论较好，发行数为二千多份。

6. 《华夏》，为湘鄂赣区某纵队姓叶之游击司令于今春集资创办，言论较好，系长沙出版，仅销售于长、潭、衡等地和他自身之部队，发行数不知。

7. 《国民》，政府机关报，为薛岳之喉舌，任启珊主编，常登湘党部之摩擦文章与转载各地之摩擦通讯。强迫摊派，为湖南发行数最大之报，普遍于政府系统与党部系统。因价较廉，商人亦多购阅。

8. 《大公》，长沙出版，派别不明，但言论还平稳，销数少。

9. 《阵中日报》，九战区政治部主办，除销行前线各部队，在湖南各地亦订购。

经过同志的努力，曾经在各报中创立过一些联系。今年五月，在薛岳严格统制各报与严格清查整理各报后，又丧失不少。如《力报》自今年一月自唐旭之同志进去为主笔后，直至五月初被迫离开，这时期社论大都为唐与中心县委的人写作。我党关于政治的东西亦系自桂林直接寄他们，因而更便于把握方向，能作及时的反映，编辑部人员对我大都友好。这里的三青团员、国民党

员都是参加青年记者学会的，为着它的正式成立，今年三、四月时，曾与邵阳县党部书记发生尖锐冲突，在报纸上公开的指责该书记。至五月，便为省政府严令封闭。

《开明》系黎澍苍奉命经手筹划者（黎系省委派往刘处之工作同志，后充刘之私人秘书），去年春出版，黎系总编辑，编辑人员一部分系《观察》抽出者，故多为我党友好之进步青年。五月改组，黎被迫辞职，继职者为原编辑部之青年，现与黎还保持着联系，故该报言论至今还稳重。

《华夏》编辑部原有同情者，《抗战日报》之周某旋为介绍进去，今年六月勒令停刊。

《国民》副刊主编系凌波学生，凌波曾与之来往，可起些小作用，后被发觉，受处分，现无来往。

《阵中》总编辑蔡鸿干为一较进步之青年，与徐老来往甚密。副刊主编之杨某亦系同志，与凌波联系者。今年四、五月时，为《团结》论文和通讯曾受到处分，六编辑人全部解职。

湖南各县大都有报纸，除偏僻县分为三日、五日刊之类外，多系八开之日报，党在这方面的联系更差。《麻阳民报》主编李谊之、《新化民报》助编孟月秋两同志都因红于最近（六月）辞职。他们的能力都强，且善于应付的，报馆当局极器重，离开后，便只有他们的一些同情关系了。《益阳民报》主编及另一同志尚能隐蔽下去。其他《湘乡民报》主编谭日峰、《溆浦民报》、《汉寿民报》等等，亦有点直接、间接的联系，作用都很小。

（三）出版刊物

去年在省委领导之下，出版了《真理》半月刊、《学生时代》半月刊，但都未到十期均因登记未准而停刊。《中苏》半月

刊因为田价人同志主编，有的可参加。妇指委会之《湖南妇女》亦有同志参加编委。曲江出版之《持久战》，去秋曾〔与〕湖南党委共编一时期。

（四）党中央通电、宣言的传播

前由报转载，现在只有油印或手抄，选择对象邮寄或秘密投递。为了避免当局的发觉而遭受阻碍，系之〈先〉好人而渐及其他，这只是那些经过考虑认为能力胜任、环境允许之地方才如此。但实际上很少按照自身的决定才〈去〉完成，只是县委、中心县等抄几份邮寄而已。

另附干部情况报告①

①原文未见情况报告。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两个阶段

抗战以后的湖南，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组织、民运等各方面说，都可以分做两个显然不同的阶段，在湖南统治了十年的黑暗势力到抗战发动以后开始了变化，北平、上海等处的前进分子、教授、学生甚至某些以前被逼迫不能回家和被逮捕的革命者逐渐回到自己的家乡里来，抗战运动，不可制止的在长沙及少数县城里展开起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何键离开湖南，张治中来做湖南省主席，以后跟着战争在华中更加紧急起来，全国政治形势好转，湖南省政府也颁布了新的施政方针，在内容上可以说不比抗战建国纲领有何逊色；经济上因为工厂内移，文化上因为学校内迁，文化人后撤，也曾盛极一时。一直到武汉撤兵，广州失守，这一年的时期中，一般的说是一个向上进步的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撤兵以后，敌兵攻下岳阳，长沙告急，湖南省政府迁沅陵。长沙大火以后，张治中被撤职，薛岳兼湖南省主席，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在许多方面看，是和全国政治形势逆转相呼应的，可以说是一个向后退步的时期。

当然，抗战的洪炉推动了各方面的进步。譬如在工作中锻炼出来许多青年干部，扩大了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群众政治认识相当提高，这一切就在后一阶段中，仍然是向前发展，最少也不会是后退的。这是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也就是说在倒退中仍然有它的前进面。

第二、湖南的政治情况

(一) 第一阶段的政治情形

在抗战初期，一方面因为全国形势的推动，一方面因为广大群众的要求，张治中主持省政是采取了相当进步的设施的。兹述其大的几点：

1. 惩办贪污。当张治中巡视湘中、湘西时，杀了三个贪官，当时影响很大。

2. 提高政治效率，反对萎靡不振。当张治中巡视各县发现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好多时候不办公，专门领薪水的事不少，他在公开报告中痛骂他们，尤其是对国民党，于是某些县长改穿草鞋了（如湘潭）。

3. 培养并用青年干部。办了两期青年干训班，招收初高中、大学学生，第一期约四千人受训，后分派各县工作，很收了一部分动员民众的效果。这里边很有一些是进步的青年，是诚心为着救国的。

4. 撤换并训练乡、保长。全省分区训练乡、保长，强调乡、保长要由乡村知识分子、校长、教员等担任，乡、保长几乎大部分是改选或是另新委派过了的。

5. 训练壮丁，武装壮丁。青年干部下乡主要的是担任训练

民众的工作，壮丁普遍给以武装训练，并组织各县民众抗日自卫军，各县县长任队长，另以一个有军事知识者任副队长，湘中、湘北、湘南一带是做了一下的。

6. 实行全体民众的社训。编社训课本，由青年干部在各城市和乡村中训练住民，这只是部分的地方做到，大多数是没有做到的。这种课本，一般的说是注意提高民众抗战知识和政治认识，对动员民众是有帮助的。

7. 对民众组织相当开放。当时省政府曾规定由民众组织按年龄、按职业、按性别的团体，如老人会、壮丁团、儿童团、工、农、商、学生、妇女等各类团体，不过真能如此进行的没有。

那时候，在长沙著名一点的团体有文抗会、职抗会、中苏湖南分会、妇女会、一致剧社、一九三六剧社、世界语学会等等，都是由民众自己组织和选出负责人的。

8. 对言论自由相当开放。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在湖南新办了许多刊物，不少是坚持正确主张的报纸，有《抗战日报》、《观察日报》、《大众日报》、《真理日报》（在邵阳）、《呼声报》（在溆浦）；杂志有《湘流》周刊、《前进》周刊、《火线下》三日刊、《中苏》半月刊、《湖南妇女》周刊等等。

外省刊物如《新华日报》、《解放》、《群众》，解放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等新的理论书籍和刊物，在长沙以及各县销行不少，只有少数县份是被阻禁的。

9. 对国共两党关系不认真防止磨擦，也不故意制造磨擦。当时虽有耒阳、衡阳、溆浦、安化、长沙等处以其他名义逮捕中共党员，茶陵、攸县、安仁等处发生地方团队暗杀和逮捕中共党员的事件，省政府在表面上总采取制止事件的扩大和调查解决的办法。

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很被张治中等尊敬。当时组织一个为着统一全省民众运动的抗战统一委员会，徐特立同志被聘请为常委之一。徐特立同志当时在长沙经常可以出席银宫的星期名人演讲，青年会、文抗会、职抗会等召集的座谈会，文抗会所办的政治性的训练班教课，以及各学校各团体的演讲。

张治中当时曾对人讲：“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

当张治中主持湖南政治的第一个时期，这一切设施和态度可以说是稍许进步的，给了民众以多少希望，给了抗战运动以多少推动，给了党的发展和工作以多少便利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许多政策执行得不彻底，尤其是对于民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兵役问题，优待抗属问题，免除苛杂，改善民生问题，惩治贪污、土劣，改善下层政治机构问题，土匪问题，都不能采取正确的办法加以解决，就是训练青年，改组乡、保人选，举行普遍的民众社训，也因为国民党原有势力居中操纵和阻难，效力大为减少，一切设施当然没有坚固的基础。短的时间一过去，薛岳一来，和国民党原有势力勾结一起，使湖南的政治不得不又走上黑暗的前途。

(二) 现阶段的政治情形

张治中主湘政时，除本省保安队、民众抗日自卫军以外，对于直接抗日的军队是不指挥的，对于省政完全自己处理，对于当时国民党特派员赖连所领导的党部不十分合作，很少受国民党的影响。

薛岳兼战区司令，省政府各厅设茶陵，以秘书长李扬敬代行主席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毓尧为省府当然委员，每次参

加会议，这叫做加强党的领导，所以现在叫做党、政、军合一，
在湖南也实现了党权高于一切！

现在省府委员名单为：

1. 薛岳，主席，复兴社，忠实和崇拜蒋介石的人。
2. 李扬敬，秘书，代行主席，薛岳的部下。
3. 陶履谦，CC，民政厅。
4. 朱经农，CC，教育厅，何键时就在湖南，教育界的罪人。

5. 杨锦仲，不明何派，财政厅。
6. 余藉传，CC或是接近CC，建设厅。
7. 李毓尧，CC。
8. 陈渠珍，接近CC，军人，湘西的土皇帝。
9. 谭道元，原是军人。

由这个名单可以看出，现在省政府实际上是受CC操纵的。

薛岳自己在长沙（住乡下）主持第九战区的事务，而九战区政治部主任是康泽，秘书是方学芬（法国留学生，稍许进步一点），薛最信用的政治顾问是任启珊，可以说除方以外，都是最不讲理和专门反共的一窝。

我们且来看一看薛岳主持湘政以后的设施和成绩吧：

1. 取消抗战统一委员会，组织党政包办的动员委员会。以前的抗战统一委员还有八路军驻湘代表参加（以湘省名绅的资格），还有工会、商会、学生会代表参加。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就以省主席、县长为当然主任委员，再加县党部书记长及所谓法定的代表组织之，一切都操之党政方面，民众无参加可能，但是也从来未曾看见动员委员会做过什么事。

2. 取消青年干部训练班，取消各县社训。以先张治中时所

派到各县进行社训的学生都令其回原来学校读书，民众训练的工作，交给各县政府经过乡、保长去进行，等于停止进行。

3. 取消民众抗日自卫军独立的系统组织。指定县长和县书记长为正副队长，缩小民众武装数量，每乡仅数杆枪。

4. 设立县政研究会。第一届训练二十八人，都是由薛提调一些军事干部，如营、团长等，受训三数月，派赴各县当县长。第一批委派出去的约七、八人，其余或派其他工作，或是候缺。

5. 严剿土匪。湘西是土匪最大的集中地，其中势力较大的是陈渠珍，其余还有集中三、四千人枪的大帮土匪不少。薛强调彻底剿尽政策，集中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到湘西，围逼他们自动投降。因为土匪的队伍大多数虽在名义上业已收编，一则薪饷不够，仍然实行劫掠以维持生活，一则不愿意开出来打仗，拒绝往外调动的命令，时常反复，陈渠珍即依此自大，坐收其利。这一次薛以大兵压迫，一方面土匪部队也多少受了抗战第一、反对内战的影响，大部份已收编为新编第六军，开到常德、桃源一带整理，预备上前线，有一些也就暂时自动解散，隐藏起来了。至于产匪的根源，当然还是未去掉。

6. 抢运沿洞庭湖积谷。在敌人逼境并屡次到沿湖各地抢劫谷米的时候，这诚然是要政之一。去年各地丰收，沿湖所剩谷米当在五百万石以上，但是因为军政当局的垄断，商家办米就说他是居奇，是好商，以致商人不敢运。接近战区各河内都设有工事和埋置水雷，交通时受阻碍，军队封锁船舶，船夫视为畏途，不敢出远门，无船可运等等，使这一政策不能顺利完成。湘西、湘南一带，谷米价格一般都上涨起来了，形成一则太多，一则缺少

7. 兵役成问题。因为对民众缺少政治宣传，强制民众当兵；因为虐待被征壮丁和新兵，用绳索捆绑壮丁，待新兵如同罪犯，关闭室内，屎尿都不让自由，又用体刑，新兵开小差被抓回的有被钉死或打死的；因为不实行优待抗属；因为兵役办理不公平，有钱有势的人家那怕是四、五个儿子也不会被征；因为民众生活日渐困难，越是穷困越要养家等等，兵役问题最是麻烦，最是引起民众怨恨。于是拦路捕捉外县过路壮丁，夜间派枪兵围房子捉壮丁，用钱买壮丁，贿买乡、保长免征或是缓役，有些地方甚至闹到壮丁都不敢在家里睡觉，不敢在田野工作或是远离家乡，或是兄弟分开产业，假报自己是独子或长子，以避免兵役，各种怪现象都有。

据说现在每个壮丁都要总抽签，每个壮丁都要随身带兵役证，没有兵役证、免役证或是缓役证的就不能走动，就有被捉去当兵的危险。

8. 难民分到各县按保寄养。战争在豫皖赣一带时，湖南所到难民确是不少，被收寄的在十五万以上。于是决定分派〔到〕各较安全县份，每县一千八百到四、五千不等，各县再分派到各乡按保寄养，规定每日发伙食钱一角。可是，因为难民不懂当地方言，到乡下去不一定能领到伙食钱，无法谋生，难民怕被人谋害（溆浦县曾发生难民偷吃小菜而被当地打死的），坚决拒绝下乡，或是下乡以后又回城市。最近则有许多难民私逃回沦陷区域去的，政府曾用拦路枪杀逃走难民的手段，也不能制止难民的回乡活动。

在芷江的榆树湾曾设立难民开垦区，不过充其量仅能容五千多人，并且因为难民缺少资本，没有牛，没有农具，要他们做到养家活眷仍然成问题。

在沅陵、宁乡都曾由社会团体创办难民工厂，或是纺纱或是缝衣，但不过容纳六、七百人，并且其中不少是本地的贫家子女。

9. 训练乡、保长。按各行政专员区集中乡、保长受训，美其名曰提高乡、保长政治知识，改进下属行政机构，实际上少不了一门防共、反共的训练，对于民众的真正利益并没有帮助。现在党、政当局正在进行强制各乡、保长都要加入国民党，不是国民党，不能担负乡、保长的职务的计划。

10. 税捐重重，人民生活恶化。一两银子的田赋，抗战以前连正常附加也只五元上下，去年则增加到十八元以上（湘阴）、二十元以上（长沙）的。水陆大道，到处设关，无论是外来货或土货都要抽通过税，所抽税额有百分之百的，最近才由中央颁令不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货价。上海入口货常有被指为日本货被扣押充公的危险，因此日用品价格迅速上涨无已。

11. 统制食盐。湖南原来吃淮盐，抗战到达长江流域以后，全靠由浙赣路、粤汉路供给浙盐和粤盐，最近则只能依赖川盐。运输困难，食盐总在恐慌中，于是决定由政府统制贩卖。近来，则改为由政府统制分配，按乡、保、甲分派，每人每日合三钱盐，但是常常隔几天不分。另一方面，党、政机关和军队可以凭条子买盐，于是民家只好经过他们的手出重价偷买食盐。官价定三角六分多钱一斤，而军人偷卖的盐总在七、八角以上一斤的高价，运到乡下则卖一元一、二角一斤了。长沙一带的农民，每一石谷不过能换到二斤多盐而已，许多贫民只好不吃盐。

12. 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当张治中未离开湖南时，省临时参议会就已经开始筹备，出席人的选出分为由各〔地〕提百分之六十，各团体代表百分之二十，省府提百分之二十。当时我们向省

府、省党部提出，省临时参议会应该和国民参政会一样有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派代表参加，张治中本人表示接受，并且据他说徐特立的名字已经通过了。我们一共提七人，后来依南方局意见再加提六人，一共十三人。屡次催促，省党部、省政府两方面都不作具体答复。等到薛岳上任以后，名单正式发表，我党所提名单竟不列一个，连徐老的名字都抹去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省临时参议会在长沙开第一次会议，有人说“这是一次CC派大会”，参议会出席人之一任凯南先生说：“这个会毫无意义，毫无益处，仅仅是大家说说话而已。”实际上确是如此。

议长赵恒惕在会议中曾高叫着：“要提高乡、保长地位，我愿意回家去当乡长去！”或许他都感觉到省临时参议会是无用的吧？

13. 剥夺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一类杰作就是借口没有领取登记证，停止《观察日报》、《真理》旬刊、《时代青年》的出版；禁止各机关、各学校不准阅读《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并一切进步的理论书籍；一切集会要事先得到党、政当局的同意，一切群众组织要经过登记，经过审查，得到党、政当局的允许才行。

用这一套道理解散了塘田战时讲学院，解散了衡山的战时工作服务团，赶走了许多外来的团体。

14. 制造摩擦。一切以前的逮捕或杀害我党的同志的案件都不能妥当解决，并且在薛岳指挥下，有计划的布置了平江惨案；不准八路军、新四军通讯处的设立；不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在湖南居住；各处调查、登记和破坏中共的组织。”以上这一些，如象我只是说到目前政治形势的逆转、倒退，没有说到一点

好的方面，其实在去年六月省政府还发表了一个新的施政大纲，一般的说条文辞句都写得不错，不过没有一点见诸实行而已。

15. 政治上总的方面虽然如上所述，但有时也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并不是全省完全一致。例如：

临近战区的县分岳阳、平江、南县、宁乡在敌人将要攻入湘北时，都曾表现过某些进步的设施，接近进步分子，组织游击队，对群众运动比较开放，对下属行政机构稍予注意，比较认真训练壮丁、武装壮丁等等。

某些行政专员，如徐庆誉（驻浏阳）、曹伯闻（驻郴县）、岳森（驻邵阳）都是比较进步的。不过行政专员大概都没有实权，不能够起决定的作用，他们不赞成反共，不贪污腐化，只能自己做个好官，有时还拗不过上峰的命令、国民党的攻击。

某些县长，如以前南县蒋先启，淑浦后来又调沅陵的张某，以前岳阳某县长，都是比较接受进步设施，接近进步分子的，不过都逃不了国民党的反对攻击，不能久于其位，都次第被撤职了。

（三）湖南的经济情况

湖南的经济情况，一般的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来说，就是武汉、广州未失守以前为战时繁荣时期，武汉、广州失守以后为衰落时期，不过不象政治情势那样明显罢了。现在分述如下：

1. 工业：湖南新式工业比较说长沙是集中的地点。以前长沙有纺织厂、修械厂、玻璃厂、面粉厂、织袜厂、织布厂、电厂、白铅炼厂、黑铅炼厂、小机械厂，抗战后还从外埠迁移来了电器厂、汽车修理厂、被服工厂、手工业工场为织布、漂染、织袜、肥皂、牙刷、缝衣、竹业、木业、泥水业、皮革、制笔、印

刷、铜铁器、码头伏、洋车伏等，数目更是不小。长沙大火以后，部份工厂、工场是迁移别处或乡下，但是因此损失而不能重新开工的居多数。

新在湖南建设的有酒精厂、植物油厂等；军器工厂集中湘西的有沅陵、安化（烟溪）、辰溪（二处）等四厂。

纺织厂原来移一部份到沅陵，现再移黔阳的安江，规模不及以先大。

湘西那些偏僻的地方以先连手工业都不发达的，现在有了许多大规模的机器工厂，尤其是军火工厂。

各种手工工场原来以集中长沙、益阳、常德、邵阳、平江、浏阳等处为最多，现在以避免空袭，都疏散到乡下了。又以原料（如棉纱、颜料、干碱、漂粉、缝机、袜机等等）缺乏，燃料涨价，资金滞塞等原因，手工业在总的数目上说是相当缩小了的。在湘西、湘南某些地方局部的看，比以前又是较为发达一些，并且木机、手纺车正在发明中，家庭纺棉花的事又会恢复起来的吧。

2. 农业：湖南的农村出产以谷米、茶、桐油、鱼类、茶叶、菜油、猪牛、皮革、猪肠、猪鬃等为大宗，武汉、广州失守以后，这类东西都无法出口。去年是大丰收年，洞庭湖沿湖各县谷米无法大批运出，鱼类出产的洞庭湖因为敌艇劫掠无法活动，茶叶、桐油是对外贸易大宗，现在都由政府统制运销，数量减少，价格较前也大为低落（桐油价格最高时卖到七十余元一石，现在才二十余元一石），这都是湖南农村经济最大的损失。

至于一般农民经济，也同样日趋贫困。因为农产品价格没有提高（湘西、湘南米涨价是运费花的太多），外来日用品如盐、煤油、布匹的价格都增加了四、五倍，一般农家都弄得入不敷

出；因为捐税增加，田赋也增加四、五倍。抗战后，以前苛杂大半仍然存在，再加上新的什么自卫队薪饷用费、购枪费、出征壮丁慰劳费（其实就是一保公摊的买壮丁费，买一壮丁要出身价六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不等）、鞋袜寒衣捐（是按户摊派的，鞋袜、棉背心由各民家做好缴纳，或是出代价五角至一元五角之谱）。临近战区各县为破坏公路和大道，动员劳役辄以数千数万计，伙食由乡、保派收，被征的人只有饭吃，无工费，家中无人可供劳役的，还要抽破路费，这个办法必然耽误了农民的时间，还要拿出钱来破坏铁路、公路，常常要壮丁离自己家乡数十里或百多里，耽误时间有到一星期或十多天的，农民视为苦差。

还有一种不著形迹的大损失，就是某些地方因为要躲避壮丁，不敢在家里住，直至远离家乡，减少了农村中的劳动力。

尤其是佃农，辛苦一年，大半粮谷送给地主，自己所收才三、五十石，以长沙附近的谷价算，才抵百五十元左右，怎样能养家活口！所以许多佃农都要求退佃，因为他们实在不够生活。

就是一般自耕农和中农也因为不能经营副业，弄不到额外收入，也大半在崩溃中。

3. 商业：经营商业的范围现在是大大的缩小了，和海口各商埠断绝了关系，土产不易输出。城市中有被空袭的危险，临近战区如长沙等处的较大商家，有小部份转移到湘西，甚至桂林等处，大部份是已经停止营业。

长沙大火，商家损失不小，火后有许多是由店员合股经营，大老板都不愿意冒险复业，所以资本是大大减小了的。

到处设卡，收关税奇重，有些货物抽到百分之百，又最易被指为仇货加以扣押，甚至没收，使商人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样也就提高了货价。

总的说起来，商家资本额是减少些了，大家都做入口投机生意，利润倒是较高的，蚀本的是少数。

4. 交通：新建设的固然有些，如洞榆公路修成功，烟(溪)江(大江口)公路在赶修中，但是破坏的更不少。长沙到沅陵的公路破坏到桃源以上，长沙到邵阳公路只通到永丰以上，长沙到衡阳公路，衡山以下都破坏了，长沙到武昌，长沙到浏阳以东的公路都破坏了；铁道则岳阳以南涿口以北的粤汉路、湘赣路、湘黔路都已彻底破坏，平江、长沙、湘阴、宁乡等的大道都已破坏；水道则湘江从湘潭以下，其余洞庭湖旁各小河都已布置工事或放置水雷，时常炸毁船只，死伤人命，军运、商业和旅行都是极不便利的。当然，在防阻敌机械化部队，延缓敌人的前进，是有多么效率的。

综上所述看起来，湖南经济情况是在下降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的加多，土地价格下降，只是军事工业大规模的建立在湖南，手工业在某些地方有些发展，是好的现象，民众生活不但不能改善，反而更加困苦。因此，对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是会逐渐增加其困难的。

(四) 文化教育状况

1. 文化繁荣时期：湖南文化教育，在数量上说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不过在何键统治时，称为最黑暗时代，在学校内提倡读经信佛。抗战以后，平津、上海告紧，学生回湘开始努力救亡宣传，办得有《湘流》、《前进》等周刊，组织了文化界抗战协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不久以后，继起的有《大众日报》

《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火线下》三日刊、《中苏》半月刊、《妇女》周刊等在长沙，《真理日报》在邵阳，《呼声日

报》在溆浦出版。

在长沙组织了一致剧社、一九三六剧社、世界语学会；在湘潭组织了南国文艺社；在新化、溆浦、南县等都组织了文艺性质的团体。

当时迁移到长沙的学校，有北平清华大学、民国学院，并且新组国立联合大学，收容平津、上海各地大学学生，这里面来了许多进步分子，推动了湖南的救亡运动。

当时在长沙并少数县城，都组织各种座谈会，作理论上的研讨，有群众大会听取名人演讲，徐老到长沙后就作了许多次的演讲。

《新华日报》在长沙设分销处，生活、上海杂志公司、新知、大上海图书公司、明明〔书店〕，以后有新路书店并设，大批销售各种救亡理论、唯物辩证理论、马列主义等书籍，《群众》、《解放》、《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

战时书报供应所（现移邵阳），沟通各县文化也取了相当作用，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

2. 文化衰落时期：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之后，情形大变。许多外来文化人离开了湖南，失掉了长沙文化中心，分散了力量，反动势力对文化运动渐次实行压迫，学校分散各县，易为学校当局束缚，因此等等，湖南文化运动日趋下降。学校的数目，各县民众教育馆的设施，倒未见得减少。

湖南文抗会因为其中国民党委员怠工，以致不能恢复；中苏协会迁沅陵；一致剧社在沅陵、常德一带工作；其余文化团体或自动解散（如一九三六剧社），或不起什么作用（如南国）。

《大众日报》、《真理日报》前后以经费困难停刊；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后，《观察日报》、《真理》旬刊、新创办的《时代

青年》，都以得不到登记证被迫停刊；《抗战日报》自己解散。到现在，湖南进步的报纸仅仅一个去年八月才创刊在茶陵的《开明日报》，正在国民党攻击预备把它打倒中，《开明日报》的前途，恐怕不是被迫停刊，就是开倒车。

中等学校大多数集中在湘潭（三个）、湘乡（四个）、蓝田（八个）、新化（十个以上）、邵阳（五个）；湖南大学迁辰溪；沅陵、辰溪、乾城、永绥、凤凰各县还迁来不少中等学校，最大的是国立安徽中学，有学生五千以上。邵阳的国立第十一中学（收容湖南沦陷区及其他学生），也有学生三千以上。国民学院迁溆浦。这些学校多半分散在农村中，无论学校当局如何禁止学生外出，禁止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尤其是严禁阅读共党报纸和理论书籍，但是青年总大多数是向上的，他们不断叫出自己的苦闷，不断要求抗战教育。国立安徽中学的学生，男生则开小差，女生则夜间痛哭，连他们的校长邵华先生也不得不长叹：“为什么我用心教育，你们就收获不到丝毫效果！”岳云中中学校长当他发现他的学生投考“陕公”和“抗大”时，连呼曰：“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为之泣下。湖南大部份学生都感觉得自己是住集中营，不是住学校。

各处经售进步书籍的书店，在某些地方被封闭（常德、沅陵），但现在长沙、邵阳、衡阳、茶陵、辰溪、兰田等处仍然有生活、新知、新民、五五等书店存在，不过被搜查、被没收书籍则是常事。反动派想用这个办法使书店蚀本，自己倒闭，同时由三青团的系统在各重要县份开设青年书店，推销汪派、托派刊物，不过生意上到底冷淡一点。

现在国民党对异己者严厉执行检查制度，同时不给登记证，使非国民党办的报纸、刊物得不到合法地位。

强迫教员（中、小学校的）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加入三青团，国民党也在认真执行。

湖南唯一实行抗战教育、中央领导下的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仅仅维持了七、八个月，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被军队围迫解散。溆浦的卢峰中学，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停办了。不过还有些个别进步分子领导的学校在各地存在着，例如新化上梅、益阳赫南、屈镜文办两校（民教馆名义）。

总之，湖南的文化教育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又走上了黑暗的前途，青年们在威迫利诱中苦闷着，怯懦的会畏缩，勇敢的会力争光明，造成这种形势最负责任的是教育厅长朱经农和彭国钧等人。

（五）军事

对这门没有详细的调查，实际情形又不知道，只能简而简的说一点。

湖南的军队可以分为：

①前线战斗部队：

岳阳、湘阴、平江、浏阳等处。

②补充部队或预备部队：

宁乡、长沙、益阳、常德、汉寿、南县、华容、安乡等处。

③休养和补充缺额部队，八师人以上：

湘乡、邵阳、武冈、芷江、辰溪等处。

④在训练中的新兵：

一九四〇年要抽集壮丁三十万名，邵阳、桃源、零陵等处为集中地。

⑤省保安队：

无一定驻地，由省保安司令调动。

⑥宪兵。

第三、湖南的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止的情形)

先要声明几句，我因为不是担负组织部工作，又常在外县巡视，所以全盘的了解很差，郭建鸣同志有一个详细的报告，如果长江局转来的话，应该把他的报告作为根据，在数目字上我这个报告是很靠不住的。

(一) 湖南党的发展过程和有利条件

湖南有马日事变，有秋收暴动，有游击区，阶级仇恨是相当深的。大革命时代的组织基础，除在平、浏、茶、攸、汝、桂一带能有武装保卫以外，可以说所留无几。

一九三七年抗日高潮已经到来，一直爆发了“七·七”事变，这给党在湖南的恢复以极有利的条件。请看以下事实：

①平津、上海各地教授、文化人、学生回湘或转学到长沙国立联合大学，其中有我党同志二十多个。

外来文化人和学生在长沙组织进步刊物，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等，给湖南抗日救亡运动以大的推动。

②湖南各县有许多老同志抗战以后回家了，在监牢里释放出来了，以前不敢动，现在敢动了，他们在各处开始救亡运动，甚至组织支部（如溆浦的翟、刘等）。

③徐老回长沙，八路军设驻湘通讯处，许多脱离党的同志，许多向往中共主张的青〔年〕都自动找来了。

④外地机器厂、兵工厂、抗战团体往湖南迁移，也送来了党员。

⑤稍后，抗大、陕公在湖南公开招生，党很方便会到许多进

步青年，一小部分在陕北求学以后又回去了的。

⑥张治中办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各县去了。

⑦长沙危急，学校移后方，也给党以分布到各县去的机会。

⑧省委负责人以及分配干部到各县去发展组织。

⑨还要说到的，就是中共主张完全公开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开前线，得到全湘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二) 对于发展党的不利条件

①顽固分子却处〔处〕威胁青年，甚至污蔑、逮捕、杀害中共党员。

②国民党统治破坏、压抑群众运动，高唱防止共党活动。

③国民党破坏进步报纸、杂志，查禁没收理论书籍，封闭进步学校（如塘田和卢峰），禁止群众集会、结社。

④党的原有基础散布得不平衡，宣传还不够深入和广泛。

(三) 发展党的实际情状

一九三八年七月，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大量发展党员、增加党员七倍的指示，决定计划动员所有组织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努力，到十月检查，实际增加了六倍有余，由五百多人增加到三千人左右。

发展最快的要算长沙城乡，长沙市某缝纫支〔部〕一月内由五人增加到三十多人，铜官瓦窑区总共工人三千多人，到一九三八年底发展到八百多人，该区负责同志专以发展党员为工作优劣的标尺，介绍最多者认为模范支〔部〕、模范党员，并颁发奖品以为鼓励。

溆浦刘某同志向县委报告，西北乡某地可以成立区委，已有

同志八十多人，并指定三人为区委负责人。过三个月去检查，八十多人仅是谈过话，三个负责人还未见过面。

后来检查铜官特别快的实际情况，发现那完全是拉伕主义，有的一个加入就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拉进来了。有一个圈子里的小头目，他一下子介绍了四十多人，原来就是他的同行兄弟，区委对于他们的履历、政治表现、工作态度一概不管，到后来一人退出，就牵连全家或全帮兄弟。他们各支部差不多都不分配工作，不纳党费，不服从党的决议，他们把党腐化了，把党的纪律破坏干净了，省委只好要他们整个解散，重新登记。

另外一个现象和上述的相反，例如一个可以完全在曹某同志领导下的女校，七、八个月不能发展一个人。省委派白某同志到湘西去建立组织，三个多月才收获到三、四个可靠的同志，再加上几个同情者。邵阳、新化在开始一个时期，半年多还停留在原有基础上。

在发展党的一个拉夫、一个关门的两个危险倾向，很久以后才把它克服过来。

（四）由量的发展到质的巩固

一九三八年底，湖南党开始注意到党的巩固问题，但是还是叫的“在发展中巩固党”的口号。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湖南党员总数共计有五千多人。

从这以后，政治形势逆转，湖南省委根据南方局的决定，着重于党在质量上的巩固，在湖南则停止党的发展，号召全党严格清查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将支部中坚强的党员和不了解政治、不认识党的分子分别成立小组，无教育希望、不可靠的分子则加以隔离，只维持个别关系，以至开除出党。整个区有问题的，如铜

官则重新登记。

组织常益、衡阳、邵阳、湘中中心县委，将省委干部分配到中心县委去，改组各县委，对干部整个加以调整，以加强下级的领导。

严格执行党纪，号召全省党要做到支部按时开会，同志绝对服从决议，进行工作，每月缴纳党费。

以环境关系，不能经常开办大的训练班，号召全省党组织、各县、各区、各支的学习大组提高同志们政治水准，尤其注意区、支的干部训练。

湖南党经洗刷后，党员数量会减到三千多人。例如铜官原八百，会只能保留一百至二百人；湘潭原来五百以上，只能保留百多人。

（五）有组织的地区和党员数量

湖南省委所辖地区原来不是全省：

①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东部属湘鄂赣特委。

②茶陵、攸县等处原来属赣委。

③岳阳、临湘、醴陵、长沙、湘阴在湘北紧急时，原已移交湘鄂赣特委；以平江惨案，长沙关系仍保留在湖南省委。

④南〔县〕、华容、安乡三县，一九三九年夏移交鄂委。

湖南一共有七十五县，有党的组织的六十县以上，在湖南省委直属下的五十县以上。我们把这六十五县分为七个大区域，组织特委或中心县委，现在将已有组织的五十县分区表列如下：

①湘中五县：

长沙（县委）、湘潭（县委）、湘乡（县委）、宁乡（县委）、安化（县委）。

以上五县委，约八百八十名党员。

②常益七县：

益阳（县委）、沅江（县工委）、汉寿（县委）、常德（县委）、桃源（特支）、澧县（整理中）、临澧（整理中）。

以上三县委、一县工委、一特支，约六百六十二名党员。

③衡岳四县：

衡山（县委）、衡阳（县委）、祁阳（区委）、零陵（支〔部〕）。

以上二县委、一区委、一支〔部〕，约三百名党员。

④邵武五县：

邵阳（县委）、武冈（支〔部〕）、新化（县委）、新宁（个别关系）、城步（个别关系）。

湘西南四县：黔阳（支〔部〕）、芷江（支〔部〕）、晃县（支〔部〕）、通道（个人）。

以上二县委、四支〔部〕，约三百名党员。

湘西南暂辖于邵阳中心县委。

⑤湘南十三县：

郴县（县委）、耒阳（县委）、安仁、资兴、永兴、宜章（县委）、汝城（县委）、桂东（县委）、桂阳、嘉禾、兰山、临武、常宁。

以上五县委，约一千名党员，其余不明。

⑥湘西十县：

沅陵（县委）、溆浦（县委）、泸溪（县委）、辰溪（县委）、大庸（个人）、永顺（个人）、保靖（支〔部〕）、乾城（支〔部〕）、凤凰（支〔部〕）、麻阳（支〔部〕）。

以上四县委、四支〔部〕，约二百党员。

以上共计二十一县委、一县工委，区委、支部、小组数目不详（这些数目请以湖南组织部郭同志的报告为准），三千三百四十二名党员。

（六）党员成分

这我简直无法提出数目字的统计，以我估计，大约是，
产业工人约百分之三。

手工业工人约百分之十五。

农民约百分之六十。

知识分子约百分之二十。

军人约百分之二。

①产业工人包含于：

新化锡矿山，湘西辰、沅、烟溪兵工厂，衡阳、粤汉路，湘西公路，晃县汽车厂，沅陵、祁阳被服厂，常宁水口山，宜章香花岭。

以前长沙有：纺纱厂四十以上，黑铅炼厂五，白铅炼厂十三，码头二十以上，长沙大火后都分散了。

②手工业工人以下列各地为多：

长沙、铜官一百以上。长沙市以前〔有〕缝纫支〔部〕四十以上，织布支〔部〕二十七，现可恢复一部分。

益阳

汉寿

常德

邵阳

③知识分子：

中、小学教员以汝城之小学教员为最多，长沙、益阳次之。

学生则以湘乡、安化、新化为最多，湘西、湘西南各才建立组织的地方都是教员或学生。

④军人：

军中同志原来几达二百人，近以联络不易，军队流动性大，减少一些了。

⑤农民：

除党员数量很少的地区以外，农民几乎都占多数，尤其是湘中一带，农民中的自耕农、贫农占多数。

(七) 党龄

湖南老党员不多，以我所知道长沙、宁乡、益阳、常德、汉寿、沅江、湘潭、湘乡、邵阳、溆浦等县有三、五人不等；湘南为游击区，老同志较多，县委以上领导机关老同志占多数，总数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二十人以上，由省外来的以外，有一小部分是重新介绍加入的。

湖南党员绝大多数是一九三八年加入的。

(八) 女同志

依妇女部统计，全省才一百零二个女党员，在全省党员中才百分之三弱。其中大部分是女教员、学生等知识分子，女工、农妇占少数。

女党员为什么这样少，其原因在于：

①还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尤其是县、区以下的领导机关忽视这一工作。

②工作未深入到妇女群众，尤其是女工、农妇中去。

③妇运干部缺乏，许多积极分子离开原有岗位。在湖南，妇

女干部多半参加在女青会、妇女慰劳会、儿童保育院、宣传队等处工作，工作对象并不是妇女。小学教员如果不由学校走进农家，也是不容易接近妇女的。

④目前湖南的妇运一般的还是普通救亡运动，并未关联到妇女群〔众〕的本身利益，因此不能团结她们，锻炼她们。

（九）干部问题

①数量：湖南到底有多少干部，我手中无此种正确数字。据大概估计，特委、中心县委、县委一级的约九十人，区委一级的在三百以上。

②干部性能：湖南干部中一般的说，最感缺乏的是组织人才、工运人才，文化人才保留得也太少，很多人都离开湖南了（老练的只留下谭、张、翦、杨、潘等数人而已）。

③干部的党龄：老干部很少，估计在六十到一百左右，县委以上老干部约占三分之二，区以下则几乎尽是新干部。

在工作中，表现出来老干部比较谨慎，新干部在政治上较开展，许多县的工作（益阳、南县、湘潭等处）是由新干部建立或开展起来的。

（十）领导机关

（1）省委：

①人数：省委原来九人，高、郭、任、聂、蔡、王、徐、袁、帅，现在留在湖南的仅高、聂、王、袁、徐。而徐不便参加会议，袁参加中心县委工作，省委实际上仅留三人。省委秘书涂，青委李、陈、□，文委任、潘、杨。

②省委会议：每周举行常委会一次，三个月举行全体会议一

次。

③各部门分工：原来分为书记、组、宣、统、军、民各部，下设文化、工运、妇运、青运各委，实际上因为各常委轮流在各县巡视，除组、军两部设于事外，都是光杆。各部、各委的独立工作，始终未建立起来。

④对下级的关系：省委领导特、中〔心〕县〔委〕一级。青委轮流巡视各县，传达省委的决议，开办训练班，收集各项材料报告省青委，非省常委所决议，巡视员不能擅自改变。

全省交通网正筹划建立中。

（2）特委、中心县委、县委：

各级党委名单一律由省委决定，最近因为保持秘密的关系，把已经暴动（露）了的工作同志一律加以调整，各级党委负责人以三人为限。

注：我以为常益、衡岳、湘中三个中心县委实际等于特委，因为这三个委员会都有自己独立的负责人，他们要经过县委才能领导支部，这和湘南特委是一个形式。

（3）区委、支部和小组：

湖南省，区委在农村中尽量以一个乡为范围，支部以保为范围，小组则以五人为限。

（十一）县委的领导

大部分在改进中，部分县委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如决定保、甲长人选，介绍教员，参加民众武装，揭破与排除汉奸势力，慰劳过路友军，组〔织〕担架队、公路大道破坏队，办壁报，开书店，各县都有些收获。

(十二) 区委

大部分缺少自动工作能力，区委干部多数是不脱离生产的，常常感觉到时间不够。

不能明析的建立各部门工作，书、组、宣等所负工作差不多无什〔么〕分别，每个人分配着去出席支部〔会〕。

区委干部以政治、文化水准较低，不善于作政治分析和报告。

自己的力量差不多都不能独立开办训练班。大部分还不善于研究工作经过，提出工作经验。

总之，湖南大部分区委还只能被动的执行县委的指示，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

(十三) 支部

①会议：许多支部是能够按期或不定期召集的。

②大部分支部不善于认识环境，布置当地工作。在会议时，每每空谈政治。有某些支部逐渐能够关心当地问题，如兵役、征款、改选保甲长、粮食、食盐等问题，支部生活就逐渐活跃起来。

③对于纪律，一般还很少注意，如走动时不知道拿介绍信，不能按月收党费。

④支部委员会的分工，一般是不明确的，很容易弄成书记管理一切的现象。

⑤一般地不知道教育新党员。

⑥支部选举负责人时，常常容易发生“他闲一点，生活有办法一点，可以担任书记”的观点。

(十四) 党内教育

省委前后曾五次办训练班，注意训练〔县〕以上的干部。课程是：政治、统一战线、游击战、民运四项为主，还收获到相当成绩。

县委、特委办训练班颇多，几乎每县都办了几次，因此养成不少新的下级干部。

提高党内学习精神。党六中全会决议传达以后，开始努力提倡，但仍很少成绩。

普遍的训练新党员，在长沙时，省委曾指定专人负责进行过。一般的说，对这一工作是做得太差。

(十五) 执行纪律和思想斗争

对于这一点是注意得太差的，以致普遍发现不缴纳党费的，转移别地不拿介绍信的，不严格保持党内秘密的现象。

一九三八年南岳集训，三个新党员被威胁时写了悔过书，党给以开除的处分，并通知全党。

新化某新党员同样被县长威逼时写了悔过书，当给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①

至于思想斗争的事，一九三八年在长沙市曾发现恐惧国共重行分裂、马变再现的观念，当时开展全市党的讨论，指明当时统一战线正在开展，马日事变是不会重演的。

一九三八年底，湖南某些地方曾普遍发生要求把党公开，党指

①此处编者删去一百二十余字，系举例说明一些自首分子情况。

明是太幼稚太危险的见解。

第四、统一战线

(一) 开始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

湖南从一九三八初徐老到长沙后，就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实际活动，省委也就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但是当时还只是注意到群众团体的调整。例如：

湖南文抗会在被省党部几乎要强制封闭的时候，党领导他们改选理事会，吸引进去几个国民党员，以免激烈冲突而能继续工作。

国民党要封闭职抗会，省委主张保存职抗会实力，不采取解散的方法，而是并入长沙工抗会。

那时候，对统一战线工作是没有系统、没有计划的。一九三八年九月听取南方局的报告以后，对于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方才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依照中央指示，统战部的工作要以专人负责，任务是调查友党、友军和政府对本党态度，收集材料加以研究，指导公开工作同志的工作，调整友党、友军、政府和本党、八路军、新四军间的关系，团结进步分子等。

可是，湖南党省委以下各级领导机关的统一战线部都是有名无实，曾未作过工作报告，党的系统公开了的同志只有任作民、衡阳的李华棋而已。至于因为工作方式不好，行动过于暴露，因而被国民党看出或是被进步分子找到的倒不少，长沙、益阳、汉寿、沅陵、溆浦、新化、邵阳、湘潭、郴县、耒阳各处都有，以至在工作上受到损失。

现在且将以前曾调查过、研究过以及和政府、友党、友军等

关系分别报告如下。

(二) 湖南的国民党

1. 省党部：

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很长时期以彭国钧为领袖，叫做甲派，和当时掌握政权的何键一派叫做乙派的相对立。

彭国钧到湖北当特派员的时候，湖南国民党的特派员是赖连，赖连仍然继承着甲派的衣钵。

何键离开湖南以后，乙派很受打击。

张治中主湘政后，复兴社的势力在湖南开展起来。张治中很不满意赖连，常常骂当时的国民党为腐化，为只领薪水不做事的懒东西。

乙派为着保持实力，就各方面找帮手，有的接近进步分子如刘岳厚，有的转入复兴社。

现在湖南省党部的是包含各派的分子，而以甲派即CC派为主，主要负责人为：

李毓尧——主任委员，以前无派，近年加入CC。

肖逢蔚——书记长，CC。

谢祖尧——CC。

仇硕夫——CC。

周邦式——CC。

伍仲衡——以前为改组派。

肖训——

秦镜——

刘岳厚——以前何键派，不负实际责任，被人反对，较进步。

熊雄——F?

黎养牺——F?

省党部移沅陵时，分设湘中、湘东两视察团。现在省党部移茶陵，长沙设办事处，以伍仲衡为主任。

2. 国民党县党部：

甲派（CC派）在各县很占优势，因为他们始终把握住教育机构，以前乙派完全依恃政治势力，这样在各县就不容易固定，很易随县长的进退而转移。而甲派则根深蒂固，现在各县党部书记长差不多全是教育界人。

祁阳、零陵、永州几县县党部在省党部改派书记长时，曾拒绝交代印信，发快邮代电，反对撤换，结果是失败，因为他们是乙派。

国民党的党部在各县无论有无党员是要设立的，因为好安置人，好发通电，拥护某某，反对某某，至于党权高于一切还是政权高于一切，这要看政权是拿在那一派手里。何键当权，乙派的党权自然高于一切，现在是薛岳高于一切，CC派很能和薛岳合作，所以也看不出党权怎样低于政权。张治中时代是政权高于党权。

3. 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

国民党的组织还是往昔的一套，县以下设区党部，区以下设区分部。

国民党的下层组织，原来久已有名无实，不能开会，不能工作，谁是党员，要不是位居要津的，大概都不知道，尤其是乡下零星的党员，或许有，组织就不易找到。

不过抗战以后，受了中共工作发展的刺激，一九三九年以后，也来了两个收拾残局的办法，一个是重行登记，一个是大批

征求党员，高叫着湖南五万个党员的口号，这一来就发生许多新的现象。

宁乡某国民党老党员接到省党部通知书，要他登记宁乡几个乡的党员，他着急得没办法，叫大家来登记，于是只好掏腰包请客，才登记了二、三十人交卷，自认大触霉头。

高叫下乡运动，到四乡先设起区分部来，再送登记表、入党表，请求土豪劣绅加入。

到各种训练班（如社训干部训练班，暑假学生集训队）、中等以上学校、小学校职员、教师、各种救亡团队等去强迫加入国民党，许多处所为着这件事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冲突起来，因为三青团也正在那里抢团员。如是，国民党去宣传“要加入就加入党，可以做官，三青团是乳臭小鬼！”三青团去宣传“三青团是复兴国民党的，党已经腐老了，没有希望，要有好前途的加入三青团！”常常逼得青年们走途无路，痛哭甚至牺牲职业或学业。

现在国民党叫出每个公务员、每个兵、每个铁路工人、每个汽车路工人、每个乡保长、每个小学校教员都应该是国民党员。谁拒绝他们的强迫征求，谁就是共产党，就要将他撤职。

我以为：如此努力拉夫，五万个党员的数目会是可以完成的。不过在许多偏僻县，如湘西、湘西南某些县份，国民党恐怕还只有县党部一级的组织。

4. 国民党中进步分子：

被国民党强迫征收入党的许多青年，当然有许多是进步的，这一种我不说。

国民党老党员里面，仍然有些进步的分子。保靖县党部和三个进步青年一起工作，通过县党部要求我们派干部帮助工作；溆浦龚某请某同志编辑他所发行的晚报；刘岳厚开办《开明日报》；

徐某女士请某同志为副乡长。

县长如以前南县的蒋先启、张某，都是愿和进步分子合作的，以前岳阳某县长也如此，不过都以不善掩蔽被省党部所密告被撤职了。

其余办理学校，请进步分子当教员；公正士绅与进步分子共同经营书店（郴县、邵阳、茶陵、沅陵等处）、办报纸（如唐某）、办刊物（如邵阳唐某）、研究政治形势（在益阳、南县等处），保释共产党员（衡阳中共党员被人诬为土匪捉去，士绅保释）的人到处都有一些。

5. 三民主义青年团：

湖南三青团原来指定鄧悌为团长，鄧被枪毙后，许多时期没有团长。一九三九年改定薛岳为团长，朱经农、李扬敬等为常委，总团部设长沙，总团部以下设：

长沙区团部：辖平江、浏阳、宁乡等县。

益阳区团部：辖常德、汉寿等县。

邵阳区团部：辖武冈、新化等县。

衡阳区团部：辖衡山等县。

沅陵区团部：辖辰溪、溆浦等县。

未正式成立团部的设筹备处。

三青团的各级主任都是指定的，对团员异常专制，团员仅能听命令而行动，不必经过什么会议公决，每日要向主任做工作报告，稍不如意就受凌辱。衡阳三青团某主任常常叫团员进办公室，立正半天，不吩咐一句话又斥令退出，使团员闷得哭脸。

三青团团员一部分是集中住起来，编为工作队的，经常出外工作，如写标语、扫街、街头宣传、写壁报、维持本会会场秩序等等。他们穿整齐制服，食用由团供给，此外有不供宿食、不集中

住的团员。

在三青团的领导之下，常常组织服务队、工作队一类团体在其指挥下进行宣传工作。

三青团的团员很普遍的是强迫拉进去的，自己投进去的多半是要求解决衣服和饥饿问题的，当然有一部份是国民党豪绅、资本家的子弟。

三青团在湖南青年中、社会上都还没有什么信誉，他们在长沙组织有社会服务部（开设食堂、寄宿舍、娱乐场、浴室、理发所等），在主要交通县开设有青年书店，据说这是要养成青年人服务社会的能力。

6. 国民党、三青团对本党态度：

湖南国民党和汪精卫似乎有些默契，由什么事实可以证明呢？

（1）汪派刊物由党部散发。

（2）汪发表“艳电”后，各地民众要求反汪，沅陵（省党部）、衡阳、祁阳、零陵、湘潭的党部都是禁止反汪运动的。

（3）衡阳县党部以向、李等刊售反汪小册子，乃借口未经审查，违犯出版法，拘捕李同志，交涉才释放。

（4）《民意》等汉奸刊物，可以在许多书店贩卖。

所以国民党省、县党部都是反共的，张治中时代还稍许不同一点。他们都是两面派，党公开同志和他们见面时，就很讲客气，背面就来厉害的。他们的办法是：

（1）严密监视各公开机关和个人（如通讯处的徐老）。

（2）对中共党员登记、盯梢（梢）。

（3）威胁那些接近中共的青年。

（4）不断令党、政、教育各机关造谣诬蔑，防止中共活

动。

(5) 以汉奸、土匪破坏兵役，扰乱军心等名义逮捕中共党员。

(6) 随意没收马列主义及一切进步书籍刊物。

(7) 禁止机关、学校订阅《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解放》、《群众》等抗战书报。

湖南国民党对抗战救亡不热心，对反汪运动不高兴，对反共很积极。

湖南三青团也是反共的。邵阳三青团对封闭《观察日报》很出力，并派干部到塘田讲学院去起破坏作用。可是塘田的三青团分子反被我们感动，都痛恨国民党封闭那个学校。

三青团的反共不同于国民党，就是他反共也反汪，并且他还要做抗战救亡运动。

(三) 湖南的政府对本党的态度

可以分开来说：

1. 张治中政府：张本人当时强调团结，对徐老很尊敬，对民运很提倡，对国民党的腐化很反对，应该有利于两党的合作。但是他没有下层干部，各县政府差不多都是原来的，他的命令下面可以不执行，各县仍然继续不断发生摩擦，他也不能认真处罚那些摩擦专家。

2. 薛岳政府：薛是平江惨案的指挥者。薛兼湘主席后，徐老三次往见，都被拒绝。他是一部分反共密令的制造者、颁布者，对各县反共案件，没有一件是平允处理了的，他在反共问题上和省党部完全一致。

3. 各县政府：大部分是反共的，但是程度不一致。新化王

县长公开反共最早（系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威逼学生写悔过书；安化县长逮捕××^①；溆浦县长捕×、×^②等；耒阳捕四人；衡阳捕三人；茶陵杀人捕人各十多个；宜章捕××、×××^③；安仁枪杀×××、×××^④；衡阳杀×××^⑤。都明知道所捕所杀是中共党员，这算是第一等反共健将。

沅江县不肯明显捕共，说是不敢作破裂团结的罪魁；长沙县长张某捕中共同志，得到通知后即行释放；徐庆誉专员硬由县保安队手提释放两个中共党员。这都是愿意顾全团结大义，不愿意糊涂反共的。

南县的蒋，沅江的张，可以和中共同志往来，共商工作，这是不赞成反共政策的人。

（四）友军对本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

驻平江的杨森，临湘、岳阳一带的孔荷宠是执行平江惨案的。

衡阳、耒阳的逮捕中共党员，都是由当时的保安司令现在的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昌炽干的。

其他各地驻军，保安团、队等，还没有具体反共的表现，不过据听说李党的政治部军官们虽不立刻压迫我们，而是采取防止的态度。

驻益阳的川军，驻长沙的军队，政治部和个别同志接近，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发动民众运动，并捕杀以前铲共义勇队队长。现改编为保安队实在是汉奸的曹明阵，这是一些进步的行为。

①、②、③、④、⑤姓名系编者略去。

（五）阶级间关系的变动

由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运用，阶级间的关系显然发生了变化，这一论证表现于以下诸事实：

1. 湖南原为游击区，阶级仇恨本深。从新四军改编后，我们同志能帮助政府清匪，地方安静，他们对中共政策再不怀疑了。

2. 衡阳北乡土绅保释被诬为匪的中共同志。

3. 益阳某老者，宁愿请教于中共一青年同志。

4. 溆浦某将军甘为×^①同志作保。

5. 一般民众都了解中共的政策，佩服中共的艰苦作风。

6. 一般民众都甚怕国内团结的破裂。

7. 一般民众都把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寄托在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8. 中共领袖的传记、陕甘宁边区、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故事行销各地，极受欢迎。

（六）摩擦和对策

1. 尊重政府和友党，对政府正确设施力加赞助，不同意的加以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2. 各县发生捕人、杀人案件，纯采合法手续，经过政府解决，不准采用破坏统一战线的报复手段。

3. 努力发动党和群众参加政府所号召的国民月会、兵役、劳役、义卖、献金、募捐、募寒衣等运动，得到广大同情。

^①姓名系编者略去。

4. 不收编土匪，不联合土匪做自己力量，尽量说服土匪来大家参加抗战；在必要时，帮助政府清除匪患，使顽固分子无所借口，进步分子同情我们，免除许多磨擦。

5. 对友军、伤兵、难民，我们发动群众慰劳。滇军出征六个月，经过滇、黔、湘、赣数省，从来未被人招待过，经过长沙时，我们发动民众烧茶水、煮红薯招待他们，他们感谢得几乎流泪。对伤兵、难民的慰劳，我们同志总是很亲切，常常被管理人发觉而拒绝去工作。

6. 号召同志熟悉工作环境，在群众中努力提高信誉，争取群众，团结进步分子，孤立顽固派，使下层行政机构逐渐改良。

7. 发动广大群众推动政府或友军排除顽固派头子。益阳曹明阵的枪毙，是因为民众有几百千把的呈文请求政府处决，是因为广大群众指证曹明阵杀过〔我〕军、埋枪枝、作汉奸的阴谋。长沙民众自卫队副队长盛渐逵的被撤职，也是因为广大群众的告发。

(七) 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1. 统一战线的巩固主要的是下层做得好，上面的统一战线容易碰到一群不谈合作、面善心狠的顽固派（湖南国民党是从来不愿意和我们往来的），下层士绅反倒可以得到很多了解我党政策、同情我们的、诚心和我们合作的进步分子。

2. 国民党、三青团都采用强迫加入的方式，自然有不少的进步分子加入了国民党，但是这些人自己并不愿意戴国民党的帽子，他们对国民党反而悲观失望，所以在政治上固然要强调国共合作，实际上还是要和进步分子合作，你硬说他是国民党，他反而不敢亲近你。

3. 在群众运动中，要努力组织小规模真正的群众组织，以群众力量争取合法公开（如益阳、常德的工会）。再一点，就是设法钻到合法团体里去。

4. 提高党员的社会地位，设法把握乡村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逐步改善民众生活是我们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方式。

5. 小资产阶级集团，如商会行业工会，我们要加以注意，联络他们或派人参加工作，这如果有成绩，许多时候在政治上是有影响的。

6. 合作社事业我们一定要参加，要领导，我们要在经济上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改善民生的最好办法。

第五、湖南的民运

（一）由发展到沉寂

湖南民运和整个政治形势相配合，是由发展走向沉寂。抗战初期，民运相当获得自由，首先是长沙，逐渐发展到各县，但是他还限制于文化界、上层知识分子，还没有深入到工农中去，还限制于进行抗战救亡的宣传，还没有接触到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上去，差不多仅仅做到这个阶段就遭逢到无理的统治、压迫和解散的厄运，现在又是死气沉沉的了。不过仍然要承认，初期民运在宣传抗战救亡、统一战线的理论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影响到以后工作的开展，还是有多少基础可以凭借。

（二）初期民运的情状

初期民运有他几个特色，就是：①多半是由外来知识分子、

文化人或中等以上学生所发动。②多半是不事先取到合法地位。③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护、参加而很民主的。④他们的行动是为着坚决抗战，坚持团结，是一种活跃的进步的姿态。例如：在长沙成立的文化界抗敌协会、职工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世界语学会、战时青年服务团、一致剧社、一九三六剧社、许多的歌咏队、读书会等等，都是由平津、上海等处来湘的教授、学生所发起，所组织或是所领导而成立起来的。他们都不先通过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和登记，他们都有几十或几百个实际参加会议、参加选举、参加工作的群众，他们召集群众大会、演讲会、游行大会、演剧唱歌，慰劳伤兵、难民，开政治座谈会，办政治的、游击战研究的、医药救护的、世界语的、俄语的训练班，他们这一套工作方法和方式很快的传达到了各县。文抗会的宣传部并且有外县通讯课，经常通讯的有三百多人。

（三）原有的合法团体

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湖南省妇女会、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佛学会等什么都有，并且各县都有分会。这些合法的群众团体，也有几点特色：

①经过政府登记，并受政府党部津贴。

②除商会、学生会、工会以外，都没有会员，工、商、学生会会员是必然的（或者说当然的），不是自愿的，只要你是做生意、读书和开工厂或做工（工会是雇主、工人合一的）。

③开会、选举理事必须得到国民党党部的允许、派人出席和指定名单，他们的决议案和理事，几乎都不被群众所拥护。

④工作是除等因奉此以外的有关抗战工作，就是摊派捐款，

摊派寒衣，收集慰劳品，有时乎〈候〉派代表参加“群众大会”，慰劳伤兵，收容难民等等。

⑤各县所有各团体的招牌（只商会是例外），几乎都是挂在国民党县党部的门前。

以上所说是一批古老的群众团体，是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具有外形的僵尸。

（四）抗战以后新增的合法团体

张治中主持湖南省政时，相当的注意民运，他相当了解古老的合法团体无法动员民众，所以他的态度是：①准许新旧并存，组织一个抗战统一委员会来统一民运，调整民运，推动民运。抗战统一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以党、政、军诸首脑为主，则加群众团体代表、社会名流（徐特立同志就是以名流资格参加的）为副，设立秘书处，以黄少谷为主任，可是这个统一委员会还没有实际行动起来，就跟着张治中一起下台了。②颁令组织各业、年龄、性别的各类团体，丝毫没有实现。

薛岳兼理湖南省主席以后，首先取消抗战统一委员会，组织什么动员委员会来管理民运，以省、县的党、政、军的首长为常务委员，参加某些合法团体的代表，于是他成为统治、压迫和阻碍民运的总参谋部。

再要说到合法团体，那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三青团所组织起来的某些工作队、服务队、宣传队等等的了，三青团有完全垄断民运的企图。

男、女青年会，虽然是基督教徒，在湖南很做得一些工作，尤其是宣传方面，如演讲会、座谈会，女青年会的宣传队（演剧、歌咏、壁报，在各县流动的）慰劳伤兵、难民，后方服务站

（招待过军和伤兵）等等，颇有成绩。

此外，还有一部份用工作历史、群众力量争取到手的团体，且分述如下。

（五）我们对于民运的支持

要说到湖南至今还有真正的民运没有被顽固分子完全扼死，主要的当然是群众的力量，再一层就要归功于我党对民运政策的正确。

1. 农运。现在我们并不去组织什么农会，主要的是从改善乡、保、甲下层行政机构着手，竭力争取进步分子或是自己同志当乡、保、甲长。至于这点，越是下层越易得手，乡长多半是由政府委派或指定的，所以在收获上乡长一级成功的少，保、甲长较多。

依借保、甲机构可以召集保民会议、甲民会议，解决当地日常问题。

依借保、甲机构可以训练民众，如组织联保队，训练壮丁。

农村中进行文化运动，推动进步分子办学校，或介绍进步分子或同志当教员，这一点颇有些成绩。长沙、益阳、新化、邵阳、湘乡、湘潭、汝城这样学校有十多个到五十个以上，全省计算总数在一百以上。

经过小学教员可以做家庭访问，开办学校、补习班、识字班等政治宣〔传〕和文化工作。

农村斗争，在沅江曾发动算帐（问修堤的土劣要帐看）运动，反对贪污，动员数千农户参加，益阳桃花江抗捐运动。

揭穿汉奸阴谋，反对贪污的乡、保、甲长，动员群众破坏大道、公路、铁道，招待过路友军（长沙组织群众招待茶水、红薯

颇成功，并组织妇女队替友军缝补衣服，募手巾、棉背心等）。在长沙紧急时，领导群众作清野工作，贮粮、贮盐等等，实际抗战救亡〔工作〕都能注意去领导着做。

2. 工运。长沙大火后，湖南不多有的产业工人星散，大部分失业。纺纱厂迁移到沅陵；被服二厂在沅陵、祁阳等处开工；很大数目的长沙手工业工人也解散了；很多泥木匠被征到茶陵去修省政府房屋（据说有三千多人）。其余常德、益阳、衡阳、邵阳等城以被敌机轰炸奇惨或被威胁，工厂迁移下乡。军事工业、公路、铁路对工人防范极严，以军法制裁工人。对工运开展是有新的形势，并且是比较困难的。

湖南干部中，工运干部是特别缺少，一个安源老干部派到锡矿山工作，不能有很好的收获；军工厂中仅保持一些个别线索；衡阳中央皮革厂曾有读书会的组织；铁路（衡阳粤汉路工）工人有饭堂的组织；锡矿山有工人学校；祁阳有工人俱乐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其他无足道的。

说到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倒稍许有一些，以前长沙的织布工会、缝纫工会都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现在解散了，削弱了。此外可以说的有：

①长沙铜官陶业工会：会员三千多人，办有工人子弟学校五所，可惜不善于作改善生活与组织合作社等活动，现在以货无销路，工人穷困已极。

②益阳总工会：以织布、漂染、造纸、织袜、竹业、豆腐干业为主要力量，共百多行业的联合组织，会员共二万多人，是由党领导组织起来的统一战线的组织，现在很被三青团所注意，常务理事陈××有被收买动摇的可能。

益阳失业工人组〔织〕救护担架队，共一百五十人。

益阳织袜工人曾作加薪斗争，调解结果，增工资每日三至四分，但领导者被开除三人，不是完全的胜利。

工会常领导工人作募捐、募寒衣、掘汽车路、组织自卫队等工作。

③常德：以国民党怕工会被我们操纵，两年多以来还只是一个总工会筹备处，团结工人约三、四百人，领导救亡运动。

④汉寿：有三十多余〔个〕联合组织的总工会，以木业、缝衣、码头工人为主，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会主任刘某是CC派，但罗（□□）、曾（□□）两同志极得工人信仰。工会所属惠贸合作社共计有工人数千人，工会和政府及驻军（川军）的关系颇好，组织得有担架队。

⑤沅江：正在进行筏业工会的组织。

其他各处工运没有什么显著成绩。有许多地方党，在主观上还忽视工运，也不懂得怎样开步走。

3. 青年。关于青运，青委李锐同志已来此，当有详细报告。为简略起见，以前的都不谈，现在还在继续工作的有：

①湖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

②桃源女中的学生自治会。

③长沙的育英儿童工作团：儿童三十人，在湘潭、湘乡、邵阳、衡阳、耒阳等县巡回工作，颇为民众钦佩，也被国民党忌视，拟往桂林。

④江苏青年工读团，在泸溪工作颇有成绩，得当地民众拥护，成为当地工作树立的基础。工读团是黄炎培等领导的。

⑤长沙战时工作队：原为党、政当局所号召组织，共四队，在四乡巡回宣传，现有三队可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⑥湘乡的战时工作队：在紧急时，我党同志脱下长衫组织担

架队猎伤兵，民众感动，一时参加者二百多人，为政府所奖励。

⑦衡山战时工作队，参加者二百多青年，工作颇积极，被三青团胁迫解散，于是他们都加入了南岳游击训练班，毕业后派前线工作。

⑧溆浦民国学院的前进社，参加者四十多人，出前进刊物，名《文化战线》，可惜作风太左，不能团结全体同学，以拒绝某些分子加入，让他们另组织一个“立□”社相对抗。

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宣传队，以前在衡阳、邵阳一带工作，颇著声誉。

⑩自治女校迁衡阳乡下，以作农村工作太积极，被国民党压迫撤消某教员职务。新化的上梅，益阳的蔚南，长沙的育英都和自治〔女校〕一样是进步的学校。邵阳的求实女校也是接近我们的。

⑪其余有关青运的各中等学校内的活动，我不详知。

⑫民先队依据党的决定，许多地方刚组织起来就要他们取消，费了不少唇舌去说服，现在都取消了。

⑬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省委用很大力量，看为湖南青年干部训练的大本营，一九三九年五月被武装包围解散了。在这以前湖南的青年运动还限制在知识分子群中，工农的青年的组织和活动还没有开张。

⑭青年运动还主要的限于作救亡运动，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还没有发现。

4. 妇运。帅大姐可以作详细报告。我的意见，以为湖南这地（只）有高高在上的妇女运动，全国妇女慰劳总会湖南分会在宋美龄的督促，张素娥和进步妇女热心合作的条件下，要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很长的时候在我党影响下工作，主要的也限制在慰

劳伤兵、难民、儿童保育上面，真正的组织广大妇女群众为妇女利益而活动，认真训练女干部，则始终未作过。

湖南是过于缺乏工农群众中的女干部。

(六) 国民党对于民运的态度和方法

①国民党对于民运的态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命令民众、麻痹民众的老办法，例如：

举行国民大会——用警察强迫参加，不参加就处罚。

公民训练——强迫参加，不去的罚款。

强制训练——一次不止操罚洋一元。

募捐请募寒衣等——按户、按机关、按学校分摊，强迫交纳或是老寒扣薪饷，扣津贴。

《力报》义卖——强迫每商店一份，每份最少一角。

②民运一切统一于国民党：

组织团体——要先报党部，取得允许，成立后要登记。

举负责人——名单先交党部审查通过。

开会（连座谈会、读书会在内）——先报告党部，请求派人出席，否则为非法。

纪念会和群众大会——只准由党部召集，一切标语、宣言要由党部审查，盖印后发出，否则为犯罪。

③国民党是需要民众服从他，而自己的利益始终和民众的利益相冲突，怕民众觉悟和团结有力量起来反对他。反对民主是好由他专制，反对阶级斗争是愿弄农群众做他的死奴才。

④国民党宣布铁路工人、汽车路工人都是公务人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想这样来防止工人接近共产党，或是更好去执行他的野蛮的党的制裁。因此，国民党的领导者是工农、青年、妇女群

众的死敌。

(七) 民运的经验与教训

①善于争取和把握住乡、保、甲下层行政机构，这是团结农民的最好方法。因为，这可以相当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调处阶级间的冲突，团结进步分子，打击汉奸顽固派。

②善于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例如，(1)到(1)各已经存在的团体中去工作，如男女青年会、妇女慰劳会、老牌学校中去工作。育英儿童是以工作成绩先取得九战区政治部的赞许，一致剧社曾以个别社员深得邮递信任而取得登记，以及直接去参加党、政、军队所组织的服务队或工作队，更用不着自己去登记。

③要合乎广大群众的要求，用群众的力去争得存在。如常德、益阳、汉寿等处的工会，如邵阳的工人俱乐部，都是因为下层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保持自己的领导，国民党想要破坏也不易。

要善于推动与团结进步分子。许多学校因为维持在进步分子手里，男女青年会、妇女慰劳会的张素娥等等不容易被顽固分子打击下去，我们能接近他，尊重他而取得工作的机会。

④要推动每个支部做群众工作。支部要经常注意自己环境中每天的问题，研究、讨论、决定进行工作的策略并分配每个同志动手才能成功。

⑤要更多的注意工人运动。应该一般的以工运为中心，并由省、县委多多培养工运干部。

⑥不要忽视商人中的活动。商人在城市中的作用并不比工人差，但是我们对这一工作还太少经验。

第六、湖南的民众武装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民间枪枝

湖南是素来不准民间私藏枪枝的，不过这条规定只在湘中、湘北一些县分是如此，一到湘西、湘西南、邵阳、武陵等姓族散布枪枝不少，经常有大帮土匪集合在那些地方，最多的有几百到几千。在陈渠珍的家乡凤凰县，还有不小规模的梭炮厂，手工造枪也颇发达。

（二）人民抗日自卫军

一九三八年，湖南各县普遍成立人民抗日自卫军，省设总司令，由张治中兼司令，各县以县长为正队长，另委一人为副队长，各县以下分乡设分队，乡多抗日自卫队设常备队，人数、枪枝不等，由十多个到三十多个，常备队在本县可以调动，一切费用由各乡自筹。

各县许多自卫队在乡间所作的事情，是防土匪，抓壮丁，催捐款，有时候还干涉民间的纠纷，至于汉奸则未必十分注意。有些地方的自卫队指挥者如长沙的盛渐逵，在长沙紧急时，竟擅自取消“抗日”字样，压制民众组织游击队，公开对人说他反共不抗日，倒真是一个汉奸，和抗日自卫军的名义是相反的。一般的说，民众武装的领导权都操在土劣之手，每月派用费三、五百元，人民不胜其繁苛，现在差不多不能不减少人数，每乡四到五六或十人以下。

张治中时代，将所存老废枪枝三乎多分发各县，不足的数目，由各乡、各县集款购买。如此计算，这种抗日自卫军人枪总

数在二万到三万强盗集团，他们不但不能抗日，而且不能自卫。这种武装大部分是土劣自卫的，求见得能够抗日。我们家乡在去年秋，日军来到时，他们都丢枪跑了的。这种土劣武装的壮丁训练，主要的是教的立正、稍息、开步走、敬礼等，碰得有驻军好的，可以请到军队里的教官，教以开步枪、机关枪、掷手榴弹等（如在长沙），对于抗战是有实际用处的。这种壮丁训练很普遍，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一概强迫参加，人多就分批训练，每批教一个月，每日早晨两小时，因为不用政治说服，纯用武力强制，人民怒愤，而又无可奈何。

（三）抗日游击队

政府不准人民擅自成立游击队，岳州未陷落时曾组织三百人以上的游击队被改编，湘潭曾由我党同志号召武装民众，集会两百多人开前线参加游击，被强制改编，大部分逃散。即使要组织一般民众，对于游击队的干部是欢迎的，尤其是农工群众如此。我们经常作这一准备，到沦陷时可以组织小的游击队。从临湘、岳阳一直到赣北，有一个游击总司令，是樊松甫，孔荷宠是岳、临、鄂南三带的游击司令。湖南的党现在还没有直接领导游击队，将来如果能发动游击，则干部异常缺乏。现在只能在训练干部，讲游击战术一课，实际经验就很困难。

第七、敌人：汉奸在湘情况

（一）敌人的进攻

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来，敌人的进攻停止在新墙河北岸。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日寇先遣部队曾到过长沙市八十多里的麻林桥，只停留一晚就迅速撤退。陷落才四、五天的 湘阴 县城、平江县城又告克服。

湖南被敌沦陷的地方，至今还只有临湘、岳阳两县的大部分土地。

(二) 敌伪汉奸的活动

敌人时时企图由鄂南、岳阳、赣西北分途进攻长沙和由广州北犯之敌会师衡阳，打通粤汉线，切断东南与大后方交通，这一计划是一定有的，不过总还算碰了一次打击了。

敌人由湘北撤退时，仍然施用他的怀柔政策，被虏壮丁大部分到岳阳后，发盐一大碗或米一大碗遣回，站队训话说：“日军不杀百姓，是我救大家的，下次来的时候，你们不要怕，不要逃跑，要欢迎皇军”，云云。

不过，敌人已经做了不少杀人放火、强奸的“成绩”，民众不易被骗。

散犬在进攻长沙及平〔江〕时，常由飞机投下武汉、南京的汉奸报纸，散传单，散汪精卫的宣言，散反蒋、反共的小册子，散优待证，劝告军民不要抗日、携械投诚有赏等鬼话，不过一般民众不敢收藏，拾后就烧掉，怕有汉奸嫌疑。

汉奸到处活动，如益阳的曹明阵，长沙的盛渐逵，还有一个曾是铲共义勇队的周八胡子、丑先期等都是汉奸，他们的部下公开对人说：“日本来了不要怕，磨□到湖南来当省长，都是我们圈子里（青、红帮）人，我们还会有官做呢。”

湖南国民党大部份有通汪嫌疑，他们替汪散小册子，禁止民众反汪等毒见端倪，或许是机会还不成熟罢了。

(三) 我们对敌人、汉奸的对策

①加紧对民众宣传，揭穿敌人诡计、汉奸阴谋，坚定民众抗战信念。

②搜集汉奸证据，发动民众督促政府给汉奸首〔领〕以严厉制裁，同时向糊涂虫小汉奸加以说服。

③尽量开展反汪运动，到处促成并参加反汪运动。

④训练民众、武装民众，预备和敌伪汉奸坚持干下去。派同志加入自卫队，获得武装，办游击训练小组，到紧急时，党员和群众一起进退，领导群众做收存粮食，搬移妇女、老小等清野工作。

第八、今后湖南党的任务

(1) 为完成党中央所决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急迫任务，应该更加扩大和深入的宣传反汉奸汪精卫联系到反顽固派的工作，揭破敌伪汉奸汪精卫、顽固派等投降分裂、阻碍进步的阴谋和亡国灭种的危险。

(2) 扩大宪政运动，普遍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去，提高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要求。

(3) 认真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进步分子团结得更紧，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对政治认识上说），照顾他们，以达到孤立顽固派，打击汉奸汪派、顽固派的反动势力。

(4) 以经常照顾大众利益，努力工作，注意道德，使党员成为工农中最可信赖的友人；以提高党的社会地位，争取乡村政

权，提高民众中民主教育，发展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使群众永远团结在党的周围，是克服一切危机，争取最后胜利的枢纽。

(5) 迅速在质量上巩固党的基础，这要求改进支部生活，加强党内教育，严格执行纪律，认真教育全党做秘密工作，清洗异己分子，使得党不怕任何风吹雨打才行。

(6) 所有支部都要参加群众工作，尤其是工人、妇女、青年群众中的工作，应更加多多研究方法，培养专门干部，有计划的分配到工人、妇女及青年群众中去。

(7) 对于小资产阶级、贫民、商人、文化界，应加重注意维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在抗战中、民主运动中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8) 改善各级党委的领导方式，县委、区委在领导上要做到自动一些，才能够在党中央、省委的原则指示下灵活的处置一切日常事变。党内秘密交通网，要迅速建立起来。

(9) 对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估计不够，在某些逆流到来时，张惶失措，以至动摇、自首、悔过。要有预见，从思想上克服这类危险。

密家藩关于湘鄂西 公南特委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党的组织状况

(一)各级党委

公南特委管辖公安、南县等六县党的组织。特委于一九三九年十月湘鄂西扩大会议后正式建立。特委直接领导公安县委、南县县委、安乡县委、澧县特支、石首县工作委员会及华容县工作委员会六个单位。

1. 公安县委：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建立。县委下已正式建立的有一个区委，还有两个区委正在建立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全县共有十二个支部。组织的分布不大平衡，仅及全县地区的二分之一，其余二分之一地区完全没有组织。

2. 南县县委：在特委建立以前，南县曾建立中心县委，领导华容、安乡及石首的一部分组织。特委建立后，石、华、安各县组织直接由特委领导，南县即改建县委。县委下建有六个区委，全县有二十多个支部，组织的分布很普遍。但去年十一、二

*附公南特委补充报告。

月间，南县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详情见后），城市区委完全瓦解，其他区委受很大影响。

3. 安乡县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建立。县委下已建立的有一个区委，还有两个区委正在建立（去年十二月），共有支部十个，组织分布还普遍，差不多都是在最近发展起来的。

4. 澧县特支：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在湘鄂西区党委建立前，澧县支部属公安县委领导（它是由公安组织发展的）。因为交通不便，领导比较薄弱，工作很难开展，所以澧县组织现在还很小，最近工作正在开展中。

5. 石首县工作委员会：石首本来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建立县委，下有四个区委，十七个左右支部，后来因为组织受破坏，改建县工委。被破坏的有两个区委，还有一个区委发生自首现象，现在正在进行整理组织。

6. 华容县工作委员会：公南特委建立后，华容即建立县工委。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曾受到很大破坏，现在还保存有几个支部，但因为最近南县组织遭受破坏，华容形势更趋恶劣，县工作委员会正在建立中即行停顿。

（二）干部状况

1. 来源：特委本级三人，书记是本地新干部；组织是过去苏区老干部；宣传是附近地区调来的新干部。县级以下各级干部多半都是本地的新、老干部，只是县级有少数外地干部。本地老干部都是过去苏区干部，本地新、老干部约各占半数。

2. 成份：特委本级书记和宣传，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组织是农民出身转变为知识份子。县级干部，贫农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比例差不多，其他成份极少。区、支级干部，农民

成份占半数以上，其次为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手〔工业〕工人。

3. 党龄：特委书记和宣传是一九三七年党员；组织是一九三〇年入党。其他各级老干部多是一九三〇年前后入党，中途都因湘鄂西苏区失败而失掉关系。抗战后有的恢复党籍，有的重新入党，但绝大多数是重新入党的。新干部多属一九三七年、三八年党员。

4. 文化程度：特委书记、宣传是高中学生，组织相当于初中程度。县级文化程度较低，多农民出身的半知识分子，高初中程度约占三分之一。区级农民半知识分子占半数，中学生约占五分之一，其余也能读简单信札，完全不识字的极少。支部一级干部文化程度更低，多只能阅读最低通俗读物和简单信札。此外有极少数半知识分子，完全不识字的约占十分之一、二。

全特区，县级干部约有十五人，区级约四十五人到五十人，支部一级约一百五十人。

(三) 党 员

1. 全特区约有党员五百五十人到六百人：公安一百五十人；南县二百人；安乡一百人；澧县二十人；石首一百人；华容五十人。

因各县组织都正在清理中，这里不能有很精确的统计，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

2. 成份：农民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手〔工业〕工人约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五。女党员不及百分之十。

3. 全特区人口约一百八十万到二百万，每县人口平均在三十万左右。全特区平均党员占全人口的三千分之一。

4、党员绝对多数是正式党员，只在安乡、澧县还有少数候补党员。

二、党的发展过程

(一) 特区各县多属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党的政治影响很扩大，苏区失败还保存有一些党员干部，所以抗战后个别党员与党重新取得关系后，就能很迅速的发展起来。但党的真正大量发展是在武汉失守前后。当时，一般群众抗战情绪很高涨，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还只是开始，一般救亡活动还暂时保持着比较公开合法的存在，当时也是党的政治影响非常扩大的时期。

(二) 特区各县党的发展经过大概情形：在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转变，鄂西个别失掉关系的党员和知识分子开始互相结合，并进行打土豪的活动。抗战后，鄂西旧组织即派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即派人来鄂西审查整理，并正式建立了鄂西江陵、公安各县组织，公安县的党就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石首组织是由武汉来鄂西的个别党员在通过政府合法名义下进行公开群众工作，如青年救国团、地方自卫队等。这些工作团结了石首的积极群众和一些旧关系，党就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南县、华容、安乡党的组织，也是在抗战后觉悟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旧关系结合，在长沙办事处取得了党的关系。当时湖南党委即决定建立南、华、安三县工作委员会，以开辟这几县的工作。在公南特委内六县中，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发展党的方式，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主要的依靠了旧的基础。

(三) 经过时期：这里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抗战开始后到武汉撤退前。这时期是鄂西党开始发展时

期，但发展非常慢。当时一般的是关门倾向，所以反对关门主义，大量发展党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时期，从武汉撤退到一九三九年五月。这时期是大量发展时期，各地组织大概都在这时期建立起来。第三时期，从一九三九年五月石首、华容组织受破坏起到最近，是一般的停止发展、巩固组织时期。但真正提出巩固党的口号，是在十月湘鄂西扩大会议。

（四）发展成绩：一般的说，是完成了大量发展党的任务，在短时期内普遍建立了各地党的组织。这成绩之取得是由于：1. 正确地把握住了大量发展的时期，坚决地进行了反对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的斗争；2. 党积极地领导了群众的救亡运动，由于群众运动的大大开展而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并涌现出广大的群众积极份子；3. 党一开始发展即依靠了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4. 依靠了过去的旧关系，使党很快的深入了农村，并很快地普遍起来。

（五）关于发展组织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已见前次报告。这里只补充几点：

1. 在发展过程中和一般的停止发展后，对于发展工作的检查还欠具体深入，因此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不曾完全被接受。这表现在后来的发展中，对于入党条件的把握、发展手续、如何考察新党员以及对于旧关系的处理等，各方面还不能认真的执行，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规定，而且仍然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查。

2. 在开始发展时，对于怎样发展组织的教育工作非常不够。很多新入党的同志，对于如何发展组织完全没有认识就给予发展的任务，因此造成后来的严重错误。在开始发展时，只偏于强调反关门主义倾向，没有能够建立严格正确的发展组织的模范，这就影响于后来的拉伕现象、追逐数目字、对发展党的随便

倾向。

3. 发展工作中的严重的自流倾向和偏于依靠旧基础，这影响于后来的组织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和很多组织关系的暴露。因为旧基础是非常不平衡的，同时旧关系一活动，即容易暴露，也就影响其他关系。对于如何有计划的向各方面去发展和正确的利用旧基础，注意不够。

三、组织机构、领导方式与工作制度

(一) 组织机构

在湘鄂西扩大会议前，各级机构一般的比较大；这次扩大会议即决定缩小，以后都进行过各级机构的改造。

1. 各级组织在扩大会议前，一般地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妇女、统一战线各部；后来多只设组织、宣传两部，委员由五、六人减至三、四人。以前有执委与常委之分，后来就没有。

2. 各级领导机构的管辖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少至两、三个单位，多至十个左右。扩大会议后，注意到组织分散，避免集中，也就积极进行缩小管辖范围，一般的领导五个单位左右。

3. 各级机关的隐蔽形式是多样的。一般的支部和区委是利用同志的家庭或学校，县委也有采用这种形式的。但因为一般的县委有两、三个同志脱离生产，如无同志家庭或学校可利用，即开设小商店来隐蔽。但在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对于机关的隐蔽是不很注意的。扩大会议后，各级组织采取分散的办法，也就一般的没有固定的机关。脱离生产的同志分别采取各种方式掩护，会议、接头联系、谈话；采取分散游击方式。

(二) 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

1. 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分散活动多，集体讨论少，所以一般的集体领导不能很好实现，而偏于分工负责。

2. 集体领导方面，只能限于一般的原则问题，如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估计、工作方向的确定、计划的订立。而组织上的具体的集体领导，一般没有很好做到，彼此之间对于各个领导单位的具体情况的了解是非常不够的。

3. 分工负责方面，只一般的能做到组织单位的分别领导，而各个工作部门的分工负责却很少做到。组织、宣传等各方面的工作集于一身，而各部门的工作却不能集中起来。组织、宣传各部，可以说一般的不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

(三) 巡视工作与报告工作

1. 巡视工作多半能定期的实行，有的还能够比较的深入下层，如县委能经过区委直到支部巡视工作。但特委及其以下各级并不设专门的巡视员，巡视工作是由各级委员自己进行，巡视工作同时指示工作。

2. 报告工作多半是在上级巡视工作时，而下级来上级报告工作一般的比较少，这是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汇报制度现在是不采取的。报告方式是口头的，书面报告的方式在过去环境较好时曾采用，目前不用这种方式。在报告工作方面，一般只限于下级向上级报告，而上级向下级报告是很少进行的，因此一般的下级不能了解上级的工作。在听取报告方面，领导机关多半是个别的听取下级的报告，很少领导机关集体的听取下级报告，这对于不能很好的实行集体领导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

系，不能一般的采取这种方式。

(四) 计划工作与检查工作

1. 一般的计划工作能做到，但是检查工作在县委以下各级很少能进行。对于这方面的经验还很缺乏，所以一般的检查工作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

2. 关于计划工作方面，缺点很多。许多计划是太原则、空洞、复杂、庞大、没有中心，这种计划当然难于执行。在订立工作计划时，对于具体情况的了解研究不够，因此计划缺乏实际性，一般的是要求过高。同时，对于计划执行的坚持性不够，时常改变计划，这尤其表现于领导机关改组时，新的委员会不能继续上届委员会的计划的执行。区委和支部大都还不能掌握工作计划，根据计划进行工作。一般领导机关对于帮助下级建立工作制度的注意是很不够的，而这一点应该是领导工作很重要的方面。

3. 检查工作制度一般的还没有建立起来，过去检查工作进行得很少。在区党委召集的两次扩大会议上进行了检查工作，主要的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突出的工作方式和作风、组织工作中的拉伕倾向。公南特委成立后，进行了一次工作的检查，主要的是指出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认识不够，工作方式的转变不够，但不曾更深入更具体的进行检查，特别是关于党的工作方面。县委以下各级都还不曾认真的检查过工作，现在只是在开始建立这种制度。

四、支部工作

(一) 支部的建立原则

一般根据于独立作战的需要以建立支部，所以时常以小市镇

为中心。这种小市镇大概一乡（联保）总有一个以上，但也有一乡范围内建立两个以上支部的，或甚至一保（四、五百人口）内就有一个支部，这是在组织比较密的地方。这样支部的建立，时常只根据于同志间惯于接近的习惯。我们认为以小市镇为中心，以乡（联保）为单位建立支部比较好，这样比较便于支部团结群众，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

（二）支部组织状况

1. 党员数量没有一定。过去多至三十几人，少至三、五人，现在一般人数太多的都已缩小到十人左右。

2. 支干会一般是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过去多至五人，现在已减少。支干会的设立，是在支部人数较多，需要分成几个小组时。如果人数较少，只有四、五人或五、六人时，只设一个支书，或增设一个干事。

3. 小组的编制以三人为原则。以前有多至七人的，现在都已编小，一般都是三、四人，也有少至两人的。小组长时常兼任支干。

（三）支部生活

1. 支部经常召集会议有支干会和小组会两种。一般是十天开会一次，有的一星期一次，也有极少半月一次，大概都是规定了的。临时会议比较少召集。支干会一般能自动开，但区委如果多把几次不去参加，就要松懈下来。小组会议小组长能自动召集的不多，大都是在支干会推动之下开的。一般规定两次会议，一次自己开，一次上级来参加，支干会议可以做到，小组会议不容易做到，农忙时会议更难照常开，时常要脱〔缺〕几次。会议内容大

多很空洞、单调、老一套，一般同志对会议不感兴趣，要求少开。有的会议是因为上级规定了严格的开会程序而受到束缚，大家少发言，时常是上级出席人讲一大篇完事。组长联席会议和支部大会，过去开过，现在都不开。

2. 过去支部的经常工作是发展党员，发展群众（秘密群众团体）和收集党费。宣传教育工作，一般没有做。目前的经常工作中心是清理组织和教育党员，但教育工作是县委、区委帮助支干会进行，支干会还没有能够自己担任起来。群众工作改变了过去的路线，秘密群众团体大都取消，采取以个别党员为中心团结群众的方式，规定每个人要团结三个以上群众在自己周围。收集党费过去很困难，一般只能收到三分之二，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缴纳。支部对于吸收每个同志参加日常工作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差不多有半数同志不能参加工作，有部份同志只能间或参加工作，能够经常参加工作的同志恐怕不及三分之一。

3. 一般同志懂得“党员要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一般的支部都能成为群众政治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但对于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仍然注意得非常不够，只认为支部是团结抗日群众的中心，甚至有的支部在群众自发的反贪污份子的斗争起来之后，还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有些支部同志甚至区委负责同志以为组织与领导这样的斗争不是党的事情。因此一般支部和群众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这影响到支部生活的政治内容的缺乏，支部战斗力量的薄弱。

4. 支部中间比较能有健全的会议生活，有活跃的经常工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有战斗力量的，恐怕一县十几个支部中只能选出两、三个。这次湘鄂西扩大会议提出创造模范支部的号召，但到最近各县还没有创造出几个模范支部来。最薄弱的支

部，会议完全依赖上级推动，工作时常停顿，群众少到和党员差不多的支部，一县十几个支部中也约有两、三个。这样的支部，时常是因为领导太薄弱所产生的，也有的是由于成份不健全。

（四）区委对支部的领导问题

1. 区委比较健全的能定期出席支部会议，大概每两次会议参加一次；支部的小组会议，区委每月能参加一次。但这样比较健全的区委是很少的。一个区委时常管辖相当大的范围，四、五个支部，所占地区纵横二十里左右。一般区委都没有一个人脱离生产的。很多区委同志因为由支部提拔起来不久，还只习惯于原来支部的工作，而对于整个区委工作的照顾非常不够。因此，区委对支部的集体领导是很难实现的，有的区委同志兼任支部书记的更是如此。

2. 领导支部的区委同志时常是由该支部提拔起来的，或是附近支部提拔起来的，因此对于他所领导的支部的各方面的情况都能了解。但区委对于各个支部的具体情况的研究很少，所以如何实现具体的领导仍然很不够。同时，区委、县委对于如何了解研究支部的具体情况，如何实现对支部的具体正确的领导，这些问题是很少讨论研究的，只知道一些零碎的具体的事实材料而缺乏原则性，对于工作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3. 区委一般给予支部的任务是过于繁重，或者空洞，不会帮助支部按照具体情况订出一定时期的工作计划，执行的步骤，不会抓住中心环节推动工作；同时对于支部工作的检查很少，不能帮助支部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提高支部同志的工作情绪。

4. 领导某个支部的区委同志时常就是由该支部提拔起来的，因此也就时常有代替支部工作的情形，一般的对于如何“帮

助”支部同志这点，是不大懂的。区委同志时常被纠缠于他所领导的支部的工作，不能了解研究整个区委工作，也就不能接受和参照其他支部的经验来更好的帮助支部同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使支部同志不能独立工作，不能真正代替他自己原来的支部工作。区委同志一般的是不了解自己的任务是培养干部，培养自己的代替人。

(五) 工作经验教训

1. 对于支部建立的原则，在个别地方把握不够。这影响于支部团结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的斗争。甚至有的把一个小队、一部份组织由这个支部到另一个支部划来划去，因此支部时常扩大、缩小。领导机关时常改组，影响于支部工作的稳定性。

2. 与群众联系密切，能注意倾听和研究群众情绪和要求、呼声的支部，它的生活一定活跃，有战斗力，真正成为团结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否则支部各方面工作都不能健全，就要失掉它的作用。

3. 支部的会议生活要活泼，要采取随便谈谈的方式，不能给以死板的会议程序的限制。多谈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老一套”的陈话、空原则少讲。实在感觉无话可谈的例会不要开，个别谈话可以多举行。

4. 一般支部同志对于究竟什么是支部，支部到底有些什么任务懂得很少，因此，只以为支部是团结抗日群众的中心，落后于群众的自发斗争。上级党部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很差，很少注意到这方面。

5. 上级党部对支部的领导，对于支部工作的健全与否有决定的作用。过去一般的县委以上组织，都不能注意到在领导上要

面向支部，对于支部是党的基础的了解是很表面的。支部工作不健全，党的决议即不可能实现，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作的健全与活跃是不可能的。

五、宣传教育工作

(一) 党内教育

1. 一般的说，党内教育工作都很薄弱，在大量发展党的时期，对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都很少注意，即使注意到，也很少认真执行。去年十月湘鄂西扩大会议后，各地组织才重视到党内教育工作。过去曾用苏区党的教材《新党员训练大纲》来教育新党员和下级干部，但一般只是给能看得懂的同志自己去看，很少在上级领导下有系统、有计划的学习，很少经常在支部会议专门讨论问题。有的组织编过《新同志谈话大纲》，确定新同志入党后，在候补期内，由支部进行教育，但没有能够经常进行。个别地方党曾出版过党报（油印），这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才能看懂，不能教育一般同志。《新华日报》曾散发到每个支部去，大概每个支部总有几个同志可以看懂一些，但上级领导讨论是很少的。县委、区委各级都是个人阅读，很少集体讨论研究。个别地方，如在南县、公安，曾办过短期（两、三星期）的干部训练班，抽调各地干部受训，讲统一战线问题、党的建设、游击战术等，这是较大的（十几个人）训练班，只是过去举行过，受到这种教育的干部是很少的。各地党曾办过小型书报流通社，但有计划的领导同志们阅读，是没有很好做到的，只是由大家自动看。关于提高同志的文化程度的识字教育工作，只是个别地方党自动的做了些，但不经常，上级党部的领导很少。

2. 去年十月扩大会议上，提出巩固党的口号，决定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关于教育内容，指出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意识和革命信心、革命气节。关于教育工作的组织方面，决定健全各级宣传部，健全党报的发行工作，各地方党部办短期流动训练班和上党课。扩大会议后，公南特区各县组织的教育比较提高一步，但整理组织的工作和加强教育工作的比重相差仍然很大，一般太侧重于前者，不能适当的配合起来。教育工作和学习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教育材料还感到缺乏，最近党报都不容易看到。教育工作的组织方式，因为政治形势的转变，即是短小的训练班都很难举行，而有计划的长期上党课（十天或半月一次）和个别谈问题的方式是比较适当的。关于党报，还不能在党内普遍散发，主要应采取口述方式。特委、县、区各级的学习，还没有能够有计划的进行，书籍不够，但并不太感缺乏。

（二）对外宣传工作

过去在南县设立过湖南《观察日报》的分销处，在石首建立过《新华日报》分销处，《观察日报》曾销过二、三百份，《新华日报》三、四十份。南县党曾出刊过《先声日报》，销到好几百份。石首地方报《石首日报》，党曾参加过编辑。这些对于党的政治影响在特区的扩大略有些成绩，但政治形势转变后都被取消了。一般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口头宣传工作，是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主要方面。在政治形势转变前，党与群众团体大量发展时期，这种工作的进行是很活跃的，大多数同志都能积极地参加到工作中来，并积极推动群众团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但一般对于群众中左倾积极分子的党外教育（在被吸收入党前对党的认识）是做得不够，因此一般新党员入党时，对党的认识是太模糊

的。在政治形势转变以后，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是大大削弱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口号不能广泛深入的传达到群众中去。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一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演变提出适当的宣传鼓动口号，在一个群众斗争发动起来以前和发动起来以后，不能展开宣传鼓动工作来配合斗争。在对外的文字宣传工作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错误，就是模仿中央党报（《新华日报》）形式，在上面发表“红色的”文章，要求把一个统一战线报纸改变成党的机关报。还有在墙报上照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一类的口号，在春联上写“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共合作”等话，不善于通过适合于具体环境的方式提出党的主张和口号。

六、倾向、斗争、党纪

（一）一般发生过这样一些倾向

1. 左的方面，表现于关门主义和急性病。不愿意与国民党的人接近，不积极争取中间份子，巴不得立刻把所有贪污份子都驱逐掉，自己做了联保主任，就是取得了政权；提出只能为少数左倾群众所接受的口号和主张，只迷恋于自己的狭隘的秘密群众团体，把党的活动束缚在狭小的左倾群众的圈子内，巴不得马上挂起党的招牌来，马上武装起来，打起游击队的旗帜，要求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一样活动，要求和过去苏维埃时的党一样活动。

2. 右的方面，表现于过于强调统一团结，只谈抗日，抹煞阶级斗争。对群众的要求呼声不注意，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甚至个别县委负责同志认为“现在是统一战线，不讲阶级斗争”。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少数同志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

逆转表示悲观失望。他们觉得国民党可以随便杀共产党，我们却不敢杀国民党，只能屈服，共产党的力量太弱了，受不了国民党的压迫。

(二) 倾向发生的来源

1. 因为很多同志过去参加秘密的民先一类群众团体的活动，带来了它的关门主义的作风，仇视国民党的心理还没有改变过来，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不够。

2. 公南特区各县大多过去建立过苏区，阶级斗争是比较发展的，很多老的干部仇视国民党和豪绅阶级的心理仍然存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教育工作太不够，没有使他们很好认识党的路线的改变。

3. 对具体环境的了解不够，不知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不同于陕甘宁边区，不同于华北，现在不同于过去苏维埃时代。对阶级关系，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不懂得。

4. 在地方党的领导上，过于强调统一和只谈抗日。

这些倾向发生的来源，基本上是由于统一战线教育的缺乏。

(三) 关于反倾向斗争

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政治上的风头主义，是国内形势转变前的主要倾向。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和十月的两次湘鄂西扩大会议上，特别是十月扩大会议上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但主要的还是反对突出的工作方式和作风，而对于如何要积极争取中间阶层，广泛发展统一战线的注意仍然不够。左的急性病只存在于下层党员群众和干部中间，一般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来克服。但各地方党

部都没有很好的完全把这些倾向克服下去，没有广泛发展这种反倾向斗争。国内形势转变以后，发生的悲观情绪一般还不严重，但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一天天逼紧，这倾向是在发展着，成为今后反倾向斗争的主要方面，现在这倾向一般只存在于下层组织。过于强调统一，忽视阶级斗争，不倾听群众呼声的倾向，在过去国内形势转变前比较严重存在于个别地方，一般并不十分严重，现在已逐渐在克服过来。整个说来，我们反对各种倾向斗争的开展是不够的，很多同志的政治上意见不能拿到会议上讨论，领导机关也不能很好揭开同志间的错误倾向，帮助同志们思想的发展，很多同志的政治意见是被抑制着的。

(四) 自我批评情形

有些地方组织在规定的会议程序上面列入自我批评一项，有些是能执行的，但很多就对这一点很随意。个别地方领导同志压制自我批评的现象是存在着的。一般自我批评只限于同志之间的批评，而且只限于同级，对整个工作，对上级领导和领导者是很少敢在会议上批评的，因此背后随便乱说的现象相当严重存在。有些领导同志明知下级对上级有意见、不满，也因为顾虑自己的威信，不能发扬同志们的批评精神，甚至对敢于批评他的同志采取歧视的态度，有的更甚至因为某个地方组织对他不满而不敢去领导他们，并在同志间夸大他们的错误弱点，因此造成上下级对立的現象，还有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对下级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不要太批评了，而因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好好先生”的态度，又有些同志批评下级只是指出错误缺点，责备一顿，以为这样就是自我批评，不认识自我批评是教育同志的工具，对下级同志因此时常采取官僚的家长的態度，“戴大帽子”，并不严重的

错误也提高到原则上来，甚至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干部”。

(五) 党纪的执行

一般是很松懈的，无故不到会，几月不缴党费，经常不能完成党的任务而不受党的处罚。这现象相当严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便牺牲同志政治生命，在执行纪律时不能把握原则，不关紧要的问题拿来作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根据，对同志处分不经过党委的正式决定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执行党纪，不能教育一般的同志，对于一般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非常不够。

七、干部问题

(一) 培养干部

在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中，培养了一批支持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党的工作的，群众工作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各种干部都在工作中产生了出来。但因为工作的迅速开展，在组织大量发展的时期感到支持工作的干部很缺乏，培养来不及。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有着很大的缺点，只是在工作中培养，政治上、理论上的培养是很不够的。其次，在干部专门化方面做得很不够，时常给一个干部担任各方面的工作，但熟练于一方面的干部实在太少，过去可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提出干部专门化的问题，是在去年十月扩大会议上，并且过去一般领导同志没有明确认识到培养干部是自己的任务，所以从来没有自觉地去培养干部。再就是对于新干部的注意不够，一般是只依靠着老干部，因此，在现在的工作中新干部是太少的。已有的新干部主要的是知识份子，而培养起来的工农分子的比重是很小的。

(二) 提拔、配备、使用干部

因为过去工作开展快，干部的提拔也很快。对于干部的才与德两方面，对工农份子的提拔一般是注意到了的，个别地方轻视工农份子的现象也曾经存在过，现在已逐渐克服过来。在提拔干部中，还有过随便超级提拔和提拔没有考察清楚的干部的错误，造成后来不好的结果。配备干部方面，曾注意到工农分子与知识份子配备，新老干部的配备是注意得不够的。下层组织因为干部一般不能脱离生产，不易调动，所以配备干部是要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干部专门化的工作不够，在对各方面工作的干部的配备也很不够。在使用干部上，一般能估计到干部的特点，但对个别同志的使用上也有着错误，特别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比较适合于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硬拉在党的工作中，而工作又并不是无人可以代替的。这除了因为对于干部的了解不够以外，还因为政治认识上的错误。

(三) 干部团结问题

知识分子轻视工农分子，造成不团结的现象是存在过的，新老干部不融洽，不团结的现象，在个别地方曾发生过，但这些并不是普遍的。由于党内民主太缺乏，领导同志不能倾听同志的意见，不能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等现象造成的不团结情形是比较多的。

(四) 关于审查干部

这方面在过去很少做好的，一般只是很表面的了解干部，对于干部的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历史、思想转变过程、入党动机都

很少认真审查过。过去只在入党调查表上列入过这些，但并不曾认真研究讨论。以后在了解干部时，只问忠实与否、工作表现、能力怎样，这些都是很表面的。对于个别似乎有问题的干部，也随便放过，没有认真去审查。一般在党部会议上很少专门研究讨论干部，组织部的工作日程上是不曾列入审查干部的。去年十月扩大会议提出巩固党的任务，强调审查干部以后，才比较注意到这方面。但在执行时仍然表现很不够，还不能更深刻地认识这问题，对于怎样审查干部这点了解很不够，现在对于我们地方的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审查出几个坏分子，只是清洗了一些表现很明显的分子，而隐藏的坏份子，在我们大量发展起来而存在过严重错误的党员中，是不可避免的。

八、秘密工作

(一) 国内形势逆转前的秘密的工作

在这时期党的工作大量发展，一般同志看不到形势发展前途，缺乏政治远见，对于秘密工作采取忽视态度。当时党可说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领导机关是不注意掩蔽的，秘密机关就设在公开机关一块，公开工作岗位时常是秘密党的领导人。开会、接头、放文件、油印甚至都在一个地方，领导机关几乎为所有下级组织所知道。整个党的组织写在一个一个名册上，许多党的干部仍然担任秘密的负责工作。过去苏区的旧关系，在关系解决后即在当地积极活动，影响很多关系即刻暴露。对于横的关系，过去也注意得很不够，整个支部同志十余人、二十余人，都相互完全知道，支部与支部之间也有极少数是相互知道的。开会时常一开两、三天，有的甚至开支部大会。南县更开过第一次、第二次代

表大会，集中南、华、安三县代表几十人于一堂，因此造成秘密工作中的严重现象，弄坏了很多干部，暴露了不少组织。过去建立庞大的秘密群众团体，对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二) 现在秘密工作情况

在华容、石首组织。去年四、五月间受到破坏以后，对于秘密工作才开始注意，但并没有过关于秘密工作的严格规定。在去年十月扩大会议上才提出加强秘密工作，总结了过去经验，确定了一些秘密工作的原则。公南特委即根据这些原则制定了一个秘密工作守则，开始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在各市面才开始转变。领导机关是分散而不固定的，各个负责人自己分别找掩护，接头、开会、通信处分开，严格规定负责同志和下级联系，也严格规定秘密工作同志不担任公开工作。秘密文件即废除，各册一般都不用，必要的记录临时用过即毁掉，必须较长时间保存的，即用代名词等方式记载。开会次数减少，半月或三才弄一次，开会人数不超过五人，地点是流动的，会议时间尽量缩短。但秘密工作的认真开始转变是在十二月特委会议以后，这时形势比十月扩大会议时更严重。在这次会议上，严格检查了特委和各县的秘密工作。

(三) 秘密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及其克服

目前存在着缺点和困难，首先是一般同志对长期埋头苦干的决心非常不够，不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个别同志甚至企图依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支持下去，夸大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要秘密工作能彻底转变过来，首先要克服这种错误认识，定下长期埋头苦干的决心。其次，关于秘密工作的经验非常

缺乏，这需要党加强这方面对我们的教育。再次，因为过去秘密工作这方面的忽视，造成现在的严重现象，很多干部弄红了，不少的组织是暴露的，党内横的关系虽然隔绝了，但仍然相互知道。这些缺点，因为存在于下层，感到不易克服。有些红的干部和党员，因为有家庭负担不愿离开，因为是在农村，整个家庭移居是很困难的，党只能暂时停止他们的组织关系。而这样的份子在受到国民党压迫时，是很可能自首叛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暂时停止当地组织的活动，而尽可能要重要干部（还没有红的）即刻离开。不愿暂时放弃一部份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保全更多组织的。在下层组织没有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以前，首先特别要注意到比较上级的领导同志的安全，这些我们注意得还不够。

九、各地党的破坏与叛变情形

（一）特区内被破坏的有华容、石首、南县、安乡四县，大概情形是这样：

1. 华容：武汉撤退后，鄂西形势紧张，在南华安三县工作委员会推动领导下，进行建立附近六县联防自卫队，团结了广大群众，并收集民间枪支，以华容桃花山为据点。当时华容的党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中，当地豪绅顽固份子即积极活动，组织秘密“反共协会”，以华容地方武装为依靠，并与洞庭湖警备司令取得联系，就在去年三、四月间开始反共，被捕杀的同志和群众大概有三、四十人。他们并没有一定名义，或者指为土匪，或者汉奸（指共产党为“特种汉奸”）或者就指为共产党。

2. 石首：去年五月，在“反共协会”的指使下，石首顽固分子开始反共。首先是东乡联保主任（同志）的牺牲，他们是来

用活动土匪、汉奸进行暗杀的方式，当时石首县长很进步，被害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公开逮捕方式是不好采用的。接着几天以后，第一区区长派出枪兵二十余人，在深夜逮捕维新乡的负责同志、党员、群众九人，在区署拷问，其中五个经家族保出，另外四个同志（区委、支部干事）因坚决不承认错误，即被转解到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结果大概是牺牲了，详情不明。这次破坏了两个支部，许多同志都跑掉了。在破坏前有一个同志（小组长）因受到国民党、三青团的压迫叛变，供出了八、九个人。维新乡破坏不久，一区上津乡联保主任即压迫当地红了的干部自首，这样自首的有十人，有区委、支干和普通党员。

3. 南县：去年十月，特委组织部×^①同志在南县被捕，被捕原因是有一个同志名叫××^②的叛变。×^③过去任过三县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当时湖南党因为看到×^④不可靠，即以×^⑤同志代替他的工作，而分配他去做对土匪、汉流的工作（×^⑥过去参加过汉流组织）。因此，×^⑦对党很不满意，尤其仇视×^⑧同志（手[工业]工人）。这次×^⑨同志去南县，又直接去会×^⑩，所以被捕。×^⑩同志被捕消息传出后，南县城区组织各支部同志就都跑散，×更进一步叛变是很可能的。

4. 安乡：去年七、八月间，有五个同志于深夜被捕，当即被杀掉，迅速而秘密。被杀同志是区委和支部负责人，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这次事件发生也是因为有一个同志叛变，这叛徒曾被提拔起来任区委工作，后来南县领导机关发觉他很多缺点（成份是劣绅），撤消了他的工作，因此向县政府自首，并供出了这五个同志。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姓名系编者略去。

(二) 从这些破坏与叛变中可以得到不少教训：

1. 首先，没有正确的领导和路线的党是不会巩固的。对具体环境不了解，提出过早的任务，过激的行动，会使党遭受破坏。

2. 在大量发展党的中间不注意巩固的工作，对党员，特别是对干部的审查工作的不重视，甚至对已经发现有问题的分子采取麻木态度，这些是使党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

3. 不注意秘密工作，对阶级敌人毫无警戒，在环境转变后不能迅速使党完全转入秘密，使党遭受破坏。

十、群众工作

(一) 武汉撤退前后，党的组织才在特区内各县发展起来。在党的组织普遍发展起来以前，个别同志，本地的和外来的，就在各地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青年救国团在石首建立起来后，很快团结了学生、士兵、小职员、工人、店员、农民约百人，进行宣传与教育团员等工作。但只存在一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即指令石首党部停止青救活动（当时武汉青救还未解散）。青救被解散后，石首党的组织就开始推动国民党所许可的合法的群众团体的工作，同时进行组织秘密的民先队，团结了七、八百个左倾群众。民先主要的工作是教育队员和推动各地合法团体（如战时服务团）的建立，帮助政府工作。公安情形不同，很少公开的群众工作。党开始发展起来即同时建立秘密群众团体“抗战自卫队”，团结了一千左倾群众，主要的工作是教育队员。南、华、安三县主要的是民先的工作。南县还有很多公开的活动，尤其是工人工作，党取得了南县总工会的领导。国民党对秘密的民先和抗日自卫队的活动是非常恐惧的，但并没有采取积极反对压制的办法，

有个别的发现这样的活动分子，即当作壮丁送往前线，这是在环境逆转以前的情形。

（二）国内形势逆转后，党即决定转变民先等秘密群众组织为公开合法团体，注意在旧有群众团体如鲁班会（木工）、财神会（烟工）、轩辕会等中的活动，不能完全转入公开合法团体的群众，即团结在各个党员周围。

（三）党的群众工作的方针改变以后，即注意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利益。国内形势逆转，国民党的兵役政策更恶劣，贪污腐化和发国难财的现象更普遍，物价高涨数倍，甚至增加租额，群众斗争日见发展起来，在澧县发生烟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引起罢工一个多月。公安、石首、安乡等县都发生过反对贪污〔的〕联保主任、保甲长，要求选举委派贤能的情形。这些斗争很多是群众自发的，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但大多取得了胜利的结果。澧县罢工的结果，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党领导的斗争是尽可能运用调解谈判和经过上层统一战线活动的方式，说服了群众过左的行动和过高的要求。在环境相当好的时候，在个别地方（如石首）曾在领导群众斗争上犯了很大错误，如“反贪污运动”，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关系，不注意争取中间分子等。这些现在已逐渐克服下去。

附：

公南特委补充报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

一、党员数量〔公安〕

1. 最多时：二百三十人。
2. 洗刷后：一百二十人，对最多时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二。
3. 积极分子：三十人，对最多时比例为百分之十三；对洗刷后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

（有些支部的确数已记不清楚，有个别支部尚在洗刷中，这里的数字只能是一个近乎正确的估计。）

二、党员成份（公安）

1. 党员最多时：工人二十五人，百分之十点八；农民一百七十人，百分之七十四（有些雇农在内，不能统计出来）；知识份子二十人，百分之八点七；小商人十二人，百分之五点二；富农三人，百分之一点三。

2. 洗刷后：工人二十二，百分之一十八；农民七十五人，百分之六十二（有些雇农在内）；知识分子十六人，百分之十三；小商人七人，百分之六。

3. 积极分子成份：工人八人，百分之二十七；农民十五人，百分之五十；知识分子七人，百分之二十三。

三、洗刷出党的坏人及其种类（〔公安〕）

1. 自动脱党的：三人（商人，其中一个被三青拉去。实际数目超过很多，这里只是已知的）。

2. 洗刷出去数量成份：

（1）投机份子：九人，〔其中〕富农三人，商人二人，农民二人，知识分子（地主家庭）二人（这里只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2）不够条件的：九十八人（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工人，不能计算出来的一部份自动脱党和投机分子在内）。

四、各地党的巩固程度

1. 有问题的份子（略）^①

2. 已红的干部：

公安：县级二人，一个完全红（老干部），已暂调往安乡，一个还可拖下去（社会关系多），区级七人，四个全红（三个是本地老干部，一个是外地老干部，其中一个已离开了本县，两个可在本县内调动），三个半红，可以站得住。

安乡：已红的几个已牺牲，现在组织多是后来新建立起来的，干部都还没有弄红。

澧县：组织开始建立，很小，干部不红。

石首、华容、南县：组织被破坏很多，无法统计。

3. 适于在该地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公安）：

县级二人（但有一个外地干部），区级八人（其中两个需要调动）。

^① 原文如此。

五、党的发展过程

1. 石首：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六月到十月武汉撤退前是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党主要在开辟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只是开始发展，当时政治环境很好，同时有很好的开展工作的客观条件。这时期有这样两种偏向，一方面是发展上的关门主义，另一方面是反关门主义口号强调过高，而对于发展组织的教育准备工作很少做。

第二个时期是武汉撤退到一九三九年五月。这时期是党的大量发展时期，政治环境开始逆转，但二月以前还不很坏。这时期倾向是追逐数目字，不注意详细审查和对新党员的教育。对环境的逆转认为是极暂时的，可以即刻好转的，没有注意及时巩固组织，仍然向前发展。

从五月以后是第三时期。开始注意巩固工作，但还没有，还不懂得如何认真执行。对客观形势的发展还没有正确把握到，仍然认为即刻可能好转。这时期中一般没有继续发展，只在组织很薄弱的地方有极小发展。

2. 公安：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

从西安事变以后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是第一时期。这时期当地的老基础自发的建立地方党组织，成立鄂西联席县委（旧组织中也有些新的成份）。当时没有取得党的领导，仍然继续打土豪的路线，虽然他们模糊知道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改变，可是自己还不能决定正确方向，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也并不多，主要是在收集旧的力量。

二月正式取得党的领导，从这时到十月是第二时期，是审查、整理旧组织和改正其路线的时期。当时政治环境相当的好，

以半公开的方式活动（开过几十人的扩大会议，几乎是半公开的二十多人的训练班）。这时期的错误，是在审查、整理工作中没有很正确的标准和方式，许多旧关系洗刷了又重新恢复过来；同时，在整理工作中没有和开展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教育工作也注意的不够。

从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是大量开展工作，发展党和群众工作的时期，即第三个时期。这时期的政治环境虽因全国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多少有些变化，但一般说来还不很坏。当时的偏向是发展中缺乏计划性，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同样也没有很好的发展组织的教育准备工作，对于新党员的审查教育工作也不够；同时，在大量开展工作中没有注意到公开合法工作的建立，只是建立庞大的秘密群众团体（“抗日自卫队”一千队员）。

从六月以来是第四个时期，巩固组织的时期。政治环境有些变化，三青团的活动开展起来了，但仍然没有变得很坏。这时期的偏向是只做了一些表面的清洗工作，而没有认真切实的〔做〕审查干部的工作。

石首、公安和特区其他各县组织，主要都是经过老基础建立起来的。

六、支部（公安）

1. 种类及数目：

全县十五个支部。其中农民支部七个；工人支部二个；混合支部六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四个）。

2. 好坏支部数目及其种类：

好支部：四个。〔其中〕知识分子领导的混合支部二个；工人支部一个；农民支部一个。

环支部：三个。〔其中〕知识分子领导的混合支部一个，农民支部二个。

附注：关于教育工作与领导机关两节，在前次报告中大概都已写出，这里觉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杨锐、许诺关于岳阳中心县委 一般情形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招待所)

一、客观环境

(一) 自然环境

1、地区——岳阳、临湘、湘阴、通城四县。

2、地势——岳、临、通多系山地，计有大云山（岳、临界）、相思山、剑脊山（岳、通、平界）、药姑大山（岳、通、崇界）、四十八岗（岳、平、湘界）等著名山岗，岳阳西北部临洞庭湖；湘阴地势较平坦，汨罗〔江〕东西横贯其中，为湘江下游所在地。

3、经济状况：

(1) 物产——以大米为大宗，甘薯、豆子、棉花、茶叶、茶油、木材等亦多。临湘之沅潭，岳阳之洞庭湖产鱼最著。工业品除木器、竹器及岳州之毛笔外，无甚特产。

(2) 土地分配——通、湘比较集中，多中等地主及少数大地主；岳阳中农及小地主较多，临湘最贫苦，山多田少，靠茶叶

*原文署名：“杨锐（贞浓）、许诺（许升）”

及鱼贩为业者较多（但无正确统计）。

（3）地租利息——地租自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甚至高到百分之七十。利息普通为年息百分之三十，其余用放新谷、承干租、放印子钱等方式的利率，每年有高至百分之百以上者。

（4）风俗习惯——一般都纯朴、俭节，迷信还相当重。但自大革命以后，民智开通不少，旧礼教观念逐渐减弱，缠足风习大部份地区已绝迹，卫生习惯较湖北、江西、陕西均好。

（5）人民生活——丰年大半勉强能自给，山地较平地为苦，多靠薯丝等杂粮过活，长期淡食（无盐）者甚多，荒年则吃蕨茎、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之现象亦甚普遍。但一般讲来，较此间边区民众生活为好。

（二）政治环境

1、政权——全在国民党手里，其工作不外等因奉此，抹牌赌博，发国难财。对我们态度是：一般防范，个别恐吓，但至我们离家时止，还没有闹过什么惨案。

2、党派：

（1）国民党——通城县党部恢复不久，不健全，党员不多；临湘县党部在实力派指挥之下，少独立性；岳阳县党部历史较久，规模较大，老党员多，地方党员亦较他县为多（但不知确数），大多数对我们不好。其活动方式大都与政府机关协同动作。湘阴情况不明。

（2）三青团——最先在岳阳成立岳临分团，后改为岳、临两个分团。其发展方式，初用个别介绍，后通过地方行政机构，如区、乡、保、甲举行集体入团，在数量上发展甚快，岳阳力量最大，临湘次之，其团员分公开的与秘密的两种，其主要工作为

防止异党（主要是中共，其次是CC）活动，其工作方式不外加强特务工作，封锁饭碗，散播谣言及恐怖空气，派人打入，收买动摇份子，向工农发展，查禁书报，办学校，出刊物，发宣言等，与同地国民党有内部矛盾，但对外是一致的。通城三青团才开始发展。湘阴也有分团。

3、驻军：

（1）正规军——时多时少，我们来时计有：第四军抗战建国四个师（驻岳、临最前线），八十二师（贵州部队）、九十八师（陈诚基本部队，以上两师驻岳、通最前线），每师人数约五、六千人，均系步兵，重兵器少，仅九十八师有少数钢炮，八十二师武器最少最差。与民众关系，平时较战前为好，作战时或作战后较差，抢劫、拉伕、强奸等事情亦在所不免。用练习刺枪残杀逃兵，更属惨无人道。政工人员不作政工，对兵士干部仅有打骂□□的制式训练。驻军对当地政府以及驻军与驻军之间、军官与政工人员之间，关系都不好，作战时亦少联络，往往招致敌人各个击破。对我们关系：八十二师因驻扎较久，得我们帮助之处亦较多，其上级军官（如师长、副师长）对我们还算好，有困难找我们帮他解决，但该师政治部（近已改为特别党部）坏得很，多系三青团员。其余各师因新到不久，与我们关系较少。作战成绩以九十八师为佳，其余各师也有部分好的（如八十二师之毛团），不过多系奉令开枪，专打硬仗。

（2）地方部队——岳、临、通、湘各有一挺进支队，下分三至四大队，每支队人枪在一千上下。县长兼支队长，所有民枪，都归并在内，不许另立名目，除少部（如岳阳北区之胡春台部）颇有战绩外，大部分仅于正规军进攻时充任向导而已，甚至武装贩运仇货，设卡抽捐（如临湘）者有之。

4、阶级关系——人数比例无正确统计，地方大权操在豪绅手中，民众无民主权利，战后与战前无什么差异。

(三) 沦陷前后的环境变化

1、沦陷时期——临、岳、通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继武汉而沦陷，湘阴于去秋湘北会战时遭一度蹂躏。

2、陷区政府机关——向邻区（或邻县）山地迁移。

3、国民党党务机关——一时呈瓦解状态，CC组织一蹶不振，三青团组织于邻陷区建立起来。

4、县政府改组——岳、临两县府（县长比较开明）在区司令与地方武装（顽固份子、流氓所掌握）威迫下非法改组，一时呈无政府状态。

5、民众救亡组织——前有之人民抗敌后援会、教育界抗敌工作团、妇女界抗敌工作团、学生抗敌后援会及各种救亡剧社、歌咏团等组织，均随敌人之深入而无形瓦解。

6、经济状况与人民生活——陷区田地部分荒芜，大部〔分〕人民流离失所。邻陷区人口、军队增多，粮食发生恐慌，工商业停顿，货物来源一时断绝，加上奸商操纵，物价陡涨（食盐高至三元六角一斤），人民收入减少，生活困苦不堪。

7、一般情绪——在国民党影响下之民众，对抗战感到失望，更有不少国民党员及政府机关中人加入了伪组织。但在我们影响下之群众，则跃跃欲试，以不能自动武装抗日为苦。

(四) 敌人状况

1、占领地区——临湘：县城、沿交通线及乡村之大部份。
岳阳：县城、沿交通线（北至麻塘站止）及沙河以北之大部分。

通城：县城、沿交通线及乡村之大部分。湘阴：除湘北会战时曾遭一度蹂躏外，无沦陷地区。

2、力量分布——临湘以羊楼司、羊楼岗、桃林及县城；岳阳以县城、城陵矶、西塘、新开塘；通城以县城、赛公桥、北港（时得时失）为其重要据点。各据点周围以及两据点之间还有一些小据点，每重要据点常驻兵约自七、八十至数百人，每小据点自数人至二、三十人，但都筑有较强固之工事，并配以大炮或机枪。自西塘至桃林、岳城，自岳城至新开塘，自桃林至羊楼司、县城，均有敌人自修之汽车路，为其重要交通联络线。

3、政策及其变化：

（1）初到时的一般设施：

①出“安民布告”及各种诱骗宣传品。

②调查户口，发“身份证”及“良民证”，行联保制，清除抗日份子。

③建立伪组织——名称不一律，负责人由顺民推选，美其名曰实行民主。

④通过伪组织抽税、征工（多用于修公路）。

⑤开设小学校（在岳阳并办了一个中学），免费招生。设立俱乐部，强迫中国妇女供其侮辱。

⑥对游击区及邻近区域随时奸掳烧杀，对中国人命财产任意蹂躏，无所不用其极，花样翻新，一言难尽。

⑦强迫用伪钞及军用券，压低中国法币价值。

⑧成立宣抚班，作为伪组织之太上机关。

（2）后来的变化——以湘北会战为转换点：

①推行软化政策——奸掳烧杀之表面禁止与事实上之部份减少，施小惠收买人心（如免费治疗，发盐济困，作战或打扰时鼓

励顺民抢劫或劫张济李），征工服役照发工资，利用伪组织私人关系向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及行政人员写劝降书……。

②搜刮民财——过去靠外地接济之粮食用品，今则取诸当地民众，如谷米、棉花、茶叶、被盖、落花生等，尽量搜刮，除使用外并向外运。

③尽量开发——如用巨款开发岳阳北港之茶叶。

④尽量推销日货日（伪）钞——只要领得“身份证”及完纳一定之税捐外，可向其占据区域内（远至武汉等地）“自由”贸易，但须以推销日货、伪钞为限。

二、党的工作

（一）党的发展（以岳阳为起点）

1、旧有基础分三部分：

（1）杨乐如——老党员，马变前在湖北新堤工作，马变后，回岳阳，失却联络，在乡村进行启蒙运动，从思想上团结知识青年。〔民国〕二十四年上期，任岳阳五区一高教员，创办附设补习班，以团结和训练前进青年，在同事中建立了初步的组织。同年下期，他的同事郭观梅（过去是党员，当时失了联络）在岳阳姑桥经过当地的游击队政治委员王振国一度发生关系，派同事杨贞浓（即杨锐）去通城找关系，未成功。〔民国〕二十五年上期至〔民国〕二十七年下期止，任六区一高（原名连云校）教员，曾先后发起组织自学图书社，推动当局开办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前后凡三次）并主持办理，推动当局开办联校附设师资训练班（前后□两班）并主持办理，在小教界及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大，特别是师训班，至今被顽固份子称为“岳阳之抗大”，实际

上，师训班大多数学生已成为岳阳今日党的干部或同志。〔民国〕二十六年暑期并派学生送油印用具给过境之傅秋涛部红军，并与之接头。当时因被日军封锁，关系无法继续维持，直至〔民国〕二十七年四月才由他们派彭位东同志来找我们，可是岳阳的党在此前已与长沙取得了关系。〔民国〕二十六年下期，郭观梅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关系，结果由武汉拨归湖南，至〔民国〕二十七年一月，杨乐如往长沙正式恢复关系，省方即派彭援华（老同志，女的）同志回岳，成立特支，即后来岳阳组织发展的基础之一。

（2）王养直——大革命前入党，马变后在岳阳城内当小学教师，暗地进行党的工作，民国二十年，岳阳组织被破坏，因而失掉联系，以后便只能从事一般的启蒙运动。〔民国〕二十六年，〔王〕曾介绍其学生王国雄、姚星群等进抗大。至〔民国〕二十七年一月，〔王〕与杨乐如同时正式恢复关系，为岳阳新建特支最初负责人之一。

（3）毛国苏——岳阳花猫尖人，农民出身。花猫尖在庚午、辛未年（民国十九、二十年）曾建立苏区，毛国苏便是当时苏区中最积极的一个C.y.。到十月后，苏区虽被破坏，毛同志家中田产被充公，胞弟（也是C.y.）被杀戮，但毛同志仍坚定如前，不时与中共领导下之当地游击队发生关系。〔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傅秋涛部老战士谢福兴（也是花区人）回家，最先与毛发生关系，经过毛在当地发展组织，建立了一个支部，归平江县委领导。至〔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彭位东同志来岳后，才将关系拨归岳阳。

2、发展经过。自成立特支后至〔民国〕二十七年四月成立岳阳工作团，六月正式成立县委，十一月长沙大火后，由湖南省委拨归湘鄂赣边区特委领导。特委指定岳阳成立中心县委，领导

岳阳、临湘、湘阴、通城四县工作。当时，除湘阴略有基础外，其他两县尚无组织。岳阳组织大量发展时期在〔民国〕二十七年六、七、八、九数月，其他各县大量发展时期在〔民国〕二十八年二、三、四、五数月。

3、大量发展时的客观情况与发展所依靠的力量。当时的客观情况，由于：（1）整个统战局面尚在顺利时期。（2）地方部分政权（如岳阳县长）对我们相当同情。（3）三青团尚未成立，国民党也相当软弱，一般说来还是算好的。

至于我们主观所依靠的力量则有：（1）过去启蒙运动打下的基础。（2）有些同志在中、小学教育界占有相当地位和直接掌握的三十几个小学校和五十几个民众学校。

4、经验的总结：（1）起初犯关门主义，后来又犯拉伕错误。（2）对统战了解不够，清高、独干，甚至打击友党份子。

（3）不善于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和适当的联系起来。

（4）不善于掩护自己，以致许多同志都闹红了。（5）发展的不平衡、不普遍。

（二）党的现状

1、党龄：

岳阳——两年又五个月，湘阴——约两年，临湘——一年又五个月，通城——一年又五个月。

2、党员人数（一九四〇年二月）：

岳阳——六百余，临湘——约一百二十，通城——约一百五十，湘阴——约七十。

3、党员成分（无正确统计，其比例约计如下）：

贫农——百分之三十八。

中农——百分之三十二。

雇农——百分之五。

〔以上共占〕百分之七十五。

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

独立手工业者——百分之五。

注：女党员约占全数百分之六。

4、巩固与清洗：

（1）从发展中巩固，发展一个教育一个。

（2）发现坏份子随时加以洗刷。

（3）洗刷时，先用说服，说服无效时，即行无形疏远，少用叫名开除。

（4）对洗刷后的份子，尽可能争取他中立，在思想上给以一般的教育和影响，但绝对不与之发生组织关系。

（三）组织领导问题

1、各级机关组织：

（1）中心县委——书记、组织、宣传（常会到会人）、军委、青委、统工、妇女七人，外巡视员二人。

（2）县委、区委——书记、组织、宣传、统工（统工不出席常会）。

（3）支、组——支部：书记、组织、宣传三人，小组组长。

各级负责人，初期多用教书掩护，失业后少数经商，多数无职业。

2、领导方式：

（1）各级有定期会议。

（2）上对下检查工作：①上级派员参加下级会议。②由巡视员及各据点负责人深入检查。

(3) 中委对县，县委对区，采分区领导制。

3、优缺点：

(1) 上级领导人理论水平还相当高，都很积极、坚定。

(2) 领导人（特别是县以上）多知识分子 工农太少。

(3) 领导人一般都缺乏工作经验，不善于抓住时机，把握工作中心。

(四)教育、宣传问题

1、教育方式，分三种：

(1) 办短期训练班。

(2) 在会议中进行教育工作。

(3) 规定自学（规定文化水准高的教育文化水准低的，识字的教育不识字的）。

2、教育材料：

(1) 来源：①上级颁发或翻印；②自编；③利用各种现成书报。

(2) 内容：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当前的实际问题及一般社会科学常识。

3、教员：各级宣传部，各级负责人及特殊知识分子同志。

4、教育成效：政治、理论水平一般的提高了，但与实际工作的配合运用还感不够。

5、宣传工作，可分两期叙述如下：

(1) 沦陷前——利用各种公开工作地位及工作机会，进行了下面的一些宣传工作：

①在岳城出版《战鼓》周刊，读者多为小学教师及学生青年，销数达两百多到三百份。半年后因经费及环境恶化被迫停刊。

②在岳城创设街头书店，股东多为同志，基金约三百余元，专销生活、新知、杂志公司、□□社等书店出版书报，推销数量不小。数月后，因岳阳告急迁移下乡，未几〔月〕被迫停闭。

③在岳阳城乡创立自学图书社，社员达百余人，进行集体的自我学习，收效颇大。

④利用各学校及救亡组织，在城乡设立了五十所以上的民众学校（教材采《战时读本》），组织了好几个流动宣传队，设立了好几个抗敌讲座，出版了好几种抗敌壁报和画报。在伤兵俱乐部，还进行了些对伤兵的教育与宣传工作。

⑤介绍和代为推销《新华日报》、《解放》及各种前进书报。

（2）沦陷后——公开工作地位及机会先后丧失，范围亦为之缩小，此时的宣传工作方式如下：

①利用少数尚能把握的小学，继续办民校与出壁报等工作。

②利用连云高小，组织了宣传队和话剧团。

③领导部分失学青年成立了民众学校（仅一所，日夜两班），学生多至百余人，维持到半年后始被迫停办。

④通过前进知识分子及开明士绅进行宣传解释工作。

⑤教育同志利用各种机会随时随地进行口头宣传。

⑥由公开同志（仅彭援华一人）与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份子进行宣传解释和推动工作。

（五）干部问题

1、成分：区级以上干部知识分子较多，工农较少。

2、党龄：新干部多，老干部少。

3、籍贯：纯系土产，合干部地方化原则。

4、倾向：有时犯左倾幼稚病。

5、思想斗争：因多系师生或朋友关系，尚未能及时进行严格的思想斗争，有点犯家长习气和自由主义（不过只是个别的现象）。

6、提拔：因党龄较短，组织发展迅速，干部提拔尚嫌太快。因之，干部的教育工作虽相当的做了，但实际的工作锻炼是多感不够的。

7、保存：因过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未能适当的分开与配合，以致大多数干部都弄到色彩鲜明，失去公开工作机会，并受到顽固份子的注意和防范，难于展开工作。现正进行将各级领导工作大部分由知识分子转到工农手里，并酌量调动有色干部。

三、统战工作

（一）对统工的态度和作风

按其发展的顺序，可分如下三期：

1、第一期（沦陷前）：对统工了解错误，工作在拉拢和利用同情我们的个人或政权，打击反对我们的个人或政权，未能利用当时好的政治环境进行积极的争取工作，化敌为友。

2、第二期（沦陷后至〔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偏重了上层的交际和拉拢，忽略中下层和实际的具体工作。

3、第三期（〔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到现在）：由于过去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改正了过去的一切错误，走上了统工的正轨，可是环境已日形恶化，我们在各方面丧失了有利的阵地。

（二）统工的进行

1、动员同志和群众帮助政府进行了征募、侦察敌情及运输

等工作。

2、动员同志和群众在战场上及邻战区进行了打扫战场、作向导、送茶水饭食、慰劳伤兵、设伤兵招待所等帮助友军的工作。

3、动员青年参加八十二师青年学生救国团，并派彭援华、杨乐如两同志帮助教课。

4、由公开同志赠送党内书籍、文件（如《论新阶段》、《六中全会决议案》）及前进书报给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三青团、各驻军上层份子及一般开明士绅，且公开以共产党员资格与他们谈论有关抗战及团结之各种问题，从而解释误会，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5、教育全体同志利用各种关系推动前进份子，说服落后份子，孤立坏份子。

6、尽一切可能从各方面设法消去或减少政府与国民党，或国民党与三青团，或驻军与政府与国民党，以及其内部之各种不利于抗战的矛盾冲突。

四、群众工作

（一）群众的困苦与要求

1、最怕征兵，其次怕征工、征税。

2、食盐运输困难，加上贪官污吏及奸商们之操纵舞弊，市价陡涨，高至三块多钱一斤，人民购买力弱，大都陷于淡食。

3、因受战争影响，一般土产（木材、竹器、农产品）无法向外运销，人民收入减少，而日常必需之各种工业品，如布匹等则陡涨数倍，以致人民生活日形困苦。

4、特别是湘北会战之处，湘阴之大部及岳、临、通之全部

惨遭溃敌蹂躏，房屋、牲口、种子受极大损失，今年春耕更感困难。

5、人民对自动武装抗敌之要求甚为迫切，但对国民党之统制、压迫收编政策，则存戒惧心理。

（二）组织群众的困难

在湘鄂赣边区，国民党及其政府为防止异党活动，除其直接领导之各县国民兵团所进行之国民兵训外，禁止任何群众组织，虽上令全国一致推行之国民月会，亦在被禁之列。在目前利用合法名义组织群众，甚为困难。

（三）党对于团结群众的工作

通过当地支部从下列两方面进行：

1、利用民众夜校（识字、学珠算、拳术）及各种封建形式（如拜盟弟兄，结干亲家，成立鲁班会等）团结群众。

2、利用对于群众日常生活有利的各种事业，团结群众，如集资购运食盐成立食盐公卖处等。

五、武装政权工作

（一）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地方武装政权的强度控制，一方面除各县成立直属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之挺进支队（县长兼支队长）外，不许成立任何地方武装，一方面规定区、乡、保、甲各级行政人员及游击队各级干部人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否则即予以强迫归并、驱逐或撤换（如岳阳北区之胡春台部，起初在我们同志领导之下，作战很有成绩，结果引起县府

注意与嫉忌，被迫改编，我们同志被迫离开。又如彭庆明同志曾任岳阳乡长，亦因犯左倾嫌疑而被撤换）。因此，

（二）我们在湘鄂赣边区无法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只能潜伏在国民党部队里面暗地进行工作。

（三）在地方政府机关内亦不易打入，更难长久立足。所以，

（四）我们现在在岳中范围内，无论武装或政权内的力量都相当薄弱。岳阳挺进支队内有一个中队长及三个兵士是我们同志；岳阳、湘阴均有极少数保长是同志，临湘有两个乡长和两个助理员，游击队有一个副大队长、一个中队长、一个特务长、一个书记、一个班长、三个兵是我们同志；通城有一个大队长、一个书记、两个伙夫和少数保长是我们同志。且由于国民党整个政权的腐化，其防范“异党”的严密，以及其部队素质（多系地方过去土匪及民团改编而成）之太差，我们同志在他们里面所可能起的作用仍属有限，成绩亦不甚显著，虽然党在这方面用了不少的力量。

六、平江惨案

（一）惨案发生前的政治情况

1、由于新四军驻平通讯处在涂、罗、黄诸同志领导之下，做了不少有助于群众或整个抗战的工作，一方面获得了当地群众及一般开明份子的信仰和爱戴，另一方面也就招来了顽固分子的嫉忌。由于他们多方造谣中伤的结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处曾一度派员调查，企图藉端取消，但因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对通讯处一致赞誉，无罪可加，只得作罢。

2、在惨案发生前一月前后，陈诚在南岳召集第九战区军政长官举行××会议后，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过去对我们态度很好，并与涂同志面谈过几次，还要求我们介绍人在该部工作）回到边区后就发表反动谈话，有“在他防区内绝对不容许有异党活动”等语，前在该部工作之同志只得退出。

3、边区驻军各师政治部主任秘密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制异党活动问题，会中有提议“如发现共产份子即行就地枪决或加以汉奸名义处死刑”者，当场虽未得通过，但闭会后，有些反动部队（如杨森部八十二师政治部）即各自组织暗杀团体，在特务营、连或锄奸队等名义掩护下进行工作。

4、在各师及各政府或党务机关内，发现防制异党特别是共党之密令，顽固分子大造其谣。

5、距惨案发生前不久，不时有形迹可疑之特务人员围绕通讯处打探，同时平江县长（对我们同情）亦来信叫我们戒备。

6、前两天，在杨森部工作之××等同志突然被拘押（后遭暗杀），消息传至通讯处，涂同志等判断为“大概因私人关系，不会影响到通讯处来的”。

（二）我们的对策

1、指示各地组织提高警觉性，严密组织，防备意外事变发生。

2、收拾重要文件，准备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负责人绝对分开，将后者潜伏起来。

3、尽量缩小通讯处范围，减少武装兵士（已做到）及办事人员。

4、准备将通讯处迁往平江县（准备由平迁衡以至撤销），并已派黄耀南同志（通讯处主任）先往平江县交涉一切。

(三) 惨案的经过和我们的损失

1、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许，杨森（第九战区二野战区总司令，司令部驻平江）部特务营余连〔长〕暗将嘉义市通讯处前后包围，佯派×参谋请涂正坤同志同往该连部会商要公，涂同志虽明知情势不好，但处在势逼之下，只得同去。甫行至通讯处大门口，则有一着长衫之特务人员，一面从衣袋内取出手枪，一面向旁立之连长请示：“连长！我打皆（音）？”连长回答：“打！”涂同志腿部中弹倒地，随扭身向凶手摇手，且说：“有话说得清，不要打人！”凶手不由分说，连续发射，涂同志就此牺牲了。当前门枪击涂同志时，后门外机枪和步枪声猛发，全通讯处同志始知事变已起，纷从楼上跑下或从工作室走出，则见前门武装部队蜂涌而入，大声叫：“老百姓不要乱动！”这时涂、罗诸同志家眷得以老百姓作掩护（好在都是穿的便衣）混入邻家，幸免于难。对通讯处人员急呼“缴枪！缴枪！”在罗梓铭命令各通讯班同志不要抵抗之下，所有武器缴给了匪兵。接着，就是将通讯处所有人员禁闭一室，然后分赴各处大肆搜查，所有书籍、被服、文件抄洗一空，随后又将吴渊同志牵出，枪毙于市中运动场内。同时，向居民申〔明〕说：“我们在此地至少有一星期驻扎，所有新四军通讯处房间都由我们驻兵，你们老百姓不要惊惶！”涂、吴两同志遭受非命后，嘉义市中居民议论纷纷，咸谓“如今不是国共合作吗？他们在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样不宣布罪状随便杀人？……”那些匪徒见众怒难犯，怕以后不好掩饰，乃就地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加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大意谓“他们在这里过去本是算好的，不过近来他们暗地派了人到我们部队里做破坏工作，煽惑士兵，拐枪逃走，今天我们就是奉命来查究这

笔事的。命令是没有叫我们杀人的，刚才因为×连长过于卤莽，将×、×两人杀了……现已将×连长拘押起来，准备法办……”。对群众这样掩耳盗铃的“解释”了一下，大会就算结束了。群众虽然不满，但在枪杆威胁下亦莫可如何。之后，因为那些匪徒们早就侦知了一切内情，他们知道赵绿吟（女同志，岳阳人，抗大毕业生）是通讯班的音乐教员，便一致要求她唱歌，赵同志正是满腔悲愤，无可发泄，乃英勇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高张着激昂慷慨的歌喉，唱着“枪口对外”、“国共合作进行曲”、“打杀汉奸”一类的抗敌反奸的雄伟歌词，从下午起一直唱到她被迫停止呼吸的最后一刹那。到了那天晚上，大概已经夜深人静了吧，匪徒们把通讯处被押一室的同志们按官兵阶级分划开来，然后从“官长室”先叫罗梓铭同志出来，罗同志从容地发问：“你们叫我到哪里去呢？”匪徒们回答：“解你们到总司令部去。”罗同志声调高强起来了：“我知道你们不是解我们到总司令部去，你们是叫我们上杀场去。不过你们要知道：干革命工作的人是不怕死的，怕死的人就根本不会干革命工作……。杀我们可以，但是你们总要宣布罪状，不能无故杀人。我问你们，你们是假借什么罪名来杀我们的呢？”匪徒们回答：“现在不是同你讲理的时候了。”边说边拖地逼着罗同志走，后面曾同志他们也被迫跟着来了。罗同志更怒声说：“你们今天还在干杀共产党的工作吗？共产党是抗战的模范政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今天来杀共产党，就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就等于汉奸！你们要杀共产党吗？共产党是杀不了的！八路军、新四军你们杀得了吗？全中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进人类都是我们的同志，你们杀得了吗？……”到这时，已不是罗同志一人的愤语，而是全体被拘同志的怒吼了。匪徒们发急了，怕事机泄漏了不好办，忙叫将罗同志们

的咽喉束住，罗同志等知说话机会已不可多得，便立即领导高呼：“国共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赵绿吟同志则高唱“枪口对外”歌词，一直高呼高唱到喉、颈、口、鼻全被束住，不能呼吸时为止。这种慷慨悲歌，从容就义的英勇牺牲，一丝不苟的精神，是何等的感天地、泣鬼神呵，不知在忠奸对比下的匪徒们作何感想呵！罗梓铭等六位同志被绑劫出市街不远，被投入一个淘金岗内活活地用泥土筑死了，这时只远远地听到了两、三下手枪声和连续不断的筑土的声音。事后掘出尸体，每个同志的遗体上都有血迹斑斑的刀伤与弹伤。

2、这次惨案使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是异常巨大的，除罗梓铭、涂正坤等六同志外，计被劫去：手枪六枝，驳壳〔枪〕六枝，马枪两枝，子弹千余发，法币二千余元，书籍、印信、被服无算。

3、与惨案发生同时，嘉义市叛变了一位同志（豆腐铺老板），带领匪兵暗杀队四出侦缉黄耀南同志，准备一网打尽，幸得黄同志早已得悉隐蔽，因此得免于难。

（四）惨案发生后的政治环境和我们的工作

1、政治环境：

（1）杨森部派便衣队四出侦缉和破坏我们的组织及同志，并在嘉义及长寿街一带开办训练班，强迫民众受反动训练。

（2）在湘鄂赣边区范围内，被各当地军政机关假名逮捕杀戮以及暗杀，牺牲同志达五十余人。

（3）杨森及边区顽固分子藉此散布各种谣言及恐怖空气。

（4）平江县政府及乡镇公所、自卫队以及地方公正士绅，大都对我同情和保护。

2、我们的工作：

(1) 发快邮代电——惨案发生后三日内即已发出。

(2) 呈报省委及新四军军部转请中央究办。

(3) 将惨案经过分别通知边区各中委、县委，并指示当前政治环境及应注意之点，将一切组织完全转入地下状态。

(4) 通讯处无形取消，黄耀南及其他同志调动工作，特委机关迁移山地，继任负责人分散领导。

(五)这次惨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1、公开机关与秘密机关，公开工作人员与秘密工作人员应该分开。

2、负责人不应集中一处。

3、警觉性提高得不够，做事太迂缓。

4、殉难同志从容应变，逆来顺受，临死不忘顾全大局，足为后死者模范。

5、事变后，脱险同志犹能在极端险恶环境下继续进行艰苦工作，这种精神也是好的。

6、由于过去地方统战工作做得相当好，相当地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胡庆熙关于湘潭 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①

一、关于一般的停止发展党，进行巩固 工作的问题

(一) 在说到这个问题以先，我须将我工作地区的组织一般情况说一说。我是于去年八月到湘潭工作。因为湘潭过去党的发展是大量的(那地〈里〉曾经进行过竞赛与突击等发展方式的)，而且几乎是半公开的，因此发生了几种现象：第一，党员的质〔量〕，落后的多；第二，横的关系很多；第三，自首分子加入的多；第四，领导者暴露太多。有了这四个原因，所以在革命形势逆转的到来，关于组织的建立与巩固发生了困难。于是，大批领导的干部不得不离开，对于党员不得不加以清洗。但是，因为上述的几个原因，虽然在我去工作以前，调走了尽红的干部，清洗了大批自首分子与落后分子，可是总做得不彻底。譬如，尽“红”的干部走了，而新提出的却是“次红”的分子；自首分子被清洗了，而因农村环境的关系(大家非亲即友，人情很重)与党员组

*原文标题：“湘潭工作报告”

①本文时间系编者考证。

织、政治认识的不够，所以捕风捉影，被清洗分子关于组织的活动多少有些关心，况且就是清洗也不彻底。此外，调走的干部去了，剩下的尽是农人，所以领导很成问题。这是我们去工作时的情形。因此，我们第一步的工作是要彻底整理，于是我们特别注重到干部的提拔与组织的重新建立。所以，在未接到停止发展的指示以前，事实上在湘潭已暂时进入此种状态，虽然我们未放弃过有条件发展的原则，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成绩。客观的原因，是湘潭情形太复杂。譬如，组织的半暴露与大批党员甚至整个几区的放弃，圈子会的存在，国民党的活动；同时，又因是毛先生与彭先生的家乡，大家都好意或恶意的关心这些事，所以自彭先生的兄弟遭暗杀以后，这种情形更趋严重，发展更属困难。至于主观的原因，是我们工作经验的缺乏，尤其是这种环境下工作经验的缺乏。

(二) 关于执行整理紧缩的任务：第一，考查与提拔干部，设法调走不妥当的干部或党员（因客观环境的关系，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第二，有条件的化整为零，或将一个区分为两个，或将区分立为支，支分立为小组。第三，设法掩蔽组织系统，譬如，我只令下级知道组织联系，而不知区、支小组等系统。第四，注重中心组织的建立。第五，教育党员在言行上的群众化。第六，尽量清洗自首分子与落后分子。

(三) 无新党员的发展。

二、关于审查成份，清刷异己分子、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及敌探奸细的问题

(一) 党员经过审查的有八分之五，约五十人。干部经过审

查的有十一人。

(二)发现了五个新干部：三个农民、一位教旧书的老先生、一位女干部。发现了些自首分子各（和）落后分子。

(三)我们进行清洗工作大半是自上而下的，第一步对干部加以考查，再由干部推及下面。在考查清楚决定清洗时，我们完全采取一种只让直接领导者，不让他人及本人知道的办法，同时，以组织的纪律和各种关于政治上的信念去隔绝被清洗者与党员的组织关系。譬如，有一个支部共有六个人，我们认为有四人太落后，其他两个却是很好的，但他们居在一块地方，彼此很熟悉，同时，那四个落后分子对他们的活动又很关心，我们要把他们隔离起来，实在困难。于是我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分成两个小组，某两人因某种关系做一组，其他又做一组；同时当面告诉他们，以后不得上级允许，两组不能谈组织问题。同时，将环境的严重告诉他们，要大家不要动，各人安心办理自己的事，以后上级的领导不是经常的，要碰机会，但上级一定要想尽办法来领导他们，事后，暗地通诉（知）那二人一组中的一个，因为组织有事托他做，要约他在何时何地见面。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谈过其他问〔题〕以后，我们要他回去绝对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与上级见了面，也不要说上级有人来过，回去只准与某人取联络；和其他的同志在感情上取联络，绝对不准谈组织。关于组织上事，各管各的，你固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关于政治问题，最好只顾听他人意见。同时要告诉他们，不要乱谈乱说，经过这样几次谈话，使这位新干部对于组织观念加强，而其他几个就慢慢淡忘了这么一回事，于是我们便达到了被清洗〔者〕与党员完全不知道“清洗”这样一回事。

对于被洗刷者，一般是采取感情上的极端联系与组织上的绝

对隔离及政治上的可能领导这一原则。对于同情者工作，无何值得提出的特别具体事件。但我们一致根据中央指示提出多交朋友，多结亲戚的口号。

(四) 我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第一，要耐心的去了解一切环境，给以精确的分析，再按照原则作出可靠的结论，大胆的决定。我们应该应用两条战条(线)的斗争，反对原则的抽象化和事实的反原则化，我们工作经验少的人对这点很难做到。第二，对于一个事情的处理(譬如考查一个干部)，在政治上自己要有明确的见解，不然你就很难避免错误。第三，初去工作的人，因为没经验的依据，怕拿出主张，怕犯错误，因此把工作拖延下去，显得松懈。我们要克服这种倾向，要知犯错误固不应该，但耽搁了工作也不应该。第四，我们要实〔行〕自我审查、自我清洗，极力克服自己思想、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动摇根底，以身作则，才能去审查人家，洗刷人家，忠诚的执行任务。这一点，一个没有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逆境中之工作应特别注意“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第五，要有坚强的政治信念、明确的组织观念，做事有计划的习惯，充分发扬创造精神与责任心，克服工作上的尾巴与雇佣倾向。这固实是一般应有的，尤其在一个不顺利的环境中去整理或创建一个组织应有的精神。

三、关于党内教育的问题

我所工作的地方因环境的严重，干部的缺乏，尤其在农民中文化的落后，对于教育进行问题实在不容易。以前，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整理与清洗方面，特别的定出计划进行教育还是以后的问题，自然，尽量的利用个别或集会的方式进行教育并没有放

弃过。我们教育的内容大概分三个方面：第一，党的理论方面的，如共产主义是什么？为什么组织共产党？共产党目前与将来的任务怎样？中国革命的过程怎样？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应用。第二，党的组织方面，如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与任务；共产党员通常的守则；关于秘密工作等的技术。第三，对于具体政治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解释，如关于薛岳发表□□的命令后，我们就对他们解释，国民党发出这些命令的用意与客观条件，规定他们这种梦想的不能实现，我们应该怎样揭露他们这些黑暗的内容。又如，当湖南粮食恐慌紧张到发生小的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们指出：这固然是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反映，是民众对他们不信任的表示与小部分民众萌芽着斗争意识表现，但这决不是可以这样估计，说国民党的统治已基本动摇，人民有明确反抗的意识，可以进到有政治意义的暴动的时候。不过，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是赞助他们的；在不影响到组织工作进行的条件下，我们是要参加或领导的。

至于党员对马列主义与统一战线的了解，大概是这样：占大多数的农人（佃农尤多），由〔于〕他们本身经济生活意识的反映，对于马列主义具有朴素的信心；此外，少数几个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字上或多懂一点，但还不够得很。至于民族立场，在中国这种经济生活中，恐怕大多数人民是将他的民族观念与经济观念明显或不明显地放在一起的。我们的同志由〔于〕了解经济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在中国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比一般人不可否认的对民族的认识要高明，对于统一战线他们是没有特别意见的。

提拔了五个新干部，是经过根据上级负责人的报告与亲自〔进行〕各方审查提出来的。对于干部的教育是完全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其他非环境所许。

四、关于加强党的保卫与反奸细斗争的问题

我们因环境的关系，负责人的缺少（湘潭仅一人负责），我们没专人负责研究领导保卫工作，不过到目前组织里面还没有发现过奸细。

五、关于秘密工作问题

湘潭目前工作是完全秘密的，没有公开机关与公开党员。党员因农人居多，都有职业。《秘密条例》主要的是：（一）会议外不谈政治问题；（二）不对下级宣告自己执〈职〉务，与上级来往不让下级知道；（三）党员与党员，组织与组织尽量断绝横的关系；（四）不做违法事业；（五）热心自己社会职业；（六）各级连锁负责，保证内部分子的纯洁；（七）不准暴露有关文件；（八）注意威胁利诱性质之谣言，除特别情形外，非经领导者许可，在此种时势下不得自由行动，免随（中）敌人打草惊蛇之计；（九）公务人员不负组织责任；（十）跨党分子须与地方组织隔离。

六、没有甚么可以提出。^①

七、……^②

八、关于撤退与掩护的问题

（一）有三个暴露了（但不显著），一个已撤退来川。暴露原因是：因发展组织时，他们都是干部，现在有些被清洗的分子

^①原文如此。

^②此处编者删去一千六百余字，主要例举加入国民党和自首的问题。

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些被清洗的分子，有一个被人控告，并来便衣队拘捕，但已逃脱。其他两个我们已叫他们马上脱离本地，如果他们走了，下面组织无影响。

(二) 现在党员总数有八十大，有教旧书的、手工匠、巫，尤以佃农为最多，分布在湘潭黄荆坪、首霞乡等地区。此八十人中，暂无须有撤退之人。

(三) 领导机关巩固程度不够，尚无职业掩护。

(四) 撤退时，大家苦无去路。

以上各点，都是目前支部组织上之弱点，应即加以注意。

九、关于现存支部的问题

支部组织，在清理中，尚存者有如下各点：

(一) 现存的支部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当前的环境，支部组织以系统明确、简单为原则，每支人数规定十人上下，支仅设支书。支以下为组，每组以三人为原则，设组长一人。此外有个别联系者，按其情形与任务，由支书或组长或更上级的人与之取联系。

(二) 支部工作，目前重心放在清洗与整理上，其方法为分级负责，譬如支书负组长之责，组长负党员之责。

(三) 支部与群众暂无具体之联系方法，完全系经过党员及特殊关系。

(四) 支部生活，除个别谈话外，在这整理时间可说没有其他活动。

(五) 都是遇事由上级去找下级，时间也是临时决定的。

就一般说，湘潭党的支部到如今还没有到健全的境地，这仍免不了前面所说的客观与主观的原因。

十、关于保甲工作方面

(一) 国民党进行保甲工作，目前是采取这些办法：如清查户口、办乡、保长训练班、设立战时任务队、五家联结、身份证等。他们利用保甲防止我们活动的办法是：引诱或指定保、甲长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宣传排除异党分子；设立保国民学校及中心小学，占据乡村教育地盘；办理国民兵团，加以军事统治。

(二) 他们防止我们进入公务机关的办法：一方面公务员须由上方指派或同意；一方面要你入党入团，在他断定你危险但无证据时，便给你以监视或打击。

金在关于在湘西两年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

一、第一时期的工作(乾城——沅陵)

1. 经过：一九三八年秋间，我自鄂东北回到湖南，自沅江折至沅陵，旋至乾城，即由李谊之同志介绍入党，共同进行建立乾城党的组织。组织成立后，即担任县委组织部工作。未久，所里及乾城县城两个支部成立。那时，湘西绥靖公署正组织湘西剿匪宣传团，于湘西二十一县设区队。我们想利用这个组织发展我们的力量，并决定由我进行取得宣传团总干事职务。后来该团因经费发生问题，缩小范围，我就离乾到沅。一九三九年二月，湘西工委会派我到赵君迈主办之税警运输处督运员及押运员训练班担任政治训练工作，图立下发展川湘公路线的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又因《抗战日报》社缺乏工作人员，派我兼在《抗战日报》充任编辑。二月初，赵君迈自香港来，态度转变，我与丁纯林、岳松，王时风等同志均被停职，党决定全部退出该处。以后，我遂专在《抗战日报》工作。四月，党派我到沅陵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我在青年团充任宣传组兼社会服务组组长，进行湘西青年运动的统一战线工作，与三青团的关系建立得尚好。进步的群众组织，

*原文标题：“湘西二年的工作报告。”

如一致剧社、新声歌咏队、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数团体，均渐获得三青团之好感。当时，曾发动一次以三青团为首的节约献金、义卖公演运动，驻沅各党政机关，如省、县党部，省府、县府及各厅、处均参加，除党部外政界、军界参加，情绪尚热烈。献金运动结束，各参加单位假基督教青年会开茶话会，由民〔政〕厅代表提议组织战时青年座谈会，以为经常从事救亡工作的联系组织。然而党部与青年团的摩擦是大，党部对青年团的活跃大为嫉视，遂借口青年团与左倾团体接近，攻击青年团，并且说青年团里面有一个《抗战日报》的编辑（指我）。我看见形势颇为严重，便自动退出，并将情形报告〔湘〕西工委。之后，我即被派担任湘西青委的工作，并决定：我必须立刻离开《抗战日报》往各县工作。不过〔湘〕西工委和青委会都没有执行这个决议案，原因是《抗战日报》工作人员不够。所以，我只负一个青委的名义，而未曾作青委的工作。不久，《抗战日报》廖沫沙、周立波相继离去，负担编辑工作的人更少（只剩两个人），我就继立波充任《抗战日报》支部书记，一心支持《抗战日报》。至于青委工作，青委会书记（白云华同志）从未召开过会或谈过工作，我就无法兼作了。《抗战日报》内部的情形极为复杂，《抗战日报》是田汉嫡系的报纸，社长蒋寿世是田的二舅，总编辑廖沫沙是田的学生，总经理王文秋是田的多年从属，印刷部主任是蒋寿世的儿子，金台和另一人张某也是蒋的忠仆。我们在编辑部尚有力量，廖沫沙和我们很接近，编辑方针大体上还能把握，然在行政和财务上有很大的对立。那时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据说周恩来同志对《抗战日报》曾允每月捐助四百元大洋，而以立波同志为半公开的代表。这笔钱自二月以后就没有来过，蒋寿世、王文秋以此抱怨，立波同志则认为报馆各方面尚应大加改善，尤其是收支

要公开、合理，用人行事要公允（蒋等从未清算、公布帐目，也从无帐目，用人行事则以蒋的利益为标准），终至决裂。立波被逼离开，我和雷三行、林岳松两同志仍秘密支持该报。蒋、王等见所谋未遂，乃在七月十五日宣告停版。我们则在先二日得〔湘〕西工委通知，不必坚持支持该报，报纸停版，任务也完了。

2、感想：这个时期的工作可分作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乾城的工作。乾城在那时是湖南第四保安区司令部、行政专员公署、湘西绥靖公署的所在地，可说是湘西军、政的中心。我们在那里的对象是乾城和所里的青年，尤其是国立安徽中学（现在改为第八中学）、屯区（即苗区）师资训练所等几个中学和商专。初时工作尚顺利，不过CC的势力也在当时发展到了乾城，而我们的工作也有过火的地方，如垦荒书店（这个店名就不大妥）经常聚集青年群众，并且还出大型壁报，组织球队。这些，都超出了商店事业的范围，自然容〔易〕给外界注目。现在乾城情况恶化，都是这些荒唐作风所致。第二部分，我在乾城还不到两个月，因为职务未定，没有适当掩护，到沅陵后。我所担当的工作最繁冗，而且最紊乱，并且给我的任务也没有一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也没有分开。比如，我既在《抗战日报》当编辑，就不该再要我去三青团和税警运输处工作，因为《抗战日报》在当时已被公认为红色报纸，不然就要允许我离开《抗战日报》。可是〔湘〕西工委并没有允许我的请求，只是推延下去，结果各方皆受恶影响。特别是在三青团工作，那简直含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我一方面仍勉强担任报纸编辑，终至成为省、县党部攻击我的藉口。以后我担任青委工作时，还是不能把工作分别清楚。四月间，省委老聂同志到沅和〔湘〕西工委诸同志共同决定，我必须立即离开报馆，到各县去开展青年工作。而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这个决议。

案。原因是：报纸工作人员缺乏（既然如此，何必做这个决议呢？）。至于青委工作，据我所知，不但没有开展，而且未曾开始，连会议也未举行过（这应该由当时的青委书记负责）。究竟以后青委会还存在不存在，我也未得知道。再，在《抗战日报》的任务也没有一定，本来的任务是“支持到底”，后来到六月尾，湘西工委会给我们的通知是：“不必坚持”。但到七月十二日，又得通知：“还是要支持”。第二日晨，再得通知：“仍不必坚持”。一时简直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如何措置才适当。把这一时期的工作感想简单写下来就是：①在乾城时〔缺〕乏警觉性，工作突出；②在沅陵时未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分开；③领导、组织处理工作很紊乱，分配工作不适当。

二、第二时期(在凤凰鸦拉营)

1、经过：《抗战日报》工作结束，李声玄同志及湘西工委会决定派我到苗区去创立党的组织。我找到了一个朋友的关系，他在苗区鸦拉营当校长，我以休养身体为由就应了他的邀请。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到达苗区鸦拉营地方。当时，行踪颇秘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去到了那里。做苗区工作最好的条件是能说苗语，生活习惯也要有苗气，这些我都没有具备，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和这位校长的交情。这位校长和我很好，只要不影响到他的学校发展，什么都没有问题，他的思想也并不算落后。同时湘西工委会又转来了两个同志的关系，在他两个的帮助之下，更增加了许多方便。鸦拉营地方非常闭塞，周围土匪如麻，和凤凰及铜仁（在贵州）的交通几乎断绝。各寨的老百姓大都有枪，校长家的枪更多（他家可以号召到一两千枪），如果没有消息传到县城，

我们可以大大干一下。首先，我们以学校为中心，每周举行两次教职员进修会（有时乡长和教会传教士也来参加），讨论时事、教育、甚至宗教等类问题。学生则有读书会、壁报。学生年龄大都不小，年近二十岁的很不少（他们多是自附近各寨来的），理解力也不差。另一方面，经常由打猎或宴会去接〔触〕附近各寨民众，半年间建立了鸦拉营、土屯新寨、廖家碾、老塘、界上、黄罗寨等地各小组或支部，共有同志三十余人，唯苗民则仅二人。此地所以如此易于发展，实有客观的原因：①一般民众生活太苦，极求解放；②政府官吏及军队压迫太厉害；③民众在兵乱、匪乱中养成斗争传统，反对精神甚旺。不过，后为一叛徒所破坏。他……①叛党后任县府督学，此人与我曾在长沙作救亡工作，颇知我的来历。他来鸦拉营视学后，便回县报告，使我不能再在鸦拉营安身。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我就离开了。

2、感想：由鸦拉营工作半年的经验，我认为：①乡村工作比城市工作易于发展，因为反动政治势力较小；②贫苦地区的工作比富裕地区的工作易于开展，因为老百姓求解放的心很切；③有生存斗争传统的民众易于发展，因为他们不怕既存势力的威胁。这一时期的缺点是：①个别同志的生活习惯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适应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保守心理；②地区广大，交通困难，各寨小组对中心组织联络不够；③横的关系还未完全斩断，彼此颇有相悉者；④叛党分子捣蛋，应付困难。

三、第三时期的工作(在永绥)

1、经过：湘西苗区计有凤凰、乾城、永绥、古丈等四县。

①此处编者删去二十来字，系例举叛徒的姓名和当时所任职务。

苗民以永绥为最多，计占全县人口六分之五，因屯田制而被“均”之田亦最多，有所谓“寸土归公”的现象（清时辰州道尹傅鼐以“以苗制苗”之策奏准创立屯田制，四县年可收屯谷十八万担，以作防苗军费，屯田则系没收苗民者。又创碉田，以养碉堡、营寨守兵，其田亦没收苗民），故永绥苗民最苦，开展工作容易。一九四〇年三月，我达到了永绥，唯我所找到的社会关系却在县城里，加之永绥又系交通孔道，不便直接多所活动。主要工作则就在如何找到桥梁，以之深入苗民，而这个桥梁也就只能在我的生活范围以内去找。当时我在两个小学和一个女子初中任课，日常最接近的是学生，就从发展学生群众运动着手。四月间，成立了永绥县委，建立县城和国立八中高二期两个支部。永绥有一个高中，两个初中，还有一个特区师资训练班，平日学生亟思活动而又不善于活动。恰恰那时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有隙，党部没有一个群众团体，我们便乘机取得重庆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允许，组织永绥通讯处，以国民党县党部为领导招牌，展开永绥的青年群众运动。参加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大多数为中學生，次为小学教员。开始，各界机关团体都来协助，题字写文的也不少（办事处就设在县党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认识许多青年，吸收了几个同志。群众工作的热情极高，演剧、通俗讲演、出半月刊、出壁报，闹得很热闹。可是这一下就闹坏了。首先，县政府就不高兴，因为这是县党部领导的；后来宪兵也注意了，原来我们个别同志和一些青年群众吹嘘得很厉害；接着八中的校长邵华（国民党中委）也来限制学生活动。事先，我曾一再提出，要求我们的同志不要工作太突出，但他们认为群众情绪热烈，不可遏制，当时我也就没有过分坚持我的意见。后来局势恶化，我们就把这个运动消沉下来，只救下一块合法的招牌，以为他日再起

的根据。城市工作既困难加多，我们就把工作中心转到乡下，派了一个本地同志到茶洞去发展组织。茶洞是川湘交界的一个市镇，虽在公路上，但尚未为人注意。七月间，有一个国民党员从泸溪回到永绥，他是第三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员，认识我当过《抗战日报》的编辑，在长沙坐过牢，就给我作宣传，我便只有迅速离开永绥。

2、感想：这一时期的收获是：开展了永绥的青年运动，使他们尝试了集体运动的生活，多少散布了一些种子。我自己的掩护工作做得相当好，除了那位泸溪教员外，几乎没有人发觉过我，缺点是：①个别同志工作突出，竟至不估计客观环境的条件；②我自己未能坚持正确的主张；③与〔湘〕西工委缺乏联系（半年未得到过一次信），整个政治情况不明。

四、两年来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教训

1、关于个别同志的：①生活习惯应和群众打成一片，如此，才得接近群众，开展工作；②工作应和客观环境配合，如此，才不至于突出或落后；③工作方式应多变换，不该老是读书、研究、歌咏这一套，应该多从日常生活，如起居、饮食、游玩、谈天等方面去开展工作；④经常提高警觉性，而不是随随便便，偶一为之，必须时刻存着如临深渊的戒心。

2、关于组织方面的：①真正透彻了解当地环境，而不应为偶然的现像所蒙蔽；②工作要有一定计划，不应举棋不定，进退失措；③灵活运用原理、原则，不应死守、局限，忽视当前具体条件；④紧结纵的关系，免失联系，如此，下者可以明了整个政治局势，上者可以明悉地方情况；⑤斩断横的关系，以免发生危

险，致于株连；⑥调整工作干部。已经暴露或突出了的，必须迅速调开，免受无谓牺牲，影响到工作；⑦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即令工作人员缺乏，也应该宁缺毋乱，而不可兼为。

聂洪钧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 ①

一、统一战线环境

(一) 湖南是在国民党的顽固统治下，是国民党统治之中心的和基本的政权区域。在抗战的现阶段，在地位上，湖南是处在中日战争相持的前线。但从一九三九年九月湘北战争以来，一直是在停战状态中。在此以前，是张治中主湘的时期，一般的说主要是对日抗战问题，国民党党部系统不愿抗战，而政府还算得是在进行抗战的工作的。从此以后，以薛岳为首的湖南国民党的军政工作，是以全力反共和排斥异己以及排斥湖南地方势力。这种排斥，就是他的所谓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的统治。”

(二) 湖南原为中国南部的富裕之区。抗战后，且有沪、杭、平、津部分游资投到湖南，与军事工业的大部迁到湖南。长沙大火与常德、衡阳被炸，象还并不怎样影响到湖南的经济生活。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在湖南因战争火烧与轰炸，虽则有不少工商业和许多城市与乡村平民陷于完全破产，人们是多能忍受着，听不到很多的怨言。然而自从一九四〇年春初以来，人们由

①本文时间系编者考证。

不满以至发生普遍愤慨情绪，是在于国民党统治下，愈来愈凶的所谓“统治政策”与其所得税之外，更加上所谓过分利得税。这种统治（请见我的总报告）政策，不仅造成了政治的不安和文化的黑暗，更造成经济的紊乱现象与生活程度的空前提高——商人与地主不能获利，工农和贫民不能维持最低生活。

（三）在湖南，除岳阳、临湘两县为敌占区域，其余概为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区域。敌人除在其占领区临、岳两县畅行其敌伪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中，从现象上看，是有不少敌人的直接爪牙；长沙大火时，国民党省党部曾请长沙商会会长出组维持会；汪精卫公开降日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曾数次严令禁止人民反汪；薛岳与日本武汉伪政府派出之代表（据说乃一湖北蒲圻人）接洽，并护送赴重庆见蒋；湖南社会风传（薛曾登报否认以为掩饰）薛岳主张“和平”、反共。湖南何键派（亦即所谓乙派），在何键下台后，虽曾发生很大的分化，但基本势力仍然保存，他们除拥有相当部份的地方武装（特别是在湘东地带）之外，还能影响李觉等军队。在湘南，除国民党与何键派之外，就是圈子（即青帮、汉流等秘密社会组织），特别是在一九四〇年后，发展普遍于各县和各阶层（包括地主、商人、军官、教员、学生和相当数量的工农群众）。此外，自然还有许多秘密党派活动，有抗战的，也有汉奸的，也有专为进行反薛活动的。一般的说来，主要统治权是操在国民党的手上，因为只有国民党拥有比较巨大的武装力量——军队、特务和宪兵。而且这个统治还不易一下子摧毁，虽然他们基础并不坚固。我们的党在湖南是限在相当狭小的秘密范围，但是我们却有着广大开展的前途，这情形而且是已经存在着。

（四）湖南虽有何键十年的黑暗统治，但是中国的大革命到

苏维埃运动的十年，湖南广大的人民不仅参加，而且是站在斗争的前列。一直到抗战之前，湖南都存在着革命（湘北与湘南广大地区）的政权与武装队伍。抗战和统一战线以后，在为抗战而将武装集中到前线和苏维埃政权取消的区域，而广大群众在基本上仍然保存在我党的领导之下。苏维埃失败区域，如湘西北的群众，他们一直是积极的寻找和等候我党的领导，如在南县失败区的工农青年，自动成立千多人的民先队以及许多乡村之表现国民党形式而保存赤色乡村的内容。在广大的农村，如在长沙、湘潭、衡山、溆浦、益阳等县的工农群众，一般的要求我党与八路军领导他们斗争。在抗战统一战线中，党的影响是扩大到了各阶层的人民中间，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武断欺骗宣传。

（五）随着统治环境的变化，在湖南的阶级关系是起了巨大的变化。在抗战前：1、在苏区、游击区以外的最广大工农群众，对我同情，但没有决心为革命胜利而斗争；2、一般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因在国民党的武断宣传之下，对我是抱着怀疑、恐惧甚至反对的态度；3、地主及中产以上的商人，大都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反对我们的。

在抗战初期：1、为服从总的利益而被取消的苏区部分工农，情绪是表现着低落甚至疏远我们，但我党却取得了与最广大的城市工人及乡村农民见了面，一般的提高了普遍工农群众的认识和增加了我党的影响；2、取得了广大知识份子（包括科学家、公务员、职员、教员等等）和青年学生对我同情和接受我党主张；3、地主阶层，除部分曾经因直接杀过工农及共产党人而不敢相信我党会宽恕他们，因而仍积极反动，其余一般的地主、绅士则是采中立的观望的等待的态度，也有部分对我表示好感，甚至参加我党所提倡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环境逆转后：1、如果说在抗战初期我党的影响扩大了，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影响也是扩大了。但在环境逆转后，广大的工农学生乃至部分上层知识分子，是由怀疑而逐渐脱离了国民党的影响，增长着对国民党文化和思想统治的不满。2、不仅不能生活的工农和贫民，就是中产的商人甚至部分地主，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和商业统治、以及捐税重重和藉口敲榨与政治压迫，也都是深怀不满甚至愤慨，但大多数的人民是陷在苦闷与消沉之中。3、地主和士绅除参加政权及有历史成见和阶级成见的一部分以外，一般的就是不同情我党，对国民党也感到失望而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为了不愿卷入反共斗争的漩涡、甚至部分国民党党员退出国民党或远走他方。4、国民党在进行反共以后，在湖南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建筑在枪杆上。如果说他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依靠那些掌握政权（在军、政、党中有地位和权力）的地主与其贪污敲榨成性的那些为社会所鄙弃的流氓地痞。如果说确还有一部分比较还无恶劣社会影响的学生和上层社会人士跟着他们，那些多是迫于权势和为了本身的饭碗问题，这自然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一部份危险力量。

二、湖南的派别团体情形

（一）国民党在抗战前直至一九三九年冬省党部改组之前，其领导权是操在CC手上，其主要领导人为陈大庸、谢祖尧、周邦式等几人，在其整个系统中亦CC占优势。CC除在国民党部的系统中，在学校教员中亦很多他们的党羽。在CC之内，又分外来派与本地派。薛岳强制改组湖南省党部，主要是拉拢外来派，如朱经农等人，排斥本地派陈大庸、周邦式、谢祖尧等。省

党部改组以后，薛岳自任书记长，并继续进行撤换各县的CC党羽。薛岳在排斥CC的斗争中，还遭到严重的反抗，在湘潭甚有以民团为基础的秘密武装组织，许多县的书记长不执行撤换命令离开县党部。这个斗争直到枪毙湘潭县长王伦和长沙县长田某以后，才告镇压下去。从此，CC在党部的领导权便被完全打破。陈大庸等自然不服，于是在重庆及各方面活动，于去年八月，据说又取得了湖南衡阳等地区的军、政权，即获得了警备司令、保安司令、县长等职位。在学校及其他职业机关的CC分子，因为薛岳没有力量可以解决，是以一直保存在。湖南省银行是彻底改组为薛派的人。在学校及职业机关中的CC分子，多数可以说只是为了地位而加入过CC，但属于CC死党者，如熊梦飞之流还是极少。是以在这些方面的CC分子也有表示进步的，特别是在CC与薛斗争尖锐化的时候，甚有个别县党部（如湘乡县党部）表示愿与我党合作。自然，他们全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非真正为了要革命。

（二）CC失势后，党政军便都是薛岳一手当权。在党政军机关中，现多为薛派所把持，而薛派又是以广东人为其骨干。但是在今天，属于国民党部的方面，除了省党部，是只有个别县改成了薛派人，政府在省以下有多数县已调为薛派死党充任；地方武装保安队亦大部干部调为薛派人。在现在的湖南，没有一个机关没有广东人，是以湖南人说：“湖南已成了薛家天下”。为了布置党羽，薛不能不大批排斥地方势力，甚至张治中时候的乡长亦多被撤换。从省到各级党政军长官、公务人员，所有被撤换的，自然都对薛因而也对国民党深表不满。薛岳在党政军之外，同时拼命发展三青团，作为他在青年中扩大影响的工具。

（三）湖南三青团，薛兼支团长。三青团是在一九三九年

春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初，在各县三青团与县党都是完全对立的，但自从CC被打破了以后，党和团概统一于薛岳，此种对立便告消除。三青团的组织主要在学校，教员和职员中也有一些。根据一般的报告统计，在主要的学校中：国立十一中学一千五百学生中，有二百五十多个三青团员；省立临时中学近二千学生中，约二百余三青团员；湖南大学三十多个三青团员；文艺和大陆中学各百余三青团员；其他大、中学大致都在百以下，大概在每个学校至少总有几个。教员中，主要为了职业或者公开逼迫加入。据几个报告，学生中三青团多为逃避壮丁的分子。在文艺和大陆中学中，虽然各有三青团百多，我们只有五个党员，但在任何的群众会议斗争中，总是我们获得胜利。三青团向国民党一样，除了所谓领导人，除强迫征收团员之外，便是执行特务任务，而团员一般的只是名义而不大管事，除了极少数比较集中一些三青团组织（如大陆）之外。

（四）何键派原为湖南国民党乙派，就是说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派，但与国民党的其他派别是有区别的，不象CC或复兴社等等均以蒋介石为领袖；而他们原来是以何键为领袖，主要目的是在于保持湖南地方势力的统治地位。何键下台后，曾有过很大的分化，即有部份投降于复兴社或CC，但其派别的组织还是基本上存在，其维持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刘岳厚。

这一派在抗战前是湖南最反动的统治的一派；抗战后，特别是在何键下台后，便退到了在野地位，但在各级党政军机关中仍然保存相当力量。在薛岳上台后，大肆撤调乙派分子，甚至于有瓦解危险。于是乙派便决定在保存传统的组织之原则下，全体加入薛派的复兴社。在现在，乙派分子都是以复兴社面目出现，但其本身相互间以及与刘岳厚仍保持有紧密的联络关系。他们是反

对现政府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恢复地方统治势力，现在是待机而作。

这一派在上层军政机关中虽然只有个别的保存，但在地方特别是湘东仍有他们相当的武装力量。被排斥的一部份也在各县积极活动，勾结民团与土匪等。总之，凡属地方势力，一般的都与他们有关系。在刘建绪、陶广、李觉等军队中仍有很大影响，但这些军队已多不在湖南。

这一派人多数是极其腐化的分子，因为环境的变化和为了与薛派斗争，这一派的某些上层，如刘岳厚甚至李觉等，都表示着要求开明与进步。刘岳厚在衡阳办一《开明日报》，虽然遭受薛派不断的攻击，而仍然坚持着一般的公正的立场。薛岳曾允以民政厅长给刘岳厚，只是《开明日报》须交政府办（自然还有其他条件），而刘却是婉言拒绝（刘即想做官，但也未敢遽叛乙派）。李觉引进许多进步分子参加他的军队，就在时局逆转的长时期中，在他的部队中仍保持抗战统一的态度，重庆军委历次摩擦的通告、通令，没有在部队传达过。

（五）薛岳的御用机关：第一是湖南省参议会，纯为笼络地方各派势力的一个机关，以赵恒惕为议长。赵恒惕是湖南一老军阀，但自明台后，势力完全瓦解，仅在社会上保持有一些老军阀的影响，不能有所作为，在薛岳的笼络之下，景象也很觉安然，但恃自己的老道，并不怎样替薛岳卖力。参加的参议员中，自然不少是老朽和部份顽固份子，是替薛捧场的，有着自己的野心，或公正一些的人士也还是多少有些。在参议会，自然不能决定任何东西，但是（至少在开始时是）我们的意见的部份还是可以间接经过赵君迈去转到赵恒惕，或者经过刘岳厚作为自己的主张去大放其大炮。第二是动员委员会，即为薛岳之死走狗仇益三等人所

把持，而实际是进行着对商人甚至平民们的敲榨勒索。除了强征募与“节约”以外，便是任意指商货为仇货，而大施甚至没收的处罚。这个机关在湘人面前是完全臭了。第三便是报馆，在薛岳御用下的计有：长沙《国民日报》（省政府机关报）及《阵中日报》（九战区报）；在衡阳有《大刚报》与《正中日报》；邵阳有《中央日报》。此外，还有各妇慰会、伤兵之友社等御用团体。在改组以后的情形不明，无法写出其内部情形。

（六）工农及一般社会团体：第一是工会，在湖南是一般的城市和一般的工人都有工会组织，如湘潭、益阳总工会，常德工会办事处等等。工会之下，确有相当广大的群众。在抗战初期，如长沙、常德、益阳的工会多转到我党领导之下，因干部暴露被排斥后，而今工会仍然存在，但我们已只有个别党员参加。此外，粤汉铁路等工会，完全为国民党甚至是特务人员所把持，但与群众是完全脱离的官僚工会。工会普遍存在，这是湖南一个特点。其原因是：1、湖南工人经过大革命传统，要求保持工会；2、在何键统治下，国民党处在野地位，要保持工会，利用以与何键斗争。第二是基督教等团体及其附属服务组织，在湖南相当普遍，而一般的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工作人员中且吸收了很多进步分子。第三是商会，虽然一般的是操在中等以上的资产阶级手里，但与政府不是完全融洽的。为了反对“统治”、“动员”及税收的剥削和敲榨，如湘潭商会曾经写不署名的恐吓信给政府税收机关。其他，如学生自给会等还有很多，但情形多不明。农民在湖南没有合法组织，因而参加青帮、汉流等圈子的很多。

（七）圈子（青帮、汉流的组织），这是湖南一个最大的群众性组织。这组织是历史上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湖南历史上一直存在有土匪，由土匪而获得政权，如何键、陈渠珍、陈光宗等

等，都是缘于这类圈子组织而来。这种圈子组织，在薛岳上台后，由于“统治”以及黑暗和倒退，造成社会的不安。一方面虽然薛岳拼命镇压圈子和土匪；一方面却是圈子大发展起来，普遍湖南每一个县。圈子的活动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常三、五十以及成百人的集会，其中包含一切生活不安以及不满于薛之统治的各阶层和各种社会派别的人，其中有大商人、大地主、职员、教员、学生以及在职与不在职的各级军官。工农群众要求革命，但还“茫茫无影”，是以也是大批的加入了圈子。他们的口号，主要像是要求改善生活，反对薛岳。其成份基础主要还是工农和平民，但领导权却一般的是操在地主、绅士、军官和大商人手上。

三、我们对抗战中的各种派别

(一) 对亲日派。在未改组前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要领导人，如陈大庸、周邦式等人，无疑是亲日派。他们请左易斋出组长沙维持会以及命令禁止反汪等，已如上述。在这几个人中，一般的是难于争取的，但在他们影响和领导下的CC派中，有好多人是可争取的。薛岳之为顽固派是无疑的，但是否同时为亲日派，也有可能，这就如前已说过的与武汉伪政府代表接洽及薛之辟谣等等。其他亲日汉奸、托匪，如刘开元（在中央军校任教官）、×××^①等当然还有很多，但是情形不明。同情他们的恐怕只有极少数厌战的商人和难民（很多跑回沦陷区家乡了）。我们对这些人仅作了一般的揭破的工作。

(二) 对顽固派。薛岳是死硬的反共顽固派，在薛岳直接

^①姓名系编者略去。

手下工作的如罗仲衡、方学芬、吴逸智、李扬敬，自然一般的都是顽固分子。他们的种类因为情形不清楚，当难分别。不过从他们中间对反共的不一致，如薛岳命令袭击嘉义镇，而吴逸智却谏以慎重从事，现他们至少是有方法上不同的意见。至于在下面的顽固分子，如徐庆誉、夏宙康等人，一般的是为了维持地位而投入薛下，是可以争取的。

(三) 对中间派。在湖南属于中间派的，从去年的情形看来，刘岳厚、岳森、雷希龄等人应属于这一派。刘岳厚的表现是：1、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不开明而创办《开明日报》，聘请有名的湖南革命的《观察日报》编辑黎澍苍去当总编辑，并所有编辑人员都由黎聘请，所以造成清一色的左倾编辑人员；2、在薛派的严重攻击下，虽将编辑部改组，而仍转弯任用前进编辑（新的总编辑骆何明为进步分子），并要求与黎澍苍仍保持秘密的经常关系；3、发表政治意见以及参加参议会，如问黎为之准备意见大纲（实际上他认为黎供给他的意见即我党之意见），而且为了坚持公正意见，曾与衡阳警备司令及省党部廖维藩等进行过几次激烈的争辩；4、报纸直到我离开湖南之前，还是坚持着比较公正的立场。岳森（邵阳保安司令）系一不大动声色的人，但对邵阳特务及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表示极大厌恶。雷希龄为衡阳《力报》社长，在《力报》出刊前一星期（一九四〇年六月），召集编辑人员说话，声言：“《力报》不替蒋介石、薛岳及其他任何当权的个人捧场，要维持《力报》的历史报格和地位（意外之言，即历史是前进的，蒋、薛等都不会是永久的当权者），但在今天的环境下，对说的话势必须采取一些转弯，以保报纸不受打击。”此人在邵阳《力报》是被以“顽固落后”分子排挤出来的，根据这种行动，实际应该看为中间派为宜。其他当然还有许多这类人，但

我们不知或不记得名字。

(四) 对进步派。从薛岳登台以后，进步的团体多被解散或瓦解，上层进步人士多流散。从曹伯闻、赵君迈被撤职，邵阳《力报》和长沙《华夏日报》被封闭，上层进步分子的联系便一般的断绝了。在一般的大学、中学、报馆及其他各职业机关中，当然还保存有许多进步分子，但皆因受压迫而不敢动。如果我们的工作方式转变，是可以组织他们进行很多的工作的。

四、工作经验教训

(一) 我们谁都知道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自然也做了一些统一战线工作，但在我们的领导上，一般的是只有口头禅的指示，而没有作过具体的统一战线的领导。我们没有建立过健全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门，我们没有真正细心的调查和研究过湖南社会历史、阶级关系及其可能的变化，因此，也就没有作过确定的方针和具体的计划，只能是乱撞一顿，牛头不对马嘴，不能获得应有的成绩。仅有的一些的统一战线关系，但由于过高的要求同盟者，结果不是因害怕离开了我们，便是我们怀疑他们投降了反共顽固派而再也不去接近他们。

(二) 我们大致都懂得仅有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是不够的，我们也曾历次提出过要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徐老在湖南的时期之中，各阶层和各种职业的人士去拜访徐老的何止（还不要说在党周围的）千数，其中固有不少是不怀好意的，但多数应当可以说是抱着很大热忱和希望的，但我们（徐老恐怕也是一样）却是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陆军大学传出有一团长因接连几次去

会徐老而被捕入狱，但我们还不知道），当然说不到组织工作了。这种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不仅使党限于脱离社会的狭隘的状态，不仅使得许多可能的革命同盟者对我们失望，而且使得许多同情者得不到我们的帮助而受到严重的打击（十五师师长被撤职及其他还有许多被杀的）与摧残，不能不是革命的损失。没有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即是说没有能够将在统一战线中根据程度的不同，而分别予以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者团结在某种合法形式之中，因而也就不能对于社会上和抗战中之各种派别明确分别，而具体的确定自己的方针，去进行不断的工作。

（三）我们只有外表的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深入到各阶层、党派、军队、政府内面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只有人家来找我们的公开代表，我们很少主动去找人家；我们只有公开的统一战线活动，没有秘密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没有培养必要的生根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中统一战线干部，甚至把原有在政府中、社会上及国民党中有地位的一些同情者和个别同志弄得逼红，不能立足。原来在圈子中而且很有地位的个别党员，如谭丕谟（民大教授）、毛道逵（楚怡高工教员）等，都自行撤退了出来。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们是限于与社会完全隔离的状态。

（四）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仍然保存了旧的工作方式，不了解巩固与发展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不可分离的联系，不了解统一战线对于国内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力量只是用在手工业式的脱离斗争、脱离统一战线活动的单纯的吸收党员建立党——脱离统一战线活动，即是说脱离社会斗争的党也还是不巩固的党。没有统一战线的广泛活动，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党，自然无法掌握政治斗争，不用政

湖南妇女工作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

一、客观环境

(一) 社会一般概况

1、政治方面：

湖南经过大革命深刻的影响，民众对于革命仍有相当高度的认识和热烈的要求，因之抗战以后，即在何屠户（何键）时代，迫于大势所趋及广大民众的要求，也不能不表示对于抗战尽力，并稍稍开放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而向前进份子表示好感，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之抗战工作得有初步的开展。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派张治中为湖南主席，此为湖南中央化的开始。那时，抗日火焰高涨，同时他为见好于湖南人民，也拿出一套新的合乎抗战要求的政治方案，主要的是动员男女青年下乡做训练民众的工作，叫做社训；又开地方干部学校，准备改革行政机关；又组织抗战统一委员会，包括湖南各党派士绅——封建势力，虽是空头机关，但对于国共合作，对于比较接近人民的各方面表示了前进的意义。在这个时期，抗日运动更广泛开展，尤其在湘

*原文无作者。

中一带如此。长沙大火后，一般人士均认为放火过早，没有准备，加之CC对他的攻击，张治中因而下台。继之主湘者为薛岳，到湘后与CC接近，所以湖南省参政会可说是CC包办；同时，对于民众团体加以解散，取消进步报纸，封闭书店，这可真是抗战以来在政治上的一个倒退时期。他虽耀武扬威地取消了些抗战团体，使许多青年男女一时受到相当打击，可是青年的抗日的怒潮还是蕴藏着的。

2、国民党：

在抗战以前，即有CC与乙派（何）之斗争，某些县份甚至形成两个党部，互相对抗，而在组织则都不健全，有上层机关但很少下层党员群众。在抗战后，何键倒台，乙派失势而新加入了复兴社份子，所以湖南现在的情形，国民党部包含三部份主要分子——CC、复兴社（其中有乙派转入者）和乙派残余，在地方方面也是如此。

3、驻军：

抗战以前，刘建绪之湖南军队调江西（作内战的），现在浙江。现在，湖南军队有战斗部队二十万以上，休养补充部队十万以上，为滇、桂、黔等省的中央军及中央化之湖南军人，胡达做警备司令，还有宪兵分布湖南各县为保安队，常德各地有海军陆战队，湘川边境有别动队。

4、经济状况：

抗战以后，一般经济情形，城市商业资本发达，农村经济日趋困难，投机生意在各大城市日渐发展（如赌、烟、谷米生意），人民生活水准低落，主要农矿产品为大资本统制，如铋、茶、桐油、盐，在湘南、湘西有大规模被服厂、军火工厂的建造，小手工业由城市移下乡，较后方各县有相当的发展，如妇女旧式车

的纺纱及改良木机的纺纱、织布；资本集中现象最显著，如何键、刘建绪为首的农民银行，薛岳办的湖南贸易公司，中央办的湖南矿务局，其余中、交、农各银行在商业界有重大权威，因之农民生活更困难低落，尤以盐价高涨而不易买到，工农生活及职员生活不易维持。

5、国民党党部及地方政府、驻军对抗战与妇运的态度：

国民党党部对抗战问题全为整个局面所迫，不得不表示领导一下，但自始至终是动摇的，如去年反汪开始时他们加以阻止，中央已经公开反汪了，他们还犹疑不定，后在全省男女民众威迫下，才开始行动。地方政府及驻军对抗战相当坚决，尤其是驻军开明，因为他们对于日寇的凶残及民族危机有了些认识，所以对妇运的态度也算好。如长沙驻军曾帮助服务团办训练班；汉寿驻军五十师帮助女联办战时妇女训练班及妇女夜校（捐款五百元，桃源、沅陵、湘潭等处都有这样的事）。湖南群众对抗战与妇运的认识，整个说来还不够得很，不过大多数男女学生在抗战中起了先锋作用，唤醒了一些群众，因此部份的群众对于妇运的态度相当的好。如郴县栖风渡，由乡长太太发起及民众帮助成立了乡妇女会，长沙、沅陵、泸溪、辰溪等县民众，在去年“三·八”帮助劳动妇女参加大会（背箩挑柴的）。

（二）社会特殊情况

1、就地区上说显出地方性，如湘西是一个文化经济落后的地区，为封建势力陈渠珍把持多年，土匪众多，抗战后虽经中央军及宪兵的剿抚，陈渠珍旧部业已改编为新六军开往前线，但是因为那儿民众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没有饭吃，还是要做匪。

2、那儿的妇女生活上特别痛苦，女子种田，男子理家，妇

女一天做到晚，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权利，还要挨男子的打骂。文化上是最落后的，不独女子不读书，就是男子读书的也是凤毛麟角。男性堕落异常，吸鸦片烟者十之八九；抗战刚开始时，他们是不闻不问，好象世外桃源。自武汉失陷后，大批难民及救亡团体跑到那儿后，把抗战的潮流冲到那儿去了。再到长沙失火时，许多机关迁移沅陵（省政府、行署、省党部、学校、救亡团体、妇女工作委员会），这就使湘西各县来了一个政治上的转变，开始了抗战文化及群众对抗战的初步认识。

3、沿湘、川、黔边境，有五十万的苗民，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土地，住在山洞里，生活极苦，妇女的惨况简直难说，一切风俗习惯与汉人不同，他们对于抗战还很少认识。

二、妇女一般生活概况

（一）政治、经济地位及家庭状况

湖南妇女一般的在经济上、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在辛亥革命后，因为湖南的女学比较开办得早，也有个别的妇女上过政治舞台，如王昌国参加了第一次省议会，还有陈才萃、简万容参加了县议会。虽然她们也提到男女平权、女子有继承财产权，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会议上通过的一纸空文，不过也相当的引起了对妇女开放的作用。创办公立女子学校，中学男女兼收，组织妇女联合会，这一点点自由在十年反动时代又被取消了。到了抗战开始，湖南妇女为要谋本身彻底解放，只有参加抗战，因此当时各阶层的妇女都部份的起来了。这样起来又在提高妇女的地位，参加统一委员会的有朱王浣清，做乡长的有浏阳的白嘉、徐国英，做保长的也有一、二人。这样，真在政治上得到一点活动，在经

济上还是没有权利，女子终年系在家，作主妇，作奴役。有钱的家庭呢，妇女虽不愁吃，老爷们讨了小老婆，弄得时常吵闹，精神上不快乐。没有钱的呢，从早忙到晚，还得不到一餐饱饭吃，过年过节儿女们不得吃，也不得穿，夫妻常常生气、吵嘴、打架，闹得不安。

（二）习惯与婚姻

湖南妇女的习惯与婚姻，各区各县都有不同之处，但总的说来，妇女是生活在悲惨之中，在被人贱视的环境里。习惯上，在偏僻的县份及近山的地区，他们每家只有一个女孩的，多的一概溺死，就是有钱人家也是这样；滨湖县份虽有水，不溺死女孩，但不喜欢女孩。溺死吗，怕作孽，就在深更半夜把女孩用小箩装着，偷偷送到有钱人家的后门口放着，想他们做善事，若是他们没有女的，就收留着，有的就闭门不理，让狗子拖去，真是残酷。缠足、穿耳的习惯，自辛亥革命后算相当的打破了，但女孩到了十岁后就不许出门，衣服不能放在男子的盆内共洗，嫁了的女子不经过婆婆的允许不能随便回家，若是嫁后几年不生孩子，就被全家不欢喜。至于婚姻呢，湖南与各省没有例外，全由父母包办，买卖婚姻也还有些地方存在。在湘西、湘南，女的年龄可比男的大上十岁，因为他们娶着做牛马种地等等。靠近湘江县份，男女年龄相差不远，不过男的死了老婆后可配顶年轻的女子，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女的死了丈夫是不能随便改嫁的，旧的礼教还浓厚地存在着。

（三）文化与教育概况及对抗战的认识

湖南妇女在辛亥革命前就有少数官僚的女子受到教育，因为

很早就有提倡女子教育的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校，民国成立时又开了三、四个女子师范，上层妇女受到教育的真是不少。到“五四”运动，这些受了教育的部份妇女也从事新文化运动，同时长沙的私立女校增多，女子受教育的也一天天多了。在抗战开始后，文化教育方面来了一个大的转变，关于抗战的杂志及刊物流行广泛，凡是能够识字的妇女都阅读抗战刊物；同时，文化水准较高的，也在报纸及杂志上写文章；文化宣传剧团也有半数的女团员，如长沙的一致剧社、一九三六剧社，桃源的抗敌剧社。抗战教育在湖南真相当普及，如各县的妇女社训，又有由政府 and 妇女会办的夜校、补习学校、短期训练及识字班等，这样也帮助了妇女对抗战的认识。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只有些学生知识妇女对抗战有些认识，普通一般的是谈不上的，经过这许多抗战教育后，乡下的妇女也就有少数的不为丈夫、儿子做逃避兵役的事了。

（四）各上层妇女在抗战中的政治活动概况

张治中到湘后，他的女儿张素娥对抗战倒抱热忱，在地方干部学校编了一队女生（叫妇运研究组），吸收了前进妇女做指导员。在政治方面，上面说过有朱王浣清参〔加〕抗统会，个别的妇女做乡、保长，湖南新运分会黄时雨等召集了成千的妇女参加反汪大会。同时，在去年七月，在省府帮助之下，在长沙举行了国民公约宣誓，分三种妇女：①教员、学生，②家庭妇女，③特种妇女（妓女）。在三天之中共到了四、五千人，宣誓后即成立了特种妇女训练班，准备他们做抗战工作。还有女青年会的朱太太，参加生产实业，在沅陵办难民妇女工厂；有王某女士经过西南工业合作社关系，在邵阳成立织衣、织鞋、织布合作社；其余

参加教育工作及战时服务团活动的不少。

(五) 妇女生活的痛苦及改善问题

一般妇女同样是受着民族的、经济的、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抬不起头，终年处在奴隶、牛马似的生活。如湘西妇女，从早到晚，在灼热的阳光下操作，插秧、割稻、收藏，一年忙到头，剩下来的粮食不能饱自己和儿女的肚皮，十之六、七被地主剥削去了。到了冬天，就只有冒着风霜，担着一百多斤的木柴去城市去卖，价钱卖不好，回家还要挨坐在家里的丈夫的毒打。湘中一带妇女，虽不种田，但操作家事，管理孩子，纺纱绩麻，每天要做到半夜，一点不好时就要挨公婆的打骂。另一种就是童养媳和妓女，是社会最贱视的，也是妇女本身看不起。童养媳是不自由的奴隶，婆婆看待她就是一条小牛，做的多，吃的少，打骂是常事。妓女在湖南近年来很多，生活极苦，她们的来源是家庭穷困卖出的，或从小捡得的，而那些龟婆就全靠这些可怜的女子供她一己之享乐，若不顺从时，就是打骂或是用一种残酷的怪刑。还有的教职员及学生妇女，她们在文字上虽然有些自由，可是在经济上也还是不自由的，她们若是有些政治行动，她们的家庭就立即断绝经济关系，说以大义，“女大当嫁”，强制她嫁一个丈夫管住她。以上种种不同的生活，都应根据她们的要求加以改善的。前面两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妇女〕，为了抗战，很少注意她们的改善，这是错误的。童养媳和妓女呢，湖南妇女工作委员会已开始进行改善工作，后一种呢，叫她们提正当理由，同家庭用情感说服方法达到要求。

三、湖南省妇〔女〕组织概况

(一) 在统计之前几个说明

1、湖南各校的自治会和学生会每个学校都有，在抗战后都做了一些抗战救亡工作，我没有统计，所以没有列入表内。

2、全省妇女会是省党部领导的，各县都有分会。自新运分会成立后，他们就成为一块空招牌，只有汉寿、保靖、溆浦、零陵、祁阳等县被我们充实起来，得到当地驻军及中等人士的同情，在地方上开妇女夜校、读书班，并经常做慰劳伤兵及宣传、募捐等工作。

3、省妇慰劳会，当新运会成立时即并入该会。一部份战地服务团不久即改为战时工作队，在零陵工作，我来时没有得到正式报告，听说成绩还好。

4、由武汉到湖南的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到湖南后做了些工作，另附衡阳报告一份。

(二) 其他妇女组织产生及发展过程

在武汉紧迫时，新化妇女会领导成立了一个妇女抗日自卫队，纯为身体强健的失业的学生青年妇女，五十人为一队，每天操练及学习看护常识，颇得一般社会人士称赞，因敌占领武汉没有立即对湖南进攻，新化的封建地主份子就逼令县政府取消。另外，蔚南女中有一个童子军，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校长领导之下成立的（校长林柏森很开明），每天有军事训练，拟有计划的进行座谈会，暂时算没有遭受打击。还有邵阳、湘潭、长沙都有战时妇女服务团的组织。总之，这些团体做了不少救亡工作。从薛

湖南省妇女概况统计

名称	合法否	产生时间	人数	经常工作	经费	附属组织	政府人士对该组织态度
省妇女会	合法	很久	不详	在初成立时做了些宣传放足工作，抗战后做了募捐慰劳工作，现在成了国民党的包而不办。	党给		党部领导，一般人士不关心。
省妇女慰劳会	合法	抗战后	约四百	募捐、教育伤兵、宣传、募捐等工作。	政府津贴		政府及社会人士同情，党部不赞助。
新运湖南分会	合法	一九三八	不详	领导全省妇女工作，管理保育院及文化教育等等。	政府给	谈工、夜校、慰劳队。	全国总会领导，地方政府帮助，党部歧视，社会人士还同情。
基督教女青年会	合法	抗战前	不详	募捐、慰劳，办妇女训练班。	教会给	难民工厂、妇女夜校。	党政不干涉，一般人士同情。
战地服务团	合法	武汉失陷时	二十余	准备到战地服务。	教会给，半募半政府津贴		政府帮助，党部不理，一般人士还同情。
湖南女同学会	公开，半合法	二九三二、二九三九、二九三三	百余	出壁报，办识字班，募捐，慰劳，旅行，访问。	募捐	民众识字班、座谈会、话剧社、球队。	校内同学及地方人民同情；政府及学校当局不好，还干涉，党部不满意。

岳到湖南后，在进行民众团体统一口号之下，取消了许多抗战团体，就是妇女会没有取消，因为他早已成为包办的东西了，挂牌不做事了。现能在湖南工作的有新运分会，能够做些募捐、慰劳及保育院、难民工作。

四、妇女工作概况

(一) 妇女工作的展开在湖南是这样：由平、津、上海逃来的文化人、教员、学生与当地文化〔人〕、学生汇合起组织宣传队，四乡宣传，当时很能得到社会人士称赞。不久，得到政府帮助，成立慰劳会，会员除做伤兵慰劳工作外，还进行许多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各校的女生有不少参加湖南社训队，由政府派往外县进行妇女训练，开临时妇女训练班，规定各县、乡、保长负责，凡年满十五岁者均须受训。在部分县、区能做到一般妇女抗战教育，进而推动各地妇女办读书识字训练班等。妇女工作就渐渐推广和深入起来了。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个大的困难，就是组织妇女训练班的时候系由乡长叫来的妇女，每班有一百多人，地方的封建份子就造出两种谣言：一种就是女子一群群出来后，会闹成十年前女子被砍头的现象；另一种说法，就是妇女受训后，就要开到前线去打仗，送给日本去奸淫，因此吓得一般妇女不敢出来受训，跑到很远的山里躲起来，这倒是当时开展工作的一个大问题。

(二) 怎样克服呢？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同政府交涉，出布告说明妇女受训的意义，若有再从事造谣者即以汉奸论罪；再方面就是进行家庭访问，对他们的家长说明（沦陷后妇女就是有真被日本鬼子强奸的惨状），这样经过几个月后，才渐渐克服。

(三) 各妇女团体的经常工作：新运分会办有难民工厂、救护训练班、识字班、生产合作社、儿童保育院，县妇女会也常办妇女训练班，组织宣传队、慰劳队，并帮助伤兵工厂、医院作教育工作。

(四) 妇女团体响应政府号召都很踊跃，如一九三八年的〔捐〕寒衣运动，各妇女团体担任二万套，写慰劳信，妇女团体也做得很有成绩。一九三九年“三八”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沅陵妇女委员开大会，当天得到献金八百余元，其他各县妇女团体都响应了献金的号召。凡是募捐后方医院的慰劳品及政府每次的扩军时，妇女团体都组织有宣传队，在乡宣传鼓励妇女劝夫应征。如政府所办的义务学校，女联会常常供给教员。西南工业合作社在邵阳所办的生产合作社，邵阳妇女战地服务团派有生产常识的妇女去帮助。每次对于政府的响应都算是有成绩的。

(五) 各妇女团体所办的刊物：在湖南的妇女刊物，自抗战开始以后创办的有慰劳会的《湖南妇女》周刊。长沙大火后，新运会迁到沅陵后，在《抗战日报》上辟了一栏《抗战妇女》，内容是抗战常识，文字通俗，颇能得到中层社会人士欢迎。《抗战日报》停刊后，即在《国民日报》上划有《妇女特刊》。另有湖大女同学会，每星期有壁报。

五、统一战线工作

(一) 妇女统一战线工作是随着抗战开展的。“七·七”抗战爆发后，湖南妇女会曾葆荪、自治女校代理校长曹国智、政界太太朱王浣清，集合组织慰劳会，工作日渐开展。到张治中主湘时，整个统一战线工作都在进展中，妇女统一战线工作也同样的

扩大起来，在张治中所办的地方干部学校也吸收了一些妇女干部人材参加干部学校工作。一九三八年蒋夫人召集庐山会议时，那时湖南去的代表曾葆荪、张素娥等，她们参加了这次会回来后，更加推动了抗战女干部的团结，不久即成立新运妇女分会。内部扩大组织，分总务、宣传、教育、保育、事业各股，罗集了各种妇女干部共同进行各项工作，当时与政府、党部都有关系，他们也能帮助这些工作。后来统一战线工作就开展到外县，保育院移湘乡、大庸、永绥县，新运分会成立在泸溪、辰溪等县。党派的活动在抗战开始时，还没有其他派别另行活动，只有CC是一向表示妇女工作只要挂牌的，常与地方封建势力禁止妇女团体活动。到一九三九年三青团在湖南各县建立起来后，就在各妇女团体内进行活动，他们的活动方式：找每个团体内的个别妇女谈话，要她们加入三青团，另外就是争取团体的领导。

(二) 国民党对妇女工作的政策：第一是采取统治的政策；第二是妇女要组织起来，空叫着组织妇女群众的口号。如去年七月发动妇女（各阶层）对国民公约宣誓。

我们的对策：在统治之中要坚持各党派团结，开展妇运，组织劳动妇女，需用各种方法去切实组织起来，使之增加抗战力量，要坚决反对各地阻碍妇运的顽固份子。

(三) 统一战线的缺点和优点：

在湖南统一战线的优点：①上层、中层的妇女在一个很快的的时候就组织成功；②与党、军、政机关有经常的关系，能够得到他们在各种工作中的帮助（如长沙大火时，用公车送妇女工作人员，赵某拿大批款开难民工厂）。

缺点：①不会推动进步份子工作，不善于争取中间份子；②有些县份只专与政府有关系，而轻视其他机关，常弄得他们不

满意或者忌视。

(四) 经验教训：

好的方面：①能在抗战原则上帮助政府，响应政府好的号召，②在工作中能刻苦耐劳，建立自己的信仰（黄时雨、余书丹）。

坏的方面：①工作过于包办，不善于在工作中培养干部；②不善于接近上层太太，对她们表示轻视态度，说她们不会做事，而忘记了对她们接近，对抗战的另外帮助，就是不能做事也可以出钱，因此在第二次募寒衣捐时发生了大的困难，这就是一个铁的教训。

六、党内妇女工作

(一) 党内妇女工作是从“七·七”抗战后，湖南党的建立然后才做起来，当时湖南党对妇女工作并不很注意，没有整个的讨论妇女工作，也没有整个的领导，就是一种个别的对各团体内的女同志有些联系，因此妇女工作没有很好的基础。

(二) 转变前后的比较：

湖南党在去年三月接到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妇委的指示后，湖南党对妇女工作即开始转变。讨论中央指示及湖南妇女工作方针，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在外县建立新运县分会，充实妇女会，在有妇女群众的地方进行各种组织。另外，就是通知各县委讨论工作，布置“三·八”节，准备“三·八”特刊。省委当时组织一个妇女研究委员会，研究各地妇女状况，这样对于妇女工作算来了一个大的转变。

时间不久，因战局关系（敌人进攻长沙）省委将妇女干部派

到外县工作，妇女研究委员会解散，省妇委也没建立起来。不过，这时省委对于妇女工作，已指示各县委对于妇女工作注意彻底转变，如沅陵、泸溪、辰溪、湘潭建立了妇委；没有建立妇委的地方，要经常讨论妇女工作。

(三) 在湖南女党员的统计，原来一百零二人，在转变过程中增加了五十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三人。在湖南整个数目比较起来，一千人内只有五十，数目实在太少；党员成份，百分之七十是知识分子，百分之二十五是农妇和家庭妇女，百分之五是女工。

(四) 教育工作及妇女干部：

过去对妇女并没有什么单独教育，省委开训练班，也有女同志参加。去年沅陵妇委成立后，她们开了两次训练班，因为环境和缺人讲课的关系，时间很短。在抗战中培养的新干部，有二十余人，都很积极，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有黄时雨、余书丹、邓德润、李英华，在各团体内能活动的有十余人，能做党的工作的有四人，工人干部仅一人。虽然在湖南有这些干部，但因为过去工作的左倾，和湖南现在整个政治上的转变，许多同志都站不住脚，因此湖南要重新培养小学教员及农村妇女干部。

(五) 总结：

1、一般的妇女工作，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而在统一战线过程中进行了广大的宣传，启发了半数〔人〕对妇女对抗战的认识，使妇女工作展开到二十余县，在政治上影响到千万的妇女，打击了不少的封建分子对妇女工作的开展的阻碍，可算有相当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可作今后的教训：

第一，湖南知识妇女刚加入抗战救亡运动时，只是轰轰烈烈

的干，一点都不注意到封建势力的弄鬼，结果许多学生妇女遭受了他们的注目，唆使学生家庭出来限制，在武汉未失守前，弄得许多学生站不住脚，抽腿而跑，这样弄得工作受了相当损失。

第二，不善于团结进步分子与顽固派作斗争，常常自己单独勇敢去干，结果在工作中反受到别人的打击。

第三，不善于利用灵活工作方式去进行各种地区及各种群众的工作，常常很呆板利用一种形式去活动，以至使工作难在偏僻的地方开展起来。

第四，忽视了对妇女本身生活的改善，没有注意到抗战期内改善民生的决议（临全大会），结果失掉了许多生活痛苦的妇女。

2. 党的方面：从去年三月接到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妇委指示后，使妇女工作来了一个大的转变。指示各级党委讨论上级指示及妇女工作方针，在党内发展女同志，培养女干部；各级党委要经常讨论妇女工作，检查妇女工作。三个月内，建立了几个县妇委，发展了五十一个同志。这都是转变后的成绩，可是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第一，省委始终没有把妇委建立起来，因此没有经常妇女工作计划，所以对外县妇女工作不能给以很好的帮助。

第二，省委虽是在转变过程中注意了妇女工作，定出了妇女工作方针，可是没有严格检查许多县不能合法争取成立新运分会的原因而另给以指示。

第三，省委对于参加各团体工作的女同志还没有做到经常的领导，因此她们在工作中遇到阻碍的时候，得不到迅速的解决。

七、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根据湖南党总的方针，在目前反动统治之下，主要的是巩固组织，保持力量，教育群众。妇女工作也是一样。我对湖南妇女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1. 利用公开合法机关保存妇女干部，使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慢慢的进行教育群众工作，严禁左倾幼稚病。

2. 通过湖南党的组织，在乡支部提高每个同志对老婆及姐妹们的政治认识，通过他们的关系，慢慢的用□的组织形式去团结广大农村妇女群众。

3. 湖南湘西的农村支部，注意吸收妇女积极分子入党。

4. 在新运总会工作的同志受训回去后，湖南党要注意她们的领导，要绝对隐蔽自己的面目，耐心进行各种团体工作（保育院、难民工厂、合作社）。

5. 湖南省委如果环境许可时，还是建立妇委，可经常指导各县妇委工作及与各团体的工作同志发生联系；若不可能时，也必要有一个同志专负妇女工作的责任。

6. 要更加注意知识妇女。

湘鄂赣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工作 情形给中央、毛主席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毛主席：

我军被迫退出湘北后，决定王震率精干支队，经临、岳、平、浏敌后去湘中。首道率徐、廖支队，张、曾支队一批干部和后方全部，从事创设整个湘鄂赣边区。首道五月初到达鄂南，为即按五师党指示，以王、聂、刘、张体学（鄂南地委书记）组〔成〕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并乘川军未进攻鄂南时机，布置肃匪、扩军，改组乡政，与完成征粮、收税三大中心工作。兹将边区概况简报如下：

一、军事

(一) 得郑、李批示，成立湘鄂赣军区，以王震为司令，张体学为副司令，首道为政委，刘型为主任，朱早观为参谋长。鄂南凉子湖、大云山以东为东分区，以西为西分区。东分区以汪乃贵

* 电报原文有“AB总”、“台六月二日收，中机六月二日十时收，六月十九日九时抄出”的记载及毛泽东的批示：“抄弼、刘、康、周、彭、朱、叶、真、陈、刘、聂、陈云、贺、高。”

为司令，刘士杰、周民为正、副政委；西分区以罗通为司令兼政委，蒋树为副司令，方正为副政委。湘北成立湘北分区，以张仲瀚为司令，曾纪仗、李平（原湘鄂赣老干部）为正、副政委。

（二）全边区共有机动部队：原四分区四零团七个连，张、曾支队四个连，徐、廖支队三个连，新编支队四个连，共十八个连。地方武装，各县大队及武工队，共约一千余人。采取各个击破方法，先在鄂南消灭了曾公开投敌的成渠部一千余人，尚余一千余人，又公开投敌。五月下旬，又击溃大幕山特务武装阮宝山部二百余人。击溃盘据樊湖之冯钦武千余人，〔其〕残部与成渠勾结，逃往凉子镇一带。在湘北再次扫荡盘据太云山之王剪波部八百余人。边区东方均以长江为界，西到洞庭湖，南以通山公路为界。鄂南地区，除公路、铁路线外，完全为我控制（包括梁子湖、樊湖、鲁水湖整个富庶地带），南北二百余华里，东西三百华里，人口一百八十余万，并湘北分区三十余万，共约二百余万。

（三）全边区已建立一政权：鄂南地区，除公路、铁路线外，完全为我控制（包括梁子湖、樊湖、鲁水湖整个富庶地带），南北二百余华里，东西三百华里，人口一百八十余万，并湘北分区三十余万，共约二百余万。

（一）东分区已建立一政务委员会，计七个〔县〕：武鄂森（鄂城东南之西平边、鲇州为中心，有老基础，基本县）、鄂大肱（鄂城东南三十里之麻？^①为中心，基本县）、隆大（太子庙东北十五里之四督山为中心，工作尚差）、阳新（大冶二十里新龙山为中心，工作较好）、阳曲（阳新北二十里之大田畈〔畈〕为中心，工作较差）、□富（为游击区和秘密工作为中心工作区）。西分区已建立行政委员会者，辖四个县：咸武鄂（金牛西北十五

^① 原文如此。

里之下萧胡与金牛西南三十里之双溪桥为中心工作等)、咸通阳(通山东北三十五里之大磨山、高〔枪〕桥为中心,基本县)、咸崇蒲(汀泗桥南四十里之前沙坪为中心,有老基楚,基本县)、嘉蒲临(蒲圻北二十五里之梁山为中心,新开辟)。湘北分区计划成立临蒲县、崇通县、临湘县、岳阳县、湘平长县。现只建立两个县,即岳临县(大云山、药菇山、白羊田为中心,已建立政府工作)、湘阴(衡区政权)。整个边区已建立十一个县临时政府,即行政委员会。

(二)政权组织系统。鄂南设一专署,贺建华为专员。分区各设一专署办事处,领导该分区之政务工作,同时准备将办事处改为专署。湘北亦成立专署,亦准备于一月后召开边区临参,成立临时性的边区政府。

(三)下层乡保政权。乡公所(等于区政府)均改组,召集绅士、保甲联席会议,重新选举乡长,正乡长现是本地人,副乡长有我们委派的,也有本地人。保甲尽量利用旧的,最反动的加以改组。因初开辟工作,群众未起来,要取消保甲很困难。现在基本县乡政权大部建立,如大鄂二十个乡,已建立乡公所则有八个(五月中材料),新开辟县多未建立。这次计划将我军事控制地区全部建立乡政权。接〔近〕敌顽区公开进行合法斗争,建立所谓两面政权。

三、财政:

鄂敌后人民,长期受敌伪蹂躏,尤其国民党游击队、土匪的压迫抢夺,生活困苦。去年因又有部份遭受旱灾,人民普遍闹春荒,吃不上菜、盐者,十有八九。因此,我们财、粮极端困难。

现已动员党政干部以湖北平边为中心，进行征收田赋、公粮与整理关税计划，今后可征白米一万八千石。

四、地方党

由于国特统治严密（保甲长，小学教员，大部知识青年，都是国〔民〕党员或团员，各乡设有情报站），所以内战时党的组织全部被破坏。因此，到一个新地区，很少来找党的（只有以湖南大宁田为中心，散布于湘乡、湘潭、永丰、衡山间的湖南工委，掌握武装三百左右，礼觥、林长春与我接头）。鄂南地区有组织的党员约一千余人，地方党还没有起来，群众尚无组织，党员大部份未经过斗争与考验，质量很差。所以，现在发展地方党，培养地方干部与建立群众组织，是巩固根据地的急务。在文化方面，仅办了一个《解放报》，成立了新华分社，办了一个军政学校，有学员四百余人，现在正筹划成立一个联中，请派教育干部来。近日来，我们趁世界反法西斯大胜利和我们党的七大成功，尤其我湘鄂赣边区战争的胜利，正在举行祝捷人民解放胜利的宣传周，以提高群众、战士、干部胜利信心。在热烈群众中，怕我过江北和“红三天、黑三天”的观望心理。请抄转张启龙……（未完）^①

（有两电未来）^②

结语：目前边区主要敌人为川军，妨碍群众发动的最大困难为国民党。蒋已令王陵基为湘鄂赣边区剿匪总司令，辖七十二、九十九两个军，计六个师，五个纵队。我对敌伪采取不刺激策

^①、^②原注：“该报共分十二电，其中有六电译不出，已问对方五次，至昨（十八日）才复，但还有两电未重发来，故拖长时间。”

略，故牺牲较少。现七十二军集结修武休整，检讨第一次剿匪教训，同时准备二次剿办计划，估计不久要进攻鄂南及湘北。我军目前方针是：坚持与巩固鄂南，发展湘北敌后游击根据地。王震率精干支队深入湘中、湘南敌后，创立前进阵地，迎接后续部队向南发展总方针。我军若再能争取三个月突击工作的时间，和增加一些兵力和干部，就可用造成的办法，把边区创造成打不坍的根据地。目前主观困难为兵力不足，干部太少，经费困难。请毛主席急电郑、李，在六月上半月，调一个一千余人的主力团及一批干部到鄂南来。他们原计划五月底调一个大团到鄂南来，请你去电督促一下。另要有你的几个字，他们就会办得更快，免得我们跑及接后续部队的困难。目前敌顽军动向及我们发展方针，请立即电示。

参加本书审编的同志有：

欧阳滋 邓先戍

张叔复 王兴中

杨武姿 熊治洪

王 玲 禹丁华

